

編

卯—472

英德外版

著 漢德森
譯 楊中堅



文藝復興社四川分行印

110
D854.12
16
3
著 森 德 漢 使 大 德 駐 國 英

幕 內 交 外 德 美

譯 堅 中 楊

FAILURE OF A MISSION

By Sir Neville Henderson



3 1763 7171 8

行 印 社 分 川 四 社 務 服 化 文 國 中

譯者序

一九四〇年歲暮，正值耶誕節之前夕，譯者將英國前駐德大使漢德森爵士所著 *Failure of a Mission* 一書全都譯竟，戰前各國揮旆折衝之經過及歐局風雲變幻之景象，一時紛至沓來，蔡迫臨際；而瞻望世局，外交家且曾苦口婆心悉力以赴之世界和平，早已在烽火瀰漫中消聲絕跡；英德一度使節頻繁之外交舞台——倫敦及柏林，已日夕在攝影彈聲中震動顛倒；漢特爾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在其所作彌賽亞曲 (The Messiah) 中曾謂：「曾被宰割的羔羊是配得權柄和尊榮的。」今日喘息呻吟於納粹鐵蹄蹂躪下之猶民族，不知何日方能掙脫枷鎖重享自由——譯者之心靈此時已為原書激盪天憫人之精神所浸潤，乃不禁其百感之交集，而擲筆長嘆。

西儒霍悅業 (Hawtrey) 嘗謂：「外交為潛在性之戰爭」。外交家在國際間之縱橫捭闔，其重要且過於戰士們在沙場上之衝鋒陷陣，故每次國際戰爭爆發之前，必有一番外交上的劇鬥為其前奏。在上次歐戰爆發之前有三國同盟與三國協商之締結與對峙；在此次戰事未發之前數年間，歐陸無日不在黯雲低迷抗拒阻動盪之中，而局勢之變幻，更極精綜離奇之能事，因之外交上勾心鬥角之烈，為史所未見。歐陸各國，無論為和為戰，其

不啻亟於爭外援孤敵勢。英德爲歐洲之二雄，二國之外交關係，爲歐洲和戰之所繫，誠如著者所言：「英德邦交不謀改善，無以保歐洲之和平」。著者本「不詛咒而祝福」之精神，駐節柏林二年有奇，不顧英人之責難，而努力與國社黨周旋，其使命雖被侵略者貪求無厭之野心打得粉碎，而等待悲劇之最後一幕的來臨，但其努力不懈，與努力和乎流意志，實爲世人所共鑒。

目前英德二強，方以猛獅相搏之姿，從事於存亡攸關百世所繫之生存決鬥，其勝負之終局實爲世界未來命運及人類禍福治亂所依；至此次大戰之來龍去脈，戰爭之真正動罪，必爲史家日後所縝密探索而審慎評斷者，本書於戰爭的背景，外交的折衝，英德兩國的政策所在，德國內部的政情人物，著者無不以生動雋永之筆觸，作宏觀而詳確之描述，實爲治史者最有價值之史料，亦一般關心國際外交者最有興趣之讀物。

譯者於翻譯本書時，始終爲一種特異之感念所籠罩，卽有如目前一幕幕希臘悲劇之演出而不勝其驚心動魄嘆惋之情，著者親身充當一悲劇人物，現身說法，以戲劇式的展開，寫成此書，亦指讀者戲劇性的感受。而此一希臘悲劇，現正在國際舞台上演變搬演，且愈演愈烈，正不知將伊於胡底！

本書付梓之日，承黃季陸，程天放，張道行三先生作序，爲本書增光不少，謹於此

深致謝忱。

摯友王中柱先生將本書通篇閱正，鼎助尤多，並承王志望先生助譯一掃，均於此致無窮之謝意！

譯者謹識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成縣

譯者序

四

著者序

「我爲和平而努力，但當我現身說法時，人們卻準備戰爭。」

——公禱書聖詩第七十篇第六首

著者寫作本書，初尙猶豫不決，待至格蘭坦車站遇見站長迦德納先生後，始決意執筆。那是一個寒意料峭的早晨，我正在那裏等候開往倫敦去的火車，適遇這班火車遲到，承迦氏好意，請我到他的辦公室。我們圍爐取暖，說東說西，談到目前的戰爭及其起因，最後他告訴我，他和世人對於此事的真相都不瞭解。

本書是歷史性的敘述，我想在本書中揭露事實的真相。惟首先我得向讀者聲明，本書中所有的批評和意見，純出我個人的見解，故難免失之不確，或竟引起爭辯，不過我敢斷言所敘述的一連串的事件和事實是極端正確的，因爲本書的取材，是完全根據當時的電報公文和信札。

本書的執筆，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就開始，實不免感到有若干難言之際。第一，我是在柏林擔任海官職，而且從那時起直到現在，始終服務於英國政府。

著者序

一

第二，倘世事循着常規演進，我對於最近在私交上和我很好的人們，似不應作種種批評，至少不應在過早的時期，就筆之於書。

但不幸事情並不循着常規演進，不論我個人的意向如何，鑒於英國的外交政策最後取決於英國輿論，我覺得自一九三七年四月泰英王之命出任駐德大使以來，先後任職的經過，實有向國人作一報告的必要。

外交官的第一種任務是將本國政府的意旨忠實地轉達於駐在國政府，第二種任務是相類似的，便是同樣正確地將駐在國政府的意見和立場報告於本國政府。

第一種任務的實行是在當然許可範圍以內，所以遵守起來要比第二種容易得多，第二種任務的實行有時較為困難。當我赴德之初，內心雖能是護德，且對德國外事亦有愛之心，但我仍盡最大努力觀察納粹政體的善惡是非，並且很客觀地以德國的善惡為意見報告於英國政府。統治德國者既希特勒及納粹黨，與之朝夕周旋，實為其首腦處所在。但須特別聲明者，我決為光榮的和平而努力，且願追隨首領之後，盡瘁不辭，盡盡厥職。

兩年以來，我希望納粹革命將使國內及國際事態進入正常和文明的軌道，希望希特勒的野心將適可而止，希望他的保證和諾言至少有些信實之處，然而這些希望結果都成

泡影。許多人或許因我固執而責我對於納粹甚至德國缺乏心理上的瞭解。那亦許是事實，但時至今日，對我歷來置信於德國的信義與善意，仍不以爲是憾事。無論如何，我始終堅決主張，此種努力實屬正當而無損失，反過來說，如無這種努力，我們決不會帝國全體聯合一致地參加這次戰爭，也不會得到全世界中立國家精神上的聲援。總之，雖然一九三八年發生戈德斯堡和慕尼黑的驚人事件，截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爲止，事實上我未嘗放棄這個希望，在上年三月十五日德軍佔領捷京布拉格後，除非有旋乾轉坤的神跡出現，一切殆已絕望，然我仍作最後的掙扎。

神跡並沒有出現，九月一日德國陸空軍終於侵入了波蘭。德國不但沒有宣戰，而是一個空前的無端侵犯。的確，我現在可以說了，在戰爭爆發前一年半中間，雖抱種種希望，作種種努力，我都不有一種觀念，覺得我們正在忍心地讀一本希臘悲劇，直讀到劇的不可避免的慘痛的最後一幕。讀者們定能理解我的意思的。希特勒從未抉擇戰軍以外的可能途徑。一個人的意旨和野心會把歐洲強迫捲入戰爭漩渦，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然而事實確是如此，現在有幾千百萬的婦孺男兒不得不因此而受難而犧牲。據有歐洲最多數最精明勤苦民族的德國，處於希特勒及其秘密警察（Gestapo）與一切希特勒主義者的統治之下一日，國際條約即一日有類廢紙，國內和國際的生活亦即一日無文

明可言。

這是我在德國兩年多來對於希特勒的認識。我贊美德國人，我和他們相處，覺得在家庭一樣，相得之誼非其他外國人可比。富強而康樂的德國實與英國大有裨益。可是今日德國人正崇拜一位假神，他們的優良而偉大的性格已追逐着罪惡的勾當。德國倘不恢復其人民生活及思想的自由，並確信強者的責任是保護而非欺凌弱者，則德國將永不能臻於強盛幸福之境。

我僑居國外已歷三十餘年，在英國居留達六月之久的最後一次爲一九〇五年。自那年十二月我被遣至聖彼得堡首次任職之後，無論何年，從未在英國居留達四月以上，有幾年且終年不返祖國。然我每次返國，見到英國民衆具有豐富的常識，精確的判斷和明敏的天資，以及英國仕女的簡樸情狀，不禁深爲感動。而尤以今年九月及宣戰以前數月中所得的印象爲最深。我不妨將過去兩年間我在柏林所得到的個人經驗作一報告，但英國民衆對於目前戰爭的實質，已有深切的體認，決不會因本書而受到影響。

我們從事這次戰爭，毫無實利可言。我們只知矢忠於固有的自由精神，我們只知爲維護文明生活道德標準而戰，對於我們的使命以及負荷這種使命所應付的代價，有着完全清晰的認識。英國民族在本世紀，尤其是英國青年們的一切精神，已經貢獻於未來崇

高的人道，我本人已深體這種時艱，願以本書奉獻於英倫三島的人民以及英倫的城鎮鄉村海角天涯的男女老少。

一九三九年十月寫於斯利福勞斯別院

著者序

五

英德外交内幕

黃季陸先生序

本書的原著者前英國駐德大使韓德森，原書名 Failure of A Mission 可意譯爲「有辱使命」或「出使之失敗」。此書自出版以後，風行世界各國，在中國的書坊，也有一二種譯本，因爲趕期出版的關係，皆係擇要節譯，現在楊中堅同志特將全書譯成中文，在蓉出版，這種工作在常人往往認爲是費事而不能趨新的一件笨事，在我個人的見解，則認爲在目前的中國知識界這種「笨事」實有多做的必要。

第一，原著之值得翻譯介紹，不僅是研究國際問題的人可以得一種重要文獻作參考，而原著者文筆之生動細緻，也要算是最近英文出版界中不可多得的一種著述，譯者此項工作，我認爲是一件對知識十分忠實的表现。第二，我們對於西洋的東西現在尙是儘要努力大量介紹的時代，過去我們關於西洋學術思想的介紹所犯的錯誤，便是在取巧省事，去難就易，結果演成儘管我們對西洋學術思想如何的需要迫切，我們與西方各國接觸的時間，已經如何的悠久，可是我們對於西方學術思想中的大部名著全集，到現在翻譯成本國文介紹到中國社會的實在沒有多少。這自然是中國對近代學術思想貧弱的一個象徵，而其影響到一般知識界，尤其是中國的青年界則關係甚大！因爲我們在知識上取

巧省事，去難就易，於是造成我們對西洋文化的介紹盡是些甚麼「概論」「大要」「淺說」「ABC」等等知識了。在外國，人家來作政治宣傳的小冊子，一到了中國便成了我們所謂甚麼主義的經典了。這樣的下去，在現在這一代的人固然受害不淺，而未來的圖運和後代的青年的前路真不知要演成如何的一個悲慘的結果！

現在的政府和教育界人士最頭痛的是所謂青年的思想左傾問題，我們繼續考量這個問題的本身，可以說由於我們對於近代西方學術思想十分貧弱的原因居一大半，這個貧弱的根本原因，可以說是由於我們對於近代學術思想沒有做到有體系有計劃的介紹的緣故。人家所謂左傾或是甚麼右傾，沒有不是發動於知識體驗和深思的結果，而在我國則成爲一種毫無內容的時髦病了。知是信的起點，信是行的推動，既說不上知，何能說到信，更何能做到一個真知篤信？我曾經對許多憂慮青年思想左傾的教育界的朋友，提出過一個意見來解決這個問題。我的意見認爲只有從真正知識上去滿足青年才可以醫治青年的思想問題，從這方面着手縱然左傾這個名詞仍然可以流行在社會上，但已經不是一個可慮和可怕的思想問題了。所以我主張今日中國知識界應當對西洋的名著和各種學術思想體系作有系統的介紹。多做些翻譯全套或名人全集的笨事，少做些「概說」「淺說」「大意」的取巧工作醫治當前的毛病。要研究近代的學術思想，閱讀外國文的素

養是不可少的工具，可是我們在教育制度上斷不能把青年大部的时间耗費在學習外國文學上以增加他們的負擔；那末，現在我們能從忠實的翻譯工作上努力也是一件功德無量的貢獻。

這幾日我正在忙中過活，發行人黃大白同志要我爲這本譯文寫一篇序，我因有所感，特拉雜寫了上面一些話。關於本書的內容及原著者韓德森先生從他的自身使德二年，親與其事的經驗，把他寫出來公諸於世，讀者一閱是書全文，當可知他所提供的資料，對於研究英德外交關係的人是一個如何可寶貴的貢獻了。

黃季陸

民國三十年一月八日於成都

黃季陸序

四

程天放先生序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的一個早晨，我在柏林赫菲斯登大道中國大使館，接見英國新任駐德大使漢德森爵士，這是外交界照例的訪問。自那天起，到二十七年八月辭職返國止，和他晤面總在四十次左右；有好幾次是在宴會和公共集會場中見着，但是有許多次，是我們二人間的談話，對國際重大問題交換情報和意見。漢德森爵士給我的印像是一個典型的英國保守黨的政治家，身材瘦而長，態度沉着而老練，談吐時常常保持莊嚴的表情，但有時講一兩句諷刺的話，却非常幽默，總而言之，隨時隨地十足表示「英國紳士」的身份，對於許多問題我們看法是不同的；但是有一件事我們的意見却完全相同，就是我們都了解而且贊美德國的國民性。二十六年九月我們同車去參加紐倫堡國社黨大會，在他是第一次，在我却是第二次，大會所表現的整齊嚴肅的精神和偉大的組織力，使我們非常佩服。

當時德國在國社黨領導之下，正大規模地進行擴軍。英法等國都感到戰禍的陰影，而竭力求避免。尤其英國的保守黨政府，向來認蘇聯是最大敵人，更不願與德國發生戰爭，使蘇聯收漁人之利，所以漢德森爵士被派到柏林來，負了調整英德

邦交的使命。要調睦邦交，第一步必須儘量表同情於國社黨，瞭解國社黨的立場，然後才能取得國社黨對人的好感，才能希望促成英德間的合作。負擔這個使命，漢德森可以說是一個最適宜的人，因為他極力與國社黨要人聯絡，同情他們的政策，乃至替他們辯護，結果使英國本國的輿論和柏林的外交團，都對他不滿，稱他爲親德派。他曾經和我談起，如果他是德國人，他一定也擁護希特勒，因爲希氏解除了凡爾賽條約的束縛，復興了德國。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德軍佔領了奧國。第二天我就到英國大使館去訪漢德森，詢問他英國政府對此事的態度。他那時正忙於向政府做報告，桌上堆滿了待發的公文，但是他還和我談了十分鐘的話。由他的談話中，我明瞭了他的態度：認爲德奧合併是日耳曼民族內部的事，既然兩國人民都願意聯合起來，第三國何必去干涉呢？我辭出後，又去訪法國大使龐賽 Francois-Poncet。龐賽對德國的舉動非常憤恨，對漢德森的態度大加攻擊。那年五月捷克的事件又緊張起來，英國政府派萊錫門 Runciman 到布拉格去預備調停德捷爭端。有一次我和他談起此事，我問捷克問題會不會引起歐洲大戰？他說，依他看是不會的，因爲英國人連懂得 Czechoslovakia 怎樣讀法的人都不多，那裏肯爲這個國家流血哩！由此我們可想到英國政府

在那時已決定，不恤犧牲捷克來和德國妥協了。

從上面兩件事看來，漢德森所說他曾爲英德邦交和歐洲和平盡最大的努力，可說一點都不假。但是世事往往含有諷刺性，往往發生預料不到的結果。野心家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希特勒曾經一再聲明蘇台德區收歸德國以後，不再有領土的要求，但是不到半年，便將整個捷克併吞了，又不到半年，便進兵侵略波蘭了。這種無限制的野心，迫得英國保守黨政府不得不放棄牠的妥協政策，而造成了第二次以

• 以負有改進黨兩國邦交使命的大使，卒之在他任內斷絕邦交，實行宣戰，漢德森每

一念及此，自然免不了百感交集了。

楊中堅同志將漢德森所著 *The Failure of a mission* 一書譯成中文，取名英德外交內幕，請我做序。我就將與漢德森同事時期一段經過寫出來，以當序文，希望由此更可以引起讀者對此書內容的興趣。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程天放於峨眉

程
天
放
序

張道行先生序

我已把漢德森原作細讀了一遍，別的都可不談，有一點我們應該深信不疑的就是英國在戰爭爆發前，竭力使得德國政府知道英國所能讓步的限度，這和第一次歐戰爆發前葛雷（Grey）外交的曖昧態度完全不同。所以歷史家如菲氏（Fry）等論及首次歐戰的責任時，對於英國政府都歸咎於這一點。可是此次的英國外交，在瑟伯倫哈立法克斯主持之下，自始即希望和平，致力和平，所以才在綏靖政策的推行，裏尼黑的協定。姑不論後之史家，對於綏靖政策的評價如何。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的裏尼黑協定，是英國保守黨政府縱容德國擴展國力的最高峯，張伯倫老翁以近古稀之年，奔走和平，可謂已盡了忍耐之能事，過此限度，不僅是英國所不能容忍，而且是全世界所難熟視，無怪張伯倫在那時即會發言，希特勒先生如再有進一步的行動，以破壞此協定，則他將是英國主戰中的第一人了。

歐洲局勢迫得英國不能不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對德宣戰，張伯倫果真做了英國主戰的第一人，希特拉罵邱吉爾是戰議家，說張伯倫是好人，這好人畢竟受了她

的欺侮，實則張氏之受欺，不是在希氏之攻波，而是在三月中旬進佔捷京布拉格之時。自茲而後，注意國際局勢的人，都知道歐戰的爆發，只不過時間問題，漢氏在柏林雖嘗作種種努力，以冀和平的保持，但是他也料定大局終將無可挽回，他雖繼續在德國供職，也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矣！

因此，我們在讀完漢氏之作以後，第二點深信不疑的，是漢氏確曾爲和平而努力；他是張哈的親信，其使命即在拉攏德國走入正途納於常態，當然不致於做和平不兼容的工作。

所以這次的大戰，本繫於德國一國，而德國的命運又寄於希特勒與少數納粹急進黨徒之手，他們本了當年奪取政權的精神，繼續不已的對外掠奪和擴展，慕尼黑本來是他們適可而止的時會，而他們之間沒有一個旋乾轉坤之人，於是德國之船（German ship of state）一旦開出了海，永遠收不了舵。

因此才有這次的歐洲大戰，經過了一年多的廝殺，德國因過去準備充分，所以佔了些上風，今後的運命則可不知，因民主的英國，力量發動得較遲，所以吃了點虧，但近數月來，已是蒸蒸日上，將來真不知鹿死誰手，但我個人的觀感所及，窮寇終必危亡，正義終必伸張，侵略與非侵略之界限既清，則勝負之數，自亦不難斷

定。漢氏說：「惟願給不統復世人已生活及取相的自由，其確與時共的亦且且應讓而非默後弱者，則德國將永不能臻於強盛幸福之境」。真是至理名言。

當然漢氏之書，也有爲他國人辯護的地方，但大體上還算公平中正，楊君中堅以國人不易多得原本，乃逐譯之，並以首篇寄示於余，囑爲之序，因書所感如上，楊先生命筆流暢，用語忠實，深信一旦問世，必然爲文化界放一異彩。

張道行序於重慶·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張道行序

四

英德外交內幕目錄

譯者序

著者序

黃季陸先生序

程天放先生序

張道行先生序

第一部

故事的背景

第一章

從布諾斯愛里斯到柏林

第二章

使命的背景

英德外交內幕 目錄

第三章	到達柏林	二二
第四章	一九三七年五月德國的動態	四〇
第五章	企圖改善英德邦交	四九
第六章	戈林	六一
第七章	再謀改善英德邦交	七五
第二部	一本戲劇	八三
第二章	前奏曲	八三
第二章	第一幕：奧地利	九七
第三章	第一次休息	一〇六

第四章	第二幕：捷克·第一場：布拉格……………	一一二
第五章	第二場：慕尼黑……………	一一三
第六章	第一次休息：希特勒在慕尼黑會議後的反應	一五〇
第七章	插曲：四月後回到柏林……………	一六三
第八章	德國在十字路口……………	一七三
第九章	第三幕：布拉格的佔領……………	一八二
第十章	第四幕：波蘭·第一場：英波協定……………	一九八
第十一章	第二次休息……………	二〇八
第十二章	第四幕：第二場：戰爭……………	二三二

英德外交内幕 目錄

四

第十三章 下旗歸國……………二六八

收場白……………二七五

附錄……………二七九

英德外交內幕

第一卷 故事的前幕

第一章 從布諾斯愛利斯到柏林

一九二七年一月，著者在布諾斯愛利斯擔任英國駐阿根廷共和國大使。過了一年，忽接外務大臣艾登先生（時在鮑爾溫內閣時代）來電，授我以駐德大使之職，以遞補費澤斯爵士四月間調任駐法大使後之遺缺。因來電標明「私人的」字樣，特請我的秘書潘法德先生助我將電碼翻出，特讀悉內容，不禁發生三種感想，禁迴曠際，至今尙能歷歷憶及。

第一，駐德大使一職在整個外交事務中頗係最困難而最重要者，像我這樣的學識淺陋，實有不能勝任之感。第二，從第一種感想聯帶想起，這次被委任此職，以盡維護世界和平之責，只好算是蒼天授命。第三，我突然想起了有關世事成敗的古代羅馬的傳說，意謂失敗者的罪愆是和成功者的廟堂相毗鄰的。倘如我不被第二種感念所慫恿，使我不計一切顧忌，恐怕我對於艾登先生的眷舉將更遲疑不決畏縮不前了。

我在三月中旬離開布諾新愛利斯。我幼時雖曾請過一位德國女教師在家課讀，並且爲了準備投考外交官考試起見，曾在德國留學二年，然在海外服務三十二年中間，從未做過要應用德語的職位，因此我的德文是非常生疏了。爲了這個緣故，我這次返英特地搭乘德輪阿康那號，且預備了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奮鬥二本，以備在途中研讀。那兩本書一本是德國駐阿根廷大使贈給我的，另一本是未經刪改的原本，是我私人設法得來的。這本書中雖多誇張之詞，且又不免失之冗長，（倘刪成三分之一才能精簡可誦。）然而出於一個教育素修和政治經驗都不豐富的人像希特勒的手筆，當時在我看來究不失是一部鉅著。

阿康那號船長名叫倪霞爾，後來升爲北德勞合艦隊司令官。他很受全船英國乘客的歡迎，船上有許多英國乘客，內有孟坦普爵士，當時係英德聯誼會主席，嗣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虐待猶太人事件發生後便辭去該職。我會和尼霞爾船長晤談過好幾次，有一次他指着自己的面頰骨，使我注意到多數日耳曼人尤其是普魯士人混雜着很多的斯拉夫血統。在上次大戰中，我們所認爲真正的敵人應是普魯士人而非日耳曼人，在這次戰爭中我們的真正敵人又是納粹黨或希特勒的信徒，而非日耳曼民族，這並非是一個巧合。雖然德意志的歷史和傳統很少有着普魯士血統的，然普魯士人的思想，尤其是他們的行爲

方式在今日支配着德國的情形，實不減一九一四年和一八七〇年當年。

在民主主義的國家是以人民的利益爲前提的。但在國社主義，像希特勒所解釋的，國家高於一切，包羅一切，國民無單獨人格，只不過是國家的忠僕和奴隸而已，領袖爲國家的化身，領袖的意志是專制的（卽元首主義。）這種「元首」主義直接脫胎於法西斯主義，實則這種國家哲學誠如德國哲學家康德在其著作中所講述的，是完全導源於效忠國家服從命令的古代普魯士學說。造成類似的普魯士主義的原因是斯拉夫血統，是德國東北部的酷烈氣候，或是由於古代難於防禦的邊疆所促成的尚武精神，各種因素的成分孰大孰小，至今尙成問題。可是事實擺在前面，甚至歐德亦稱爲蠻族的普魯士人，實是歐羅巴的一個特異典型，不但使德國的其他民族沾染了他的特性，而且在西半球人看起來，實已污辱了或正在污辱着德國西北部，以及西部和南部的純潔的日耳曼人的有秩序精明篤實仁愛各種美德。一個旅居外國的英國人和德國西北西部和南部的日耳曼人相處原是非常相好的。

阿康那號船上的德國乘客中有多那伯爵和伯爵夫人，著者嗣後曾在戈東普魯士芬肯斯坦宮堡中寓居若干時，此外尙有普魯士的利奧波德公主，係已故皇后之妹，和她的獨子旅行，被遣納粹政府拘捕下獄。

在宴請船主的一個小小筵席上，我得到了初次試用德語演說的絕好機會。這且不談，這次旅程中使我最感興趣的一回事，便是我們遇見德國新造的船與登堡號的奇觀，這艘船後於五月間在美國雷克赫斯脫地方全部焚毀，喪失無數生命。她自南美洲飛返德國在半途追着了我們，把引擎的速率開到和阿康那號的速率一樣，在距離約一百五十呎的空間翱翔於我們頭頂，同時上下二船互遞無線電報，足足有五分鐘到十分鐘光景，確是惊心动魄的奇觀。當她重新發動引擎開足速率時，轉瞬間便不見它的影蹤，速度之大確使人難於置信。

我於三月杪到達南安普頓島，在倫敦勾留一月，親友間往返酬酢，一面部署履新事宜，忙個不了。那時財政大臣張伯倫已內定為繼任首相，蓋因鮑爾溫先生曾經預先表示在五月十二日舉行加冕禮後即退避賢路，所以我和張伯倫先生的會談最關重要。張伯倫與鮑爾溫意見一致，認為我必須以希特勒與國社黨為德國現存政府而努力與之周旋折衝。黨視個人自由、殘害宗教、猶太人和職工組合的德國國社黨，在民主主義的英國當然是不受歡迎的。但是他們既然代表德國的政府，一位派駐外國的大使實不容對其駐在國政府妄加批評。與納粹政府全力合作乃屬我的職責所在，正如駐在倫敦的外國大使即使同情於自由黨或勞工黨反對派，亦必和大權在握的保守黨合作，而不和前者合作一樣。

我全無開口：我欲和陳其堂合作，但陳其堂其立場的企圖，必致遭國人的指摘。「……你的良心做去，除了你本人以外，不必期望旁人的稱頌。」波頓的行爲法則是不錯的：只要你是一個嚴格的自我批判者，認識一二正直誠懇朋友，不必輕易標榜。只要你遵守這種法則，自可免去人家的非難。

張伯倫先生將其對德一般政策的意見大略地告訴了我，這和我爲國効勞的私衷適相吻合，老實說，我是始終遵循他所示的方針忠實地履行，鞠躬盡瘁，直至悲憐的最後一幕。記得我對張伯倫先生只提出過一個建議，即除本人當竭其全力以與國社黨同情合作外，英國政府務必加緊擴軍，不稍寬怠，因除出實力以外，任何雄辯不足以與希特勒政府計較。張伯倫先生對我保證他同樣重視此事，且謂這是他個人堅決的意向。

因當時輿論對於公然企圖和納粹政府合作，亦許引爲異事，所以我猶憶及當時我特向張伯倫先生請示，在到任之初如認爲必要時，可否稍有便宜行事之權。據答適當的見機行事，有時不失爲一極有效的外交方式，其價值如何，他個人最近且已體驗過了。

第二章 使命的背景

在未來首相此種諷解態度的鼓勵之下，我於四月二十九日啓程赴德。在敘述今後兩年中演變的事故以前，著者願爲讀者詳述我使德的宗旨。

我有一種堅決的信心，認爲歐洲的和平繫於英德兩國間的互相諷解。因此打定主意：第一，竭力與國社黨領袖聯絡，可能時設法取得他們的信任以至於同情；第二，復客觀地研究德國國情而忠實呈報於本國政府。使德二年又三月，我對此二原則，堅守不渝。在不犧牲本國主義與利益的原則之下，願以至誠去理解德國的表裏，同時考察其社會設施上的利弊。我的出使德國，已遭慘敗。但至少尚有自知之明。現代大使在二十世紀政府的機構中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齒輪，但無人能像我這樣爲光榮而正義的和平而苦鬥，其結果終不免於慘敗者，實是由於獨夫及其自私自利黨羽的妄自尊大和盲目自信所致。這句語并非是懷恨的偏激語，而是二年以來身歷其境精審觀察而得來的經驗談。董事實如此：我們今日從事戰爭的動機之一，乃欲決定將來某一國家以至於全世界的和戰取決權是否仍將操之於一個獨夫之手，一個變態的獨夫之手。換言之，今日之戰是爲維護民主主義而戰。

在此須特別聲明的，當一九三七年往德國履新時，我實懷有一片至誠，隨時予納粹政府以坦白和我合作的機會。當時我樂觀多於悲觀，蓋冀事情會逐漸好轉，那知他人的存心果如所見那樣不良，直至事態惡化的最後一刻，纔知道這種樂觀態度是錯誤了。

同時我把握每一個機會使德國人明瞭我所擬採取的立場。到任後一月，便承柏林德英協會（相當於倫敦的英德聯誼會）設宴款待。該會主席為薩克斯科堡歌塔公爵，當他任阿爾巴尼公爵時，我以伊頓大學學生和他相識，後於一九〇三年在波昂大學學習德文三個月準備應外交官的考試，那時也曾和他往來過。在這次宴會中，國社黨要人列席的甚多，我遂利用張伯倫先生特許我便宜行事之權，發表了一篇親德演說，致引起英法各界人士羣起責難，有些英國報紙且加我以「納粹派英國駐德大使」的稱號。我對於這次演說絕未感到絲毫後悔。它也許不利於我的使德情報，被少數國人目為「親德」。但是有時無論何人都易被人冠以對某「親善」的頭銜，所以這是無可避免的。在我赴德以前，此類淺薄的批評，我曾遭遇兩次。一次在君士坦丁堡，正當查那克和洛桑會議時間，哈林頓將軍和我都被冠以「親土」頭銜，時至今日，我們兩人實樂於接受此種稱譽。又一次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任駐南斯拉夫公使時，捷巧我和廢王亞歷山大是知交，又被指摘為「親南」和「親獨裁者」。

第二章 使命的背景

英國人民有時不知世界上倘有不如他們幸福的國家，他們不知道可而止的獨裁者有時甚至極有利於一個國家。我所謂「適而可止」者，例如羅馬古人首先產生獨裁者以應付危局，他們絕不濫用其獨裁權力，且僅限於某一時期，較諸今日之繼起者實屬賢明多多。英國於內亂以後重用克倫威爾，世之公正史家未有認為失策者。至前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獨裁者的風起雲湧，考其原因正復相同。我所引為奇事的，希特勒雖是獨裁者却是個熟讀史書者，在當權後讀史尤多（據牛賴特有一次告訴我，希特勒熟悉歷史，遠非牛氏所能窺及）。希氏曾一度對於克倫威爾作過特殊的研究，在希氏心目中，克倫威爾得終其天年為其美德之一。戈林亦曾一度對我提起，希特勒曾經看過兩本克倫威爾的傳記。固然，事實上許多獨裁者一旦大權在握，雄心勃勃，為保持其權勢計，不惜施用高壓手段或甚至挺而走險，對於其國民實已成為一種禍害，同時對於隣國則成為一種威脅。但并非一切獨裁者皆為可答的。土耳其總統凱末爾手創新土耳其其於其古國廢墟之上，其排斥希臘人的事實早被遺忘而不加追究，此事或將與希特勒以暗示，以為他應以同樣措置施諸於德國境內的猶太人。誰也不能同墨索里尼是一個獨裁者，而否認其對於義大利的偉大功績。同樣，希特勒苟知適可而止，世人亦不能不稱頌希氏是一個德國偉人；又如在慕尼黑會議及紐倫堡頒布猶太人法令後，現任葡萄牙獨裁者沙拉葉博士曾自其規律

，矢守勿渝；實為戰後所產生的最賢明政治家之一。德裁政治并非全然有害，此種主義在我們看來雖覺可惡，但因局部的不健全而咒詛整個國家，甚至整個制度，亦殊欠公允。世事敗於詭譎不清者不知凡幾，然在因社黨尚未至窮兇極惡到不可救藥地步，我決不隨便定其罪名？無論如何，我決不容許任何人加我以親德頭銜。當我離開倫敦之前，曾對艾登先生說過，此行恐將名致親德的徽號，苟有人繼續目我為親納粹或親德或親什麼，直至我離去柏林為止，他們發覺自己是錯誤了。

在本國輿論界蒙受此種名聲固屢有損於我，然因我態度誠摯而獲得德國民衆的同情，以便我為英國利益而努力的立場看來，權衡輕重，實屬問心無愧。我在德英協會宴會中發表的演說，德國各報全部刊登，只有極有趣的一段被刪去。那一段便是我在演說結尾，為求德國婦女界擁護我所呼籲的和平起見，特地援引了一隻歌曲的一節，這歌曲要是我記得不錯的話，曾經於一九一六年舉行反戰的威爾遜總統選舉運動時流行於美國各地。這首歌曲的詞句如下：

「我不令我的兒子上戰場，
這樣我很快意我很幹揚；

誰敢將武器放在他肩上，

第二章 使命的黃景

去擊殺別的母親的兒郎。」

後來据人告訴我，這是故意刪去的，因恐德國婦女真的以爲他們的兒子不是生而專爲希特勒和德國効死的。

誠然，改善和調整兩國的外交關係，是一個駐外使節唯一的中心任務，至於其駐在國內部的事情與他無關，在演說時原無庸提及。可是德國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我們在談到德國時，斷不能對納粹主義隻字不提。實際上我涉及納粹政府的言論只佔有全篇演說的一小部分，這次演說的宗旨原在於忠實坦白地解釋我對於德國政府及納粹黨所擬採取的態度，蓋實際統治德國的既是納粹黨，自不能不與之周旋。全篇演說的主旨便是英德兩國有以和平談判解決一切懸案的必要。我說，假如雙方能循此途徑，一切便可迎刃而解；同時又對在坐聽衆說，人們屢以英國企圖包圍德國的話向我責難，我敢保證此乃完全無稽之談。我又告訴他們，當我向德國元首呈遞國書時，曾對希特勒聲稱，本人確信英德二國間的問題無一不可以和平善意及互助合作的精神謀合理的解決，此語實發自心坎深處，最後並謂：「請保障歐洲之和平與謀和平之發展，德國在世界上將找不着比英國更誠懇更有益的與國了。」這實在是我所抱政策的全部基調。

我那篇演說中最使英國左派人士對我指責的一句話，是我勸英人不必專事延宕禍端

政治，倘能重視德國偉大社會事業之試驗與發展，則與大局較為有益。我說英國人由此或可獲得若干有益的教訓，所引爲遺憾者，英人目光專注於局部的畸形狀態，而未能充分認識德國的全貌。某國會議員在下議院中對此發表議論，謂「我們老牌民主政治無須對納粹主義領教。」一種大可稱賞的英人心理，以之應用於斯太林的蘇聯共產主義同樣適當；惟願反對納粹政府者不致陷於同樣的頑愚。俗諺謂「木石含訓誡，萬物有是處。」考之實際，撇開德國狂妄的國家思想勿論，德國納粹組織與社會機構，頗多有值得我們研究採用之處，對於我國民族的康樂幸福與民生主義均有莫大的裨益。

舉例來說：德國的勞働營我覺得最值得介紹於國人。勞働營的辦法，是凡十七歲至十九歲間的每一個德國男童，不論貧富貴賤，均須被迫在勞働營中受訓六個月，從事築路排水伐木和一切當地所需要的工事。在魯見看來，此類勞働營有百利而無一弊。在勞働營中不特無階級之分，反之，各階級間且獲增進諒解之機會。側身勞働營中者除獲得鍛鍊體魄的利益外，兼能體味辛勤工作的愉快和勞動神聖的真諦，因之，民族健康大爲增進。在此六個月訓練期間，每一德國男童平均增加體重十三磅，約合英磅十四磅的重量。

在拿破崙時代，不論怎樣恐怖，怎樣黑暗，法國革命所遺留下來的學說和制度，其

有利於人類，實永垂不朽。此一事實在二十世紀的現代人鮮有否認者。國社主義未嘗不是一種革命，我們不問其理論怎樣討厭，此與十八世紀末葉法國革命對於我們祖先的印象正復相同，亦以爲國社主義無一優點值得仿效，或以爲它將消聲匿跡於此世而不爲後世所歌頌，皆屬空妄之見。關於德國各種社會組織的利益和優點，已有人加以更透闡恰當的敘述，例如無懈不忘健康的運動，實由國社主義中的社會主義思想而非國社主義中的國家主義思想及者而成。關於此點，著者不擬在此多說。但我們須知追隨希特勒而爲希氏及納粹政府勤勞的人們儘有不少懷有偉大的理想者，他們的唯一目的在效忠於德國，改善國人之處境而增進其幸福。倘併此點而不予認識，未免不公之至。希特勒本人起初確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後來無疑地利用此理想主義以掩護納粹政府及其領袖們的繼續活動，但忠實於其主義的德國官吏不乏其人，如司法部長古脫納博士。財政部長克洛西格爵士，德國元首府文官長拉默斯博士，以及其他許多德國文武官員，當我離德臨別之時，對以上各人敬慕不止，德國民族的特性當以善於組織爲最顯著，德國要人如戈林上將，內政部長弗立克博士，道路建築總監鐸德博士，勞動服務部長依爾先生，以及建設德國復興德國使之臻於今日可怕的地位的士兵，海員和航空人員，莫不具有驚人的組織才幹，德國之有今日，多半得力於此輩人士。實則他們此種爲國效勞的精神，亦必爲

我所樂爲者。人們應加非難的不是機構，而是機構的誤用和隱藏在機構背後的思想。

對於上述諸人和其他許多人，我決不加以贊揚。世人每易蹈襲一種錯誤，即凡屬純粹的一切無不可以咒詛，就是因爲它的思想和我們的大相逕庭，因爲它的若干主義和多數行爲極端殘酷可怕，無可寬恕。思想上的憎惡足以爲害人類和平的程度，不減於獨裁者的野心。兩者都缺乏健全的判斷和客觀比較。結果對於納粹主義的德國責難太苛而太少積極性的建議。高欲維持中歐的和平，則在責難以外，當另闢可循之途徑。

我們或者可以說，無論我們對於希特勒及其黨羽所抱態度改變與否，今日所得的結果必仍相同。但依我看來，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的數年中，我們未嘗始終以公平對待德國；惟其失之公允，我們減弱了自己的立場而增強了納粹的意志。英國人的評判太偏於自以爲是，而納粹黨所採取的方法又往往使我們蒙昧於相互爭辯的中間。我們太重理想忽略現實，太重言辭忽略事實。我們他不以誠相見，斷不能使德國變心轉意，同時除非我們以絕對公正不偏的態度對待德國，則永遠不能以真正的民主思想和對人類負責精神，注入德國的頭腦。

自戰爭開始以來，常聽得人們談及是否有兩種德國人的問題：一種是仁善、好學、

和愛好和平的；一種是殘忍、尚武、和侵略成性的。固然在戰時只有一個爲我們打倒目標的德國、無辜者與罪徒不免同樣受難。但兩種德國民族的事實並不因此搖動，且苟不如此，未來的前途纔真悽慘而絕望了。姑且假定大多數和善的德國人在今日聽任少數野蠻橫暴的德國人統治。又假定這是德國歷史上的一貫的趨勢。更假定希特勒不過是造成歷次戰爭的一種心理狀態的代表人物。則在過去八十年間，依德國曾發動五次戰爭：（即一千八百六十年代對丹麥及奧地利的戰爭，一八七〇年對法戰爭，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和現在的戰爭，）看來，人們由此斷定德國的多數被動人民始終甘願追隨於侵略成性的少數人民之後面亦步亦趨，目前如是，今後亦復如是。但據我看來，此一論斷是錯誤的。這等於說，因爲德國人是綿羊（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這樣自述其德國民衆，）所以他總還是山羊一樣不可通。過去八十年間的戰爭可算得是誕生統一的日耳曼的進化過程中的陣痛。過度的思想家們認爲日耳曼民族的統一必須抵抗到底。蓋德國一旦強盛必致橫暴不可一世，所以德國的統一乃一種嚴重的禍害空無疑義。然而進化除遲緩以外難道能強迫停止嗎？假如我們因爲德國的統一是一種意想中的禍害而不惜堅決阻撓，那末所費代價是否將太重大？我們何不在政治上感化德國人使更澈底瞭解文明的真諦？但除非實有兩類德國人存在，我們即不易達到此項目的。如果綿羊的德國人並不始終追隨山羊的

德國人，那麼我們必須援助前者。除非我們能以兩敗俱傷的理由證明蠻幹莽撞之不足取，但這是永遠不可能的一件事。

我們對於希姆勒先生統領下的納粹組織的分歧，即秘密警察隊，不能妄加苛評。我覺得希姆勒先生在所有納粹黨領袖中是一個最神秘不可捉摸的人物。我自始便直覺地懷疑他，比較任何其他納粹黨要人爲甚。但當人們和他晤談之下，誰也不會相信這位和藹可親鼻架眼鏡貌似鄉學究的青年，竟是直接負責檢舉所謂國家公敵的魔王。然而事實確是如此。雖然人們常說關於警察事項大半由他的左右手海德里（一個以專橫暴戾出名的納粹黨徒。希姆勒的副手）發號指使。

希姆勒於一九〇〇年生於慕尼黑，因年齡關係未曾參加上次大戰，但他却是希特勒運動的最早信徒之一。他是黑衣衛隊的創建人，黑衣衛隊當一九二二年成立之初，人數甚少，但却是希特勒特別信任的貼身衛隊。

直至一九三三年止，他擔任着黑衣衛隊和巴伐利亞的警察總監。他從不對外宣傳，難得發表政治演說。可是他像鼯鼠般在地下孜孜地工作着，他的地下室分佈於德國的全境。至一九三六年不特黑衣衛隊的數目大大增加，同時德國全國警察亦歸其指揮，當時戈林統領普魯士警察隊多時，故兩人對此角逐甚烈，而最後勝利屬於希姆勒而不屬於那

陸軍上將。此後秘密警察的權力日益暗中膨脹，終至全德國自希特勒以下沒有比希姆勒權勢更大的人。他天賦勇武兼備，他所給予我的印像是野心勃勃和殘酷無情，但亦兼具敏捷的才幹。人們以爲他的生活質樸簡單，但據我所知，他在故鄉巴伐利亞德該塞地方置有一幢華麗的別墅，裏面有廣大的花園和一條私有道路，別墅四周並有自備黑衣衛隊的屯營駐紮。由於德元首下各顯要黨徒間的互相猜忌，不可捉摸，故欲知動盪不定的其間勾結情形，有時極感困難。但希姆勒和里賓特洛甫沉瀟一氣，狼狽爲奸，但二人之中以希姆勒智能優異且素性狂悖，更爲危險。秘密警察隊，就全般而言，實爲納粹政府中最可憎惡的部分，關於達喬和布亨瓦等處集中營的殘暴行爲早已遐邇傳播，無庸我來贅述。英國政府在戰爭爆發以後發表的白皮書曾以此事爲題材，此種令人作嘔的政治上的暴行和野蠻的淫虐狂只好留待文明人士去批判了。有一次我煞費苦心勸誘戈林使用他的權力來制止這些暴行。他的回答可說很特色的。他聽了我的話以後，不聲不響地走到書架近旁，取了一本德國百科全書翻出 Konzentrationlager（集中營）一字，高聲朗讀道：「英國人最初用之於南非戰爭中」他對於這樣反駁的答辯覺得自鳴得意，實則里氏雖在普魯士警務部長任內創立了這些集中營，現在却完全不加過問了，現委由希姆勒全權統制着。

在柏林和德國各地進行的可怕的密探和告發制度，雖哈塞德時代在君士坦丁堡流行的同樣制度，亦沒有這樣嚴厲。戈培爾博士的宣傳影片有一張表演着一個德國幼童（主角）告發他的父母，他的父母結果被秘密警察處了死刑。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大屠殺猶太人的謀劃，完全是由希姆勒的私人警察假扮流民所幹的勾當。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後奧地利各地的拘禁和殘暴行爲，也是德國秘密警察的工作表演。同月的月底戈林去維也納，釋放了這輩不幸者數千人，其中有一二人是我特地請他加以寬恕的，理由是他們效忠於皇帝是一種美德不能認爲是一種罪過。等到戈林一返柏林，可以獨斷獨行的秘密警察馬上又把他們拘禁起來了。目前捷克人和波蘭人所遭遇的災難大半是希姆勒的秘密警察和黑衣隊員之賜。諸如此類的賄賂行不勝枚舉，真是罄竹難書。這些秘密警察的有損於德國及納粹黨的威信，實較任何其他事物爲大，在我留德期內幾無刻不向人竭力攻擊秘密警察的作爲。記得在慕尼黑會議期間，當中通過蘇台德區應由德國軍隊佔領的議案時，我曾請求凱特爾將軍竭力設法使佔領事宜單獨由德國陸軍執行，而勿使秘密警察參加，因爲前者的行爲是始終可資模範的，德國侵佔奧地利時的情形可以證明。假如我有權可以指出造成此次慘烈可怕的歐戰的罪魁禍首，那才我將第一數到希特勒的驕妄的野心，和無畏的自大；第二要數到里賓特洛甫和一般納粹黨徒及老兵宿將的自私自利的幕後策動

第二章 使命的背景

，這些世人不知的無名英雄會和希特勒并肩作戰，幫助他清除障礙，奪得權位。因而給以德國議會議員等的職位。以行賞他們的功績；第三便是希姆勒和他的黑衣衝隊及秘密警察。

德國秘密警察的惡毒的脅迫，監獄和集中營的獸行以及密探和告發制度的無恥，在我們看來，不僅構成納粹政府的最大污點，亦爲日耳曼人的最受責難的特性之一。盎格魯撒克遜人雖亦自有其缺陷，但無疑的是尙是世界上最仁善的人。像我這樣久居海外的人特別能體驗到此點。我每次返國在多佛遇到第一個腳夫時，這一種顯著的個性立即印入我的腦際。除了澤夫萊斯法官在塞治穆耳地方敗績以後會有不名譽的偶發事件外，即使在內戰時期，英國人從未有過肆意虐殺濫施酷刑的罪行。何以他的條頓族兄弟却染有淫虐狂的性情呢？這真使人費解，蓋德國人平時原和英國人一樣地和善，其愛護小孩和動物之心一樣的自然而真誠。但一朝權勢在握，便濫用職權，大部如此，幾無例外。甚至往昔時德國軍隊中。下士欺騙壓迫兵卒，中尉欺騙壓迫下士，各級將士層層相壓。此種理由或許祇有德國人自己能完全懂得。關於此點，我曾在歷史初期從德國人血脈中充滿斯拉夫血液的事實中找求解答。這種混合血統或許是不好的，然亦祇能部分的說明這種特異的性格？秘密警察在英國必認爲是不可想像的一件事；習於馴服和聽從紀律的日

耳曼民族，何以能容忍它的方法和暴行，結果雖不贊成，但是慣了就不覺得了。

經過相當時期，秘密警察，將有消滅的一天，但就將來而論，德國的青年教育尤其使我疑慮而又悲傷。我不是教育專家，但也略知德國青年的教育過程大概如下。每個兒童六歲進初級小學；七歲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中的初級部——少年團。少年團的訓練大致相當於我們的童子軍訓練，只是團員尚須聽取國社主義（即種族優秀和國家自給自足等學說）的政治講演，以及打靶的軍事練習。年齡僅七歲的幼童便須肩荷小槍。自十四歲以上至十八歲以下的男童須強迫加入青年團本部，在這青年團中，政治軍事訓練更趨強化了。到十八歲時須從事勞動服務六個月，在此八歲至二十歲中間（即在勞動服務以後）須服兵役二年。過此以後纔入大學肄業。然在此期間仍須被迫加入國社主義的學生團體。此外尚有各種特別訓練甚多，但著者所欲敘述的只限於一般德國青年的生活，其他沒有詳述的必要。德國青年不管以後從事何種職業，除非已擔任永久性的軍事職位外，便得加入非正式軍事組織如黑衣衛隊或突擊隊之一。

突擊隊便是褐衫隊，亦即幫助希特勒奪取政權而升任德國總理兼元首的大功臣。領袖羅埃姆後來希特勒因懷疑他有奪取大權的陰謀，已於一九三四年六月使人殺害了。嗣後大約有三四百萬的褐衫隊使日趨衰落而降為一種黨的民軍，它的地位由黑衣衛隊取而

代之，成爲希特勒的特別護衛軍。後者的人數比較褐衫隊少得多（約數十萬而非數百萬），是挑選年富力壯訓練有素的人組成，其中一部分組成希特勒的親身衛隊或家庭衛隊，一部分後來改編成軍隊，其配備至少和正規軍隊一樣整齊，但不受參謀部的指揮；其餘部分編入祕密警察隊。我在本書中有時稱黑衣衛隊爲黑衫隊，但兩者是二而一的。黑衫隊和褐衫隊之間惡感極深，褐衫隊初時甚得希特勒的歡心，但卒爲黑衫隊所奪而失寵，且黑衫隊對於褐衫隊白眼相加。正規軍對於黑衣衛隊的觀感如何，雖不可知，但他們是納粹黨控制德國民衆的一個極重要的組織。黑衣衛隊的首腦是希特勒，有聲名狼藉的海德烈爲其助手。他們構成希特勒的「離開與統御」的內部鬥爭的重要因素。他希望幕僚互相猜忌，這樣他可以調人自居，排難解紛。他隨時唆使同僚相爭，而至自己謀漁人之利，無論在個人或團體間，他都能使用這種手段而結果能統御全體。

加入黑衣衛隊或突擊隊的每個德國男子，有隨時被召受特別軍訓或其他服役的義務，直過了五十歲爲止。因此，我在後面敘述我初到柏林時稱德國爲自搖籃至墳墓。無時不武裝的一個黠武國家。

這種尚武精神的灌輸，雖是危險，尚有紀律與服從的兩種可取之處，所以有益於青年是無可否認的，然有較此更有害者，則爲一無可取的政治思想的毒素，在最易薰陶時

代注入青年的頭腦。訓練青年而對於一切真正的思想自由與思想獨立加以抑制，實爲世界文明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創舉。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曾說：『只有殘忍的暴力纔能保證民族的生存』今日德國教育的目的，依重要性排列如左：

一、民族——即日耳曼民族優於一切，負有統制全世界的使命。

二、德性——即在政治上信仰納粹主義。

三、體格——即合度的身體發育。

四、知識。

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德國青年的思想以此項規定的原則爲準繩施以嚴格的訓練的。左思右想，我不禁懷疑：倘戰爭從那時候算起在六年以後爆發而不到二十六年以後發生，就德國以及歐洲的基本利益着想，是不是較爲有利？即使是有利，要把希特勒所一手造成的罪惡完全剷除，恐怕亦須一世紀之久。

任何獨裁者決不能堅信他的權位可永保勿墮，希特勒能保持他的權位，姑置其法規軍隊不論，實有賴於希特勒青年團，他的祕密警察和他的革命老同志的擁護。他一旦倒台，即最後兩類人物亦必同時失勢；他們一切爲了希特勒，他們任意可以作奸犯惡不擇手段，只要能夠保證希氏不倒。但是上述納粹主義的諸方面雖屬可憾，國內的壓迫窮農

德國本身之事，依我看來，和對外侵略是截然兩回事。英國所關切的是繼續侵略行動。當我初到柏林之時，深感因納粹某種顯著缺點而非難其整個制度，殊為不公而又不智。同時我更相信，除非由凡爾賽和約（有此才產生了希特勒）所引起的不加以矯正，無論在德國或歐洲全境將永無真正的和平希望。此事而果辨到，我相信希特勒及其存在的理由以及其政體所採用的方法，都將煙消雲散。但同時我又覺得，在放棄妥協的希望以前，儘可能地進行和解以至最後階段，此為上策。英國的傳統政策始終如此，希特勒苟有更光明的幕僚。當知此項政策的基點是實力與正義，而不是國家的衰微與懦弱，如里賓特洛甫向希特勒所進言的那樣。所以我寧願立於公正的立場，竭力在納粹政體腐敗的方面去看，並信任希特勒的說話，一直到他由行為證明他是個偽善者和失信者。這病人是無可救藥的。以致病的治療法繼續施於其身，我不信能夠手到回春。我最大的標的是和平，假如我自始即對納粹黨存有偏見，那末我對於德國人的感化必等於零。在某種意義上，我的任務適和巴拉姆的却相反。我到柏林不是去咒詛，而是儘可能的祝福。那便是我最初出使的背景。

第三章 到達柏林

我到達柏林的日子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五月一日是勞動紀念日，德國各地開會慶祝，而大部份的節目就是要人演說，我因此得到第一次機會一睹希特勒的豐采，並且有親聽他演說的機會。那時我尚未呈遞國書，所以這天完全用私人名義參加。我先赴日耳曼歌劇院，去參觀勞工紀念大會，而後再到路斯得公園。伴我前往的是大使館一等秘書寇克巴得里克。我在到任的起初十八個月裏，深得他的襄助，此後他被調到本國外交部。他在柏林已有六年。對於當地風土人情，很是熟悉，又極精明強幹，還富有夏爾蘭式的幽默。所以他的勸告和經驗常帶有愉快的情緒，這對我非常有益。我在任的後八個月中，由亞得里亞賀爾門繼任秘書，他也能勝任愉快。他對於德國的經驗當然不及寇克巴得里克那樣豐富，但是服務忠誠，勤懇負責。他最後來到使館工作，在戰爭爆發之前的最後十幾天裏，他日以繼夜地工作，沒有幾小時的睡眠。總之，我的隨員自上而下都很有力，這使我感到不勝榮幸。他們相處有如一家，我從沒聽見有過怨言，我自己亦從未自怨過。我常常感覺得非常滿意的是，他們都很一心一意地盡力工作，使我免除了許多瑣煩。

在日爾曼歌劇院，他們給了我一個位置，和別的旋節分開，那裏希特勒雖也出席，但演說的是戈培爾博士，講題是「藝術文學」，措辭流利，聲調悅耳，我聽了大為傾倒。因為所講不涉於政治，所以沒有平日宣傳裏所不能或缺的惡毒，詭辯和欺詐。

後來又到路斯得公園，那裏已是人山人海，羣衆列成整齊的隊伍，先由雷博士致詞會辭，接着便是希特勒自己演說，他對老朽的民主國家，尤其是當時德國報紙所瘋狂地攻擊英國，加以苛刻的責難。但是此次演說，主要還是攻擊蘇俄的猶太人勢力。他論到德國有一句話直刺我的心坎。他說「沒有一種民族可以逃脫自己的命運」。他指出德國民衆應該忍耐艱苦，以使德國民族完成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並且在必要時，應該在東歐作戰，去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其實德國的煩惱，未免有些言之過甚，而且這些煩惱完全不是自作自受，地理上的地位，對於煩惱上的發生大有關係。一國的外交政策，大都受地理的限制，這是世界上最顯明的真理，但是很少有人能瞭解到。

在當時，我注意的不是希氏的演詞，而是他個人的個性及羣衆的心理。我記得在柏林格萊德駐南斯拉夫公使任內，曾在無線電裏聽過希特勒多次的演說。覺得他聲音粗魯，措辭冷酷。但是他有諷諷善誘的天才，使民衆感佩。這天風和日朗，我覺得羣衆們寧願到別處去找點娛樂，而不願像包紮好的沙丁魚一般，整隊地鵝立着去聽那聽熟了了的演

說。當希特勒的聲音特別提高時，或是當他演說稍爲有停止表示告一段落時，他們狂叫着「希特勒萬歲」。希特勒的偉大，究竟在那裏？他用什麼方法使他成爲一個巨大民族的獨一無二的元首，他有什麼潛勢力控制他的部下，使他們受他的指揮？這些問題自始至終使我懷疑不止，要了解他的偉大，必須觀察他的實際事蹟，用事實來判斷。

的確是事實，他已經爲德國恢復了自尊，在一九一八年戰敗後的紊亂和苦難之中，重建了秩序。不過，德國人民所付的代價確很重大，——就是，完全喪失了個人幸福，思想獨立和言論自由等權利。大家要照着希氏的命令，思想說話，和行動去做，否則就要遭受放逐或是虐待。國社主義的軌道是直線的，稍有出軌行動立即受到處罰，不過某幾種手術也是需要的。在一九三三年德國失業人數佔全人口百分之十，——超過六百萬人數，在四年之中，失業的人數減至最低限度。直到一九三九年，反而感到缺少人工，約計缺少二百萬人。這情形固然大半是爲了軍需工業發達，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德國民族有強大的組織力，澈底和紀律都成了使希特勒成功的要素。德國民族的再生，全靠於希特勒個人的感召。無可否認的，從事實上證明，他是歷來那班不可思議的偉大類型的典型之一，他們的作爲是「改造民族的命運，不計其禍福，或是突然發揮暴力與權勢來征服世界」。是他反常的，但是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全德國民族也是反常的。

國家社會主義是一種革命，希特勒之所以能夠位居其他同黨革命人物之上，除了他有煽動羣衆的天才之外，還有一種特性，就是他的信心。他信仰德國，信仰他對於德國所負的使命，信仰他自己，和信仰他自己的偉大。信仰之外還有堅強的意志。有一次我看他檢閱他的黑衫和褐衫軍隊，那行列的經過，延長到四小時纔完畢，可是他的右臂自始至終行着國社黨的敬禮。後來我問他有什麼力量使他支持如此長久，他回答說：「意志的力量」，我不知他的意志力有多少是故意做作的。他的行政才能不及墨索里尼，我疑心他并不十分明瞭他管理下的各種事務。但是他能夠根據既定的計劃，止作自如，奮厲邁進。

我到德國的最初一年裏，常常詢問和希特勒最接近的人物，究竟希特勒有何特長？他們異口同聲的說，他的特長是他的「指尖感覺的靈敏」，意思是說：他能認識機會，頭腦清楚，目標堅定。一九三六年，他不顧參謀部和顧問們的勸告，進兵萊茵區域，就是一周明證。當時德國的軍力未臻強盛，對於法國的阻撓，不能不毫無顧忌，他的左右都認為此舉難免要受到西方列強的武力干涉，都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可是希特勒的直覺告訴他，西方列強一定可以接受既成的事實，所以不顧各種的勸告，實行他的計劃。結果，事實證明他所料的準確，因此加強了他的威望，深得他的信徒和全德國民衆的擁護。

當時的情形，英法兩國還有對這獨裁者說「不」字的可能，而不一定要用武力來支持這「不」字就可收效，不過這或許是最後一次說「不」字而不能收效的機會了。

希特勒的外表所給與人家的印象以及常人對他的論斷未免失之表面，他實在是個天才的幻想家，同時他能夠指出德國人民的需要。在他不必訴諸戰爭取得各種需要的條件之下，他的言論是絕對的，民衆對他的信任是不動搖的。在一九三八年，因蘇台德區問題，他將他的民衆牽入戰爭的深淵，這時民衆的信仰就第一次發生了動搖。一定有許多德國人在懷疑那希特勒還是爲德國前途着想呢？還是爲他自己，他的黨和他個人隱隱必着想了？現在他們或許更要懷疑了。可見現在，納粹政府和納粹組織的標榜已經滿得野間。民衆所能想或做的，只有對於制度，要人和領袖抱着不相抵觸的態度。希特勒的野心已經成爲歇斯的里亞的妄自尊大狂了，德國軍隊都已對他宣誓效忠，黨部組織全靠他的力量生存，全國青年都已訓練得崇拜武力和希特勒；這軍隊，堅強的黨部，宗教熱狂的和青年都成爲支持他的實力。所以德國民衆只有遭受磨難，無可避免了。在宣戰之後，我偶而遇到一個德國人，他說：「我們太渺小了，實是無能爲力」。

我從沒有機會在正常情形之下以普通人的資格和希特勒會晤談話，藉以觀察他的私人生活，實是一件憾事。除了偶而相遇時寒暄數語之外，我只有在正式談判時和他見面

而且所談的往往又是不愉快的外交問題。他從不參加外交界的非正式宴會。有時我的朋友特地給我安排了一個機會，他也設法不和我接近。有一個時期，他歡迎接見外賓，後來漸漸減少，他顯然不信任外交家，所以根本厭惡和他們作私人接談。還有一層理由，人物愈大，其自視也愈高。因為假如屈身相就，和常人接觸必有損偉人的尊嚴，希特勒似乎深得此中三昧。他是一個羣衆演說家，他喜歡羣衆，可是厭惡別種社會生活。他喜歡和幾個知己在一起，滔滔不絕地發揮他議論。但他招待外交團時却又忸忸不安，他招待外交團每年只有三次，一次是新年宴會，一次是每年一次的招待外交團領袖，一次是九月裏在紐倫堡國社黨大會時的茶會。

我有一個德國朋友，照他以前的官職，大概和希特勒談過多次的話。有一次他問我，在和希特勒會晤的時候，他曾否半途插言。這真是個離奇的問題，可見他自己從未插言過，但是我也沒有這種經驗，他或許不會注意我的言語，他或許像里賓特洛甫一樣，只注意自己正要說什麼，而不顧別人。但是有時他似乎靜聽別人的言論，而且他也沒有冗長可厭的言論。有一次，我對他講了五分鐘至十分鐘的話，他的回答所占的時間竟有三倍之長。從此以後，我常常避免對他發言。假使我認為他的議論太冗長，或是他的雄辯離題太遠了。我便打斷他的話頭，他也並不以為是冒犯了他。照我所得的印象總算

的情緒，並非自然的，而是人爲的，他故意做成激昂的樣子。但是幾年來爲權力而奮鬥歷次激昂的演說的結果，這種激的態度，已經成爲他的第二天性了，他亦許想到煽動家的口才要激動羣衆，對於個人一定要有同樣的影響，所以如此。無論如何，他對人民演說的時候好像在爭奪發言的獨佔權。但是在他研究某項問題時，他也很注意地聽，不過同他反駁是不准的。假使有人要一試的話，像一九三八年一月裏弗利爾將軍的事件，他是要被黜職的。

我從沒有聽見他做過寬宏大量的行動。反之，徹底的報復是他最顯著的特性。他有權力對任何人施行報復，這種報復很是持久而且難受，毋怪他的信徒都畏懼他了。表現他的報復的力量實例，實是很多。這種缺點真是他的悲劇，獨裁者往往如此。凡是有獨立意志的人都不能忍受喪失言論的自由，因爲倘若發言要觸犯主人，有才幹的人就一個一個的離開了，他的隨從日漸腐敗，最後只剩幾個唯唯諾諾的人物。他們的諂媚和順從適合他的胃口。在我住居柏林的最後一年中，這情形已變成希特勒的命運了。

他常常告誡國人不要忘了他們不如人家的缺點，可是他自已首先犯了這個過失。由於他具有煽動家的性格，他必須羣衆歡呼。假使沒有羣衆歡呼，他的親信一定要歡呼的，尤其是墨尼黑褐屋中的老勇士。但是他沒有什麼嗜好，他不飲酒，不吸煙，並且不吃

肉食。他常失眠，尤其是在柏林——所以他不歡喜在柏林居住。他起牀很遲，不喜歡在午餐後工作，但是也談得很通，往往坐着整夜的長談。在午餐之後，喜歡和美麗的青年女子作伴，閒談，藉以鬆弛精神。美麗的風景也是他所愛好的。他真正的住宅是貝許特斯伽登鎮的貝荷夫，在一座山頂上可以遙望薩爾斯堡和他的故鄉奧地利，景色甚是偉麗。那裏並沒有特殊區域的情形，我到貝許特斯伽登鎮見過他二次，覺得並沒有顯著的防禦設備保護他的安全。其實他是受嚴密的保護的，他的祕密警察領袖希姆勒負有保護他的責任。一個大使要謁見他非常便利，因為他覺得一個大使不至於藏匿手槍或炸彈的。對於旁人，假使稍有疑點，或許要加以搜查及種種為難。他的不事嚴密防禦，無非要表示他是為民衆所擁戴的領袖，不懼怕而且信任民衆的熱誠，俾給人以良好的印象。但是在這官邸（貝荷夫）四週的樹林裏，密佈着他的黑衣衛隊的營壘，樹木叢裏，或許隱藏着高明的槍手。在一座最高的山峯頂上，他還有一座密室，造成鳥巢的形式。要走完一條幾英里長的石路，經過銅門走到山邊。乘坐穿過山石的升降梯，纔能達到這密室。據說四週密佈機槍保護着，但是我沒有親眼看見，只是憑着傳說記述而已。

希特勒常常穿着褐色的外衣，此外沒有其他裝飾，只有一顆在歐戰時得着的二等鐵十字章。這方面，他和戈林不同。但是這兩種極端，都能得到德國人民的歡心。他們願

然要把戈林愛好勳章的鮮性引為笑談，但是他們也是喜歡的。同時希特勒的簡樸，也是他深獲民心的一點。他的同志們建造他們的別墅，花園，和私營各種財產，除了戈林的榜形以外，大受民衆的怨恨。和別個納粹相比之下，希特勒實在勝人多多，當然要受民衆的信仰了，別個納粹要人，往往在國外保有私蓄，可是希特勒沒有，除非是一種合法的收入，這就是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從他著的我的奮鬥一書所得的版稅。

一個大使或公使在未向駐在國元首遞呈國書之前，他的地位還不能算是正式的，不論對於該國的官吏，或是對於其他各國的外交人員，直要遞呈國書之後，纔能發生關係。喬治六世的加冕禮定在五月十二日舉行，英國教堂正在籌備慶祝典禮。在我駐柏林的大使任內，我和南非的外交同志交往最深，始終互相合作。他的確當的判斷，我非常的重視。這次他表示願意參加慶祝典禮。我一到柏林之後，破例拜訪那美國的外交同僚順便也問他是否預備參加，他用空話答復說是願意參加的。

在這裏我要帶敘述的，美國的多特在夏天請假回國後，久未回任，因為他不贊成他的政府授權美國的代表，參加九月間舉行的紐倫堡國社黨大會的政策。繼任的美國駐德大使是許士威爾遜他和多特不同，是個老練的外交家，他曾經擔任過幾年駐日內瓦的美國特派員，他有銳利的觀察，和精確的判斷，我很少看見和他同等才力的人物，我和

他過從甚密。他對於環境的認識，對於我很有裨益。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虐待猶太人的事件發生後，他就被召回國。後來他正要回任了，又遇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德軍侵入布拉格的事件發生，所以他回任的意思完全不打消了，在那次和後來幾次事變裏，我沒有了他，覺得很是不慣。

關於正式拜會，我也破例拜訪白倫堡上將。白倫堡已被希特勒派為參加倫敦加冕典禮的代表，同行者有海軍上將齊爾次，和斯登夫將軍。我到陸軍部去訪問他，並且替他和他的隨員在動身之前餞行。這位上將給我很深的印象，他年只有五十八歲，身材高大，有軍人的典型，而且容貌端莊。他是典型的舊式德國軍人。派他担任德國出席加冕典禮的代表，沒有比他更適合的了。他熱烈的崇拜希特勒。有一次他對我說，假使希特勒命令他和他的軍隊在第二天開到北極去，他們願意毫不躊躇的立刻動身。據說希特勒也同樣的喜歡他，而且一再的說，假使白倫堡背叛了他，他就要跳窗自殺。後來白倫堡並不會背叛希特勒，却是違反他的意志，因此並不是希特勒自己跳窗，而是白倫堡被人拖到垃圾堆去了。不過這件事要在十個月之後纔發生，當時，他還是希特勒最接近的朋友，最親信的顧問。

可憐的白倫堡，他是我在英門大使館裏招待的第一個德國人，也是第一個邀請我

他公館裏去的人。這次宴會參加的全是男子，除了我自己和牛賴特之外，全是軍人或是空軍人員，政府是納粹的，可是海陸空軍的高級將領都是上次大戰的軍人。我常疑惑他們對於他們的政治領袖作何感想。有的人或許熱烈服從黨的信條，當作升官發財的階梯，大部份人一定承認希特勒恢復德軍戰前榮譽地位的偉大功績。但是對於納粹的特性和干預軍事，難免要生嫉妬和紛擾的事情。

這次午宴戈林也參加，我記得當他和白倫堡以及牛賴特在膳後和我談話的時候，他們之中有一個人問我：假如有人對我行一個納粹敬禮，或是呼一聲「希特勒萬歲」時，我當怎樣對付？我回答說：「我舉起右手，手指拊攏，放在右邊眉毛之上，一寸的地位，同時立正，再喊一聲『不列顛萬歲！』」他們聽着都笑了。事實上除了一次偶然有個衣帽間的侍者，和密德福小姐對我呼喚過「希特勒萬歲」之外，此外沒有人對我行過這樣的禮。當密德福這樣做的時候正在紐倫堡，當時人很擁擠，我聽了一驚，竟忘掉了說「不列顛萬歲」，所以一點動作都沒有。

加冕典禮的前一天，我謁見希特勒並遞呈國書。我進見的前一刻適值與登堡號大飛機失事，而且謠傳有人暗算，因此他非常震怒。我每次會見他時，總遇到他感情憤激，這好像是由於我的命運不佳，我們互致簡短的頌辭後，他似乎興致索然。後來我對於飛

機失事和殉難的德人加以慰問時，他穩邀我到別室裏坐下談話。他告訴我，在興登堡號出發之前已有許多警告的信函，這飛船開始他的飛行之前，機身全部各處都檢查過。對待我的態度十分和善，但我又在想，他就治德國的祕訣究竟在何處？

許多德國人，尤其是婦女們，常常對我講起，希特勒的容光煥發，兩目炯炯。但是我注意他的眼睛，只是紅而有怒氣。這或許是我的不幸，因為我只在正式會談的時候見他。我認爲他的事業固然巨大，無人可以勝過，但是對於我並沒有偉大的印象。在德國民衆之間，他誠然是個煽動家。他在驅使德國人的魔力，也是無可否認的，我親眼看見已非一次了。但是對於我毫無影響。在心氣和平時，他的健全的辯論很能說服我。可是當他面對付國人的方法，盛氣相向時，我沒有辦法只有請他平心靜氣一下。他有相當自然的威嚴而始終懇懇的態度，但我仍然懷疑他究竟用何方法獲得現在的地位，他如何保持他就治德國人的地位。照我的意見，對於第二問題和答案：是第一、德國人喜歡受專制領袖的統治，第二、國社黨現已奉他爲領袖，一時不能更換，要避免黨的瓦解，不得不繼續支持他。這一點沒有人比希特勒認識得更清楚了。

當我謁見希特勒的時候，外交部長牛賴德和司法部長都在場，還有一個是希特勒的名翻譯兼密特博士。希特勒接見外國政治家 and 外交家的時候，總是此者密特擔任翻譯。

假使他出版一本回憶錄的話，這倒是一本涉及各問題之有趣文字。以我個人而言，始終用德語直接和希特勒談話，希特勒的翻譯工作，殊不需要，但是他常紀錄了許多東西。這對於他主人是非常有用的。有一次他允許給我一分刪改過的紀錄，當年秋季哈里法克斯幫助勸誘見希特勒的時候，也有希特勒的雙方談話紀錄給他，不過這只限於牛賴特任外交部長時期，在里賓特洛甫繼任外交部長之後，這種優待就不允許了。

牛賴特是個聰明的，經驗豐富的斯瓦比人。他在任外交部長之前曾擔任過駐羅馬和倫敦的大使。在德國人中，斯瓦比人素以節儉和保守著稱，好比英國人中的蘇格蘭人一樣。牛賴特夫婦在英國素負盛名，我非常喜歡和他們交往。他的美麗的女兒嫁給上將麥根森的兒子。他在他岳父手下擔任外交次長，這個次長職位相當於英國的外務次官。以德外交次長是魏薩克，他在大戰時是一個海軍軍官，他精明熱烈，同職又是忠實的軍人。大約一年之後，他在里賓特洛甫之下繼任外交次長。我對於他們都有良好的關係，而德外交部又是快樂融洽的機關。後來里賓特洛甫內情形就改變了。但是到那時候，我的外交情志還和我還算是很幸運的。

第五先覺轉本是與登陸政府的人物。他不是納粹黨的黨員。後來他加入黨，但是這時後他的地位變動的，是否了解希特勒和黨內部的意見，尚是疑問。有一個證據是在柏林

甚至有三種外交部同時并存。一個是羅森堡的，一個是里賓特洛甫的，一個是威廉衛的正式外交部。羅森堡的活動，在我到柏林之前已經停止了，只有里賓特洛甫的，有極常的勢力。他又是希特勒的大使，所以給予正式外交部以大大的不利。

遞呈國書之後，還有一種儀節應該實行，纔可認為正式接任。照柏林的慣例，一個大使到任，應該舉行一次正式的歡迎會。這雖然並不是一個普遍的風俗，——譬如在倫敦或是在巴黎就沒有這回事，——這倒是切乎實際有用的事。一個大使剛纔到任，技術上認為不認識任何人的。爲了要打破第一重難關，德國外交部的職掌禮節的總官，就用大使的名義，邀請外交團和政府的高級長官參加大使館的宴會，日期和時間由大使決定，費用由大使負擔。這樣，一位新到任的大使，可以認識將來所要交接的人囑了。

謁見元首之後，要我決定舉行歡迎會的日期，我是蘇格蘭人。便選定了六月十日。在外國，英王的誕辰是在六月九日慶祝的。這天是表現忠君愛國的好機會，所以我決定在那天邀集柏林的全體英僑到大使館茶會。我以爲接着在第二天舉行正式的宴會，鮮花和別種的費用，或許可以經濟一些，所以這樣安排。可是我沒有料到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和十日是柏林這一年中最熱的日子。結果鮮花上節省下來的費用，損失在這兩天飲料的消費上，而且有的花已經枯了還是要更換。

柏林的英國大使館是一座廣大莊嚴的房屋，在薩威廉街，——柏林的大康寧街，除英國大使館外大部份的德國政府機關如德元首官邸，和外交部等等都在這街上。我離開柏林的時候，俾士麥的舊宮，正在修葺，預備給里賓特洛甫住。這使館是在十八世紀一個德國人建造的。他在經營鐵道事業中暴富，後來破產了，就賣給英國政府。最初屋子後面還有一個廣大的花園通到勃蘭登堡旁邊的大街，因為種種原因，或許是因為英剛政府的實際當局，財政部官員的貪財心理，或許是國為無法拒絕德皇對英大使拉塞爾提出的要求，所以這花園最後售給阿得龍旅館。威廉二世要使德皇館成為柏林最宏大最高位的旅館，這兩種理由全有關係，也很可能。但是無論是什麼理由，使館的舒適而論，出售花園好比是一個悲劇。阿得龍旅館的大廈掩蔽了日光，旅館的火煙窗發出污穢的黑煙，這屋子永遠是黑暗和污濁。再則這位鐵路富翁，關於內部舒適的思想，似乎比十八世紀那樣的幼稚，只是浪費地方，而不是利用地方。房屋固然大，臥室只有半打。以前的大使是個已婚的人，和家屬住在一處，所以僅餘一個臥室供給賓客，實則房間的數量還比現在多，可是其中有幾間分配給使館秘書處，這秘書處的辦公室也設在使館大廈裏，雖添了幾間，他們的設備仍是不完備和不衛生。

有人認為外交官和駐外使節的全體人員都在外度着非常奢侈的生活，這實是一種錯

誤的觀念。大戰以後，使館工作比大戰以前增加更多。雖然館員相當地增加，可是使館不能得到擴充的地方，在柏林這情形尤其顯著。國內也知道這種事實，因此會令我提出意見，要更換館址。從舊城上，離開這威廉街上有歷史性的大廈不免有依傍之情，但就工作便利而論，實有更換新地址的必要。現在的館址只有外交人員和商務參贊的辦公處。商務參贊辦公處，海陸空軍各武官的辦公處，護照處，和總領事館都設在一公里以外，在另外三座屋子裏。這種辦法對於使館的工作，大感不便。

在這種經濟和政治不能分開的時代，假使工作敏捷，效率提高，更需要同事的密切合作。而且，像柏林的情形，電話只能在完全次要性的工作上用作傳遞工具。所以我的意見要更換館址，原來的地方靠近希特勒新築的大道，德國政府可以改作政府機關，而我們自己可以建造一所新使館，適合現代各種需要，可以容納全部辦公處，還可以充作大使的私人住宅。我會經對戈林和里賓特洛甫談起這個計劃，他們把我的意見轉達希特勒，我又請他轉達，說是我願意親自和他談道更換使館的事。而且我希望這事能構成某種諒解的一部，可是因為環境不甚順利，始終沒有親自向他提出這個問題。

英德使館就設備和工作效率二點而論，固然很便利，但是底層的會客室倒很適宜於盛大的宴會。在慶祝英王誕辰的日子，全柏林一千五百個英僑裏大約有一千個英國人希

加我的茶會，一些也弄不出這大廈裏有這許多客人。一半是因為他們都聚在二間房間裏，一間是餐室，那裏備着各種茶點，一間是舞廳，這裏映放着五彩的英王加冕的新聞片，影片是承福斯公司好意租來的。這舞廳可以容納三百個人，每次電影大約需四十分鐘映完，這個炎熱的下午一共放映三次，這樣每個人都能看得到，不在舞廳裏的就坐在餐室裏閒談，我一位姓幹的德籍侍役後來對我說，他常以爲德國人食量大，但是他從沒有看見像英國人那樣吃得多，我歷次的宴會從沒有像這一次那樣使我快樂。

大約有七百個納粹官吏和外交家參加第二次的正式宴會，那次吃掉的食品要少得多。映了二次電影，和昨天同樣的受人讚賞。我很感謝福斯公司的盛意，電影標題是英國的。這倒是極好的宣傳品。比英國的電影好得多。納粹官吏中很少到過英國的，我希望他們可以從電影裏了解英帝國的情形，可是他們走馬看花，就要忘掉的。但是值得提出來說的，是關於加冕典禮，德國政府統制下的報紙那次能夠擴棄反英的態度正難地報導各種儀式和加冕週內的情形而沒有絲毫感情用事。

第四章 一九三七年五月德國的動態

在敘述正文之前，我先要在這一章裏將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我接任大使時所見到的德國的情形作一個簡單的描寫。

希特勒總攬大權已有四年多了。在這期間他對於德國的軍事工業和道德的再造都獲得了長足的進展。這是很明顯的，除了對它使用實際武力之外，德國已是不能再馴服的了。

薩爾區域已於一九三五年利用有利於德國的公民投票收復了。萊茵區域則在一九三六年三月用武力佔領，並且武裝起來了。巴黎和約所加於德國的枷鎖業已完全解除。德國就積極進行準備第二步計劃，即大日耳曼的統一——包括奧地利，蘇台德區，米美爾，和但澤。軍事準備為納粹政策的鎖鑰。這時陸軍和空軍正在加速的擴充，防空設備也在大規模地加強，強迫兵役從一年延長到二年，勞動服務營的數量大增，還有全國的青年們大量地捲入希特勒青年團的組織。

我在前文曾說過，德國是從小孩的搖籃到墳墓都軍事化了。這些文字擬給大衆閱讀以發警傷。現在唯一的實際問題就是德國這種力量還是預備用以支持它的合法權益的護

得呢，還是用來滿足不合法的野心呢。

經濟部裏充滿了軍人，德國全國的經濟已是軍事化了。納粹黨的口號仍舊式「種族的純一」，和「大炮代替牛油」。全部工業計劃都要為完成四年計劃而努力，換句話說，就是使德國的經濟自給自足。納粹政策可說是把德國人民鍛煉成一架效率宏大的戰爭機器。

齊格弗蘭防線的積極建築，外人看來，是給與世界現狀的一個號。同時，在德國內部，人民生活的高漲，生活水準的降落，黨都對於人民的苛索，和個人自由的擯制等等，重重壓制着人民，因此國內阻不安。納粹的口號是「大炮代替牛油」，其實德國在經濟方面，大部份是自給自足的，要是全部油類，甚至包括牛油牛乳在內，不是用來隨炸藥，餵槍炮，德國也決不會有食品奇缺的情形。如果戰爭延長，德國決不會有饑荒發生——假如有的話，那是要歸罪於納粹政府的了。他們的政策，是四年以前發明「大炮代替牛油」這句戰時口號的時候所決定的。他們的政策對於德國婦女小孩，在現在或是將來遭受的缺乏主要糧食的痛苦，不論是現在，和未來的時期內，都是應該負責的。無論德國的宣傳機關怎樣的反從面去宣傳，那終是一件無可諱言的事實。

不少德人曾告訴我，希特勒的性情所以這樣的急躁，是由於他常常暗示着「種觀念

，就是他認為他的壽命不會久長。他充滿着奸詐使我時常疑慮我自己是不是要上他的當。希特勒已懷疑到德國的人民不能夠無限期的忍受政府給與他們的艱難困苦，所以他不得不急躁雷厲風行，在德國經濟沒有崩潰，和人民還沒有過分不滿之前，完成那軍事機構的準備，軍事機構，是在施行他的計劃，和滿足他的遠大的野心的過程中所不可少的。對於他，可說是軍事準備和經濟崩潰在賽跑。

在另一方面，德國軍備的日漸增強，使德國在外交上能夠獨立行動。所以歐洲在前一年，歐洲的政治局勢變成有利於德國。到一九三七年，德國已不再有外國干涉她內政的危機了。此時柏林羅馬軸心已經成立，幾月之後墨索里尼在九月訪問柏林，德義步調乃趨一致。這軸心成立後當各國對義制裁時期，及義接濟西班牙的弗朗哥事件而論，這軸心對義大利有極大的利益。但是實際上，德國的利益比義大利所獨到的大還要。這軸心替德國納粹黨在奧地利發動陰謀的大障礙。在一九三四年阿爾卑斯被崩的時候，使這些陰謀失敗的真正障礙消失了。

那時候納粹黨仍舊竭力打着反共之鼓，主要的原因是安定內部，此外還有一種目的，是要使國際相信德國是唯一反對共堡壘，日蘇交惡所造成論機會又促成了德日防共協定而締結。這所謂防共協定，也等於反民主陣線，自一九三七年來，義大利加入之後，

就形成特角之勢了。爲期十年的德波條約已經在一九三四年簽訂了，所以那常常自認爲在世界孤立的德國的政治地位，在一九三七年可說已是固若金湯了。納粹主義的成功，引起了別國，尤其是匈牙利，以及歐洲和海外其他國家的同情。外國境內的日耳曼少數民族熱烈地組織起來，響應祖國的運動，做主國的政治進攻的前衛。這時候真是政治運動和希特勒的全盛時期。在德國雖然在納粹黨橫征暴斂，而且糧食缺乏的時候，難免有頑強的情形，但是德國人終究是馴良的，有紀律的民族，他們肯服從，而且相信着特勤的政治運動，深得青年們的擁護。他們已是訓練得服從希特勒，情願供獻一切，差不多對上帝一樣。全部的德國青年們，受崇拜武力的訓練，已經是有七年了。他們是希特勒最忠實的信徒。

在旁人客觀地看來，希特勒奕棋的技巧，真是神妙極了，德國人民對於義大利或是日本，根本漠不關心，所以他的出奇制勝的策略，沒有一次使得人民感到興趣，可是，結果終是如願以償的。希特勒也需要和鄰國敦睦邦交，維持和平，但同時又深謀遠慮，做完成毀滅這些隣國的計劃，這些同盟國家給德國一些休息的機會，希特勒就暗中把德國造成一個達成目的的大營壘。德國和日本的條約是功效最大，非但控制了蘇聯，並且迫得西方列強要象顧遠東。一九三六年，希特勒猜想義大利的會中立。在三五月便冒險

進兵佔據萊茵河區域，德義軸心不僅是針對着英法協約國的對策，還使一九三八年略取維也納的行動成功得更容易些。如果友誼關係還對他有利，他不僅濫施秋波，對他的友人發表熱烈的言論。只要一讀他的關於軸心問題的演詞，當可覺得很有味的罷。但是一旦他們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就要被他所棄得好像沒有這回事一樣。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希特勒多次演說斥責波蘭的時候，我曾經提醒他，說他似乎忘掉了一九三四年和畢蘇蘇資某簽訂的協定對他的效力。可是希特勒的答復是，這個協定始終沒有什麼用處。這個協定的存在，只是使得他在國內失掉民心。希特勒有一個稀有的特性，就是自欺。每一件從前做過或是說過的事，要是不適合他現在或將來的目的。不配再去記憶的時候，他就完全可以完全忘却。在同樣情形之下，當希特勒感覺到聯蘇比聯日有利的時候，他就把日本攜養一旁，好像一只已經榨去汁水而擠榨一樣。希特勒統制下的德國，對於朋友的行動並不關心，在墨索里尼進行他的計劃的時候。希特勒並不費心去警告他。所以我相信假使英國準備接受德國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建議的話，希特勒也許會不惜採機找尋藉口，去撕毀幾天以前所訂的莫斯科協定的。不論口頭的或是書面的協定，只要一旦對於希特勒和德國的光榮沒有供獻了，就變成絕對沒有意義的廢物。所謂協定條約，無非是臨時的文件，用不着的，就撕毀，再另外訂新的條約。我早已說過，我願相信希特

勒起初是完全爲忠於德國而努力，後來他漸漸的把德國和他混爲一體，最後，照我妄斷，阿道爾夫希特勒的重要勝過德國了。

總而言之，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當我到達柏林的時候德國的國情是這樣的：大權集中於希特勒一身，報紙是被統制了，但是國家預算沒有統制。國內不容有反對黨的存在，每一個官吏都由他委任，可隨他的意思調動更換。德國的經濟財政顯着崩潰的跡象的時候，同時他的軍事力量在物質和人力方面正在大量的加緊的發展。還有它的同盟國也和它堅強的團結，和給它充分的利用。德國不斷地聲明，說是希特勒心中除了革命的勝利或收復殖民地之外，並沒有其他的野心。納粹主義所宣佈的政綱，仍舊尊重別種民族。這樣，歐洲的空氣就平靜了許多，所謂納粹主義有時候給人描摹得成爲最適合德國一種民主政治。這時期可說是歐洲比較風平浪靜的時期。但就德國而論，正是集中力量，積極準備的時期。那時有二個主要的政治問題，就是西班牙內戰問題。和奧地利的命運問題。在國際間，德國仍舊是代表着防禦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堡壘，共產主義還是被用作國內壓迫民衆的藉口。但是從德國報紙的言論中觀察起來，英國是第一號的公敵。要求收回殖民地的運動，在一九三六年復活之後，時起時伏，仍舊處於重要的地位。不幸英國對於德國在中歐東歐生存地域的要求，抱着獨佔的態度。我第一次訪問戈林時他對我

說：「德國沒有一次能夠採一朵花，而不遭英國說一聲『禁止』的。」要和納粹黨人討論「生存地域」一語的誤用問題，他們不會了解，或者可說是不願了解。「生存地域」的含義，是用合理的方法，加強經濟關係。這樣纔是正當的。假使要用軍事或經濟的壓力來造成政治的控制，那是不正當的。在他們，「生存地域」只是指着用軍事經濟力量來控制政治的。

至於要求收回殖民地問題，無非是暫時用作宣傳的藉口，一則可以把這要求保持着，以便將來在歐洲的慾望成功了和消化了之後，再求應用，再則使德國人民相信，他們之所以缺乏牛油和其他的享受品，完全是因為缺少殖民地緣故，而並非由於過分重整軍備的緣故。當年十月，戈林向我約略的說出二條英德諒解協定的大概時，我就問他對於殖民地問題的意見，他的答復認為殖民地是沒有關係的。當我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向希特勒提及殖民地問題的時候，他的態度是認為還沒有到討論殖民地問題的時期。照他說，他們或許要再等四年六年或是十年再說。英國的報紙上登載的信函和文章，有些挖苦這裏報紙文章的鼓吹殖民地問題，說是德國在大戰以前，根本沒有利用過殖民地。殖民地所供給它的東西，還不及它進口貿易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總之，這些殖民地可算是德國無用的累贅。我到任不久第一次和戈培爾會見，他講起德國敵人「規條三」了許多

殖民地，我反對着說，這「規摹」兩個字未曾用得不妥，因為德國的失掉殖民地，完全是戰敗的結果。戈培爾說他也了解這種論斷，不過英國的報紙發表種種虛而不實的文章說是殖民地只是累贅，而毫無用處，這種論調實在使我及德國人民大為不快。其實這個反駁到也不無理由。

我很欽佩英國報紙的力量和自由。然而我要真誠地說一句，這報紙把我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改善英德邦交維持和平的企圖阻礙了。在經驗上知道這些企圖要失敗的，但是能成功也不可。去年九月，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鮑爾溫助爵的信，他信裏認為「民主國的弱點是容易短見，這種意見是在不健全的同想和智識的基礎上倏忽的促成而竭力地施行，」鮑爾溫助爵確有一語道破之妙。當然多數報紙的論評是合理的，但是有時也難免近於偏激。假如希特勒是個正常的人物，到還沒有關係可是他對於報紙極度敏感的人物，尤其是對於英國報紙的評論，他不能細加辨別。他不了解孟却斯得指導報和別種激烈報紙的分別，因我感到倘希特勒有為錯誤的評論所隱蔽，所以時常請求替他剪裁報紙（當然還要經過翻譯）的人，把有錯誤的文章放進字紙簍去，但是毫無結果。我疑心有反英份子，正在特別注意把容易激怒他的資料，毫不遺漏的供給他。

英國報紙固然使人討厭，或竟有失公正，像反映着不負責任的個人意見，和國內政

黨的論戰等等，可是德國那些受官方統制的報紙，更是卑鄙。有些報紙竟然明目張膽地盡量造謠，像民衆觀察報 (Volk's-cher Beobachter) 或是突擊報 (Angriff) 和各種納粹黨機關報之類。Stuerner 報是著名的反猶太報紙，在紐倫堡出版，是斯德萊檳博士主編的。詈罵和侮辱是他們的慣技，他們不好算是新聞紙，簡直使人作嘔。在戰時如捷克波蘭事件發生的時候，這些報紙，假使你不覺得不舒服的話，真是讀不下去。德國青年每天被這種渣滓和曲解的謾物所薰陶，我真引爲遺憾。在柏林的報紙中，德國總匯報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還至少有點正當報章的風格，還有 (Borse Zeitung) 外交部的機關報，也有相當風格，不過在里賓特洛甫任外交部長之後也常常謾罵了。德國最好和平公正的報紙要算弗朗克福日報 (Frankfurter Zeitung) 我常懷疑它在新聞檢查之下，可以保持獨立的痕跡。我個人慣看三種晨報，和二種晚報。但是一個納粹官吏的妻子對我說，「何必如此做呢？假使你讀一種報紙，就等於讀了很多報紙。」

第五章 企圖改善英德邦交

我到柏林剛滿一月。就接到政府的訓令，命我按照張伯倫（他現在已經繼着鮑爾溫勳爵擔任首相了，）苦心孤詣所預定的方針，開始折衝，企圖改善英德兩國的邦交。第一步是邀請牛頓特及早到倫敦去討論西班牙方面的海軍問題，對於海軍問題，德國在袖珍艦德意志號在伊維柴被西班牙政府轟炸之後，已經停止參加了。再則對於國際政局，亦有廣泛的檢討。我尚記得，我向牛頓特提出這建議的時候，他很是躊躇。事實上，他是很明白——可是我沒有明白——這種建議的內在困難，然而他還是答應去徵求一下希特勒的意見，雖然，照他說來，倫敦之行，在六月二十日之後才能實行，因為他早已預定訪問巴爾幹各國首都。要在那天纔回來。但是不願種種內在的困難，德國終於接受了這次的邀請，而且約定在這月的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之間訪問倫敦。

這次的成功，我殊為欣喜，但這欣喜轉瞬成空，最終的結果，是日後惡運的表徵。我對於開啓英德談判之門的種種努力，都遭受着這惡運的打擊。起初我還歸罪於機會不好。但是不久，纔認識這是有計劃的。六月十九日，柏林官方公佈，說是接着德意志號被炸事件之後，在奧蘭沿海，又發生巡洋艦萊比錫號被魚雷襲擊的事件，結果亦未命中。

第二天我便接到牛賴特私人的短簡，告訴我他訪問倫敦之事不能實行了。二十日那天是星期日，我費了極大的早晨和上午，設法去找尋這位外交部長。我想起來他大概是爲謹慎起見，所以避到鄉間去了，目的地就不清楚了。但是終於在當天晚上在外交部花園的私室裏把他找到了。我告訴他這萊比錫的事件，只是使得訪問倫敦一舉格外的緊要。我在沒有會見元首之前，不能接受他不去的答復的，總算承牛賴特的情，把會見元首的事安排好了，在第二天的早晨和他去拜訪希特勒。

剛巧希特勒從威廉哈文港參加在伊維柴殉難的德意志號三十餘人水手的葬禮回來。希特勒每逢看見德人死亡或是聽得死亡的報告時始終是暴躁忿怒的。這時正如我第一次遇見他適逢與登堡飛船失事一樣的情景，所以他拒絕靜聽我有理的辯論，只是頑強地堅持他的立場，說是在這種時期，不能容許他的外交部長離開德國。他的態度是這樣的不合理論，弄得我無法解釋，後來遇到一個熟人漸漸的探得了這事情的內幕，我纔得到一個結論。這次萊比錫事件，——實情永遠沒有證實，——只是用作取消諾言的藉口。實際上，這訪問倫敦一事，希特勒自己並不贊同，還有他的駐英大使里賓特洛甫更沒有同意。里賓特洛甫除了駐英大使之外，又是一個全權公使，他覺得牛賴特的訪問倫敦，有損他的威望，減少了個人的自負。他的缺點是真習犯人家，這便是他失敗的原因。他

負責使命到倫敦，結果一無成就，已經是痛心死了，假使另外有人來，那是使他的失敗更加明顯，這未免使他無可容忍。我可以斷定他一定竭力勸他的主人拒絕我國政府的建議。萊比錫事件使他如願以償了。將來歷史上一定要吧一九三九年九月爆發戰事的不幸，歸罪於里賓特洛甫的。他反對牛賴特的倫敦之行的陰謀的成功，對於希特勒政策是一種極不良的影響。這件事是我的沮喪的開端。德國政府這樣突兀的取消預定的訪問，真使英國政府失望。照外交上正常的禮節，德國政府應該在萊比錫事件引起的緊張空氣消散之後，自動的定一個訪問的日子，方是合理。可是德國並沒有這樣做。只好等張伯倫發起，再作第二次的努力，在這年的下半年他遣派哈里法克斯勳爵到柏林和德政府接洽。

我早已說過，我個人第一次企圖和德國納粹領袖們改善友誼關係的努力是五月裏在德英協會的宴會席上，發表的那篇演說。我第二次努力，就是九月裏參加紐倫堡的國社黨大會。英法美三國大使，向來以為這僅僅是黨部的集會，不能算是政府的正式集會，故從未參加。一九三七年大會時，法大使屈養，美代辦吉爾勃，與我，都奉本國政府之訓令，令我們參加國社黨大會，雖然時間只以二天為限，但這尙是國社黨執政以來的第一次。

假使沒有見過這次紐倫堡國社黨大會的種種演習，或是沒有領略過那邊會場裏的偉大場面，不能算是熟悉德國納粹運動的人。這裏是極好的經驗，我在二天裏從沒有一刻空閒過。參加黨代表的檢閱禮，人數有一四〇、〇〇〇人，代表着二百多萬的黨員，（一年之後也是在紐倫堡，希特勒已告訴我黨員已經有三百萬了），希特勒青年團有青年四八、〇〇〇人，和女團員五、〇〇〇人。我還參加希特勒的擁有二萬五千名黑衫隊員的黑衣衝隊營裏的晚宴，我和希特勒，牛賴特，戈林，戈培爾，和其他次要的人物談話。

檢閱的形形色色，很是可觀。黨代表（全國各城鄉黨部的領袖）的檢閱，晚上八點鐘時。在徐柏林廣場舉行。十四萬人都穿着褐衫，分成六大行列，每行之間都留着一條走道。他們大部份在廣場裏面，還充滿四週的階台。臉都朝着一座高台。這高座台是給元首，部長，衛隊，軍樂隊，外賓和觀客登臨的。希特勒遠遠的從離台四百碼的廣場入口進來，跟着幾百個隨員，在中央大道向前整步進行。他一到場，自有一種動人的信號。廣場四週的三百多盞探照燈，一齊把燈光向上一轉一齊照射着天空。幾百盞略帶綠色的燈光，在幾千尺的高空會合，形成一個屋頂，既是莊嚴，又是美麗，好像身處水晶宮裏，一聲號令，執旗的隊伍，從廣場的遠處的一端目光不及的地方，向前行進，走上中

央大道，越過階梯，再分列在四週的道上。一部份的儀仗上，綴着電燈，望過去好像五條金光燦爛的大河，波動着在綠光交織成的圓頂之下向前推進，寂靜無聲。穿過褐衫構成的集合體，真是蔚為奇觀，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莊麗。在大戰以前，我在聖彼得堡住了六年，常到俄國劇場看戲。但在這偉大的美景裏，我從沒有發現一個可以和它比美的劇院。德國人愛好團體生活的天性充分的發達，穿了制服，整步的進行，集體的歌唱，認為非常的樂事。這納粹的革命一定很了解怎樣去適合德國人本性的技巧。這次大會，若以集體的美而論，那是壯麗的，若以炫耀武力而論，那真是不祥之兆。

希特勒青年團的檢閱典禮，在參觀者看來，也很隆重。旗幟，音樂，和歌唱，占了全部節目的重要地位。青年的熱忱，在這裏充分地流露了，大會中，希特勒，赫斯，和希特勒青年團的伊袖希拉黑都發表演說。

魯道爾夫赫斯是元首的代表，每逢希特勒不能出席的時候就由他代表。在某種情形之下，我感覺得他好似希特勒的乾兒子。戰事發生之後，他是內定為次於戈林的德國的元首第二個繼承人。在不十分艱難的場合，他也許是希特勒的第一位繼承人，但在戰時，他對於軍隊的權威，還不足以支配軍團之間的平衡。赫斯生於一八九六年，生長在亞歷山大里一個商人的家庭。他在德國受教育，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裏服役，起初在陸

軍，後來改入空軍。直到一九三五年，航空變成他的嗜好。以一內閣部長的身份，居然在航空比賽中得勝。後來希特勒禁止他再去冒着生命的危險作空中飛行了。

赫斯是希特勒的第一流起家同志之一，又是他的很好的朋友。他的黨員號次，在二十號以內。他參加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的慕尼黑起事。後來判處徒刑，和希特勒一同幽禁在藍得斯堡的礮台裏。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權之後，他也入關，被任爲不管部副員。

赫斯身高度黑，眉毛凸出，面上常露笑容，儀態又很動人，他可算是納粹領袖中最漂亮的人物了。他不喜歡多說話，並不在談話中顯露他的才能，熟悉他的人都認爲第一次的印象很是迷糊的。的確，他在德國的勢力是非平常人能想象的。總之，他是一個出類拔萃不可測度的人物，有着狂熱的性情，在必需的時候就會發揮出來。

這天早晨，天氣惡劣，青年們都從遠處跑來，鵠立在雨中，這種天氣，青年們是不會歡迎的，所以演說都很簡短。其中希拉黑的演說，雖然很短，而且內容又是極盡諂媚，常常提我元首，使人難耐，可是給我的印象最深。演辭中有些話使我很驚奇。他對青年們說：「我不知道你們是天主教徒，還是基督教徒。但是我知道你們是信奉上帝。」據我所知，在希特勒青年團裏，引證宗教是不許的。這件事未免和向來辯答宗教的隱隱言

論矛盾了。然而，在理論上，希特勒青年團是宗教自由的，但是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實際上，這種自由是被各種有效方法阻撓了，在一九一八年霍亨索倫時代上帝沒有拯救德國的失敗，所以現在，即使上帝仍可崇拜，他一定是純粹德國式的上帝，希特勒和這上帝聯合得很密切，幾乎和翼翼的上帝本身不能辨別。

希特勒自己在講演裏常常提到上帝。他並不是一個無神論者，只是他的上帝為擁護希特勒反對基督徒的上帝罷了。有一次我和他會見的時候，我們談起宗教問題，他對於英國幾個主教援助尼莫勒牧師案表示不滿。他大聲疾呼的說：「他不容忍英國牧師再來干涉德國宗教的事。尼莫勒被控叛送納粹政府，經法庭審訊之後，本來已經恢復自由。因為英國主教干涉了，希特勒便送他到集中營去。他接着說，假使有英國主教企圖踏進德國，在邊界就要把他們驅逐回去。他用此人的詞句作結論，說是「宗教自由以德國為最」。像這樣的談吐，真使我無法答覆，就是答復了，也毫無用處。他自己的國社黨宗教是自由的，這是他的意志所在，也是他的注意所在。而且他總是信仰他自己的言論。也就是這種態度，使得人們和他與摸做他的里賓特洛甫舉行談話和辯論，倍加困難，而且會不歡而散的。

同樣有意義的，是紐倫堡希姆勒的黑衣衛隊軍營的大帳幕裏舉行晚宴，進餐的時候

。黑衫團員合唱很多歌曲，接着是奏鼓樂，行十字營旗的下旗禮。音樂和操演是異常的優美。這黑衣衛隊幫助希特勒統治德國，有偉大的功績，很是重要，他們是精選體格壯健的人組織成的，「但是，」我當時寫過幾句「黑暗之中的營帳，模糊的燈光，寂靜的大地襯托着黑色的制服，鼓和喇叭上畫着的骷髏架及十字形腿骨的圖案給人一種惡劣恐怖的印象。」的確，我覺得好像回到華倫斯丹時代，和十一世紀的三十年戰爭的時代了。

但是除了各種軍事的和非軍事的場面所給與的威管之外，紐倫堡還給我下列的印象：第一，從這幾次大會的報告裏觀察所得，空氣已經比從前恬靜了，一則由於漸漸有實力充足和自信的體念，一則由厭煩的情緒的增加；第二，從第一個推演出來的，納粹主義有進入安靜局面的希望；第三，從我和納粹領袖們的談話裏得到的結論，英國和德國有諒解的可能；第四，諂媚希特勒的情形，日見增多，幾乎變成崇拜的偶像了；第五，是組織嚴密的印象。

希特勒這次對我特別表示好感。無疑的，英法美代表的出席使他很高興，他知道這是由我發動的。我乘此機會對他說，牛頓特赴英這事，假使他認為有價值的話，英國還是歡迎的。可是提到這一點，就立刻難以接近，他說恐怕這種訪問要引起非分之想。他認為訪問之前的先決條件，英國的報紙應當改變態度，對於納粹主義應該有一副正確

了解。

這天午餐席上，我和戈培爾博士，就兩國報紙互相攻擊的問題作了一次長談。這次談話並無新的發展，結果這報紙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但戈培爾的態度很是和藹可親。他有「小博士」之稱，就智力而言，他可算是納粹領袖中最機敏的人物。他從不演說，極有辯才，在私人談話中，非常的心地公正，頗有理性，就我個人言，只要有機會我是極樂和他交談的。以他的容貌品性而論，他實在是典型的愛爾蘭煽動家，而且或許是屬於克特勒種，他生長於萊茵河區域，曾在基督教的學校裏受過教育，身材短小，雖然身體畸形發育。在柏林和共產黨鬥爭，替希特勒和納粹黨爭奪地盤的時候，滿身都是勇氣，但是在台上辯論或是執筆撰文的時候，措辭的酸辣奸詐是沒有人比得上的。

第二天我遇見牛賴特，他比希特勒容易接近，他告訴我，他覺得希特勒的態度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現在憤怒的情緒已經減低而且無望和英國成立諒解。可是他並不提及他訪問倫敦這件事希特勒是否還有允許的可能。在談話之中我問他究竟德國的最大目的是什麼，他的答案：「奧地利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目的，蘇台德區的德國人問題是和平妥協的，只要捷克脫離蘇聯路線，而且真正的尊重德人的平等權利，情緒就可以順利解決了。」我覺得這種說法有二種性質，對於說明德國的政策，還有一半的真實性，同時

在保證這一點，又有欺騙的性質，——就是，承認某種目的，同時附着一個積極的聲明，保證以後不再有其他的要求。毫無疑義的，當時奧地利的確是希特勒的最迫切的目的。所以在說明一九三七年國社黨大會的情形之時，我這樣的呈報政府，「德國今日非但能夠期待，而且在期待的過程中，可使實力培養得更強盛一些，使得將來的目的更有把握。德國最大的目標是德意志的統一，假使我們要反對，那末首先應向我們自己開一個主要問題，「怎麼辦？」——僅僅對獨裁者說一聲「不准」，而沒有準備戰爭去貫徹，是沒有用的。

這時我和戈林作了一次長談，奧國合併的問題也曾提出討論，他堅持此事已無可避免，他還告訴我，在幾天之前已經見過奧地利外交部長希密特，並且坦白的對他說，要奧國政府善意的接受合併，愈早愈好，不然難免發生流血事件。但是我大部份的時間是要求他用書面舉出（A）所謂英國企圖包圍德國的具體事實和（B）德國最終的目的，這是在七月間向他提出要他答覆的。戈林雖說準備一談，並且發表意見，以待「希特勒核准」，可是，不用說，我從未接到過這種書面的答覆。在這次談話中，戈林又提起這問題，說是預備再和希特勒商議。他說如果我肯在十月初同他往東普魯士的羅明頓去行獵，那時或許給我答覆。這個邀請我立刻樂意地接受了。

戈林平日暢言無忌，有時甚好爭辯。但是和我交談幾次，雙方開誠佈公，出之以友誼的態度，從未有不融洽的情形。他爲人公道，不像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那樣容易被個人的私怨所激動。我自始至終認爲他個人確是有和英國維持和平及友善關係的誠意。在紐倫堡他還重申這一點，但同時他又說，假如英國拒絕和德國合作，那時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把英帝國加以摧毀。他說德國於不得已時或許要修改英德海軍協定，這樣說的德國人，他是第一個。於是我對他說，這樣的措施，結果難免要引起戰爭，幾個月後我又對他說，他也承認這種可能，表示不勝遺憾。他又補充說當時希特勒堅持訂這協定，無非是保藏一只將牌，預備出奇制勝，在最後關頭拿出來做討價還價的張本。他們，在這方面，比希特勒誠實。從戈林的暗示中，我可以猜想，廢止海約這件事，在希特勒的心中早已籌之成熟。根據後來的經驗，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希特勒永遠沒有遵守條約的誠意，一到不適合他利益的時候，就要拋棄，那時他正在重整巨大可怖的陸軍和空軍，要同時重建海軍，事實上殊多困難，而且，物質上也不可能。所以在希特勒心中這海軍協定的唯一的作用，是要解除英國及對他的中歐計劃的力量，讓他的計劃可以實現，此後或許是大英帝國的轉變時期，現在還不能作任何的定評。

勞希寧在他著的破壞性的德國革命一書中有一段說到這一方面，很是透徹，因爲作

者有一時期曾經和希特勒過從很密，他這樣的描寫希特勒的性情：「他準備簽訂任何條件，他準備保證各國現在的疆界，並且和任何國家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照希特勒自己的意見，勞希寧說：「不利用權詐，實是愚夫之見，因為終有一天各種正式的條約，都將撕破。每一種信誓旦旦的條約，是遲早要廢棄或是不合時代的。假使有人不顧條約怎樣，不顧環境如何，對於條約都不捫心自問，詳加考慮而死命遵守，他一定是個蠢夫。他可以簽訂任何條約，但是只要對於德國的前途有利，他就要無情地在第二天就把牠撕毀。」這是希特勒對於條約神聖的觀念。但是這時候，前途尚有希望。我在巨哥斯拉夫的貝爾傑度簡短的假期，應雷根公主之邀，在荷遊之地行獵，此後就動身到維明登，和戈林一同行獵了。

第六章 戈林

納粹各要人間，戈林最同情我。他大概是指使一九三三年縱火焚毀國會案的主動者，他是希特勒最親信的人，所以一九三四年在羅姆清黨時期，希特勒交他一人辦理。在任何危局當中，譬如在戰時，他會變得很殘酷。他有一次對我說，他所崇拜的英國人是海盜型的人物，像佛蘭西司德雷克之類，他責備我們英國人已失去了剛強的天性。事實上，他自己就是一個典型的殘酷的海盜，可是他也有一種可愛的品性，所以我坦白承認，我私人是很喜歡他的。

希特勒的許多同志裏，戈林受的教育較好。他的父親做過德屬西南非洲的第一任總督。在南非戰爭的時候，戈林還是一個孩子，他不顧父親的反對，他熱烈附和荷蘭的移民，有一次他曾經告訴我，他至今還保存着垂邊帽子，上面寫着「黑爾門，戈林，荷蘭人的將軍」的字樣的照片。那時候他還貢獻他的全部的區區儲款——他的叔母給他的一二枚金幣——捐助德國的荷僑。因為結果在一九一四年大戰時南非助英作戰，他說這是他終身最不勝遺憾的。在我第二次到紐倫堡去的一個下午，他曾經招待我去參觀這一座小小的屋子，在凡爾登斯坦建築在佛爾哥尼亞山上一叢保壘的遺跡之間，這些保

第六章

在十一世紀和十二世紀裏建築，用來防禦斯拉夫人的侵略的，在那邊，他度着童年生活。他很勇敢，是鄉村兒童的領袖。

在一九一四年他曾當過步兵的軍官，但是不久就轉入空軍，擔任里區托芬空軍隊的駕駛員。這空軍隊有好久的時期是英國空軍的死敵，他自己曾經建立了許多空戰偉績，受過獎章，差不多和我國的維多利亞十字章相等（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期間，在德國一共頒發過九百個這一類的勳章。）一九一八年我國取得了制空權。里區托芬弟兄二人戰死，這空軍也損失了三分之二。戈林繼任隊長，勇敢地指揮殘餘的飛機作戰，一直到大戰終了。休戰的日子到了，他拒絕把飛機移交給協約國，他眼見祖國破碎，氣憤填膺，又嫌惡德國的革命，因此，到瑞典去隱居，擔任一個民運航空的職務。在瑞典他和一個望族的女兒結婚。在希特勒運動的初期他便重回德國。在納粹黨裏，他的黨員號數在九十之內。能夠做前一百名之內的黨員是一件極榮譽的事，像元首的代表和第二個假定的繼承人赫斯是二十幾號，但是大部分的老黨員是比較地無甚名望，他們主要是担任着慕尼黑黑褐屋的工作或是擔任國會議員等的職務。

誰都知道希特勒對他的老同志很忠實。他們互相倚附，安危共當。這些老同志在政治上處于比較不重要的地位，所以我感覺得這些人，反是在那些納粹部長後面支持他們

的潛勢力，這些要人，只是徒有其名欺騙民衆的掛名人物而已。希特勒的爲人，和一般的獨裁者一樣，善於權變，包藏虛偽。政府中有着善良的人物，如牛賴特克洛西克伯爵根室博士和沙赫特博士等担任官職，那末坦直的德國人民就必然的認爲是誠實的政府了。

戈林本是上次大戰中的戰士，曾經立了許多功勛，所以他加入納粹黨之後，就成爲最活躍的領袖，被稱爲納粹運動的勇士。他參加一九二三年的慕尼黑起事，受了重傷，結果逃亡了沒有受到監禁，幸而他妻子盡力護侍，他得恢復了健康。三年之後，他妻子死了。他非常的愛她，所以她的死亡給他精神上很大的打擊。在柏林之北四十英哩的休夫海特他的一所別墅，就用她的名字，題名加林別墅，她的墳墓就築在這別墅裏，以表紀念。十餘年後，戈林和一個美麗的女伶名叫宋納的曼結婚。在一九三八年生了一個女兒名叫愛達，他非常的快樂，這孩子也有像他父親那樣的碧藍眼珠，好像是他的遺像。

我喜歡戈林太太和喜歡戈林一樣，她性情溫柔坦白，一點沒有做作。我第一次和她相見是在大使館招待加拿大首相麥根齊金的盛宴席上，金氏在參加一九三七年六月的帝國會議之後便道遊歷柏林，所以我設宴招待他。席終有一碟乳酪餅他拒而不吃，說是醫生囑咐她不要吃，我就說，這是保持美容的問題，她答道：「不，黑爾門是喜歡胖婦女

的」我中辯說並不是我喜歡批評人，不過我以為只有女子應該注意美容的問題。緊接着意見，虛榮的修飾不適合男子，而對於女子則可增加美感，她的丈夫愛好修飾是很著名的好修飾了。但是她只是說：「你真這樣想嗎？我倒贊成男子修飾的」她說得如此的直率 and 自然，當然便別人見了不得不喜歡她。我見她次數愈多，我愈喜歡她。假如她關心政治，那末她和她的小孩對於戈林的生活一定大有好處的。我深信如果這位上將有決定的力量，他決不會像希特勒那樣在一九三九年來發動戰爭的。在一九三八年他絕對站在和平的一方，反對發動戰事的經過，這事我在後面還要敘述的。在當時曾謠傳說他爲了這事，失去希特勒的許多信任。假使他在一九三八年沒有爲和平努力，或許在一九三九年他要作一次同樣的努力。一次是經驗，二次就要被希特勒認爲過失了，不幸得很。戈林已有一九三八年的事蹟，現在不能重演，構成了一幕希臘的悲劇。他是希特勒的忠僕，我從沒有見過比他對希特勒更忠誠和專一的人。他是一致公認的第二名巨頭，他常常使我知道他是元首的當然的繼承人。身居第二位的人往往自視甚高，可是在我和他幾次開誠佈公的談話裏，戈林從來沒有誇耀過他自己在納粹革命裏的功蹟，每件事他認爲都是希特勒做的，一切光榮都是希特勒的，一切取決於希特勒，而他自己毫不足道。他在納

粹政府裏所擔任的職務之多，五分鐘方能數完。如果沒有了戈林，希特勒將不知所措了。希特勒的腦中或者想到不可能的事，但戈林能做到。德國空軍的建立是一件偉大的成功，這全是戈林的成績，足使他引以自傲的。雖然他拘小節，雖然他歡喜修飾，制服，勳章，珠寶飾物和畫片，和喜歡羣衆的歡呼，但他對他的偉大功績，不過分誇張。他也有福爾斯太斐（Falsification——譯者按：係莎士比亞劇中一個肥胖好色的兵士。）的幽默，他成了許多柏林人取笑他的弱點和焦點，這點他和希特勒和戈培爾不同，取笑希特勒和戈培爾是要犯罪的。在一九三九年初期，柏林的戲院裏，有許多的滑稽喜劇都經命令禁止。違反這命令的就要送到集中營裏去監禁。在慕尼黑有個著名的滑稽戲劇家，常常在達河集中營裏嘗鐵窗風味。

大部份關於戈林的軼事是善意，而且，像下面所說，大都是關於他喜歡在他廣闊的胸部裝飾勳章的事。「希特勒有一天去見上帝，上帝說：『我很喜歡見你，亞道爾夫，但我希望你不要叫你的朋友黑爾門來，他每來一次終要摘去一顆星，』這是一個笑話。另外一個故事是一個汽車夫在黑暗中和上將的車子相撞，被捉到法庭告他以駕車不慎的罪名。他申辯着說，這不是他的過失而是上將不好，因為他忘却把他勳章的光芒遮掩起來。他就被釋放了。還有一件是關於戈林的空軍的故事，一九三八年危機時代在柏林很

流傳，柏林人說：「英國的飛機多得遮黑了天空，法國的飛機多得使你看不到太陽，但只要戈林的按鈕一按，天上的鳥兒無處可飛，只得落地走路了。有人說德國人不善幽默的，這句話對於柏林人就不大確當了。」

雖則他在服從命令，或執行計劃的時候，毫無顧忌地表現着殘酷的性格，他又愛好虛榮和修飾，但是他還有善良的本性。雖然像一般的德國人一樣，很少憐憫之心，但是他愛好小孩和動物。以前在加林別墅的頂層，特開一間遊玩室。裏面有各種迎合現代兒童心裏的機械玩具，他除了在那裏和小孩們玩耍之外沒有再快樂的事了。玩具的種類包括飛機的模型，投擲重轟炸彈轟炸不設防的城鎮。但是當我加以非難的時候，他說教導兒童過於文明或謹嚴，那不是納粹主義的生活觀念的所在。沒有兒童的時候，他和一只初生的小獅子玩耍，這小獅子常在別墅裏面出現，直至愛達生下來以後。每隻獅子長到十個月的時候就贈給柏林動物園，養在同一隻檻內，戈林夫人有時獨自一人進獅檻和這些獅子玩，管理的人看了都非常害怕。

戈林精於射獵，又是第一流的來福槍手，他手定的德國狩獵法可說是保護和改進動物生活的模範。在德國各種鋼質捕獸機絕對禁止，兔子在德國不准打獵，在英國則不然。戈林不願管理森林人的勸告，在他廣有十萬畝的加林別墅裏養鹿，結果成功了。

他非但想試養歐洲野牛並且要養原始的野馬。如同古時希臘房屋的椽條上刻着的那種馬。全世界的狩獵家都承認他對於國際狩獵事業的供獻。他主持的一九三七年的狩獵展覽會確是空前絕後的完美，範圍之大，甚至勝過一九一〇年維也納的狩獵展覽會。

戈林的職銜除了空軍創建人和空軍領袖，森林部部長，狩獵會會長，國立歌劇院長，和各種國立博物院院長，普魯士總理，和二十餘個其他職位之外，他還是經濟部的最高首腦，和四年經濟計劃的主持者，以森德爾經濟自給自足的工作。一個空軍領袖兼着運許多職位實足驚奇。但是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很讚他批閱公文，研究表格，和攝取要點的才能很強。他實在是幹練的墨索里尼典型的政治家，希特勒及不上他，他所以能夠做到第二領袖都是因為他的組織能力。希特勒不在外交政策，希特勒及不上他，他所以許要和別人商議，可是在實行之時，戈林是不可少的顧問，在危局彷徨時愈顯出他的忠誠和努力，他個人的身望對於政府大有裨益。照我的觀察，除了戈林之外沒有一個納粹領袖是這樣的深得民心。有幾個納粹領袖如里賓特洛甫和希姆勒之流，都失了民心，德國人也許是馴良的，但是並不是愚蠢的。

戈林的工作雖甚繁多，但他不但抽暇接見訪問他的人而且給賓客們充分談話的時間。在他面前，人們可以坦白的暢談，他不會輕易的發怒也毫不觸犯賓客。在賓客滔滔不

絕地談話時，他能夠很忙的擔任要點。這並不是我過於自誇的話，在和他作長談的時候，我會經修改他的意見，他常常虛心接受，並且願意受教。譬如他常常詢問關於英國和英國人民品性的問題，對這些問題他的見聞非常豐富，雖然有時難免歪曲事實，但是他也常常發表精警的見解。一般人往往長篇大論喋喋不休使人討厭，可是他除了和我最後會見的一次之外，從沒有發過冗長的言論。照反納粹派看來，他是生性殘酷和惡棍一樣。但是撇開政治而論，他也有許多優點。在八月三十一日我和他晤談了兩個小時，當時波蘭大使正在謁見里賓特洛甫，這時距離德軍侵入波蘭領土和派遣他的空軍在黎明時轟炸波蘭飛機場之前只有幾小時。這是出師的命令還未經希特勒作最後的簽署，大局的安危繫於李潑斯基和里賓特洛甫的會商。戈林雖然已在準備發動戰爭。似乎至少還抱着一線的和平願望，偶然他給我一個無條件的保證一旦和英國開戰他的空軍轟炸祇限於軍事目標決不炸及不設防的城市。我說由於現代飛機的高度和速度，難免瞄準着軍事目標的炸彈結果會落在倫敦住宅區裏，而且我竭力反對「黑爾門戈林的禮物」擊中我的頭顱。他立刻回答說，假如這種事情發生，他一定特派一架專機在我的葬禮舉行時投下一個花圈。假使真的如此，無疑的他一定會這樣做的。

關於戈林我未免說得離題太遠了，但是我了解戈林比任何納粹領袖更為深刻。我說

爲要批評一個人，一定要從他所交的朋友來觀察。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戈林和希特勒接近，所以在歐洲史上占了重要的地位。我回憶中的戈林是一個在一九三八年堅決主張和平的人物，假使他的精神和他的肉體一樣的勇敢，在一九三九年他或許再可維護和平，我回憶中的戈林，也是好客的主人 and 狩獵的能手，也是我曾和他作了許多小時的親善而光榮的辯論的人。

羅明敦的田獵會，是我第一次受戈林的招待。他那屋子是一所以茅草爲頂的簡單獵舍，但是屋裏面的設備應有盡有，據我所知，只有一個男僕，其餘侍者全是女子。這裏不拘禮節毫無拘束。除我之外，戈林的許多瑞典籍妻舅之一，羅森伯爵是唯一的賓客，其餘參加的人物有狩獵家雪賓和門特，和一個青年副官勃勞茨，他是現任德軍總司令的兒子。

在歐洲大陸獵蜜的森林裏獵鹿和在蘇格蘭獵鹿不同，從遠處不易發現鹿的蹤跡，只有當他們在春情發動時期狂叫的時候纔能尋出他們所在的地方。春情發動的牡鹿有一定的聲調，在附近往往可以發現牠們和牝鹿在一處，每到傍晚他們走到森林中青草叢中，最便利的方法就是藏匿在適當的地點等他出來的時候射擊牠，有時在這種地點建築幾座高台（高至二十英尺到三十英尺），獵者每人佔據一座，在牡鹿通常同牝鹿出來覓食之前

，等待一個多鐘點的光景。

這天早晨我到得很早，大約在下午四點鐘一切都已爲我準備好了，他們預備我到這裏來射一只大鹿，據說常常在這裏出現的。在出發之前，戈林對我說，英國人雖善用獵槍，但不善用來福槍。上星期，他邀一個英國獵人一同打鹿，他連擊三槍未中！我聽了大爲沮喪，但覺得英倫三島善獵的美譽應該由我來保全，我並不氣餒，因爲和我作伴的有塞賓和門特還有那守森林的人，他的技術不甚高明。我不禁想到我的同伴在輕視可憐的外交家，一個英國人的射獵技能。但是這次我很幸運。我們上了高台，等待一個多鐘點後，有一只牡鹿帶着牝鹿一同在距離預測的地點足有半英里處出現，我們沒有別的法子，只有下來追逐，有些像蘇格蘭的方式，走了一程，於是在地下爬行，最後把胸部貼着地爬行達到一個小丘，離這鹿羣有一百碼，這只鹿正馴良的站着，我就發一槍命中鹿的心，從那時起，我的狩獵的名譽算保全了。我覺得戈林也很快樂，當他的同伴把我蛇行（在德國森林中爬行是不常有的）的情形告訴他時，他笑着說，這正是外交家們應做的事。第二天早晨我又打得一只鹿，也是一槍命中，而且又是用追逐的方式而不是用高台的。此後大家認爲我有德國狩獵會名譽會員的資格，後來我確實加入該會。

在羅明敦遊歷二天，頗覺愉快。在大自然裏人類完全平等既無所謂國家主義，又無

所謂社會主義，自主人以下，每個人都是模倣，天真，和極度的友愛。天氣晴朗我盡情享受。每天晚餐以後，把白天打死的鹿放在屋子前面的草地上，四週燒着松枝，一隊獵人穿了深綠色制服站在蔭處。獵人的首領從每一只袋上讀出獵得這野獸的人的姓名，由主人作簡短的謝辭之後，角就吹奏起來。當星光燦爛的晚上，在樹林深處，聽着從遠處樹林裏傳來號角的回聲，此種情景，真是美妙極了。

第二天早晨我離開羅明敦，覺得很是遺憾。我會和戈林作了一次政治問題的談話，如同普通肥胖的人一樣，他很伶俐和機敏，心地很坦白，而且只及於要點。他的美德讓解的觀念，只有抱括兩條協定，第一，德國承認英國在海上的優越地位，並且允許在必要時把她的全部資源供給英國；第二，美國承認德國在歐洲大陸上的支配地位，並保證不阻止德國的合理的擴展。這是德國在中歐東歐自由行動的理論，實質就和二年之後的八月二十五日希特勒給我的最後建議一樣。因為極其簡單，所以覺得證證有。辭但是這種建議非但忽略了西方民治國家的民族意識和國際理想，且毫未計及擴張主義的方法 and 過甚的藉口。既然德國準備承認各國的平等權利，準備廢棄武力而用外交方法解決一切問題，那末對於這些應該締結一個紳士協定。希特勒政府如要在德國之外，以德國國內獲得地位的同樣方法來實現目的，無論何種企圖都要失敗。在德國內部，用了元首和

黨的名義，個人的人格和自由完全犧牲。以德蘭文化的優越性，和德國民族有駕臨別種民族的超然權利的口號，純粹政府準備毀滅弱小鄰邦的自由。但是這時候希特勒和他的左右還在保證說沒有這種野心，他們所需要的只是在德國國內謀國社主義的鞏固，和合併奧地利完成大日耳曼主義。照他們說：奧地利已是完全納粹化了，假使舉行自由的公民投票不受許士尼格的阻撓，一定全國投票贊同合併的。他們說，許士尼格全靠協約國的支持和凡爾賽和約的枷鎖纔能維持他的地位。

離了羅明敦我到許洛斯芬肯斯坦別墅，這是多那伯爵的住宅，我從南美洲回國在阿康那船上會和他見過。這別墅在東普魯士靠近維斯多拉河和波蘭走廊的地區，在東普魯士貴族黨邸落的中心，而且又靠近興登堡的別墅。芬肯斯坦別墅是一所紅磚建造的十八世紀房子，有雙斜式的屋頂。拿破崙在經過德國進攻俄國的途中，曾在這地方休息。這時全德國已在他控制之下，據說他見了這屋子曾讚歎過，「真是個美麗的房子！」拿破崙將它充作司令部很久，這裏也是他和華爾佛斯加公主幽會和演出羅曼史的地方。假使他當時能聽她的勸諫，恢復一個波蘭王國來代替那荒涼的公國，歐洲的歷史必定大異於今日。因為這公國缺乏防禦的力量，在滑鐵盧之戰以後就滅亡了。拿破崙駐節芬肯斯坦的臥室和辦公室至今還保存着。

別墅的主於空寂煽動人。主人是一四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可是不幸常生病。雖然英語程度很差，他也讀每日新聞和每日郵報，使我驚奇的是他對英德政治和英國政治家的知識非常豐富。他有一萬畝可耕的田，和二萬畝的森林，他自己耕種自己管理，收入很豐富。當時有一件巧合的事情，給我印象很深，至今猶未忘却。我的臥房裏有本英俄文書，其中有一本是威靈敦公爵的書信，我想是威靈敦的一個姪孫出版的。我偶然翻到他在滑鐵盧戰後給全權代表卡斯萊利勳爵的信，那時候普魯士，俄國，和奧地利正想瓜分法國，以免拿破崙式的事件重演。信子這樣說：

「如果我們要法國割讓廣大的領土，我們必須先考慮一下，繼續施行戰時措施以保持續張領土的代價，在和平之時耗費了我們的資源去維持過多的軍備，法國一遇適當的機會要收復失地，那時就會感覺到這些割讓的土地對於我們沒有好處。

我們務必繼續保持遠大的目標，就是真正的和平和世界的安寧，而從事於達到我們理想的準備。」

上面加圈的字是我的意思，這和我對於凡爾賽和約的意見完全一樣，所以我便抄錄在一張芬肯斯坦紙上，至今我還保存着呢，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一九一九年的民族仇恨和報復的空氣裏不能建造「真正的和平和世界的安寧。凡爾賽和約根據民族自決的

原則分配土地固然比以前進步，可是畏懼德國武力政治再現的心理阻礙了真正的和平，它似和平而實非真正的和平。我並不是指責解除德國武裝，要德國賠款，或是剝奪她的殖民地等等設施的不當，我以為凡爾賽和約最大的錯誤是只給奧波蘭人捷克人，巨哥斯拉夫人，和羅馬尼亞人自決的權利，而沒有給德國人同樣的權利。當時奧地利人和蘇台德區的德人曾經大聲疾呼要求和德國合併，可是當時道德上的較高原則偏於政治和軍略的觀點，絕不容許戰敗而仍舊有潛在危險性的德國擴張領土。我以為國聯是代表人類前進的努力，雖然不能完全達到目的，如果向着目標努力一分就有一分的收獲。但是依我看來，除非國際間達到道德上的平等，除非注重道德的原則和公平而不計所謂最高政治和政治集團的策略，國聯是永無實效的。

第七章 再謀改善英德邦交

雖然在六月裏邀請牛頓到倫敦去的計劃失敗了，而且希特勒對於這次邀請，只是起初含糊地接受，終於粗率地拒絕，可是張伯倫還要進行第二步的試驗，企圖打開英國和納粹政府之間的僵化的局面。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狩獵展覽會在柏林舉行，這事在一九三六年早已由戈林將軍開始籌備了。當我五月裏到狂的時候，我發覺除了英國以外差不多歐洲每個國家都準備參加，狩獵這件事，在各種運動中是最不會引起國際嫉妒和惡感的一種運動。所以依我看來，英國素稱為國際運動的要角，這次不參加這樣的賽會，是不幸的事。所以時間就很短促。我還是請求外交部轉呈政府籌備參加。謝謝他們的好意，計算籌得少數款子，還得了瓦雷新先生的鼎助，報名參加，組織了一個英國部。瓦雷新從事於這件工作，只費三四個月光陰，但是靠了他的能力和熱誠，搜集了許多從非洲北美洲亞洲傳來的紀念品，其中包括英王英后和格羅色斯脫公爵打獵到的野獸，成績很好。有一只已鑿成標本的大紅貓熊，也帶來參加展覽。評判的結果，歐洲部分波蘭獲得頭獎，至於海外的收集，英國得到了頭獎。

在德國組織非常嚴密，這次狩獵會辦得成績很好，世界各處的狩獵家都趕來參加，

見我的使館人員。午後戈培爾夫婦蒞臨參加使館的茶會，由我姊妹萊脫里舞夫人和墨卡否夫人招待戈培爾夫人。我自己擔任哈里法克斯爵士和戈培爾的翻譯。他們談話的主題是兩國關係的態度問題，並沒有什麼相左的意見。我不能否認戈培爾在私人談話時的合理持融和外國所傳的迥異，哈里法克斯爵士得了一種很好的印象。

樞密大臣當晚就返倫敦，他在倫敦五天夕陽餘，所得結果很好。哈里法克斯爵士離京時談及他思想的高超。我聽說這為特勃所感。就是一種德國民衆，也認爲這次訪德是英德兩國關係的轉機，值得讚美。可是政界人士，態度仍是冷淡。後來戈林應德皇一請他備首相真有改弦易轍的誠意麼？他能否不因納粹粹派的事變而？他能否不海國聯破壞政策，集體安全，和聯德制德的者讓嗎？」

這種疑問正是那時德國對於英國政策的正統見解。在事實上希特勒雖會廣大聲明願和英國修好，但他心裏並不急求其實現。他很是狡猾，認定第一步必須通過與地利的河洩。他並不準備爲了對英成立認解而犧牲他對中歐的野心。在他心目中所謂對英友好關係的解釋，是要英國允許他重新中歐的地圖。他的諾言並沒有別的價值，只是欺騙德國民衆的一種工具，因爲德國民衆倒真是真正願和英國維持友好的關係的。所以這好比是魔術家轉轉觀衆視線的一種暗喻隱語。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以前，人們雖然已經預

備厄運的到來，但是當時還希望希特勒或許有誠意的；他的諾言或者和他的真意相差不遠；大德意志的統一完成之後，他可以滿足了；所謂種族純一的理論是真確的；他所要求的只是限於德國人的；在奧地利和蘇台德區併入德國以後，他可以引此和平的佔領爲滿足，而不再侵犯別國的獨立。雖然時局已瀕於絕境，但是人們還願向着好轉的路上走，直到絕對不可挽回的時候爲止。我們的目標固然是和平，假使我們先抱着不幸的結局終必到臨的成見，我們就不算忠實的維護和平。我們的任務並不是在預言不幸的結局，而是要盡力去避免這不幸的結局來臨。

所以在那時我也存着一種幻想，希望哈里法克斯爵士的柏林之行是走上順蹊的開端，可是那時在政治上很少樂觀的祥徵。奧地利已是戰雲瀰漫，希特勒的毒蟲漢倫已在蘇台德區升起，西班牙戰事仍舊牽制着民治各國，而在這烟幕之中，希特勒在擴大地積地鞏固他的地位，蘇聯的力量已經爲了軍隊中的清黨運動而變弱了。而一方面羅姆柏林軸心在德意日反共公約簽字之後，已經成了犄角之勢。這三個國家，形成一個新的更堅強的侵略集團。小國已經在懷疑，考慮，處在德國保障之下，是否可比在日內瓦重開理論的集體安全制度更安全的問題。

一般說來，一九三七年是希特勒在軍事上外交上埋頭準備的一年。德國的經濟情形

增高了德國迫切的企求。那些預言德國經濟危機的人們，根本忽視了德國有鐵腕的控轉力。哈里法克斯爵士曾經問過戈林，德國建築汽車路的經費是怎樣籌措的。戈林的回答是「信心」，有了信心，何事不可為，沒有信心是要嚴厲禁止，而且要嚴厲處罰的。

那是實在的，西班牙內戰確給與希特勒一個喘息的機會。這戰事牽制了歐洲各國，使佛能夠暗中進行他更大的野心。於是他燃起蘇台德的烽火，鼓勵奧地利的納粹份子，在但澤，排斥反納粹份子，和威赫立陶宛交出米美爾。對他最有利的，是英法二國，對於戰爭意見的分歧，把英法裂成二歧視的單位。這種敵意又給與希特勒一個機會，他不但加強了國際間的政治地位，並且秘密地積極進行擴張陸軍和空軍。在一九三七年我寫的關於德國的報告裏，有這樣的一段：「德國的重整軍備已爲人所不注意，但是在德國還是和數年前一樣，進行不遺餘力。陸軍方面正在積極整理，師團的數量和新增的坦克車師團的大量增加，空軍還在飛速地擴充，至今尙無停止的模樣。不久我們就要遇到一個第一綫有四千架至五千架飛機的勁敵。德國的防空又極度發達，防空效率已達到舉世無雙的程度。所以德國空軍力量因此愈見增強，（關於德國注重防空，戈林有一次偶然給我一個有趣的解釋，他說假使士兵的家屬在後方處於危險地位，那末他們將不能注視前綫了。）至於海軍，雖然對英國在百分之三十五的比率之下，但正在積極訓練的海軍

人員已超過這樣準所需要的數類了。最後，並利用教育、宣傳、訓練、和行政管理的方法，動員全國人民和工業適應戰爭，也在突飛猛進，軍事效率好比是一個上帝，每人都應對他犧牲一切，不單是軍隊，而是全德國人民都已準備戰爭了。

照上面在一九三八年正月的第一個星期所寫的報告看來，在那時還抱樂觀的態度，未免使人寒心。但是當時仍有把希特勒所採取的行動，當作是一倘你看這和平，必要求備戰爭」的措施。我一向相信希特勒的目的是要合併奧地利和蘇台德區來美滿，但他在這方面的要求是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所以用外交方式解決是很可能的。希特勒對於奧國和德意志死難人員所養的感傷的情緒，使人會幻想希特勒會中止戰爭，因為戰爭的慘酷將高於奧國堡壘和德意志了。

時間的進展，會證明這「希特勒的謬誤」。希特勒和他的野蠻同志，僅用武力示威所得到的成功是不會心滿意足的。好比一個人製造一件玩具，一定先要玩一下，方肯罷休。現在德國的陸軍和空軍是越練玩具，所以希特勒不願繼續和世界所遭受的損失，一定要弄一個機會，倘弄不到就造一個機會玩一下，以證明他這關切世界和平的野蠻思想。

希特勒對於死亡的德國人隊表示的憔悴，在當時是很真誠的，實際上，這憔悴完全

和他的個性相吻合。他的個性是二重人格，這種情緒可以時乘時留。像他對於別國境內的日耳曼人遭受壓迫而發生的憤激情緒，也是同樣的真摯，可是他對於國內集中營裏的德人又毫無同情。在需要和波蘭維持友好關係的時候，他對於該國境內日耳曼少數民族，竟可以毫無同情，爲了要得義大利的親善，他不惜犧牲南提羅爾日耳曼人的權利。在戰爭開始的時候，他一紙命令，使得波羅的海岸的日耳曼人遭受許多壓迫，這也無非是要潤滑他的聯蘇政策的輪子。在另一方面，他熱情對於他的目的有利時，像在奧地利的納粹黨人事件和捷克境內的蘇台德人事件，或是在波蘭的少數民族事件裏，他可以做出發狂的樣子。對被壓迫的日耳曼人這樣，對死難的德人也是這樣。他也曾明白的說過，一旦對波蘭開戰，德國人的生命，未免要犧牲重大，可是他還是不顧一切對波蘭宣戰。實際上只要他肯稍稍忍耐，波蘭問題可望和平解決，可以不喪生命而達到目的。同樣地，戰爭只要對於他一己的光榮，維持他的地位，和鞏固他的黨權這一點有利，當然他不會犧牲千萬生靈於西方戰場了。

我在柏林駐節二年，好比經歷一本戲劇。一九三七年那年算是前奏曲，重機關槍，更大的大炮，坦克車之後又是更重的坦克車，轟炸機之後又是猛烈兇殘的轟炸機，這些武器所發出的鋼鐵聲和武裝士兵的又多又響的步伐聲，奏成了華格納的軍樂。這便是後

英德外交 內幕
面一本四幕悲劇的劇奏。

第二卷 一本戲劇

第一章 前奏曲

把下面敘述的德國內部事件當作悲劇的前奏曲也不爲過甚。那首前奏曲的台幕。是揭開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那天德國報紙宣布了一個消息：國防部長白倫堡上將已經在前一日和一個愛伐葛露亨的女子結婚，希特勒和戈林兩人是唯一的證婚人。這裏發生的前夕，我在宣傳部晚餐，我們的主人是該部副部長芬克，就是現在的經濟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席終之後，他對大約六十多位賓客（其中有許多閣員，軍官，納粹黨官員，以及外交人員等）宣布這件事實，當時的賓客都感驚奇，人人爭問葛露亨小姐是誰。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回答。大家的談論繼續集中在這個問題上，直到大家漸漸知道在希特勒的警察紀錄上，她是一個美貌而放蕩的女子。我始終懷疑這件事未始不是那個詭計多端的秘密警察領袖希特勒故意造成的一種陰謀。即使希特勒和戈林事前不知道，至少希特勒已曉得他們兩人必要結婚。於是安排下這個圈套，排斥白倫堡，這於他自己，於一般德國急進派份子都是有利的。

這件事的暴露，使希特勒的個人情感和威望同受極大的打擊。白倫堡不但是他所最

信任的顧問，而且還是和他最親密，或許同時又是最寵愛的朋友。不料這位最好的朋友竟欺騙了他。希特勒在發現了真相之後，他所採的第一步驟就是力勸這位上將藉口上了人家的當，提出離婚的要求。這次白倫堡不聽從他的勸告，竟使他疑惑他的部下對他對國是否忠誠。但是更不幸的事還在後面。原來白倫堡是一個有政治黨識的大將，對黨極有球勞，很得黨員的擁戴，但和陸軍將領們感情不佳，而納粹黨的急進派因為他不是和他們同一派系，而且又反對他們這份干涉軍事，和他又感情惡劣。

因此，陸軍總司令弗利區將軍，受了其他各將領及上次歐戰以後唯一宿將賴德夫根尊敬和愛慕的支持，於是不等希特勒自己想妥解決的辦法，就向元首進言，稱白倫堡身居國防部長的要職，和一個不三不四的女子結婚，如果再讓他留位不去，軍紀將無法維持。獨裁者最不喜歡他人的指揮，所以希特勒一則因為不願受人所左右，再則因為顧及老友的交通起見，對於弗利區的請求起初表示拒絕。但是弗利區乘此機會不但堅決主張維持陸軍紀律，而且進一步嚴厲地批評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關於對奧政策。這更使希特勒不能容忍了。這件事發生約一個月之後，戈林上將對我說：「若是貴國的參謀總長對張伯倫說：『雖則與陸軍無關，你的外交政策，我完全不贊同。』張先生將怎樣對付他呢？他一定說『謝謝你，再見吧。』他一定將他革職，就像希特勒革弗利區將

軍一樣。

事實真是這樣。弗利區去職，白倫遜亦然。當時希特勒對希特勒的這一問題，是如
何能從這兩位大員的更動，對於他自己有利，至少不失去他的地位。希特勒在三月
以後，到了二月四日，希特勒在那年第一次的大發雷霆之後，這兩位大員的更動，是以
大批更換人員的騷動和過林堡煙幕而宣佈了。當時的騷動不僅在軍方面，並且在外交界，
軍、空軍和外交界。但是這大的變化，除了外交界以外，還有白倫遜和弗利區兩人。這
兩人的注目，其關係極關重要，因為一切的騷動之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無
通軍的秩序，本來就要在幾個月之後才能實行。此後空軍軍權就由希特勒一人獨攬，
最高統帥。至於白倫遜在別方面原有的工作，大半由凱爾爾將軍一位有神經氣派
的軍人執行，但凡事須聽命於元首。勃勞希茨將軍是一位很有資望而能幹的軍官，他繼
續弗利區將軍之後，任德軍總司令。戈林將軍擢升上將，成為德國現役軍人中的惟一陸
軍上將。

一般地說來，希特勒運用他機敏的手腕應付各種事件，每每突破難關。他利用這一
次難得的機會，肅清軍部中的帝制派和保守派份子。他已經安插了許多軍部中的將領，
並且使他們黨化。黨派對於軍部，曾要求採取更激烈的行動，而軍部方面這次所遭遇的

失敗，雖不是致命的失敗，可說是早已註定了。不過他們或許以為慘敗的時期，未曾降臨，尚堪自慰，可是軍部黨化後吸入黨部機構一事已經播下了種子。從此這些種子無時不在滋長之中。自慕尼黑會議以後，已迅速地萌芽了。但是將來德國突被黨部或軍部統治，決定的關鍵在這次戰爭。

這次白倫堡結婚事件是很值得重視的。在精神和物質上都有極大的影響。我在上文已經提及，這件事不但使希特勒在那年中第一次暴怒，而且使希特勒因此完全變了他整個的人生觀。他從此以後，變成更爲不近人情，同時又更容易突然發怒，有時真怒，有時作怒，他對於僚屬的信任心也大大底崩塌。同時也成一個更難接近的人了。希特勒最信任誰呢？那次事件以後，我再研究這個問題，答案總是「無一人」。「白倫堡事件」的最重要結局，就是在希特勒左右的兩位最穩健而最受人尊敬的顧問——白倫堡本人和牛賴特男爵——被黜免了。里賓特洛甫代牛賴特任外交部長，造成極大的禍害。當初里氏被派到倫敦的不克盡職，已很明顯，我想甚至於希特勒本人亦承認的。那時德國饑饉立時有其他任何適當的職務，可以安插這位「特任大使」，大概他早被調動了。希特勒畢竟乘這次政府改組的機會，派他任外交部長，但是他和凱脫爾將軍一樣，是接受希特勒的。我頗相信希特勒在任用里氏的時候，一定覺得里氏既然是一個唯命是聽的人

，對於他他能順從，那末將他留在柏林，當然比在倫敦可以少出亂子。

我在此要鄭重聲明的，就是我和里賓特洛甫私人間並未爭吵過。他被派到倫敦時原來的存心，或許直得欽佩的。但是我自始就覺得他的自負心和憤懣的神色，以及對於英國與英國民族性的誤解，成了英德兩國間進一步瞭解的一重嚴重障礙。最後我認清促成這次戰爭的種種舉動，以里氏就他權力範圍內所幹的爲最多，沒有別人比得上他。因此，但丁神曲中的任何一層地獄，似乎還沒有有一個夠凶惡得可以收容他，我早已担心恐怕里氏的舉動。會造成如此的結局，並且再三請他的同僚注意。在慕尼黑會議以前，我對戈林和別人談論的時候，曾提起發生於一九一四年八月間的戰事。我說那次戰事中的罪魁是當時的奧國外交部長勃契多特伯爵。當他在聖彼得堡任奧國駐俄大使的時候，我與他相識。他是一位偉大的奧國貴族，可是他正和里賓特洛甫相像，亦有自負，愚蠢，膚淺等缺點。我曾警告別人：若是里賓特洛甫再這樣幹下去，總有使德國毀滅的一日，就像勃契多特使奧國毀滅一樣。不幸希特勒對於外國的政治，非常注意，里賓特洛甫既以他外交部長的地位常常和希氏接近，因此他比德國其他任何閣員獲得較多的機會，以他的意志左右那位元首。依我看起來，在一九三八年九月間，里賓特洛甫和希特勒兩人是以希特勒爲首的主戰派中最激烈的份子。在一九三九年八月間，還是他們兩個。

最後，因為白倫堡事件使那位獨裁的元首不得不對外做出一番光榮的勝利來消滅人們對這次事件的記憶。無疑的加速了一本戲劇演出的速度，這本戲劇的第一幕就是「與國談判。」

但是這本戲的前奏曲和第一幕之間，有齣插曲。這插曲就是張伯倫先生先後八個月的和平談判中的第三次努力。他的目的是和希特勒打破談判之門，談判的用意是在用和平的方法，解決一切懸而未決的問題。這是張伯倫內閣所決定的對德政策。這也就是張伯倫自始至終的唯一目標。老實說，兩國雙方或許都有些誤會，但是希特勒方面常常藉他向英國提出的要求，已被英國拒絕接受，一方面又等到英國確實被步向他接近的時候，纔是想方法撤回他的要求，而不肯在中途和我們成立諒解。今日我們不能相信他的這種態度是出於偶然的。他演出這次「希臘式」悲劇的動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計劃的。希特勒在歐洲的企圖不能與對英談判相容。他決心在我們作實際的談判以前，先要獲得他的目的。最要緊的，就是在我們的國勢還未太強盛以前動手。希特勒的這步棋中計，所以他無時不處心積慮，等候時機，就是在他完成這重疊的準備之後，將那條約預成廢紙是毫無疑義的。到了一九三九年四月，他果然動手將談判辭了。當時他想藉德海軍條約以及對比利時所提出的保證，能使英國不干涉他的種種中計計劃，那就

更好了。我深信那次訂約和保證的動機，便是如此。

我在這裏，不厭求詳，將英國派遣本人出使德國的期間歷次所擬的具體企圖，逐一敘明。第一次：一九三七年六月間，英國政府邀請牛頓爵士到倫敦，那件事不曾實現。據說是萊比錫號巡洋艦事件以及里賓特洛甫發生猜忌所致，其中經過，我已有詳細說明。第二次：哈里法克斯爵士造訪柏林，事後希特勒並無答覆，不過這次以後跟着第三次就是我本人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間晉謁德元首。談話的結果，照樣毫無結果。第四次：張伯倫先光親往貝斯德新加登鎮和慕尼黑，後來英德兩國發表宣言，可是那次宣言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佔領布拉格之事粉碎了。第五次：英國政府原定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派遣貿易部大臣和海外貿易部大臣赴柏林，可是這次計劃因為希特勒在那年三月十五日的舉動，當然不得不作為罷論了。第六次：就是哈里法克斯爵士在六月三十日的最後一次努力。那天，他在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會的年宴席上，發表了一篇性質重要而經過審慎考慮的演說，闡明英國的政策是煞費苦心地建立在兩層並立的基础之上。他說：「一層基礎是我們抗拒暴力的決心。另一層是我們承認全世界有一種積極進行維持和平工作的願望。我們倘能確實相信這人的意嚮正和我們的意嚮相同，並且相信我們人人果真希望獲得和平的解決方案（加圈的字句是我撰的，）那末我今天就要肯定

地說，我們對於目前引起世界不安的各種問題，都可討論。在這種新的氣象之中，我們能夠考慮殖民地問題，原料問題，貿易障礙問題，德國的「生存地域」問題，以及影響歐洲全體人民生活的其他種種問題。」如此的表示，可謂極其理直公平，但是希特勒全然不理。

我提引這段演詞，因為他的內容實在就是一篇文章的主題。我駐柏林苦鬥兩年，其間所任的全部工作，就是根據這個主題做文章。我在歷次對德國政界領袖談話的時候，亦再續再厲地和他們討論這項題目。在我的談話之中，我總向聽我話的人講明：「如果你們真要和乎，我們是誠懇地準備談判。」有些人無疑地肯聽我的話，但是另外有些大要若罔聞，老實說，希特勒並不實在希望和乎解決各種問題。我的意思不是說他和英國開戰，他對於這事的確有些胆寒。但是他急欲試驗他的新式武器，並且冀望對於捷克人、波蘭人，以及其他不敢抵抗那種有組織的德國軍力的人民，獲得兵不血刃的勝利。

哈里法克斯爵士遊德之後戈林曾說過一句話：「張伯倫先生實在有認真做導的慮想嗎？」張伯倫先生為證明他確有這種意思起見，便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底，將我召回倫敦，面授機宜，命我謁見希特勒，並和他商討大體上解決各種問題的可能性如何。從德國

報界的論調以及希特勒本人屢次對於英屬賢客所發表的談話觀察，我們兩國之間，原以不能實進一步的瞭解，是前番障礙所致。一重是我們在欧洲，不絕地和德國對抗。另一重是我們不肯交還從德國「搶來」的殖民地。我於是奉命通知希特勒說：英國政府當準備在原則上和德國商討一切主要問題。

在六月四日，我到柏林返任。但是由於白倫堡結婚事件使政府的改組，德國空氣不很平靜，因此一直等到三月三日，纔得謁見希特勒。那時艾登先生已經退出內閣，外相一職，由哈里法克斯爵士繼任。不幸這次謁見，我又選擇了一個不吉的時刻——我命中似乎註定倫敦會見希特勒總是這樣。原來奧國總理許士尼格博士已經於二月十二日，被召到東京與德蘇加簽字。奧國局勢業已鼎沸，不久就要洋溢。因此希特勒正在大發脾氣，而且毫不掩飾。

我蒙希特勒在德國舊總理府接見，承他延坐在一張靠着朝窗的大沙發上。希密特爵士（外交事務員）坐在我左面一張小凳上擔任紀錄，他的左面一個半圓形之內有一張圓椅，坐著希氏本人。坐在他身旁而面對着我的正是里賓特洛甫。我先陳述要覓見元首的意旨。我說：貴國的報紙常敝國政府提出任何建議的時候，總向我們攻訐，說我們像買辦和奴才一樣地討價還價。本人這次請謁，並非要像那樣地講斤兩，而是要創立一種友好

的基礎。我又說：敵國政府並未忽視將來所要克制的種種困難，但是深信如果雙方能以互惠主義的基礎，並且在理性較高的原則之上，共同出力，而避免使用武力，那末那些困難當得迎刃而解。敵國政府承認變更現狀是可能的，不過必須建立在理性較高的基礎上；有些問題，似乎就是英德兩國間的主要爭執所在，譬如縮減軍備問題和限制轟炸問題，還有捷奧兩國的問題，應當怎樣和平解決；殖民地問題又應怎樣解決等等；德意志政府討論。關於限制轟炸一節，敵國政府還主張廢除轟炸機。我接着問希特勒：德意志自己對於維護歐洲的一般安全與和平，準備怎樣努力？

這水滔滔不絕的談話，或許是我歷次和希特勒談話中最長的，經過足有十分鐘之久。在我發言時間，希特勒始終縮伏在地的圈椅中，面上帶着很發癢的怒容。我的談話雖然堅決，可是同時又很溫和，絕不會引起他的這種態度。不過他一直靜聽，等我說完之後，方纔發言。他說除非英國報紙停止對他攻擊，否則一切都辦不到。他每次和我談話，總要提起這點。第三者對於中歐事件的干涉，非他所能容忍。那處有數百萬日耳曼人，正受着不公平的待遇，日耳曼人必須與其他民族一樣，享受了自決和民治的權利。英國的人民之中。僅有百分之十五，擁護斯士尼格政府；英國如果反對合理的解決方式，則德國當非訴諸武力不可。當地的日耳曼人倘受壓迫，他不能不加干涉。他如是說。

手干涉，將採取如閃電般的行動，奧國的公平，必須給以投票的機會。捷克境內的日耳曼人必須在文化及其他各方面獲得自主權。

希特勒這次的興趣，顯然不在殖民地。他先費了半小時對我高聲滔滔不已，談起英國報紙的攻擊；說起英國主教兼管開事，干預德國教會事件之難以容忍；說起有些事情，據他看來與英國無關，而英國竟實行一般干涉，德國不堪忍受；他又提起奧地利和捷克兩國境內擁護納粹主義的日耳曼的悲慘命運。此後他的談鋒轉到軍縮問題。他提議蘇俄定以及捷克的參加，說這是對於德國的一種威脅。他說正根據這層理由，德國必須如此擴充軍備，所以任何軍縮問題的討論，要以蘇聯為轉移。他接着說這項問題，變成一項特殊困難的問題，因為「事實上像蘇聯那樣的野蠻動物，對於恪守條約的誠意，沒有人能夠加以信任，就像我們不能信任野人會理解算學公式一樣。蘇聯所訂的任何協定，毫無價值可言，我們決不任蘇聯插足歐洲。」他繼續說：譬如就禁止使用毒瓦斯而言，蘇聯方面所提出的保證，我們絕不能置信。

那次談話的經過，當時由希特勒博士記錄，經他詳細整理，並承他贈我一份。上一節中有括號的幾句就是照那份記錄，一字不改地轉載。全部的記錄後經希特勒親自核准，由里賓特洛甫轉送我，前面三節中的全部文字，實際上都是從希氏核准的記錄中摘錄

的。我曾謄抄那份記錄，不厭求詳，因此希特勒那次所講的話，照記錄下來的字句，構成有趣味的證據，證明他的技倆，並且可用作對付他的根據。當他提起奧國投票的時候，我曾問他的意思是不是指全民投票而言。——當時德國的報界早已主張採取這種手續。他的答復是他要求「奧國的日耳曼人所有的正當利益，應予保障；他們所受的壓迫，應用安然漸進的步驟，予以解除。」換句話說，他用含混的答復，閃避我的問題。他並不存心容許全民投票，除非投票的事，在地直接庇護之下舉行。關於這一層後來有事實作證。

他對於捷克境內蘇台德區的要求，也值得同樣注意。起初他的要求，限於人民的自治權。在他併吞奧國之後，他雖一直等到他的軍隊準備行動時為止，仍舊公開宣稱他的要求的目標，是自治權。可是在事實上，他的要求不限於此了。他的軍隊既然準備行動。他就立刻要求將整個蘇台德區併入德國。他達到這步目的之後，慾望仍未滿足。他當說過準備保證捷克的獨立，但是到了此時，捷克人又須失掉他們的獨立。每一個階段在他不會踏進之前，總說是他最後一個階段，可是等他踏進那個階段後就要得寸進尺得隴望蜀了。再就一九三九年八月間的局勢而論，希特勒對於蘇聯的評論實在是不值一笑。他從前曾一度表示願意考慮縮減軍備和禁止或限制飛機轟炸的問題，但是到了那時，

他對於這些問題的態度，在表面上顯然和從前大不相同了。他口頭仍表示，往往是光明正大，但是倘使有人要以備他說過的話爲憑，他使用巧妙的方法閃避，不肯針對着爭點，這種辦法也是十足的希氏技倆。他對於俄國和毒瓦斯發表過的議論，值得追憶，那時蘇聯已經被指定當作犧牲品，但是與希特勒有關之事，環境一變，情形就很容易改更了。

關於殖民地問題，希特勒似乎不感什麼興趣，他說殖民地問題儘可以等到四年，六年，八年，甚至於十年以後再說。他曾答應給我一件關於這項事情的書而答復，可是在我一年半以後離開柏林時，這種答復還不見送來。但是殖民地問題我們也間或討論過，甚至於指着一架地球儀來研究。希特勒無論到什麼地方，他的房間內總有一架地球儀。我想這種辦法是所有政治家和外交家很可效法的，當我們討論那些問題時，希特勒便收斂了面部的怒容，有一次竟會笑起來。那一次里賓特洛甫插嘴談到英國報紙，他的話使我反唇相譏。我說：一位會僑居加拿大並曾在倫敦任大使的人，對於英國人的性情習慣，會如此愚昧無知。我不禁覺得警愕。希特勒聽我攻擊他的外交部長，似乎很樂意，因爲那時的里賓特洛甫對他的影響並沒有後來那樣大。我們那次費了大約二小時之久的長談，完畢之後，我在將要告別的時候，從衣袋裏取出一張很精美的希特勒照片來，請希特勒簽

名。那張照片是紐西蘭的一位婦人寄給我的，請我取得希氏的親筆簽字，希特勒很欣然地承諾。（他在這些事情上，總是很殷勤的。）我們的會談。我們雙方都無圓滿的結果可言，可是從這件事看起來，希特勒至少已使一個青年女子得到滿意。這事還使希特勒流露出很溫和的笑容，除了這次以外，我想不出再能見到他的笑容。

第二章 第一幕：奧地利

張伯倫先生第三次企圖和德國着手談判時，目的是維護歐洲和平，不幸當時希特勒所注意的祇是奧地利和中歐問題，所以他的企圖終歸失敗。可是這幕插劇是重要的，我們應當記在心頭。從這幕插劇的經過，可以證明希特勒所實在希望的目標是統治中歐東歐；他並不希望對英讓解，除非那種讓解可當作達到他的目的的方法。但是我們再提起這事，未免有些離開本題，因為一本悲劇的第一幕，事實上已經在三星期以前，就是在二月十二日揭開了。那一天，奧總理許士尼格博士和希特勒在貝許德新加登鎮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

許士尼格到貝鎮之行，首次鑄成大錯。不過這事早已計劃。事後牛賴特告訴我，在前一年十二月間在原則上就已經有所決定。一月間，我在倫敦時，曾警告英國政府，說希特勒正在打算對於奧國將採直接行動。德奧兩國在一九三六年間所訂的協定，雙方均無誠意遵守。納粹黨在奧國的宣傳始終沒有罷手。那時有三四萬奧籍的納粹黨人，仍住在德國，奧國政府鑒於這種宣傳，當然拒絕他們回歸故土，他們被流放在外四年，情緒至為憤激，回國之後，不免要想報復，後來他們從前的政敵受到了處分和苦痛，大部份

是他們在作祟。希特勒將許士尼格召到貝許德斯加登鎮，無疑的就是他的烟幕之一種。他想藉此遮掩白倫堡結婚事件給予他的震怒和欺騙，因此他對於許氏沒有一些平等對待或是協調的意思。據許氏尼格自己說，他曾受到威脅和恫嚇，並在威脅之下，使他接受一種完全不同的妥協辦法。妥協辦法必須經奧國總統和維也納內閣的認可，但是後來在二月十六日，經他追認了。許氏本不應到貝鎮去；在接受希特勒的條件之後就應引咎辭職，所以許氏又鑄成一次大錯。

當奧國接受妥協的消息傳到柏林之時德國元首正在舉行每年一度招待外交使節的宴會。這件消息引起了我和牛賴特男爵的爭辯，我們兩人從來只發生這一次的衝突。牛賴特當着許多德國部長的面前，猛烈攻擊英國政府，他說英國政府已經積極鼓勵奧國政府否認那次協定。後來希特勒本人也責備我。不過態度比牛賴特好一點。我也同樣激烈地否認此事。這次英國公然表示反對，實使牛賴特確實感覺大失所望。他恐怕每一個德人向來確實相信能夠達到的那一種根本目的，倘若不能靠着隱伏的宣傳和詭計達到，那末結果不免要採取強烈的行動，引起無限的糾紛。希特勒本人或許也認為寧可不用武力，他的預定計劃本來是想組成一個親納粹派英國政府，藉此逐漸推翻許士尼格的地位，將他傾覆，然後以比較和平而受人反對較少的手段，實現他的目的。

許士尼格本來是忠於哈潑斯堡王朝的。他對於希特勒的詭計，並無聽從的意思。因此，希特勒又發生了那年第二次的不能自制的暴怒。當我在三月三日謁見他時，他正因此事萬般憤恨。

後來許士尼格又鑄成第三次也是末了一次的大錯。當時希特勒考慮解決奧國問題的方式，究竟那一種最好，本來還在猶豫；不料許氏這次使他斷然定計。三月九日晚間，奧國政府突然用無線電向全世界廣播，宣稱他擬於下星期日，即三月十三日，在奧國有權你全民投票，以便根據公意決定奧國將維持獨立，或併入德國。奧國的投票人名冊已家家戶戶編好，所以凡有二十四歲以上的公民才有投票權。

這位無可救藥的賭徒，竟欲如此孤注一擲，結果當然失敗。許士尼格的決定，事前不曾和聲望的內閣商議，又不曾諮詢墨索里尼的意見，本來墨索里尼在軍事上就有扶助奧國政府的可能，她在一九三四年就是個好例子。這次墨索里尼知道以後，祇有一句答覆。他說許士尼格的建議無異一枚炸彈，必定要在他自己手裏爆裂。

擬定舉行全民投票的消息，在三月九日夜半時分傳到柏林。這件事使這位機會主義的大師希特勒得到了一個正在尋覓的藉口，第二天他召集了他的顧問和將領商議，到了最後決定以斬釘截鐵的手段，出兵佔領奧國。他有了口實，認為這種辦法是合理的，他

歐委民投票必須阻止，否則投票的結果，不過造成日耳曼人的流血和死亡而已。雖然，德國出兵在那天強奪奧國，我不相信這是出於預謀的，至今我還是不相信。希特勒一定想將他的故國奧地利只用一種和平的手段并入德國。不過希特勒對於他的根本目的，無論已經怎樣認清楚，他爲達到這些目的而要採取的手段，必須看局勢的發展而定，而且非等到最後一刻，不肯有所決定。但是從一九三四年以來，他對於奧國境內的叛亂組織黨員，要在奧國發生革命的時候，加以武力的扶助，自然早已定好計劃。這些計劃已經急速的改進，是毫無疑義的。在三月十二日黎明，德軍在奧國的邊界，很迅速而秘密地完成集中部署，希特勒認清奧國不會抵抗以後，他的侵略「手段是立刻命軍隊迅速分佈於奧國全部，絕不問戰事的情況若何，那次軍隊的行動有幾方面是很草率的，由德軍知德國沒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德軍由於這次行動獲得一次有益的教訓，後來在捷克境內的強烈行動，就是導源於此。再者，這次行動會使全世界預料到發生於奧國境內的事件將要在捷克境內重演，并且加速了五月廿一日事件的發展。

我獲得德軍向奧國進攻的消息，是在星期五（五月十一日）的清晨，於是我立刻命大使館武官，到德國軍政部去探聽，究竟是否確實。馬遜麥克法蘭(Mason-MacFarlane)上校在軍政部所獲得的答案是「毫無消息供給，軍隊尚未出動中」隨後他在辦公室

車，趕到來比錫，得到了充分的證據，知道軍事行動已在進行中。但是未到下午六時，德國軍政部長對副武官說，早晨馬遜麥克法倫上校被騙了。

當時里賓特洛甫正在倫敦，他到那裏去呈遞離任國書。這又可證明這次強奪奧國，並非預謀。他如果預知此事，一定不會在外交部長的任內，離開柏林，而且事實上他竭力想立刻返德，但是德政府命他留在倫敦。當然，所有的德國人那時都在自問：「英國將怎麼辦呢？」可是英國祇發表了一些令人動人的言論，這一層正是希特勒在三十日所已無端地斷定的。當時英議政府並沒有用行動保全奧國的決心，英國對於希特勒還不會採用強硬的手段。奧國原是日耳曼人的，而且有許多奧國人誠意的贊成德奧合併。英國民衆酷愛和平，所以對於心不忍的戰爭，不會贊同。後來在同年內發生的捷克蘇台德區日耳曼人的事件，也是同樣的情形。

在那天晝間，我去訪牛賴特，向他提出兩件措詞強硬的照會，但是這些辭辭上的抗議，若被對方置諸不理以後，沒有使用武力的決心做後盾，不能阻止已經在進行的德軍。從一九三六年德國駐兵萊茵區域以來，敵對的書面爭辯如果沒有敵對的行動做後盾。是一種陳舊而毫無效果的舉動。這種舉動不過造成懷恨的憤慨而已。空洞的架子不能使大強盛的德國屈服。這種架子徒然使像里賓特洛甫等的那一般人以為他們的料想會真

不錯，他們想英國與其參戰，寧可犧牲一切，喉舌的力量無論如何不能與武器的力量相抗，所以希特勒已經把那些質問，和尖刻的譴責，強硬的抗議，以及口頭的良的奧教誨等等，當作廢話而已。

三月十一日晚間，戈林在航空協會舉行盛大宴會，招待大約一千位來賓。餐後有他的「國家歌劇團」表演。這給我一個會見這位上將的機會。所以我勉強決定赴會。十點鐘開會，當我到會時，已電光滿堂，但是那位上將還未到臨，據說他正和希特勒在出席內閣的全體會議。各方面這時正在很關切地討論用無線電發來的關於許士尼格和殷慕德的消息，在座的每一個德國人都很驚愕，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變。寇克巴曲克忽然衝進門來，手裏拿着一封本國政府訓令我立刻向牛賴特男爵傳一件大照會的电報。當時鋼琴二千身眼睛的視線集中注視着我拆讀那封電報，那個大廳中肅然無聲，連一根針落地的聲音都可聽見。不久，戈林駕到，和幾位賓客握手為禮之後，坐入大廳中央的一席，於是音樂齊奏，接着就是舞蹈。我所參觀過的各種表演中，這一幕是使我最痛苦的，每一個外交官和好些德國人都感覺得奧大利帝國在一九一九年遺下來的殘物，眼前就要支裂。以至於覆亡，在這個時刻，載歌載舞，不禁黯然神傷。

我傷短促而冷峻地和戈林握了手。他顯然感到慌張和畏縮。我們坐下之後，她立刻

的從他節目單上，撕下空白的字頁，用鉛筆寫道：『音樂停後，我即刻和你談話，要向你解釋一切。』他於是把那張紙遞過美國大使太太遞給我。他就在最後的八個字下面，劃穿並遺橫棧。音樂一完，他立刻起來到外面等我，隔了一會，我出去。此後約至兩鐘，當中坐著的大批賓客，留在廳中，都在奇怪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故。

戈林對我的解釋是痛罵新士尼格的無信，并謂德國除現在取籌辦法外毫無他途可循。我對在那種大演軍的戈林私室再談話，雙方都很索然。談話中的焦點，是德國陸軍和厄運。假如各的向德開戰，大部份的奧國青年恐怕會站在德國一邊。我替新士尼格竭力辯護以後，最後我對他說：『就是奧國總理不智，德國亦無動兵後運理由。』我又乘此機會以力勸戈林注意反納粹派奧國人所受的待遇；那些奧國人都對祖國忠貞，很值得敬佩的，所冀應當受合理的待遇。我相信使戈林在奧國有自由措置之權，我相信他一定會盡他的力量去實行這種政策。在奧國被佔以後，他曾到維也納一行，逗留了不久，滿想照我的話去做，不幸態度激昂由奧國納粹黨員，仗仗着希特勒的祕密警察和黑衫黨隊，把戈林的畫圖打得粉碎了。當我們回到大廳的時候，我最後提醒戈林說：假使他不願意使希特勒知道英國輿論界對於德國這次行動的意見，最好是兩星期不讓希特勒看動基爾。

的報紙。我向元首府秘書長梅恩納博士作過同樣的勸告。自從前任亞伯脫和曼登堡的國內，梅恩納亦做同樣的官職。我並不是故意這樣，而是因為我懂得他的脾氣。照他的脾氣，如果不在他管轄下的人們勸了他的憤怒，他總要抓住在他管轄中的對象出氣。在現在情形，奧國的反納粹派是要被他抓着的對象。

奧國覆亡的命運，事實上在三月十日即已註定。其餘的事不過是跟着推演而重。三月十二日早晨進入奧國的德國軍隊，不曾受到任何的抵抗。那天，希特勒在柏林城內留了一夜，並拜謁他母親的陵寢以後，就在十三日（星期日）返親到維也納。奧國的暴徒歡迎他們的新元首，並在他宣布奧國率被德國併吞的時候，歡欣鼓掌。一本悲劇的幕下幕，就在那些民衆的歡呼聲中閉幕了。納粹政府在佔領奧國之後的初度行動之成功，實是宣稱波蘭奔達和刺殺陶爾萊斯的其他幾個兇手，爲造成德國統一之英運先聲！

維也納是一塊界石。界石的淪陷，成爲希特勒沿着暴力的途徑向國外發展的第一步。這步發展未經流血便告成了，有許多奧國人，尤其是一些青年們，在當時他們都贊成德奧合併，可是現在已後悔了。他們當時不曾領悟到希特勒會把他們的祖國看作征服地，對他們本國的民族特性毫不寄予同情。

在這幕戲未完以前，還有一件事是我最後要記述的。三月十三日是德國戰艦陣亡將

十紀念日。各國外交領袖在那天例必參加，但是我雖於當時已經養病的緣故，決意不参加，而去訪奧國公使。這次禮拜會，在我這一方面說來，是一種示威的舉動。我坐着自備汽車，車頭上置一面大的英國旗，隨風招展而到奧國公使館。我見奧國公使正穿着全身禮服，正要前往紀念大會。後來我聽說他在會場裏和他人一樣地行納粹黨禮致敬，並高呼「希特勒萬歲！」

第三章 第一次休息

這本戲的第一幕和第二幕之間，爲時二月有奇。這段時間也本能風平浪靜地過去。希特勒曾在德奧兩國舉行全民投票，兩國投票的結果，都有非常的絕大多數擁護元首。日耳曼人的耳鼓，被日間的演講和晚間的廣播所震聳了，他們自己甚至對於這套把戲感到頭痛，爲了免除麻煩起見，都贊成投票，以便結束這件事情。但是那時在奧國問題的背後已經隱約地現出蘇台德區日耳曼人問題的影子。三月十八日希特勒在國會內發表了一篇對未歸祖國的一千萬日耳曼人（奧國的日耳曼人祇佔其中的六百五十萬人）的演說，已對全世界提出一種顯明的警告，把德國第二步的目標烘托出來了。不過德政府在向奧國進兵的時候，曾向捷克人提供了光明正大的諾言。捷克人方面那時如有任何舉動，也許可以使奧國變爲滿地運和解決了。所以德國當時曾向捷克公使提出明確的保證，表示德國對於捷克毫無企圖。戈林對我：「再申明那項保證，並授我以代希特勒向英法兩國轉達這層意思之權。希特勒曾說：『本國政府懇切願與改善德捷邦交。』這一句老生常談的話，漸漸消去其效力。」

關於這層問題，是毫無疑義的了。在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三八年之間，這是一篇很清

逼的問題：「希特勒究竟要些什麼？」大家都異口同聲的回答，尤其是我的前任者費萊斯爵士在一九三七年間的離任演說中，回答得很透澈。答案是：第一是奧地利，其次是蘇台德區，然後收回米森湖波蘭蓋庫和但澤，最後是整個的戰前殖民地。我對於這種判斷，認為極端正確，在蘇的條約，始終沒有發現這種判斷有不對的地方。

捷克是英國同盟制度的核心，在道爾時是阻止德國向東南擴展的有力堡壘。蘇台德區，雖然在戰後以後，捷克無論在戰略上或經濟上都陷於完全孤立無援的地步。法國和英國雖然在道爾時對德談判或談判不成而開戰，總可以維持凡爾賽和約所定的捷克國境於完整。戰後波蘭本談判是實際止存亡國關係所在，英國駐華沙總領事曾有一封措詞和氣頗強而充足的電報，送到本國政府，力請政府與法國在未失時機以前，共同干涉蘇德關係，用意在於援助波蘭政府與德關係。當德發出這封電報時，波蘭提出上述的理由，立刻毫不猶豫地將本國政府發出一封電報，寫稱我對於牛頓先生（即英國駐捷公使）賢明的意見，毫無保留地表示同意。

英國既成德國領土中的工部份，捷克在戰略上和經濟上的地位即失去了防守的能力。我們祇須稍稍研究歐戰地圖，就可證明這一點的不誤。捷克在北境雖設有陸軍的防備，但是被說已極易遭受從南方的攻擊。這個國家是凡爾賽和約所創造的產物，他的民族

不是自然的結合，凡是舊奧匈帝國所有的各種民族問題，都在他的國境內徹徹地存在。捷克受一種致命的弱點，就是他的少數民族：波蘭人和匈牙利人，他們的人數并不少於日耳曼人，而且分佈在邊疆上，密接着那些稱爲他們祖國的國家。

二百七十五萬蘇台德區居民集聚在德國國界之外不遠，就最廣義的道德立場來說，我們難以覓得一藉口，拒絕他們的自決權。我們如果絕對拒絕，就要和不列顛帝國本身的原則相違背，這樣，我們再不能得到英國人民或不列顛帝國的精誠合作。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無論在戰略上，經濟上，以至於歷史上都有明顯的理由，主張維持那個少數民族在波希米邦境內的現狀。捷總統貝尼斯博士在後來的幾個月間，很快地利用這些點理由爲基礎，表示不願將治權賦予蘇台德區居民因他爲怕那些居民行使治權的結果，形成整個的分割而已。

此外還有一層，從重要。如果西方各國不讓德國威者利誘，到處橫行，依他的主張，爲所欲爲。那末他們必須拿出一點勇氣，並且用外交上和平談判的方式，修改凡爾賽和約，以便解決一切問題，方爲長治久安之計。局勢的進展使西方各國體認到和平解決的適宜，而同時他們對於武力的優佔，有加以寬恕的可能性。蘇台德區的真正自治，是一項道德上的問題，我們可以合理地促其實現。德國渴望着統一，這種有價值的志願

是易於了解的，英國方面對於這種志願的同情心，很可當作對德國人表明英國并非處處阻礙他們的進取而不問他們的目的是否合法不合法的政策。德國人對英國一貫不樂地非難，就是和我最親善的德國人對我也常如此，這種非難並非完全不合理，他們的意見和戈林所說的話一樣。戈林說：「祇要德國想採採一朵花，英國便說：『不許』」在德國想採一朵花的時候，我們如果有效地阻止它去採，那末我們的話，還有些用處。如果我們不能阻止它，那就等於白說了。

大約過了兩月，英法兩國政府方纔同意干涉捷克問題。當時的局勢已澄清了些。一方面漢倫先生已集合了大概全體蘇普德摩的耳人，在他的號令之下。卡爾斯維德計劃規定蘇台德區耳人自己所希望的自治權的範圍，已經公布了。德國人爲他們的未歸祖國的同胞所發出的宣傳，正在加緊進行而且聲勢漸高。在耳一方面，捷克政府也發表了些表示，說明他們對於太喪國權的任何事實，都願輕易贊同。卡爾斯維德計劃中規定的辦法，大部可以立刻接受，但是有三等點，尚待在校有良好的空氣中，從長討論。所有的解決方法中，祇有一種有真正成功的希望，那便是把捷克從一個單獨由捷克人管理的國家，變成一個若干民族共管的國家，各個民族，尤其是佔一個最大單位的耳人，應該有平等而自治的權利。當凡爾賽會議時，就有如此的打算，但是現在

第三章 第一次休息

尼斯博士無疑地覺得這次像這樣一個新創之物，決不能保持永久。他還想英法蘇三國有一種最後的手段，可以挽救他，使他不必向日耳曼民族實行他所認為過分而危險的讓步，所以他抱着樂觀的信念。

四月末，英法兩國公使在倫敦開會。會中決定英法兩國政府聯合向捷克政府接洽商討。其時英國政府曾向法國政府明白表示：如果德國向捷克進攻，英方進入滿意的範圍，不能超過三月二十四日英國首相在下議院表示的態度。那次張伯倫先生曾指明英國對捷克並無條約上的義務。他提到這一點以後，在結論中特別聲明：「論到和戰問題，不僅是牽涉到條約上的義務問題。如果戰爭爆發即無條約義務的國家亦不能他手旁觀」。英國在以後五個月內屢次向德國所發出警告，就用了這種公式。

在布拉格實行干涉捷克問題。同日（五月七日），我遵照在倫敦商定的辦法，單獨在柏林將英法兩國在布拉格所採的行動，通知德國政府。當晚事實上，希特勒和他隨外交部長正式訪問羅馬。數日後，里賓特洛甫回到德國，立刻通知我：元首熱烈歡迎我們的辦法。據他說：元首認為蘇台德問題「是一種純粹的內政問題，可由捷克人和漢倫自行解決。他接着說：民族自決，無論以何種形式實施，是必要的。」

布拉格談判，與我無關，我祇就有關德國方面的情形從旁觀察。事實上，當時希特

對於捷克問題，不甚性急。因為奧國已經能夠將那條德國巨蛇去消化。他的軍隊正在暗地裏動員。他很願意等一等，看蘇台德省是不是自願投入他的口中。就是對於奧國的侵略，雖在喝采和勝利聲中結束，也毫無憂懼，因此如果再向捷克進攻，將要掀動干戈，引起歐洲的混亂。從這一層看來，希特勒說他誠懇歡迎英法兩國的行動，實作實觀，自己已經擺的第一步。不幸他從來變更他的策略，是因他本人懷着滿腔憤恨，並且又失去了忍耐心。同時，像在奧國事件一樣，他的敵人的錯誤，更易使他變更和加強謀人的策略。

第四章 第二幕：捷克·第一場：布拉格

在一九三八年度演出的第二幕戲，可自然地分為兩場，第一場的台幕，在五月十二日揭開。貝尼斯態度的猶豫，很易使德國懷疑到貝尼斯究竟是不是存心將賦予蘇台德區的日耳曼人以適當的自治辦法，蘇台德區的情勢，顯見日漸惡化，嚴重性或大或小的事件，天天發生。德國的報紙，以這些事件為根據，並且擴大其嚴重性，肆意宣傳，以致使人不得不相信德國的另一次閃電打擊，業已逼近，尤其是在最近奧國事變之後，特別可能。德軍在捷克邊境集中的謠言，開始紛紛流布，使一切足以引起爆炸的危險物，完全具備。五月二十日，我從布拉格及其他各處接到關於那些事件的報告以後，立刻去拜訪德國外交次長魏薩寇男爵，請他告訴我這些事故，是否確實。他表示否認，但我鑒於三月十一日的事件之前例，仍請他替我和凱脫爾將軍確切提供我以一切事件的真相。一小時以後，魏薩寇男爵憑着凱脫爾將軍的回話鄭重地向我保證：關於德軍集中的傳說，絕無無稽。

捷克駐柏林公使，和布拉格的捷克政府均曾接得同樣的保證。但是因為德國報界的宣傳和奧國被侵的先例，謠言雖難盡信，仍不免令人談虎色變，從布拉格發來的關於德

軍行動的報告，愈來愈詳繃。五月二十一日，我在德國外交部確確實實看到一封從駐捷公使發回本國的電報，電報上說：捷克軍政部業已宣稱德軍八師至十師正在越過薩克森而前進中，我們替捷克人說一句公道話，當時確實有許多軍事行動，不絕地在德國發生，而這些軍事行動根據通常的標準判斷，可以說是非常的，一般不大精明幹代素和觀察家們因此很易被他瞞過。

我因此便在五月二十一日早晨，派遣兩位英國武官通過薩克森和西利亞作一次廣寬的軍事查勘。（在當天黎明到翌日黎明之間，實際上馬遜麥克法倫中校駕車駛過七百哩的路程，史屈羅少校走了大約五百哩。）他們不能發覺任何非常的或者有特殊意味的德方軍事行動，即其他各國駐德使館的武官，也曾同樣地奉命巡查全國，結果也是毫無所獲。但是這時已是計無從出，外國方面對於捷克的傳說，已自然地認為完全可信。五月二十一這一天，我在德國外交部內費了大部的時間，代表英國政府向德國提出抗議，並且正式對他們證實三月二十四日本國首相在下院所發表的警告。（那次警告已經在上文引及。）

五月二十一日我和里賓特洛甫的初次晤談，證明了雙方都相當的有點舌劍唇槍，誰不投機。有一家英國報紙由於一次殊堪惋惜的疏忽，竟提出了凱脫爾將軍的名字，說他

會問我否認關於德軍行動的報告。里賓特洛甫看見這段消息，顯然十分不快，認為我除他本人之外，不應向別人打聽消息。他和我會見時，首先責備我這件事，并說因此他將不再向我傳報任何軍事上的消息。我於是反唇相譏，說我祇能從他的態度推定凱脫爾將軍的消息是不正確的，而我覺得有弄這個結果報告本國政府之責。他在怒氣沖沖之中，又將談鋒轉到衣格爾附近兩個日耳曼人偶然被刺的事件，他以最凶惡毒辣的字句痛罵捷克人。他對我說，一定要消滅捷克人，不論男女老少。我說兩個德人之死，固然可惡，但是與其驅數百萬人於戰場，倒不如抓兩個犯人來抵罪的好，他的唯一的回答是：所有日耳曼人，無不為國犧牲。後來纔偶然覺到他這次言辭失態，定然會使 he 受到了他的主子的申斥，而且曾有一時期因此而失去了主子的寵幸。可是在那次急機的較後一個時期，他曾以擔任英國決不會動兵安慰他的主子而重獲寵任，那位主子因為要在九月間續行他的政策，正需要這種鼓勵。

無論如何，里賓特洛甫在五月二十一日早晨所取的態度絲毫不會減除緊張的形勢。五月下午，我奉倫敦來的訓令，再度覓見里氏，我先通知他英國政府正在布拉格採取一種行動，意在勸捷克政府及波倫直接談判來解決爭端。然後我警告他，說法國對於捷克負有確定的條約義務，倘使一旦被迫履行，那末英國政府就不能保證不為時勢所逼而牽

入萊茵。那天早晨里賓特洛甫原想：「希特勒，可是到了下午，就變成鬱鬱不樂。他的表露——顯係根據希特勒的命令，希特勒對於這一點自始至終認為是難堪的——這是一切抗戰都應向布拉格而不應向柏林提出。他拒絕對漢倫發出任何類似英國向捷克政府提出的勸告。他說：『萬一再度爆發一次大戰，那也是一次由法國挑撥而起的侵略戰，德國將如一九一四年之所為，起而作戰。』他在九月間反覆地說着這一套話，最後，在星期天才將哈里斯法克斯勳爵發來的一封信，由外交部次長轉遞給他，（里賓特洛甫那時已離開柏林，到貝希特斯加登謁見元首，報告一切，）信上請他注意貿然引起戰事的危險。再推遲一點結局也許就是整個歐洲文明的毀滅。」

張和歐戰場上的公事說來，這所謂「五二一」的一場風波就此結束。到星期一早晨，除了一堆長頸個的份子以外，所有的人都已深信德國軍隊集中的消息是假的了，捷克在星期日所舉行的市民選舉也已經告竣，不曾引起進一步的流血，並且使漢倫那一黨人完全驚惶。一切事情似有恢復正常狀態的期望。

昆並在萊茵河為什麼在常狀態未能恢復之前，我必須在此處一述這一次大難關中的一種特殊事件，其本身雖然無關宏旨，但却會傳揚一時，我因為他實在和後來發生的事情有極顯著的關係，所以帶引述。我所指的是關於特別列軍的一故事。原來五月二十二日，

英國大使館海軍武官湊巧因度例假，正要離魯首途，我的屬員中，有許多人認爲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乘此將他們的幼女子女在屈魯此治夫人管領之下，送出柏林。但是鐵路局通知那位武官，說列車都已客滿，但是假使旅客能夠深蒂二車，而方可以添掛一節額外的車輛，因此我的另外兩位屬員，也聽從他人的勸告，預備將他們的眷屬，送往出境。這樣必要的人數已經湊足，添掛的車輛就定妥了。大約中午時分，我從外交部起程，纔知道這件事的經過，我在階上遇見法國大使，他問我是不是真要撤退全體某員，這時這個消息竟傳到倫敦。當時我接獲英國外交部來的一個緊急電話，命我打回關於這件事的原議。我剛把電話耳機掛上，德國外交部次長就從外交部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已經收到許多呈請簽證的大使館護照，請我不要那樣出離驚人。我告訴魏薩寇說，我早已剛曉得這件不幸的巧事，在非常的時局下我所將推辭告假的一批人員中，有一位乃是我的隨從武官之一，他正要照例休假，我無意阻止他，但是我必定要取消所定的額外車輛，并且禁止我的任何其他屬員離開任所。

按以後發生的事情看來，這件事完全顯得幼稚可笑。但是我願借此機會來表明，在一九三八年的五月危機中，我并無任何企圖想做出一些舉動和款項來聚會正在德國國內玩過的槍花來爭勝較量。事實上，每一個人的神經，即使在這次危機最早期，已

分的龍驤，爲證明這層事實起見，我不要再敘述另一件小事情來證明這種情形。二十一日晚間我和段克生夫人一起吃飯，她是德國駐英大使的繼母，又是希特勒的朋友。當時法國大使也在座。在我們進餐的時間，希特勒突然開始在附近用炸彈炸毀一家小旅館，這件事是經列入希特勒重建柏林的計劃之中的。我編着我約女主人，側身對麗賽（注：大使之說）說，戰事似乎已經開始了，這句話在當時是否適當，有點疑問。不過也許是一句很不滿明的暗語。幾個月以後，戈林對我說：「在五月的危機中緊要關頭，你頗有些自相驚擾。」我問他何以見得，他於是復述上面那一段故事，這段故事曾經有人很正經地講給聽過。我解釋我當時不過將它當作一句笑話而已。戈林回答說：「那天晚上我自己湊巧也在柏林，而且忘記打響有炸屋這回事。他說：『當我聽見第一聲爆炸的時候，我立刻直覺到那些可惡的捷克人已經動手了。』」如果戈林都驚慌到這般田地，難怪別人更要發生疑懼了。這故事同時也是說明德國人心理的一個顯著的例證。據我們以爲漸漸有種種是在準備向捷克進攻的時候，而德國人却在害怕捷克人會把德國軍備統緒之斷。先發制人地挑動一次歐洲戰爭。

我止而說過，在五月的間週味的一場風波過去以後，一切原有恢復常態之望。如河是結果并未恢復，無疑地外國報紙的態度爲其原因之一。英國所提的莊嚴的官方警告柏林

方面會大肆宣傳，此種宣傳到底證明毫無正當理由，確實在此是一幕非常不潔的事。更何況了，他的動員了大約十七萬左右的兵員，然後向世界宣稱，他們的這種動員是希特勒變了。他這種種抹黑的姿勢，不是同樣地死搬硬套的。但是希特勒所最不能容忍的是，集體安全的主角們聲言這是集體安全制度的勝利，所有歌美納報紙於是都歡呼。他們說：希特勒所得的答復是「不行！」因此他不得不讓步。又說那民主國家已經使國家歸於馴服等等的話。

希特勒的這一行動，是由於這一種歡呼，才使希特勒在那年中第三次大發脾氣，決定放棄和平。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九日，他始終在觀察動蕩之中，他在五月二十三日，希特勒的命，吩咐軍隊準備應付秋季的一切事變，他抱着復仇的心，決計向奧國和捷克人算賬。這又是他從別人方面受了屈辱却拿在他掌握中的人來出氣的。同時為預防遭受法國方面的攻擊起見，他趕緊興築工程浩大而代價龐大的防線。在德國稱為「西線」，在法國便稱為「齊格弗里防線」。德國為這項工程費去九十萬萬馬克（照十二馬克合一金磅的正式匯率計算，等於七萬五千萬磅），如此巨大的耗費，加強了希特勒的憤懣。使他在五月二十八日，選規定六月一日為對捷進攻的確期。在過去的情形，我們可以覺得那所謂捷克的五月二十一日勝利，事實上實在是

毫無道理。那時德國公實在從未動員，並且，雖則德國人自己的報紙和最近對於奧國的侵略是造成那次動亂的主要原因，但是他們也實在并不存心在那時發動一次突擊事因爲他們還未準備就緒，而且他們覺得這要比進攻奧國更需要無限謹慎而充分的準備。我們認希特勒爲動亂而向全世界呼籲求援，雖未免過早，但事實上舉世人士對於希特勒的誠意，早已毫不信任。就一般人的憂慮之情，可以看出那種對希氏完全猜疑的態度與這希與希特勒的宣傳有種種不幸的結局，它不但使希特勒獲得一種口實，以趨向於他的急進派保存的一面，且贊成再渡兩試或解決的方式，而且不幸的德惠推荒公認價值增的地位是種種的，使貝希斯拒絕滿地蘇台德皆耳曼人的願望。

黑事後的實情看來，在五月二十九日以後，倘若真使貝希斯所爲能叫那位惱怒的黨義者必平氣和，似乎是一件最難吞入置信的事，事實上也恰是如此。希特勒的屬性業已動搖，他的安設氣定要找一件犧牲品來發洩，而且他已經覺得一種動兵用武的難日子，在布魯塞爾的談判，從五月六月一直拖延到七月間，終於不得已地陷於停頓。在那個時期內，我祇有盡我最大的能事，竭力勸告德政府，使他相信貝希斯實在可以有願償償，最後必會將適當的自治權賦予蘇台德區耳曼人，不幸我的努力未能成功。

外交士的努力既與德法敗，其目的原就是應當在德法戰事發生時，當機會考慮到德

請一位超然的調停專員的問題。七其間，我曾打電報給哈羅沃克斯勳爵，說爲停戰解決方案，如果欲維持捷克的純粹民族性爲基礎，一定毫無使蘇台德區日耳曼人樂意接受的希望。因此我不推一位超然的調停專員的勢難，會比外交上的行動更加有效些。於是我就懇請義國政府聯合英國政府，向法德兩國政府建議舉行一次四強會議，來解決當前的糾紛。不過當時爲要拒絕其他列強，參加此項會議，恐怕也不無困難。七月二十六日首相在下議院宣稱英政府已經決定應允捷克政府所請，派遣伍錫曼爵士赴布拉格，以私人的資格任調停專員。同日，我奉命將這件事通知德政府，并請他們和英方合作，維護倫保守耐性，不要操切從事。誰知里黨特格甫對於此事竟大加贊揚，答稱英方既求事先和德國政府交換意見，即貿然宣布所遣使節，德方保留他的態度，并認爲這純粹是一件事與英方有關係。其時希特勒心中，則早已另有打算。

我上面已說過，德方已在五月廿八日決定採取強硬行動，所以從那天以後，便極本無意妥協。在那整個七月份內，政治的氣壓步步下降，各方報告德國的軍事準備正在高潮然而無休止地進行着，到八月一日，報告愈來愈多，我便在那天命大使館裏實親自到軍政部替我打聽究竟是什麼回事。里賓特洛甫雖然曾在五月二十一日，因提起軍事情報，而表示過詳詳的願答，但是馬遜麥克法倫中被屢然仍在再被敲打聽到許多事實，使他

深信德方軍事準備的嚴重性。唯一值得疑問的是這些軍事措置，究竟怎樣算是虛張聲勢，怎樣才算是一種實際的威脅。當時據我的觀察，德軍正在準備應付萬一。但是如果虛張聲勢，不能達到德國的目的，他們就訴諸武力。不過，就捷克問題而論，希特勒顯然有意尋覓一種無論如何要用武力的藉口，是不成問題的。

任錫曼的出使，使這一幕戲得到片刻的休息，這期間我曾詳細地向英國政府陳明：假使任錫曼不能在牛倫堡國社黨大會開會以前，辦妥那件事實上大概做不到的事情，那末我們就要失去先發制人的機會，而讓希特勒在那時那地去搶到這機會，我們究竟是要堅決逼迫捷克接受一種解決方案，還是需用武力去強迫德國接受，事實上也不容我們有選擇的餘地。

任錫曼爵士八月二日抵達布魯格。再無事後的實情看來，我們不妨斷然地說：他的使命在未開始以前就已經定了失敗的命運了。他的談判，在八月間拖延了一整月，表面上雙方雖裝出一種不真誠的誠心，但遲為時已晚。到了九月間，國社黨大會就需舉行，而談判還是沒有一點具體的進展。我曾一再籲請由任錫曼爵士發表一次私人的宣言，或者至少由他向英政府呈遞一件報告，建議採取民族自決的原則和瑞士的州郡制度，作為談判的唯一可能基礎，但是我的呼籲終歸無效。當這樣一件報告最後發表之時，慕尼黑

會議早已開過了。

當這開會的第二天第一場開幕以前，還有兩首關於柏林的插曲，值得聽下。小貝初，我曾差遣英國武官到倫敦討論德國軍事準備的程度和意義，後來我奉命傳遞英國首相和希特勒克斯助贊會銜的一件備忘錄，經由元首府文官長拉默斯直接轉呈元首。備忘錄中特別請希特勒注意德國的措置在歐洲所引起的危懼。那件備忘錄並沒有產生什麼顯白的效果，除了因為是經元首府而不是經外交界呈遞，使得里賓特洛甫又勃然大怒。希特勒的提案的提出答復的也是他而不是元首，他說德國政府關於本身認為適當的任何內政措置，不容他人置喙。但是就開會的意義而言，那次我所奉命傳遞的備忘錄，却成爲最後首相與希特勒親自會晤的先聲。

我所指的第三插曲，乃是後來我自己奉命回倫敦遞送機密事。在我的回國期間，首相親自和希特勒實行會晤約意思，便有了具體的表現。

第五章 第二幕 第一場：慕尼黑

在第二幕幕場之間，并無休息，戲幕在布拉格降下，不過爲着立刻要在紐倫堡重行揭起。從紐倫堡開頭，一場一場的舞台面接連着迅速地變換，先到貝斯德斯加登鎮，來到戈德斯堡，再次就在慕尼黑的一個偉大場面，最後到柏林本地爲止。從紐倫堡大會開幕時起，布拉格已不復是世人興味集中的所在，這原是我們早就料到的。

我個人決不會忘記一九三八年第二次的造訪紐倫堡。我在外交專車裏足足被催促地開了五天，既沒有私人房間，又沒有傳達消息的工具。我在那年冬季曾經有四個月纏綿病榻，不能動彈，這場病已在我赴紐倫堡途中開始發作，因此感到十分不適。晚間，我既難得能在臥車中安眠，白天又得不到片刻的休憩，那真是苦透了！我在九月六日（星期一）晚間離開柏林，原以爲祇要在途中耽擱三十六小時，不料結果竟要整整的五天，火車上本來不適於寫東西，而我又糊塗的忘記攜帶一切寫作應用的材料。車中祇已沒有安全可靠可言，即使我已經帶着一種密碼，也是沒有用的。到底我必須由特別飛機發一封信到倫敦去，那時我不得已從技巧帶在身邊的幾本偵探小說上，撕下一些空白的紙張來寫了那封信。

另一方面，我會費了無數的口舌。我會和戈林長談兩次，和戈培爾長談三次，和里賓特洛甫長談一兩次。和牛頓特讓談兩三次，和魏爾寇長談六次。此外我又曾向黨裏弄不亞於他們的許多其他的納粹黨要人，接連不斷地提出警告。這些警告累積起來，差不多和廣播一樣，我希望它可以有一些用處。至於希特勒本人，僅僅曾與我的商談在二起時，他互道客套而已，除了對於希特勒以外，我所發表的意見，總折起來不外：「如果德國實行侵略進攻捷克，法國當當援捷。法國如果開戰，英法也不避免的牽入。」我覺得當前的重要急務，就是請將這一層意思，深印在德國人的腦海中，使希特勒將來在國社黨大會閉幕前發表那篇偉大的政治演說時，可以審慎三思，免得演說詞中，突然採取一種以獨裁者的身份事發無法轉圓的態度。

希特勒本人決計拒絕和在紐倫堡的外國人發生任何政治上的接觸，這一點確實是毋庸置疑的。在一夕外交人員的招待會中，我的法國副僚，以外交部領袖中費希曼標的身份的身份，談到政治氣氛降低的事，曾向希特勒試探對於時局的意見。不料希特勒很冷淡的回答禮讓大使說，對於天候的預測往往是很錯誤的，於是妄顧左右而盲極和全體納粹軍隊站在一條綫上，而且從五月二十一以後，決不容別人有一點想到他還台聽從外界的選擇。我有鑒於此，絕無相信不必再去和他打交代，因為一則他向我請他許我

赫斯謁見，他一定要以其他機會太多不克分身爲理由，不肯召見。二則假使我請謁赫斯，洛甫向他轉達任何正式的警告，那種警告準會被公開宣傳，結果徒然逼他走上絕路，赫斯將無可避免的立刻遭受侵略。我這種信念，事後更覺確實。

其時英國政府正在嚴密考慮如何由我在紐倫堡給希特勒一次公開的警告，但是經我將上面那一層意思劃句講明後，這個念頭硬被打消了，但是關於希特勒在紐倫堡所發表的演說，我們所能說的，充其量不過是最後的和平之門，不會完全被它關斷而已。那篇演說措詞熱烈而富侵略意味，它要求蘇俄德法日耳曼人的自決權利，允許以德國的全力扶持他們，但是不曾規定期限，也不曾要求舉行公民投票。雖然，它已成爲點燃蘇台德區內一切燃料的火種和引起示威暴動及一切嚴重紛擾的信號。捷克方面的反應是宣布戒嚴，而漢倫的抗拒，便是波茨卡爾斯柏計劃中所擬諸點，認爲這已不復敷用。

後來英國首相先飛到貝爾福斯加登，再到戈德斯堡和慕尼黑兩處地方。這種舉動之爲功爲罪，祇有留待歷史家去作最後的批判了，將來也許有人議論，說西方民主國家與不安分的納粹德國，既然不免一戰，則與其等德國在對中歐佔了優勢後再動手，倒不如在一九三八年九月間，雖然英國當時并無準備，就接受德方的挑戰，較爲得計。對於此等論調，我尚武斷辯駁，未嘗絕火。但是，到今天我將毫不猶豫的斥責當時若干人士

的某一種意見，爲完全謬誤，甚至到今天還有人固執那種意見，他們們認爲：我們雖然沒有好多實力做後盾，而且也沒有確實的道義根據，可以拒絕將自決權利賦予蘇台德區的日耳曼人，不過我們仍不妨空言譴責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九月間的舉動，那種舉動據說是一種虛張聲勢，但實際上却并不是的。當時還有一種很流行的議論，認爲在原則上對於一個獨裁者所能說的話，祇有一個「否」字，而且這個字要說得愈公開愈好。我們如果單靠這套論調，於事完全無補。我當時曾寫過這樣的話句：「不論何時，我們倘欲對於希特勒的虛張聲勢，加以譴責，讓我們首先準備好去擔當這一切後果。」英國不必說，就是法國在一九三八年九月間，真有這種擔當的準備嗎？

在這種情況之下，首相着手計劃親自和希特勒會面。我回柏林不久，就接到預爲安排的訓令。我托里賓特洛甫轉達這個意思，希特勒立刻表示同意。我聽說希特勒的最初意思是想親自赴倫敦，或者至少在途中相會，免得那位老婦老人備受僕僕風塵的煩瑣。他的第二層意思是想請張伯倫夫人和她的丈夫偕行。不過，時間已不容雙方互相磋商於是首相就在十五日晨八時半，由倫敦動身，四個鐘頭後抵達慕尼黑黑飛機場。

我自己是前一日晚間由柏林乘火車出發，到慕尼黑的時候，正趕上吃早餐。在那裏和當地的英國總領事卡奈爾君匆忙地籌備許多關於密碼和打字瑣碎事情。英國的飛

機比預料的時間早到一點，所以我到飛機場纔五分鐘或十分鐘光景，飛機就到了，張伯倫先生和隨他同來的威爾遜爵士，都向來不曾坐過飛機，因此我不禁有點抱歉他們兩位，豈能忍受這次的奔波。其實我不用着担心的。張伯倫先生跨上飛機的時候，神情顯得非常爽然而鎮靜。回答我的問候時，他說：「我的身體很結實。」真虧他這樣結實，晚上十一點鐘，他原該安睡，但那天晚上他坐汽車、坐火車、又坐飛機，合起來至少有十小時，其間會先後和里賓特洛甫及其他人們談了許多話，并和希特勒會談甚久，末了還要用電報向他的閣僚發出一件報告，結束他一天的工作，總計大約費了十六小時，始將工作緊張，沒有多少休憩。這對於任何人都不是一件輕便的事，何況張伯倫先生已經六十九的高齡了呢。

我們從慕尼黑飛機場，乘運糧車往車站去。在火車中又經過幾小時的行程，其間我們會和各位要人，如法國殖民地聯合會會長艾浦將軍等談話，并在車上進餐，由里賓特洛甫作東。下午四點剛敲過，一到貝爾維斯加登鎮，我們立即乘車到一家事先已為我們匆匆預備好的旅館裏去。在那兒僅僅被款待了半點鐘，我們又動身出發，在蜿蜒相接的汽車中走了大約二十分鐘的山路，到達貝格荷夫。希特勒帶着凱脫爾將軍和另外幾位親信，站在可以通到他那樸素山莊的階梯之上，迎接首相。

第一個節目用茶點。吃茶的地點在客廳大窗對面的壁爐前邊，圍成一個半圓形，從窗口外望，可以看見隔着羣山的薩爾茲堡。我們東拉西扯地閒談了二十分鐘之後，據元首向首相提議，說他們可以開始談話了。於是他們帶着那位可靠的翻譯官希密特博士，同到希特勒的書房裏去。我們其餘幾個人就留在客廳中，又閒談了三小時之久，希特勒的侍從們很殷勤地款待我們，但是一個陰濕而多霧的九月的黃昏，窗外雖有很美好的景色，也無從鑑賞。在另一方蕭條於蘇台德區發生的事件，有大批德國報紙的電訊源源而來。記得其中有一個電報是報告四十個日耳曼人在某處和捷克志兵發生衝突，因而喪命。其時有許多英國觀察者在捷克，其中一位立刻跑去調查那件事的真相，結果查明事實是死一個日耳曼人。德國報界當時專愛誇大其詞，捏造消息，而以後也一直如此，這件事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我的意思是最好由首相和希特勒單獨會談，不要讓里賓特洛甫夾在裏面，但是如果我和威爾遜爵士有一個跟着首相，里氏少不得也要參加的。我們便照此行事，但是不幸糖果很壞。因為里賓特洛甫故意製造異常的煩瑣，議員所寫的紀錄竟一直不會給首相過目，使首相因而感到意外的煩惱，連後來兩人進行單獨談話也成爲不可能的事。我異常絕望，凡事祇能有里賓特洛甫參與，總是有害無益。後來的幾次談話，威爾遜爵士

總是任職，我也問或任席，大使館秘書寇克巴曲克則充當英方翻譯官，在會場担任紀錄。

他體說第一次談話，經過了幾小時，希特勒在談話中明白地表示：如果要成立和平解決的協定，他所能同意的唯一條件，須以接受民族自決原則爲前提。首相最後自己接受了那項原則，并答應負責和他的閣僚商議，努力取得德國和法捷兩國政府的同意，在希特勒這一方面則表示準備在以後再討論實施的步驟和方法，并擬在雙方將來約定的日期，傅曼和張伯倫先生面談。

因此，第二天早晨，首相再乘飛機，飛回倫敦。任錫曼爵士奉召從布拉格回國商議。法國總理和龐萊先生也都於九月十八日夜逃到倫敦。結果張伯倫先生忠實地履行了他的約言，甚至運盡了更多的一份力量，因爲英法政府都同意勸告捷克政府，爲保護和平并維持捷克本身的重要權益計，捷克不但應承認自決權，而且還應該不經公民投票將所有日耳曼人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蘇台德邊區全部割歸德國。

可是當時捷克內部情況，已經在貝許德斯加登會談之後，日形惡化，有好幾千蘇台德區居民開始擁到邊境上來，其中有許多無疑地是受了納粹黨的煽動，但是另外一些人實在是恐怕戰爭爆發以後，在兩面夾攻之下，橫遭犧牲，因此於若逃命。最後在德國竟

有二十五萬這樣可憐的人們，「義勇隊」開始向捷克反撲，從此死傷的人數，日見增加。哈柴 (Hague) 內閣結果辭職，捷克另組一個舉國一致的內閣，由薛維維將軍領導。一種空前激烈的報紙宣傳，在德國開始活躍，波蘭人和匈牙利人也多參加爭逐。要是德國能奪得一份最大的捕獲物，波匈兩國也不能不分一杯羹的。匈牙利攝政王和波蘭外交部長都匆匆趕往貝許德斯加登鎮。蘇俄則袖手旁觀，含糊地說要支持西方列強，而捷克本國的人民則正在徵詢各方關於如何應付德軍集中的意見。

首相和希特勒既然約定要在貝許德斯加登鎮再度會談，德國輿論界的叫聲實在更是毫無道理的。民族自決權的原則，當初雖經承認，可是已不能滿足希特勒的慾望，雖然戈林曾告訴我第二次會談以前，德國不會有所舉動。不過，正如這位元帥所指出的，時機緊迫，不容遷延，而且德國并非虛張聲勢。

我還記得戈林那次對我講話：「如果英國想對德國開戰，那末最後結局如何，誰也不會知道。但有一點是不成問題的，就是在戰事結束之前，很少捷克人能夠保全性命，倫敦也將所餘無幾。」接着他準確而詳盡的指出當時英國所有新式轟射炮的數額，還將提到英國防空設備的無準備。他又指陳德國的空軍在數量上遠勝於英法比捷四國的總數。這話在當時是絲毫不假的。

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奉命隨隨首相和希特勒的第二次會談。這次會談改在戈德斯堡舉行。當初首相的頭許德新加登踐之行，可說是狂華而數小時之內方議定的，但是這次的戈德斯堡會談，德方却化了一星期的準備時間，凡是能使我們感到舒適與否，一種與將印象的事情，無不辨得面面俱到。一隊儀仗兵在科倫飛機場恭候張伯倫先行的檢閱，還有樂隊高奏英國國歌「天佑吾皇」恭歡迎他。他從飛機場偕同里賓特洛甫乘車赴戈德斯堡的彼得斯堡旅館。戈德斯堡本是萊茵區的一風景區之一，位於洛雷恩和德拉欽爾兩村之間。彼得斯堡旅館是馳名德國的。它建築在一座小山上，三面圍着一片廣大的原野，另一面就對着萊茵河。次日清晨，首相和我在一座廣闊的陽台上徐徐散步。那座陽台長長的貫通了旅館的兩端，沿着陽台的一排房間都歸我們使用。這是一個美好幽靜之處，外望景色軒廣，大可觀賞。正應了那句：「景色都悅目，唯有人討厭」。這裏是一處陳腐的俗語，但奇怪的是却常常榮選在我的腦際。我們在旅館中所佔的房間，大都寬大而舒適，每一間房間都有單獨的浴室，旅館主人在每一間臥室和浴室中大為我備放遵守各種科倫的特別產品，如同香水肥皂浴鹽和修面器具之類。

希特勒住在我們對河的一家旅館裏，這是一個姓德里森的人開設的，是希特勒常去的地方之一，那個人在希特勒爭權的早期，曾和他患同患，一九三四年末曾開過一審

他便是在那家旅館中定計的，並和戈培爾一同乘陸塞尼黑人逮捕隊隊員種族後，並將他處死，也是從那裏出發的。九月二十日下午五時，張伯倫先生乘搭柯德與隨員去和希特勒會見，也是到那家旅館裏。我們到那裏去，必須乘渡輪過河，過河的時候，有幾千個閒人擠在河岸看熱鬧，那種樣子，使我本不禁想起牛津和劍橋大學賽船節的盛況。

希特勒在旅館門口迎接首相，隨即領他在樓上一間通常為委員會開會用的禮堂裏，在一張鋪着呢絨布的圓桌的一端坐下，談話隨即開始。河岸上的德國民眾看見英領袖如的時候，認為是一位和稱使者，都表示一種出於天性的歡騰情緒，但是希特勒本派則還保持一種執拗不變的詩氣。

談話之初，張伯倫先生首先提起與斯德新加登鎮那次會談，他曾在原則上接受蘇雷德區日耳曼人自決權利的要求，並已努力徵求他的閣僚和議院府的同意，而且他最初曾和希特勒約定如果他能如願以償，就要再來德國和希特勒商議將協定付諸實施的計畫。他接着說，在極短的期間內，他已經獲得了英國內閣的同意，到倫敦去的幾位法國議員，也都表示同意；而且此外已得到捷克政府的默認。隨後他概略地說出照他自己的意見所擬定的在最短期間將蘇台德區和平移交的步驟。

首相說完話以後，希特勒就問他是不是薄海登三國政府確已同意將蘇台德區由捷克劃歸德國，首相說：「是的。大家靜默一下，希特勒在靜默之裡似乎對打邊了主意。他於是斬釘截鐵地說：『我絕不考慮讓步。這一片現存已絕不再有什麼用處了。』」首相雖然說得驚異憤慨，但宣稱他已經不再動用了，能再帶着一些新的提議和要求回到會議去，希特勒再得三次答覆說：「那些薄海登三國不再動用了。」

希特勒於是託辭掩飾他的過失，他解釋現在所要求蘇台德乃是匈波兩國的要求。他請，以他聽這兩國國家的交誼而論，他須得盡力支持他們。首相反駁他請，就希特勒自己尚表着看起來，那些要求並沒有蘇台德區日耳曼人的問題那樣急迫，而且匈波的要求也要等蘇台德區問題依法解決以後，纔能加以考慮。他反而要求立即將所有講德語的區域，劃歸德國，由德軍佔領。這次輪到張伯倫先生拒絕這項要求，照雙方經過三小時的劇烈爭論之後，雙方停會。

當天晚上和第二天的大部時間中，談判幾乎完全陷於僵局。希特勒剛得了一寸，已經預備再進一尺。他不再預備履行他當初在貝諾德斯加登鎮所許下的諾言，去沉靜地討論解決糾紛的方法。他利用波蘭匈牙利兩國人民的要求，蘇台德區居民的苛求——這些都是他自己的黨羽一手造成的，——當作對張伯倫勉勵失禮的進擊。這標題所從讀者是

德羅威反傷無常的脾氣。戈德斯堡會議可說是英德關係的真正轉捩點。德羅威德希特曼在那次會議中，鑄成了他第一次政治上的大錯。他承襲了美國的首相，並且由於他對英國首相的非議，使英國人對於希特勒主義和它的一套方法，發生極大的惡感，到三十九年五月間德軍佔領布拉格以後，這種惡感更達於極點。

戈德斯堡的第一次談話就此結束，並不會提到下次會議的事。直到次日傍晚為止，看起來似乎再沒有續會的可能。那一天雙方曾交換過兩件書面照會，但是對於雙方感情，并無任何變更。英國的報紙甚至稱稱談判已決裂。這時候倫敦方面，才通知布拉格政府，認為捷克的動員雖然會促成衝突，但是他們不便離開。

不難想見，這時首相還沒有完全失去耐心。他還不能在那面上實在看過德方的建議，因此不願意就拒絕討論，當日下午五時，他命威爾遜爵士和我一同往見里賓特洛甫。據說希特勒動具一件正式的公文，確實說明其關於佔領蘇台德區的建議的旨趣。當時預料希特勒會說他的建議在前一天的談話中，已經在口頭上說得明明白白，所以不應再麻煩英方請求。但是希特勒始去職派遺派有那樣地氣憤冲天。張伯倫先生拒絕再與希特勒的表示，已引起德國軍營中種種優子的憤懣，同時，希特勒更激發德國人民對張伯倫先生離德的期望甚殷，也不願使談判決裂，而急欲再行會談一次，因此里賓特洛甫更急欲與我們

德方準備於當晚寫成一備忘錄，一俟完成，立即送出。於是當晚十點半鐘，會議重復開始。

希特勒的態度，雖沒有以前那樣強硬，甚且努力裝出謙讓的樣子，但是他在備忘錄中並沒有任何讓步的要求，而且用一種毫不容分說的語氣提議，據他說這是他最後的提議。他要求捷克人於九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從日耳曼人佔大多數的各蘇台德區中開始撤退，並在九月二十八日以前撤退完畢。因此，希特勒應給捷克政府四十八小時的期限，讓希特勒一切必要的命令，僅僅在五天之內，就要將整個蘇台德區撤退完畢。首相簽了這件備忘錄，就認為它簡直是強求一個未經戰敗而自願割讓領土的國家接受的一種「命令」。希特勒對凡爾賽條約常用的名詞「協定」竟敢充當回答：「請看這不是命令，上面所標的題目是『備忘錄』三字。」這是希特勒強詞奪理的一貫作風。

經過幾小時的磋商之後，希特勒才同意將他所訂的時間表，稍加修改，并且親筆將備忘錄稍稍修改了一些地方，寫在波羅尼亞的苛刻性。他帶幾分刻薄的對張伯倫先生說：「我生平對人讓步的祇有你一人。」首相最後表示他雖不能接受或贊同德方的建議，但是以個人的地位，當然不便拒絕將其轉達捷克政府。希特勒聽了，似乎寬了心，他原不願使德國人認為那項談判是由於他的外情讓步而陷於決裂，但他仍強執意要用武力強迫捷

克，德本人已準備與英一戰，但在易受方面，他的軍隊顯則遲延而遲延知準備進駐
德境，並胡又乘飛機回倫敦，德方的備忘錄和一瓶標明戈德斯堡會談時所創草紙繪
割讓地圖，多德馬運送英法倫上校的辦事敏捷，當擬即送達英政府。那次馬上被其是
備極辛勞，他要先飛回柏林，搭乘汽車到捷克邊境，然後在黑暗中穿過捷克的鐵絲網和
其他障礙物，步行十公里之遠，隨時有敵德兵或捷克兵當作釘細而密槍般的危險。比羅在
「戈德斯堡會談」以後，危急的情況達於最高峰。法國已動員五十萬大軍，英國海軍亦
也同時運布艦隊動員。法國政府重申捷克受侵時必受援助的決心，與德政府也根據前湘
在三月二十四日發表的演說，同樣重申他們的立場。英法軍事主腦之間的參謀會議直
復開始，而捷克政府則受這些團結表示的鼓勵，拒絕接受德方在戈德斯堡提出的備忘錄
，照舊形勢起來，等捷克同意割讓土地給德國的日期一到，戰事似乎無可避免的。

首相仍不願就范墜入無底的深淵。三月廿日（星期一），他派威爾遜爵士赴德商議
持勸的私人薩爾柏林素，信中直述捷克政府業已拒絕接受轉方建議，對內容其次他勸
德元首與德商議武力不如願意談判，因德自顧的問題是形式上的爭執而不具原則去議
解。他又建議由德捷兩方面接會商，英方當派代表一人充當調人。

威爾遜爵士由寇克巴曲克和我陪伴，於當日下午五時，往見德元首，幾次會談皆未

波瀾迭起，毫無結果。我守盡了夫夫夫夫，能使希爾東肯辦着柏林的備信。當某一點上他大叫道：「好了，不用再說了！」并且走向門口，好像要離開房間的樣子。他到底又回到原處，恢復說話，但是不能得到任何圓滿的結論。就在那天晚上，他在體育會館發表了一篇演說，供一般擁護納粹黨的喝采者報以熱烈的掌聲。那篇演說熱烈地攻擊貝尼新個人，最後則談到他的宣稱。假使捷克斯拉夫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將蘇台德區全部拱手交出，德國就要在那裏實行佔領。他自己必定將葬葬葬葬，前途渺茫。同時他還客氣的推崇羅伯倫先生對於維護和平的努力，又提起他迫阻對英維持友好關係的願望。說海軍部部長曼曼，因此備請英國保守中立，從那裏說以後，他好像不能再放棄見個要索曼斯爾總統在回國所發表的和平呼籲，德國各報簡直就驚駭駭駭，因為那時德國人民正在狂熱地備戰，深恐羅斯福的言論會抑低這種熱望。

威爾遜爵士那天在大使館演說時，他曉得又接到訓令，命他傳遞另外的一封私人書牘。羅伯倫先生在暗中對於希特勒在演說中提起他的地方表示感謝。希特勒將希特勒保證如果德國不用武力的捷克斯拉夫所承諾的準備，在對猶到猶於是威爾遜爵士在過路於十七日中午午十二時十五分第幾次見希特勒。他問那位元首能根據首相的見地，讓總理學對猶信到倫敦去，希特勒答應，捷克斯政府祇有兩條路可走：接受德國的備忘錄，或者是拒絕。

。在這次談話中，希特勒曾有兩三次大聲狂呼道：「Ich werde die Tschechen zerstören。」這句話經翻譯官希特勒很忠实地譯爲：「我一定要毀……毀……毀滅那些捷克人。」從他的態度看來，他是渴望懲罰一下捷克人的傲慢無禮；布拉格必須掛幾顆炸彈；捷克的軍隊必須叫它塗炭覆沒；貝尼斯博士必須逼得棄城出奔。希特勒準備嚴厲的決心，顯然已無可變更。威爾遜就對希特勒說，他受首相之命，特傳告知如下：「如果法國爲履行他的條約義務而實行對德開戰，那末英國勢將被迫援助法國。」

希特勒問答說：他祇能對這個通知加以注意。據說這個通知的意恩是表示假使法國決定進攻德國時，英國也將被迫向德國進攻。威爾遜爵士曾想辯駁這種解釋，但是希特勒不願意聽，他高聲喊道：「如果法國和英國要動手，讓他們動手好呀。我完全準備把放在心上。我也已經準備付任何障礙。我祇能注意當前的形勢。今天是星期二，下星期三我們大家將在戰場上相見。」這沉鬱的談話，結束了這次會談。

當日下午，威爾遜爵士很早就飛回倫敦。不過，他的談話還是發生了效果。那晚上德國外交部長正式通知我，說希特勒已經由倫敦的德國大使館發了一封緊要的信去給英國首相，他要想解散他的態度，并且懇請張伯倫先生繼續轉達，將捷克政府明白覆性。這封信顯然表示希特勒還是企圖進行和解，并且多少顯出有點氣餒。他在信中硬首

相提出一種確實的保證，却只在六個月以後毫不講道義的英若敵視。這個保證就是說：祇要蘇台德區日耳曼人歸屬德國以後，也將不再過問捷克的事，並且無論如何，不再侵犯他們的獨立。（我已將這封信的譯文載在本書之末，作爲「附錄一」，「理由自不待言。」）當時有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情，使希特勒的心理上發生一種有益的反響。在那天星期二的下午，有一隊機械化部隊經過柏林的市街，開上威靈街，在元首府和英國大使館的窗前走過。希特勒在他的窗口站了有三小時，注視着那部隊經過。本來德國人都愛看軍隊演習，但是那天在街上觀看的人，竟沒有一個鼓掌歡迎，當時的情景幾乎像一隊作戰的士兵經過一個被征服了的城市。希特勒深深地受了感動。那時他纔第一次悟到從前在體育會中那一批佞媚者的歡呼，實在不能代表德國人民的真正精神和感覺。

九月二十七日的傍晚，我由本國外交部接到電話，說業已發出一件訓令，命我再向德元首呈遞一個照會。於是我設法在那日晚上十一時在外交部會着德國外交部次長，交給他一件照會，請他立刻譯呈希特勒。照會中包含若干建議，壓迫捷克政府同意根據英國政府所擔保的時間表的限制，立刻移交蘇台德區土地。所有建議都已經法國政府的贊同，并已轉送布魯格。第一期的各區定於十月一日移交。此建議設置一個國際劃界委員會來解決一切細目。這些建議很能投合希特勒的要求，而且結果便構成了慕尼黑協定後解決

的主要基礎。魏薩寇男爵雖然答應立刻將那些建議轉呈元首，但是表示不能負責。據着微薄的希望，我在星期二晚上，上床休息，心想如果沒有新的事態加以阻止，那末已經宣布的德軍總動員，就要在翌日下午二時實行。而德軍在事實上既早已集中并實行動員，所謂總動員就等於說向捷克開始進攻。

第二天（星期三）早晨七時，我被法大使打來的電話吵醒，他通知我他已在上午四時接到訓令，命他轉遞一件照會，它的內容和我所遞的相仿，而在若干方面比我所遞的還要更進一步。他說他奉命謁見希特勒本人，已經請求延見。

三小時之後，到了十點鐘，他又打電話來說恐怕事體已僵，因為他請求希特勒延見，並沒有答覆，大概現在也不會再有答覆的了。我告訴龐賽先生在十點半去看他，我繼後用電話請戈林談話，幸而立刻就能接通。在千鈞一髮的關頭，各處的電話線能暢通，真是幸事。我告訴那位上將：法大使曾請求元首延見，但是未蒙賜覆，他是爲了一件新建議的問題，也就是和戰的關鍵。我開始敘述那些建議的內容，但是戈林把我的話截住。他說：「你不用再講了，我立刻就去見元首。」

我於是抽身去看法大使。當我們正在討論新建議的時候，元首府來了一個通知說希特勒將在十一時十五分接見龐賽。同時我的一位秘書帶着一封倫敦來的電報，到法大使

館交給我。電報中命我立刻將首相發來的最後一封私人信遞給希特勒本人。信中的要旨是說張伯倫先生看了希特勒前晚的信以後，仍深信德國可不必訴諸武力而達到他主要的要求，而且他準備立刻親自到柏林來，和希特勒及法意兩國代表討論整個問題。信末尾說：希特勒是否願意爲了遲延幾天去解決一個問題而担負世界大戰的戎首之責？

在那千鈞一髮的一天中所發生的事件的真相，很值得追憶一下。戈林在十時十五分與十一時十五分之間去會見希特勒，和牛賴特不期而遇。牛氏是未經邀見強自進去的。他們兩人都贊成用談判方式來和平解決。在希特勒和他的顧問們開會時，會場上曾有過一些坦白的實話，戈林曾痛斥里賓特洛甫的煽動戰爭。據說戈林曾狂呼他明白戰爭是怎麼一回事，並且他不願意再經過戰爭了。不過，倘若元首喊一聲「開步走」的號令，他必定親自駕駛第一架領導的飛機向前進發。他所堅持的乃是里賓特洛甫必須位在他的下面。他的確會說過這樣的話或者類似這樣的話，不過不是在元首的面前。但是我相信他的確會在那一次罵里賓特洛甫爲「罪惡的笨漢。」在使希特勒打消對進開戰的念頭的各種因素中，戈林的勸諫阻止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一點。

接着就是盧賽的會晤在上午十一時四十分，會議剛到半途，希特勒離開屋子去接見意國大使。他帶來了墨索里尼的一個緊急請求，籲請德方將那個所謂總動員令，展緩二

十四小時。意大利的干涉證明是維護和平最後的決定的因素。這使希特勒能夠誇下虎背而不失面子。龐賽辭出之後，我立刻在十二時十五分去見希特勒。他對我的劈頭第一句話就是：「由於我偉大的朋友和同盟者墨索里尼先生的請求，我已經將我的動員令，展延二十四小時。」

但是在我見到希特勒本人之先，我就覺察到情勢已經好轉。當我走進元首府的時候，我看見齊在大廳裏的那些比較不好戰的納粹軍人和副官的臉上，都顯出一種如釋重負的神氣。我的一位朋友對我耳語道：「局勢好轉了，好好幹吧！」我立即被領入希特勒的內閣會議室。迎面遇着戈林和牛賴特從裏邊出來。我將首飾的信交給希特勒，他的答覆是：「給我一個確定的回音之前，他必須再和墨索里尼商量一次。我們彼此好好地討論最近英法兩國政府的建議。那位元首雖然有點心神恍惚，但是還不算不講理，這次我和他談了一個多鐘點，後來也是被意大使的二次謁見所打斷。這次他對墨索里尼本人準備接受英國召開四強會議的提議，——這個提議業已電達羅馬。」

我被留在會議室中，和里賓特洛甫拉雜地辯論，當希特勒重新進來的時候，我不覺出他的態度有任何特殊的變化。不過，雖然當他緩過迫不得已時，即將對戈林所統率的空軍頒布命令時，曾夾着一兩聲的叫聲，但是他那次的態度，始終比較和善的多。

是他從前以及後來所不曾有過的，然而事後我會聽別人說：當時有些人在門外能夠聽見聲音的地方，焦灼地竊聽，他們聽見裏面亂噪聲的聲音，還担心事情已經惡化了呢。可是這時我對於希特勒那種神經病似的發作，早已習以為常，所以倒不會有什麼不良的印象。

但是事實上，在那天早晨到達元首府以前，一切就已定妥。希特勒在上午十一時四十分，恰巧在預定開始行動之前的兩小時又二十分鐘，決定如墨索里尼所請，將他的所謂總動員令展緩二十四小時。那時和平已經得到了保障。萬一他頒布了總動員令，那末事情就無可挽回，而捷克便將遭受和一年以後波蘭一樣的厄運，假使在那天下午二時以前，沒有新的事情發生？希特勒便不會不發號施令，命大軍前進。捷克的馬奇諾防禦固然堅固，但是德國會經過奧地利，從南方將它摧毀，而且德國的空軍，佔絕對的優勢，所以無論如何，戰事一定會像波蘭的戰事一樣結局。

希特勒所以能懸崖勒馬雖然有許多原因，但是祇有意大利譏諷纔能順利地將希特勒在那個星期一在體育會館中所關斷的一扇門，重行打開。拿希特勒對於墨索里尼親自出席墨索里尼會議的重視，足以進一步證明此言之不虛。在那個危急到萬分的星期三一天中，意大利大使曾於三小時中謁見希特勒四次（第四次是通知希特勒，說墨索里尼將親自

出席慕尼黑會議，)并且大約有二十次和羅馬方面互通電話。事後慕索里尼曾以意幣二千里拉，獎給在羅馬接電話的女接線生，表示讚賞她的勞苦功高。在赴慕尼黑的途中，阿托里哥(意大使)曾對我這樣說：『共產黨員失掉了他們的機會了；今天他們如果把羅馬與柏林間的電話線割斷，戰爭恐怕早已爆發了。』

在我敘述 到戰爭發生時為止的事情的那件最後的報告中，我曾提及意大利大使對於維護和平的辛勤的努力。他在一九三八年危機中的勞苦功高，并不下於一九三九年的那一次。他的努力，和其餘各國使節一樣，終於在本年八月間不幸失敗。但是我私心總是想我們在一九三八年間對於和平的維護，所以能大功告成，阿托里哥居功實多。他確實是悉力以赴，不存私見，始終堅毅努力，欲拯救歐洲於一次戰爭的浩劫。他完全爲這種目的，盡了他最偉大的機智和能力。而且他還有一位很能幹的賢內助，能夠說極流利的德語，大使自己還及不上她。當意大利大使和我乘火車同赴慕尼黑的時候，阿托里哥夫人囁着她的丈夫，親自乘飛機到她一向愛好的一所意大利邸宅中，去爲她的丈夫所努力維護的和平而祈禱。

那個政治家的會議，於次日(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起，在慕尼黑新建的「褐色屋」(Brown House)中開始舉行，在首相達到之前不久，墨索里尼已從羅馬

乘火車趕到，迭拉第也從巴黎乘飛機趕來。據華盛頓街上的德國民衆，對於他們三位，都報以熱烈的歡呼。十二小時以後，即在星期五上午二時三十分，他們的討論報告結束。在談話中，他們始終能平心靜氣。墨索里尼的與會無異成爲一具制動機，制住了希特勒的操縱。他極圓滑地，融會了希特勒的和英法方面的建議，當作自己的折衷建議在會議中提出，打破了里賓特洛甫想自己提出一套方案的企圖，使得成立協定的進行更爲順利。會議之所以遲遲結束，大半是由於會場中有用三國語言——英法德——傳譯的必要，再加上匆促起草的困難。四個政治家，祇有墨索里尼一個人能說懂這三國言語。最後的協定在實質上是以戈德斯堡以備忘錄的內容爲根據，參酌英法兩國的最後計劃而成。其中義明由德國分期逐步佔領的四個區域，并規定了日期。人民選舉權有了保證，公民投票區域有了預示，并且指定了一個國際委員會的人選，負責執行最後的協定。對於將來可能再度召集的一次四強會議也曾經商定了一個梗概。英法兩國政府重申從前曾經過決于版圖已經縮小的捷克以保證的原議，德意兩國政府則表示祇要匈牙利和波蘭兩國的要求最後能予以滿足，便答應參加此項保證。

德國因此不流滴血不費一彈便併吞了蘇台德區。但是他並沒有得到希特勒所覬覦的一切，和那地想用戰爭來解決爭端便可以獲得的一切——就是那條許多德國人所垂涎的

在戰略上有重要價值的捷克邊疆綫，包括第一所日耳曼大學所在地的布拉格在內。除了另外一小片之外，捷克喪失了一片荒地，這片土地假使當初在凡爾賽會議時不會被劃入捷克的版圖，或許較為得計，倒可以省點是非，而且這片土地，除了在聯邦制度之下，也決不會永遠留在捷蘭版圖之內的。捷克人的含羞忍垢，雖然是一件慘事，但是一場徒勞無益而更無意義的戰爭到底是否強了？不能不說完全是虧了張伯倫先生的果敢堅毅，在工勤黨情完畢之後，我會寫信給他道：「數百萬的慈母們，將對今次為鈞座亂麻，爲了已拯救其愛子於此次戰爭的浩劫。然而今後非難鈞座行動的言論恐怕也將罄竹難書。」「這兩層後來都證明是確實的，但是將來歷史家的判斷無論如何必定要認爲英國情相所乘的步驟，是適當而穩健的途徑，當時我又曾說道：「將來我國也許會被迫籌備重涉兵戎之一日，果爾，則我深信在那次戰爭中，我方的道義立場，將無可指摘，英國的榮譽及其生存權益，將顯然爲生死的關頭，因此團結一致的列強人民，不列顛帝國以及全世界的輿論，一定能出其全力，做我們的後盾。」一九三八年九月間的情況，可并不像我所說的。

英首相曼德爾單獨和希特勒見面，草擬并簽署了九月三十日發表的英德宣言，事先我已離開慕尼黑。那天清晨，法意兩國大使，以及德國外交部次長和我自己，一同飛回柏

林，根據慕尼黑協定所組織的國際委員會，就在當天下午五時三十分，舉行第一次會議。這個委員會的歷次會議，構成了這齣戲劇第二幕的最後一個場面。

交給大使們辦理的工作，在原則上既不快做，在細節上，更是缺乏不諳的。在第一次會議開始以前，我就打定主意，認為將來着想，要使捷克有最好的希望，必須盡可能範圍內使她與德國直接談判，至於公民投票，祇能徒然引起糾葛，無論如何應當避免。我會盡我所能，想達到這兩種目的。我往見戈林，他向我保證如果捷克能坦白地力謀和德國合作而不採取敵對的態度，德國決不會不肯和它言歸於好。我會設法為那位止着和國際委員會的捷克代表馬思尼，安排了一次會議。馬思尼就是捷克的駐德公使，在那次危機中，我始終對他保持着最友好的關係。自從貝奈斯辭職以後，情勢已見和緩，雖然那些德國人還是照常很少肯對他們的要求表示讓步，而且對於戈林所提的對捷克大的諾言，也不能得重。

在國際委員會討論的過程中，曾經發生過兩度重要的危機，慕尼黑協定書中所埋的句，原來就頗含混，因此關於不舉行公民投票而移交德國各區域的廣袤，以及關於百分之五十的大多數一項規定的意義，都發生了爭執，造成最嚴重的危局。雙方對於後面一項問題的態度，恰好是符合慕尼黑協定的本文和英法協定在那個以前的建議的，而

捷克則拒絕接受。希特勒用一次最後通牒提出嚴厲的答覆，要求照一九二〇年份的奧國地圖上所標明的方言線，實行估領。至於在那年與一九二三年之間的民族分布區域，并無地圖可以查考，在一九二三年之前，戰前的形勢已經大有變了。我的注意同僚，根據他們本國政府的直接訓令，都承認德方的立場。并且他們到英國使館來會我，告訴我他們的態度，并且請我決定是否也採取同一態度，這是要到向英國政府請示以後，才能承認。我決定和他們採一致態度，主要的是因為：第一層，我希望因此能避免公民投票；第二層，我希望藉此來穩德方，尊重他們自己所擇定的界線，使他們以後不便再因進一步的利益而想變更那條界線；第三層，據我的意見，德方的主張實在是兩種主張中較有根據的。同時。在後來各國大使和里賓特洛甫舉行的一次會議中，我會明白的指出我對於德國政府所採的手段，深表憤慨，如果德國再用那種手段，我決不甘屈服，寧向德國本國政府，准我辭去委員之職。事實上，德方後來確曾想使委員會同意一種有關於他們的方案，並將他們自己所擇定的界線，大大地加以改變，我和魏薩寇男爵會談的時候，曾告訴他決不能同意那種方案，并且以辭職為威嚇。因此當時德政府便撤銷了他們的方案，等到後來奧捷克人直接談判時，德國才算達到了他們的目的，或者至少是達到了一部分。

一九一〇年的界線既經承認，公民投票便成爲多此一舉。到了十月十日，捷克人與德國人之間的直接合作和談判有了長足的進展，國際委員會的政治組會議，便無限期停會了。這齣戲劇的第二幕就此落幕。

第六章 第二天休息：希特勒在慕尼黑會議後的反應

午國際委員會的工作結束以後，我儘可能的趕快脫身，離開柏林，當然對於希特勒的誠意，和他對於捷克人的最後要求，是否可靠，着實使我心中憂慮得很！但是當時在布拉格，當然有一個政府握了大權，又誠意的願和德國合作，而且希特勒已經獲得了蘇台德區。據他從前向張伯倫先生鄭重地提出的保證，這乃是他的唯一的目的物，這些情形至少使我還能樂觀地希望希特勒能用寬大公正的態度，去對待那個有友好傾向的捷克政府。但是當我在十月中旬動身返英的時候，却全然使我灰心，假使我是一個自由代表的話，我真不願意再回柏林去。希特勒的那套伎倆，在戈德斯堡和慕尼黑會議時已經夠人頭痛，後來在柏林，當國際委員會的開會期內，還是如出一轍，簡直使我深惡痛絕！

加以我是一個病人，過去幾個月間早就感覺不適。在兩個星期之中，我在一家療養院中施行手術，前後有四個月，完全不能動彈。直到翌年二月中旬，由於凱特君的妙手回春，用心診治，纔多少有點復原，能夠重新返任。不過就是復原，也還不很康健。我那次不得已的離任，是一個小小的災殃，我當然不敢說任何事情會因為我在柏林而有改變，但是當時德國正在蓬勃的狀態中前進，而一戰後奧地利和蘇台德日耳曼人的併

應德國，更促進了德國的貪慾，在這種環境之下，我離開德國四個月，真是太久了。尤以在這個期間，所發生的一些事件，與後來的事態發展，有很重大的關係，十一月間所發生的對猶太人的有組織的殘害，就是一例。爲了一位在巴黎的德國外交家，被一個意識錯亂的猶太籍青年暗殺，於是成羣結隊的德籍無賴，受了戈培爾的宣傳煽動，并經希姆萊的祕密警察和納粹黨極端份子們的縱容與實際參加，恢復了中古時代的野蠻主義，到處恣意摧殘虐待猶太人，其狂暴慘酷之程度，即中古時代，也不能比擬。這種可惡的行徑，使所有溫馴和易的德國人和整個世界人士同樣地震驚，而其結果不始有兩層：一是純然卑鄙而反叛的，就是那件謀殺案造成了一次掠奪猶太人并將其驅逐出境的良機；第二層是相當限度內，或許還能使人理解，那就是德國的宣傳機關，總會造成驚慌，深恐旁的猶太人，會拿兇犯格林茲本的成功做榜樣，而大膽地去謀殺希特勒，或是他們當中的任何人。

德國人所採取的這種過分而不太道的報復手段，由他們自己的標點看來，實則是一種惡不可及的舉動，其效果正和上次大戰中擊沉「魯西班尼亞號」事件和槍殺「佛爾」事件一樣，適足使世界公論一致確實地反對他們。他們的敵人即使想利用最神妙而宣傳，也不能使世人像這樣地激動公憤。不過外國的反響，尤其是在英國方面（貝尼

斯博士時已避難美國)產生了一種重要的結果。它使得捷克的反德派，或是德國人所喜稱為「貝尼斯派」的人，得到一種鼓勵，而毅然重新抬頭，對於哈柴博士，和外長瓦伐爾柯夫斯基為改善對德關係而用的一番親善努力，加以阻撓。這一派人的敵意，使希特勒在幾個月以後以此作藉口，將他在慕尼黑會議時已經咬去一半的甜果，一口吞下。

在我迫不得已的四個月離任期間的第二件有趣現象，我祇能稱之為希特勒在慕尼黑會議後的反動。

我們首先應清楚由認識希特勒在九月間所抱的目的，我們大可不必去管他的歸併蘇台德區藉以完成日耳曼統一的公開願望，其另一種企圖是要壓服捷克人，尤其是壓服貝尼斯。在五月危機之後，捷克人曾向國內外宣稱：僅是他們的勳員，就阻止了德國的進軍。據他們說，使希特勒掩旗息鼓的就是他們，使希特勒得到一次被拒絕的教訓的，也是他們；此等態度足夠惹怒任何神經過敏的獨裁者，從那時起，希特勒便決心一意孤行，將貝尼斯一個教訓。五月二十一日，他費盡心計想抓住一個機會用武力粉碎捷克，他也認為一場小戰爭便可以使他的新軍獲得一些他所認為需要的勇氣和經驗。但是祇有局部的戰爭，纔可穩操勝算，除此之外，便大不相同了，因為在一場世界大戰中，他便無異將他的政權和他的德國人民的元首地位完全作孤注之一擲。可是在九月間，就不相信

法國人民到時候真會爲捷克人而作戰，或是如果法國人不動，英國會應戰的。他的邏輯是如此的：假使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德國參加了伐倫西亞的民主政府那一面，德國人會情願爲佛郎哥將軍而參戰嗎？他自忖德國人是不會的，因此深信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民主的法國政府，能夠指導法國人民去爲捷克人而作戰。這就是他的如算盤，而他的政策也就是以此爲根據。英國所一再提出的警告，因無軍事上的準備爲後盾，結果當無效。甚微。而且事實上，英國政府除了曾說過：一旦法國人被牽入戰爭，我們除扶助他們之外，英國政府並不會有過其地進一步的正式表示。

十月二十四日戰爭爆發以後，里賓特洛甫曾在租界發表一篇演說，他對聽衆說：當日（意指一九三八年九月間）英國政府應允援助捷克政府，因此纔使三個問題擴大成整個歐洲的危機，其實這個問題，如果沒有英國的干預，在一夜之間便可望解決了，里賓特洛甫不會指出這個問題怎樣纔能解決——雖然我們不難想像他心目中的所謂德國式的解決方法——而且實在他說的那句話本身就是全篇演說中許多謊話裏的一句。我們除了在集體上處於國際聯盟會員的地位以外，對於捷克人並不負任何義務。我們曾屢次逼使感明，也正因爲這個緣故，纔使我們扮演了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角色；做了一個愚誠的說客。我們從來不會在任何時間，曾答應援助捷克政府。

慕尼黑會議的解決方案，使希特勒所夢寐以求的願望未能如願以償：他希望使他的軍隊得到一點經驗，使他自已成爲征服他國的英雄，并且使貝尼斯和薩克人做他復仇洩憤的對象。在某種意義上他也許不能不對賴伯倫先生表示感謝，因爲賴伯倫先生早已經預明了一定爲他的軍隊和人民所反對的世界大戰。但是在另一種意義上，他被迫變更計劃，又不能造成一次局部戰爭，則又不禁大感憤怒，遠過於他也許曾經感到的恩義。法國議會（在這一方面與英國下議院有別）對於慕尼黑協定，曾一致通過，這種一致的情況確實使希特勒更相信他的見地，再在另一種意義上，希特勒常會發自己的脾氣，他手下一些份人總是鼓勵他去對英開戰，當英國在軍事上還沒有準備的時候；他們責怪他不應該接受慕尼黑所定的解決方案，以後失去了最有利的良機。希特勒恐怕他們的話，也許是對的，所以感覺得頗不自在，使他的脾氣更加壞了。

慕尼黑會議本身對希特勒就不是一個快意的經驗。在那次會議中，他第一次覺得他自己是和三個與他地位相等的人在一起和他分庭抗禮，並不是那批對他的舉一動一顛不低首奉承的人；在通過拱衛裡他。這種經驗越發使他不自願再用談判方式來解決問題。再有一層，張伯倫先生在德國人民中間，顯然大孚人望，這不但有損他自巳的尊嚴，而且更使他生出一種十分不安的反應。他對於希特勒壓服英法兩軍制訂決定總免戰條

他，但是他是否能在任何環境之下都得到他們心悅誠服的效忠呢？這件事是他最難的苦
姓之間所第一次發生的愉快的罅隙，也就是張伯倫先生對和平的努力所引起的一頁

在泰厄黑會議以後，他與那些和他辯論，反對走極端的人表現了極大的誠懇。這
要事實，他的「意志」告訴他不會發生一場大戰的，即或發生，也不會再繼續戰爭於
更加有利的時機。而獨那一次他却不符本機關這個意志，而去聽從謹慎的忠告。裏面
辭讓之後，那批向來被他認為德國的懦夫的人，從戈林到國社黨各級黨部領袖都對府中
人（都「德意志到脫離」。在另一方面，他那種本能的反感便由里賓特洛甫和希特勒來選定人
，更難得罷的主要原因，也使他後來採取種種措施，把黨勢勢力在反戰陣營中與其
加強。但是最使他勃然大怒的，恐怕還是他自己的懦弱，這是破題兒第一道他不得不從
「德意志到脫離」。

因盡今日的世強隱憂，固乃是從若干個人隱憂中所以任何個人如與德意志黨派潛勢力
作一個正確的估計，那就不得不相當地談到理論。我回到英國不久，曾與威爾遜最後的
報告，敘述直到宣戰為止的種種事件，其中大部份經我轉載在本書的最後三章。我在報
告中曾說：希特勒對於將來那些傾向於心理學的歷史家們，將成爲一個最有價值的研
究資料。如華德於他的批評，有許多奇怪怪僻的形容詞，那些名稱之中也帶有一種惡毒

用捷敏的腦子將所有的名稱都適用的，但是我寧願將這個問題留給專門的精神病學家去評斷。依們看來，他是所謂「化身博士」那一種類的人。他也許不是一個天才的幻術家，或者是一個實際的夢想者；對於他本人和他所負的恢復德國從前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使命，有一種崇高的信念。照「我的奮鬥」一書看來，他生來便有一種復仇的政治上的知覺力。但是他原有的野心不亞於德來那樣的猖獗。他最初的時候，總是要高踞德國元首的地位，要把他的祖國奧地利，當作第一個目標加以併吞，加以完成日耳曼的統一；並且要恢復德國的自尊和繁榮。所要說明的有趣味的一點，就是究竟他在什麼時候起從慈悲的「澤克爾博士」化身成殘惡的「海德先生」這或者是一件逐漸演變的事體。（按此處係引用新蒂芬生所寫的一篇傳奇故事，澤克爾博士是一位慈悲為懷的醫生，但是有時服一種藥劑之後會化身成一個殘惡獸性的罪人，「海德先生」。——譯者按）

所有獨裁者們，當成就了專制政治之後，就失去了權衡輕重的知覺。每次的威權會徒願望日漸擴大，同時為謀金湯萬世之業，懷着一種貪得無厭的慾望。這種獨裁者最後他們將自私自利之心放在利益之前，並且逼使他們去僥倖行險，以為保持地位的唯手段。拿破崙是如此，希特勒，據我看來，似乎也是如此。元首的高位，和德國的統一與昌盛至終不能廢足。奉迎他的人稱他為「特烈大帝」和「俾斯麥的繼承者」，時關三點鐘過未

，或自己覺得必須靠軍事勝利和其他積極的動機，才能和腓特烈大帝及俾斯麥媲美，甚或超過他們。當我初次在紐倫堡的期間，就如前面所述，看見希特勒被他的部下結縲地算着，不禁自忖人類的腦筋無論如何能在這種情境之下，保持他的清明。當我再次遇見他的時候，他的理論和現實的感覺曾使我感服。但時間一點點過去，據我看來，他愈來愈是蠻不講理，而且愈來愈不以爲他自己是會有錯而又是偉大的。最後連俾斯麥都不再能稱他匹敵了。希特勒堪稱里賓特洛甫爲第二個「鐵的總理」，而他也確實這樣稱呼他這話。他自己已經成爲一個遠比元首還偉大的人物，也許就是一種類似摩罕默德的人物。一手執槍，一手執「我的奮鬥」。他既然有了這把劍，除了他自己的死亡外，他的野心不必有任何限制。他有一種習慣，就是無論在各種場合，常向人暗示，勸他的壽命不會長的，因此引起了一種謠言，說他正患有一種不治之症，但是我往往疑心他是僅僅將這層意思當作一種遁辭，藉以辯解他自己的暴躁的急性，他將欺詐和暴力巧妙地混合使用，而且總是力謀爲每一件事情，找着藉口，將以欺瞞他的人民，使他們對於他所將加到他們身上的一切，無不俯首忍受。

即使是一個獨裁者，也不能完全不顧及他的人民的威靈和希望，而爲了這一層，希特勒以極巧妙的手腕，利用着他的國內宣傳，他的不變的目標就是要使人民確信他所做

特權事權，無不正當而有理，并且確信他稱德國是那裏有策劃而無意的外國人的犧牲者，那些大逼得個(希特勒)不得不完全靠自衛起見，而做出他所做的事情。據我的書目，卡爾中將記述，當佔領魯爾區的階段，他救出法國的罪惡，咒罵他為罪魁；在他爭權的時候，他與魁是蘇聯和共產黨員；然後英國成為天字第一號的公敵；在一九三八年夏季，小小的捷克變成一個脫王，將加塞於德國的獨立；在一九三九年夏季，必須要戰爭。因為波蘭侵略德國！一張伯倫先生將這些稱為希特勒主義的「使人作嘔的技術」，這句話說得并不過火，而是假子言之詞。這些還不過是那種技術的一斑而巳。總之，這奇怪總是那可愛的小小德國。

同時，希特勒又常常向德國人宣講，要他們忘記他們能儘量使他們得勝。他得勝種種，爲僑能份子的。我慣常弄向我親朋好友說：希特勒一方面高唱且耳，聽過種種一種困難的論調，一方面又有一種熱情，認德國在橫行不決的難關壓迫之下，爲一個不可救藥的橫遭蹂躪的國家，這再稱說法怎麼能並立？我又向那些朋友說：假使我們見有人攔着我自己的國家而說這些話，那一定會罵於我。我有一位朋友，或許有一種批評人鏡利眼眼光，曾回審我話：希特勒雖然過分地虐待德國人低能的見解，但表示他自己仍是個低能兒而已。這使朋友的話，尤覺是對的。

但我現在必須回說到希特勒在慕尼黑會議後的反應。我們應當時時記着希特勒所拜是一個黨派執術師的首領。他對於人民的努力與其說是恭敬莊嚴，不如說是蔑視輕薄的。他是德國人潛意識心理的反映，他能夠將那種潛意識所覺得需要的東西，用言辭傳達出來，由於這種事實，希特勒總能競爭權力的時候，獲得勝利。他一旦得勢之後，幾使人民感服的就是對於什麼事能辦或不能辦以及乘什麼時機做才算適當，他都有極精確的觀察。他觀察主義或者出於本能能夠判斷力還有幾次，他將他的最堅決的部下和他的軍隊所獲得的總結，完全置之不理。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可是結果總是證明他是對的，等到慕尼黑會議時，情形便兩樣了。他在那次會議中，生平第一次被迫聽從相友意見，此後由他對他的「意志」的信念，以及他的人民對於他的判斷力的信心，都已動搖，也是這類的第幾遭。

照我看來，他在慕尼黑會議以後驟然大發脾氣，大半是由於這種心理所造成。希特勒時時等待着適當的良機，因此最後的手段也往往遲遲不決，但是一等到下了決斷之舉，向來不會有人能變更他的宗旨，不料這一次，他在五月內決定到十月期用武力繳納捷克，但是結果他不會動手去做。張伯倫就在這步拯救了捷克，使他不會陷於茂林新頭着的完全毀滅的田地，但是居然有人會誠心地不以此言為然，我看起來似乎比希特勒更我

知道那些人現在還在繼續爭辯，他們以為英國政府當時如果採取一種較為確切的態度，便可以嚇住希特勒，使他或者不強行要求割讓喬台梅區，或者不會進攻捷克人。我們很難想出如何能將我們的態度，表明得比當時更確切些，而我們當時的態度并不曾嚇住希特勒。希特勒深信在幾天之內或者至多在幾星期之內，就能將捷克人打得一敗塗地。雖然在德國或英國能對捷克人給與任何有效的協助以前德國便可以得這個勝利。他必不遲於要進攻法國或英國，他在等待被他們兩國攻擊的時候，就可集合德國的全部，作為他的後盾，去為西方國家的侵略，為抗戰而犧牲。一旦布拉格被佔領，他就可以立刻提議講和，他相信英法兩國人民一定極不願意為一種已經失去的目的物，同時又是一種即使他們獲勝以後也須多步依照德國人的慾望而謀解決的目標來繼續一場世界大戰。在慕尼黑會議以前，我便寫出這層意思；過了一年，在華沙淪陷以前，再寫出這層意思，關於華沙，希特勒所用的技術事并無二致，他在一九三八年關於這方面的估計，豈是鐵而不可摧毀的嗎？在慕尼黑會議以後，希特勒仍相信英法兩國人民一定是極不願為捷克而參加一場世界大戰的。這使希特勒大感憤憤不平。

而且希特勒還有一種進一步的詭計。他希望英法兩方在慕尼黑共同簽字的宣言某條能夠在英國十足兌現，英國如不表示一種熱誠，至少也應當表示一種安心的態度。他預料

英國在慕尼黑會議以後，將緩慢其重整軍備的工作，好讓德國愉快地擁有希特勒自己稱為舉世無匹的最厲害的神兵器。在這種情勢之下，他如果想指揮全歐，就可以實行指揮，不料張伯倫先生竟在國會內宣稱：英國不能再繼續成爲歐洲唯一無軍備的國家，因此擴充軍備計劃必須用充分的速率向前推行。

再有一層，在歐洲避開了迫在眉睫的戰機以後，張伯倫先生並別爲了在慕尼黑開辦的方式而受到猛烈的攻擊，不但他的政敵攻擊他，就是他自己那黨的黨員也對他痛罵，這種環境給了希特勒一個機會使他能在那年秋季所發表的對黨公報說要用暴力的言詞，大罵那批所謂英國的煽動戰爭份子。十一月間，他曾在衛馬城發表一篇演說，甚至竟指着首相私人，說了一種侮辱的話。同時英國報紙對於慕尼黑協定的攻擊引起了德國報界的猛烈的反英宣傳。兩者間的唯一差別就在英國的宣傳，既與反對黨報紙有關，而在德國則與反英運動的乃是英宣傳部有最密切的關係的黨報紙，例如那 Volkischer Beobachter 和 Arbeiter 等在這種環境之下英法關係當然鬆弛，雙方祇有增加更深的惡感。十月間德國全國各處發生反猶太人的暴行，以致在英國和其他各國都有一種軍備擴大的高潮，形勢更難好轉。希特勒每受一次攻擊，他的憤怒和怨煩便加重一次。德國勞工黨加倍努力；爲要使德國人民深信還有添造大批槍炮的必要，要說英國在擴充軍備時

德國人既然在他們的心目中，將張伯倫先生確切地認為一位和平使者，所以希特勒在他的演說中說張伯倫先生大概不久就要退職，對希特勒要根據英國應該改組，斯內閣將是張伯倫對德開戰的，他說：「明日邱吉爾也許會很容易地成為英國首相。」英國下議院的辯論中曾有關於打倒獨裁政體「和」帶着炸彈到柏林柏林破壞工廠等語，希特勒對希特勒說：「此將他所說的關於『英國的煽動戰爭份子』的『黨論』，希特勒加入情理。」

「一個狹窄的心胸所產生的種種怨憤，可以毀滅一個國家，這是有利於一個帝國的事實。」

在一九三八年九月間，德國被領戰爭的懸崖上僅僅爲了使一位獨裁者，與一位獨裁者，在今年九月間，能跌下那不能怕的懸崖。我不知道今日德國人民感深究竟如何，但還是在一九三八年間，他修補明白這個事實。機動給予他們對於領袖的意志。此時之外還是茫然無知。每一個德國人在原則上沒有一個會不贊成他們的蘇台德區問題。雖然，但是爲了一些不必要的動武就很難得東西。居然來發動所說，他們總想弄出一個斷然來。一九三九年間，希特勒和希特勒走路的問題，情形又有什麼不同呢？

第七章 插曲：四月後回到柏林

在四個月離任之後，我於二月中旬返抵柏林，我身體上雖然感覺不適，但是精神上已有幾分從悲觀和厭煩的感覺中恢復過來，這種感覺是在劃定德捷邊界的國際委員會工作完畢之後我所感到的，我對於這齣希臘式悲劇的被迫而生的觀念，現在也逐漸被置諸腦後了，一部分的原因，是在對於十二月和一月間流行的種種謠言所生的反感，這些謠言是說德國已經打算進攻荷蘭和瑞士，奪取羅馬尼亞油田，甚至將突然燬炸倫敦，當時在外國頗一些人信以為真。我相信這些大半是納粹黨急進份子自己散佈出來的，用意在於分散外界對於他們所抱的更切近的真正目標的注意力。據我看來那些謠言在當時未免言之過早，事實上也確是如此。但是歐洲一般人，尤其是英國民衆的恐懼和憂慮，也不無理由。不過，希特勒在從事上述各種冒險事業之前，還有別的魚肉要宰割，是很明顯的。希特勒的下一步和最先的目標以但澤和米美爾為最明顯，這兩城的人口中日耳曼人占着優勢，況且德捷關係還有待於確實的解決。

然而，我覺得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項，并不一定會像三百五十萬蘇台德區日耳曼人問題一樣的難於解決。我個人頗認為希特勒將循着遭受最少抵抗的途徑，先拿米美爾開

刀，波蘭已經分給自寇克得來的利益。慕尼黑會議後波蘭完全佔有了德斯基區，還有煤礦中心奧德堡，這兩地的人口也都是日耳曼人占着多數，當時希特勒的部下對於這種割讓會持異議，但是希氏回答說：他并非煤商。這樣着來，在表面上德國和波蘭的關係比較還好。貝克上校曾在一月間到貝許德斯加登鎮訪問希特勒。柏林華沙間的談判已經正在進行中，幾種使雙方都受約束而變更但澤現狀的辦法完全有實行的可能，尤其是因為國聯本身對於這自由市的事件，已經多少有點不感興趣。

在另一方面，在慕尼黑會議的前夕，希特勒曾在寫給張伯倫先生的信中，鄭重的保證祇要蘇台德區日耳曼人歸屬德國，他就不存心對於捷克的獨立，無論在那一方面去加以限制。在慕尼黑會議中，他曾答應待波甸的要求解決，捷克的國界劃定以後，便可保證捷克本身的領土完整，德國在種族上的野心，現在已經滿足了，德國的邊界附近已經再無大批的日耳曼人，慕尼黑會議之後，希特勒自己曾公開聲明他在歐洲已再無進一步的領土上的要求。有十五萬日耳曼人的米美爾和有四十萬日耳曼人的但澤，與奧國和蘇台德區比起來，似乎只有兩個小問題。

那末，爲什麼要有戰爭呢？爲了但澤或米美爾或者甚至爲了波蘭走廊，值得將希特勒的階主義在一九三三年以後的巨大收穫來作冒險的嘗試嗎？這些問題的解決或者是困

難的，並且會引起不快之感，但是總沒有理由可以預料這種問題會使歐洲又和在一九三八年間一樣重臨戰爭的懸崖，就捷克來說，哈柴博士已繼續貝尼斯博士做了總統，他和他人的外交總長契伐爾柯夫斯基已經被認為都是贊成與德國合作而非與德國相仇視的。事實上柏林與布拉格之間確實正在對於一種德捷協定的本文，進行討論。

此外，還有其他可資樂觀的理由。當我離開倫敦之前，貿易大臣和海外貿易部大臣曾被派定去訪問柏林。他們的旅行，也和一九三七年哈里法克斯勳爵的訪問柏林一樣，官場方面聲稱是屬於私人性質的。其時有若干英國實業界的代表，與德國的同業商訂商務協定，德方正預備在柏林舉行一次宴會，招待英國代表，所以那兩位大臣的到臨，表面上可以說是適逢其會。但是在私人任務的背後，此次訪問的實在意向是很明顯的，雖然他們的最初的目標是不合奢望，但是我們可以合乎情理地希望他們此行或許可以引起較廣泛而更具體的貿易上的磋商，從經濟談到政治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難事。

剛回柏林不久，我就對戈林上將和里賓特洛甫二人談起史丹萊和赫德森兩位先生造訪的事。兩人都會同聲地表示感佩和贊同，但是帶着日耳曼人以慣有的暴燥性，對於赫德森將由柏林轉道赴莫斯科的這回事則表示憤慨。兩人談到德國的形勢時，也異口同聲地差不多用着一樣的辭句。許久之後，他們說道：一個獨裁者，正和一個民主國家的政

府一樣，也必須計及人民的願望。他們講這句話，顯然不過是他們主子的靡聲虫，可見整個而論，德國民族，已十分明顯地和英國及世界上其他各國一樣的對於廣次的危機，感到厭倦，而渴望着和平，因此我對於那句話的解釋是希特勒已決定走向和平之路了。這句話和希特勒自己公開所說可將一九三九年紐倫堡國社黨大會稱作「和平大會」的話也相符合。

我於是再一度抱着不算過分的希望，而不想再從黑暗一面去作任何事業。罪惡的預言在世界上已經夠多，不必再要我去湊數。我甚至覺得森尼黑會議之後，由英國重整軍備所引起的誤解也許真有一些公正的理由，因此二月間我會在柏林德英協會宴席上和牙科倫該會當地分會成立時所發表的兩次公開演說中。竭力解釋，要想祛除誤會。我引為講題的事實就是英國的重整軍備不但與其酷愛和平的初衷，并不抵觸，而且是它的必要附屬物。那年一月間，張伯倫先生在希特勒提到英德必須合作這一點以後，曾立時予以響應，我在兩次演說中，提及這件事實，我還提及哈里法克斯勛爵最近所發表的幾句斷然的主張，就是說，任何一個英國政治家，任何一個英國政黨或者整個的英國民族，永遠不會謀劃或支持一場侵略性的戰爭。

柏林那次的宴會終了時曾有一件小事發生，使我能夠格外加強上述一點。我的演說

剛剛完畢，外交部情報司司長走入室來，帶着一張新聞電報。據那件電報說：英國下議院通過增加軍費一萬五千萬英鎊，作爲重整軍備之用。他帶着幾分憤慨的樣子問我，英國存心侵略，事實俱在，對於我剛才的和平言詞，將何以自圓其說。那時英德聯誼會副會長勃洛開脫爵士，正代表該會，起立致辭。我便對阿許門說我將勃洛開脫爵士演說完畢之後答復他。我於是就在電報紙上用德文寫了一句話并簽了名。那句話的意思是：「祇有當英國處於力能自衛的地位時，纔能保證和平。」阿許門博士問我這項意見可否由他發表。我回答他說當然可以。過後，他永遠不會將它發表，自不待言。但是那句話實在是當時我所發表的一切辯論和解釋的總括提要，同時又是針對着當時戈培爾和主戰派正在傳播着的一切似是而非的詭辯的一種真實答覆。德國人的詭辯大意是說：英國正在加速地備戰，爲了要在它的勁敵——德國尚未過分強盛之前，先將他擊潰。不管希特勒和他的急進派份子是不是低能，倘使他們自己不是正在打算着侵略，并想藉此作爲自己的軍事準備的口實的話，是不會假裝着相信這種話的。假使英國能在一九二〇年之後保持着強盛的威力，他們也許根本就不敢以侵略的，正是英國的衰弱纔會鼓勵他們去雷溫統治歐洲的迷夢。

事實是如果我們容許一個國家儘量擴張軍備，而其力量已遠超過他的鄰國，和平就

永遠無從保證。對於人類的天性，尤其是常歐洲各國的文化標準不同的時候，我們不能信任到容許那種國家如此擴張軍備的程度，在太平時代未到臨之前，對於壓抑過份的慾望和野心的最好方法，就是使勢力如此地均等，以致使任何一國的實然的舉動均成爲一種不穩定而有危險性的嘗試。一九三九年二月間，我之所以能抱着樂觀的緣故，實在有很多是因爲我相信英國軍備之加速增強，也許可以作爲一種有效的警戒，使希特勒在他抹戰以前三思而行。

那年二月間還有一件有利於和平的事，就是西班牙內戰終於即將結束，而關於這件事的男生枝節的憂慮已不再成爲一種影響大局的危險因素。我最後發現戈林自己已經決意要減輕體重，他在嚴重的戰爭爆發時，必然要以空軍統帥和陸軍上將的資格，親臨戰場，但是當時他却用了某種方法，竟真正的減去了三噸的體重，（每噸合十四磅，）即使一個體重有十七噸或十八噸的人也不容易失去了四十二磅而仍不受損傷。他因減少體重而使心臟受了影響。他告訴我將在三月初到聖里摩去作長期的療養。他曾說過煽動戰事者是笨漢，又曾提到獨裁者不能不計及他們的人民的意志的話，這些都是使我更確安心的表示。他也許是在愚弄我，但我不大相信。在另一方面，里賓特洛甫現在確實在一切外交事件上握着最高的權力，而且顯然地護着他主子的無限的寵信。我固然覺得他不

這是向着他的主子，同聲附和，但是即使是如此，我也并未感到過分的不安，因為我知道他不過是他的主子的應聲蟲。

即使在今天和在事後，我仍不敢承認，以為希特勒實在會有任何特殊步驟的籌劃預備在那年三月中發動。他是一個向來不知道定好確期而行事的人。有一次某人告訴我他祇有過一趟預先定了日期，那就是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擇定了那年十月一日侵略捷克。這個告訴我的人對於那次的行動是應當被曉得的。我不相信在二月中旬時他腦海中對於捷克問題的解決，就已經定了任何時限，一切仍要以適合他宗旨的事變怎樣纔能成熟為轉移。他最後的目標無疑地是想隨使用何種方式去收回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歸入日耳曼第三帝國，和從前在第一帝國內一樣，但是他仍不曾確知這個目的究竟怎樣纔可達到。爲了在捷克的反德派重又活動，他曾大感腦怒，而他的黨羽正在鼓勵着斯洛伐克人發生爭執，用意在減削後者的勢力，這些也都是事實。但是他的最後計劃仍沒有擬定，一切要看局勢的發展而轉移。

希特勒是一個奧地利人，而奧地利的最著名特性就是他們的所謂「行險徼倖之志」(Schlamberg)——就是凡事喜歡聽天由命而任意胡來——我總覺得希特勒十足地具備着這種特性。他心中有着所有各種大概的計劃，至於如何纔能實行，對於那些計劃

他是否胸有成竹，却是我所大大懷疑的。不幸他一步一步地盤算下去，因每次的成功而愈加如醉如狂，愈加信任自己是偉大而不會有錯的了。他的計劃愈來愈龐大，他的「行險徼倖」的心理又出奇地混合上機會主義的信仰。在這方面他完全是得到他羽翼的幫助，那批人替他澈底籌劃了應付一切事變的準備，連臆測最遠的事變也都被想到的。希特勒自己祇是等待著他的對手鑄成策略上的錯誤，便在那時採用一種似乎最適合他自己的般目標并且最適合由那種錯誤所產生之機會的策略。

譬如一九三八年三月間，當許士尼格舉行不幸的公民投票時，又如一九三九年三月間，捷克政府同樣不智地在勃拉替斯拉伐實行干涉時，都是這種情形。在這兩次事件中，無論希特勒會怎樣活躍地設法造成一種事變，那兩次機會都不是可以預見的，有幾個聰明的預言家，固然曾在事前大約一個月之內，預言三月十五日為捷克遭殃之期——他們在事後對於這種先見之明，曾大鳴得意——但是我并不認為他們的徼倖言中，有任何根據，祇是機會碰巧而已，假使捷克人能稍為有點遠慮，又假使史丹來和赫德森二人的訪問能比原定日期提早十天——就是在捷克人推翻蒂蘇神父的斯洛伐克政府之前——那歷三月份也許終能平安渡過，至少災難之日也可以稍稍延遲。我祇能說「也許」，因為即使沒有捷克政府佔領勃拉替斯拉伐這回事被當着藉口，另一種藉口也許也可以照樣夠用

所生的結果，仍然相同。但是，不論那件事的情形如何，當三月十五日真的到臨之時，我個人祇是感覺到那兩希臘式悲劇的誘因，雖然我希望它已在慕尼黑被驅盡，而事實上還是很不幸地在醞釀之中。總之，希特勒是存心不願有一個和平的結局的。

這裏，我顧不得破壞事實上的順序，不禁要敘述到那年二月間我回柏林時人家所告訴我的幾句話。我回來後不久，偶而遇着一個和希特勒十分接近而近來會和他共餐的人。他對我所說的劈頭第一句話就是「你在德國已經聲譽雀起。」我說：這句話聽來使我很歡喜，但是我樂於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他說：「德國在去年九月間有兩種潮流，一是主戰派，一是反戰派，你是曉得的。你在後者間的聲望始終是很高的，但是現在，在前者間的聲望反而更高了。主戰派責備你會對希特勒虛張聲勢，使他相信假使他進攻捷克，英國將捲入戰爭。他們十分憤怒，因為他們仍舊相信着無論何種事情發生，英國決不會開戰的論調。他們說：『那可惡的英國大使，九月裏他在紐倫堡以言詞恫嚇我們，五月裏又拿特別列車的事來恫嚇我們。那傢伙多麼會欺詐人！』」

這個人的話是完全可信的。我在這裏提到這事有兩層理由：第一、從這事可以明白一點希特勒在慕尼黑會議後的反應，同時又可證實我那種信念，就是希特勒始終希望有一次局部的戰事，並且他覺得他會上了墨索里尼和張伯倫先生互遞聲氣的當，而未能逃

彈目的，恐怕連我當做英國政府的喉舌而發表的言論也有份兒。第二、英國國內曾有一些人對於我的言論尤其是上年九月間在紐倫堡表所發表的，認為不夠強硬，事實上抱一種見解者，不乏其人，上述這個故事可以代我給他們一個比我向來所能給他們的不能再好的答覆。

無論是誰如果對於別種見解，即使與他自己的觀點不同，也要想加以瞭解，則其所提出的抗辯，一定大大地更使人樂於傾聽，而且深深地更被人注意，這一層事實是有些人所慣於忘記或者未能明白的。一個駐在外國的正式代表，假使被認為是對於駐在國的政府，懷着敵意，他便無法實在為他的國家而切實效忠。另一方面，假使他被認為正在對於本國的利益，和駐在國的利益，同時并顧，不遺餘力，則其言詞一定有力得多。不至於僅僅引起憤慨，而失去了那些言詞的效果。一個使者抱這種態度，並不是不完全為國盡忠，而是因為兩國的利益並不是總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們可以說事實上遠不是不相容的，譬如說，如果能忠實而理性地維持和平，一定就是同時為德國和英國的利益打算，也就是為歐洲其餘各國的利益打算。

第八章 德國在十字路口

我現在必須回溯敘述我對於一般局勢的觀感，亦即我在那年二月間返抵柏林時向外交部所作的報告。一九三八年對於歐洲是一個緊要的年頭。不數月之間，未流滴血，希特勒業已完成了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所開創的依靠，並且因為併吞了奧地利和蘇台德區，終究使經過了許久的大日耳曼的統一底於成功，致使歐洲在軍略上和經濟上的結構悉被變更，對於德國大為有利，而對於歐洲大局尤其對於法國則是有害。慕尼黑會議後，法國的戰後協約陣線就已不復存在了。希特勒在德國一九一八年戰敗後的第二十年上能有這樣的成就雖屬非凡，但是我深深的感覺就歷史來觀察，這是上次大戰和結束那次戰爭的和平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結果。一九三七年間，我初次到紐倫堡時，戈林將軍（那時他還是一位將軍）曾問我：倘放大眼光來看，你認為誰是世界大戰的主要受惠者。我回答說：「意大利。它終獲得了自然上和戰略上的國境，又獲得了斯拉夫邦。」戈林的回答是「不然，是德國。因為如果沒有那一次戰爭，並且沒有那一次失敗，德國的統一將為不可能的。」

即在當時，我也并不以他的見解為謬誤。國家主義，為拿破崙以後的特徵之一，拿

破崙本人即使并不自覺，也就是國家主義的最高贊助者。意大利的統一和第二德意志帝國是十九世紀裏國家主義的兩個主要例子。愛爾蘭是國家主義的戰後產物，他如波蘭、波希米亞、以及波羅的海諸國等等的重建，也是如此。就是那倒似乎已成爲二十世紀主要問題之一的猶太人問題，本身也僅是國家主義過于發達的一個副產物。德國內部的和民族上的統一曾經遷延了這樣久纔完成，這實在是幾乎比希特勒的成就還堪令人注意的一回事。關於這個題目可以寫成許多洋洋數萬言的巨著，但是祇要對於德國歷史背景的顯著特徵，作一個簡略而必要的探，討就足以佐證這句話的真實性。從頭上說起，第一日耳曼帝國（即神聖羅馬帝國）的歷朝君皇，因追求統轄全球的幻影而捨棄了日耳曼民族的統一這一件實在的東西，於是維也納的哈布斯堡王朝喪失了機會，使普魯士的霍亨索倫王朝成爲汎日耳曼主義的迴護者。奧地利帝國的建立犧牲了德國的統一，而哈布斯堡和霍亨索倫兩王朝的頹頹使德國分裂爲二。十九世紀中俾斯麥所以不能在他的第二帝國內完成全部的合併，主要的是因爲奧地利帝國的各份子過於龐雜。

英國的自然的政治發展；曾因三十年戰爭而遲延了很久，可是在十七世紀中葉，就在三十年戰爭之後，德國却包含了大約三百五十個完全獨立的郡邦。每一個郡邦各自分別地有其行政機關，而且可以自由採取適合於個別意向的任何外交政策，我們對這層事

實，真正是頗爲費解，因爲英國的統一在她的歷史上是完成得很早的。至十八世紀末葉，拿破崙戰爭爆發之時，德國大約還有一百七十個這樣的郡邦。後來拿破崙實行改革，并將若干郡併入爲安插他在德國的親友而組成的王國，結果大約有五十個郡便這樣消滅了。到十九世紀俾斯麥的時代，那些郡邦最後減到二十六個，大多各有其統治者，政府，和立法議會。一九一四年時的德國便由這二十六個邦所組成。

戰後時代的混亂和艱苦使希特勒得以解散各邦的會議，將他們的主權移歸中央政府，并將他們變成僅爲一國中的若干省分，遂完成了第三帝國內部的統一。假使希特勒能就此爲止，全世界也許應當加以祝賀。一九一八年奧國的戰敗，使波蘭人、捷克人、羅馬尼亞人、克羅西亞人、斯洛伐克人、義大利人等脫離了維也納政府，而陷奧地利於孤立；同時又使蘇台德區日耳曼人居於他們所憎惡和輕視的捷克人統治之下，不然的話，希特勒也不能做到他後來所做的事。從此以後，這九千萬或一億萬日耳曼人之將被自然的力量吸入日耳曼第三帝國，始終不過是一個時間的問題。這事在戰後所以未能立即實現，無非是由於德國的衰弱。德國恢復強盛之後，這事仍遲遲不會實現，又無非是由於納粹主義的令人乏味。但是我始終認爲這件事本身的演變似乎是無可避免的，即使恢復了哈布斯堡帝國，也最多祇能將這件事的最後成就拖延一些時間罷了。無論如何，不管

我們喜歡與否，大日耳曼的統一已在一九三八年告成。希特勒的下一着將做些什麼，尚在未定之天。

大概說來，他有兩條明顯而互不相容的途徑可循：或者是濫用德國的雄厚軍力，以獲得政治上的新權，并且滿足他自己的永無止境而逐漸擴張的野心，或者是廢棄他所用的內容膚淺的規律，而與其他各國回到和平合作之路。一言以蔽之，在慕尼黑會議後，德國是站在十字路口，一面的路碑指着「險道」，另一面則指着「正途」。

照通常的觀察家看來，根據常識上每一種論調，若德國自身的利益打算，「正途」不但是德國人民所最樂於遵循的途徑，同時也是希特勒自己所應走的最明達的路線。德國全體民衆的願望姑置不論，就是爲希特勒自身打算，他在過去的六年中既已有了偉大而精疲力盡的成就之後，就應該渴望着有一段較安靜的生存的時期。在這時期中，他不但能固結他所已完成的統一，并且可以有機會讓他去實行他所擬的合乎美術并有建設性的美化大日耳曼的計劃，這些計劃也曾經大吹大擂，而有一部分是業已開始實行者。還有一層，假使德國能有餘裕來消化它所剛剛獲得的幾塊添出來的廣大領土，它將來定更加強大。無論由那一種合理的立場來說，當着希特勒正在欣欣企望着一段和平的長時期，像他大約在這個時候所說的，他該是懷着誠實來說這句話。假使他實在是一心以德國

的福利爲念，那末他必須而且也應該在慕尼黑會議後適可而止。在戈德斯保時，他實在并不曾以光明磊落的態度對待張伯倫先生。張伯倫先生在貝爾德新加登鎮時會同直接受蘇台德區日耳曼自決的原則，但是到了戈德斯堡，希特勒却不再以此爲滿足了。他對於這塊癩疽堅持要用外科的手術來割治，而不用那種本是談判所能保證奏效的醫治方法。但是希特勒的態度固然不對，而當時蘇台德區日耳曼人本身的苦況，也使希特勒有了幾分口實。主張非立刻開刀不可，雖然他的部下對於那種苦況也許要負多少責任。至於全世界也自然會爲了維持和平而不顧那些犧牲者所受到的不必要的痛苦，去承認既成的事實。假使希特勒在那時以後能對於中歐和東歐採取一種公正誠實而且有建設性的政策，英國是準備不加干涉并予以助力的。慕尼黑會議之後，希特勒隨時需要和平，和平即時爲他所有，并且祇要他一人之力，即可加以維護。即使到今天，我們還是難以理解爲什麼他要拒絕和平。

去年九月間我在最後所寫的報告書中曾說：『革命有如崩雪，一但奔墜，勢將無可收拾，直到抵達指定的行程終點時，便歸於分崩毀滅之途。』希特勒雖被尊奉爲國社黨革命的領袖，也許有人說連他自己也無法抑制這次革命的動力。將來的歷史家對於這點定有爭論，但是我深信就希特勒在德國的地位而言，足冀強迫他的部下，遵循他所選定

的任何途徑。雖然也許在他私人方面，不大情願這樣去做。他不但成爲儘自己手劍輪運動的犧牲，而且也成爲他自己日漸增劇的誇大狂的奴隸。他一切的成功都歸功於他策略上的機會主義。他祇要一遇着他獲得另一次此種成功的機會，例如捷克政府以武力推翻勃拉赫斯拉伐的蒂蘇政府的時候，便完全失去了權衡輕重和理智的知覺，不管對於德國，對於全世界，或對於他自己將生出如何的最後結局，一手將那機會牢牢的抓住。無疑的，假使他願意循着「正途」而行，他便不能不圖少數的急進派，同里賓特洛甫，希姆萊，赫斯和雷博士那樣一類的人，以及他巷戰時代的暴徒們，脫離關係。還有六年來被他引入歧途以供他作革命上的驅策的國內青年，他或許也要和他們脫離關係。

德國人不但缺少鎮定心，而且對於別人的心理和反應也毫不理解，這是人所週知的。納粹主義的那些成功，是如此之大，竟使它的崇拜者，尤其是德國青年，覺得在無論何地，無論何人和無論何事都不能阻止他們。他們受了戰後的羞辱以後，有一種帶着毀滅性的願望，要想證明他們的實力和對於世界的重要性質已恢復，他們認爲歐洲大陸上沒有任何人敢站起來抗禦他們的威嚇。戰後的經驗不幸地給了納粹主義的德國一個教訓，認爲非用武力或顯示武力，不足以成就任何事業。在這種心地之下，任何妥協的或返於靜止狀態的辦法，是難於實行的，而且祇會被認作懦弱的表示。

在上西所述的那些分子看來，「險進」顯然是最動人而最有利的。他們在德國人中實占很少的少數，希特勒既是個善於煽動的政治家，他的自然傾向應該是要取悅於大多數人民。但是少數人所產生的影響，尤其是在革命時代，和他們的實在人數是完全不成比例的。譬如在法國革命時代，據估計在巴黎的居民中祇有百分之三是活躍而專心的革命者。希特勒本身是個急進分子，他的那些重要顧問，在白倫堡離職息影之後，也無一不是急進分子。

據胡薩爾這些活躍的急進派之外，局勢上另一種的危險景象就是德國財政上和經濟上日漸增廣的困難。一九三三年以後，德國在精神和物質上的緊張狀態，非常嚴重，所有人民都在那種緊張狀態下工作。並且需要一種逐漸增強的心理上的強烈刺激去使他們繼續工作。據一九三八年間的估計，德國在人才上，勞資上和物質上的各項努力的總量，至少應與英法六十是為戰爭而預備的。任何一國的人民，就是像德國人那樣的有訓練而肯刻苦，也不能忍受無限期的以槍砲代替食糧，或者是忍受一種完全根據德語所稱的 *total-technic* 的經濟政策，這個政策的意思想是指為軍事準備的利益，而統治一個國家的全部經濟出產。所以，我們常常發生這樣疑問：希特勒會不會覺得他迫於情勢而不得不考慮以武力克復德國因過分集中軍備而喪失了的市場？換言之，他會不會因預防經濟

崩潰或由於經濟崩潰的結果而被迫作更進一步的冒險？

經濟上的危難表示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的不自考慮。在許多深謀遠慮的德國人看來，真正的問題是希特勒能不能改變他的經濟政策，並且返於正途而不必經過另一次以內閣革命。德國的組織純然以軍事至上為基礎，已經太久了，如果要想將它折散，重行組成一個與外界自由貿易的組織，而不引起嚴重的紛擾和失業，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是，即使在這一方面，我始終不能贊同一種過於簡單的理論。以為：希特勒會為了避過經濟崩潰而被迫作進一步的冒險。我對於德國組織的能力，相當敬佩，因此頗不以這種論理為然。加以，一個昌盛而和平的德國實為英國之福，而且外界，尤其是英國，會樂意幫助它去克復財政上和經濟上的困難，這由史丹萊和赫爾森二人擬定赴德一事，可以看得出來。

我因此深信如果希特勒真有意回到經濟上的正途，同時也一樣回到政治上德國國體上的正途，那麼他一定可以做到的。他的急進派份子，也許會非難他，或者甚至於使他們感覺棘手，但是他一定能夠堅決地對付他們，和一九三四年對付羅埃埃埃埃一樣地堅決。自然我們希望遠不如那次那樣的殘暴。向德國伸出援助之手而不任納粹主義自己作踐自己的政策，在英國的若干方面，也會受人責難，但是英國大多數的人，對於在近方面採取

一種心胸闊達的政策，是一定會表示贊同的。

放遠眼光來看，在德國未能再度安定昌盛之前，歐洲永久不能達到穩定和平，這是很明顯的。德國的繁榮將便利它在經濟上和英國相競爭，但是結果會使雙方得益。如果英國思想高高在上的超然獨立而讓她的最好主顧之一的德國永久貧乏，這件事是毫無建設性的價值的。有一種理論這樣說：假使我拿希特勒看做一個流氓，德國民族自己便會將他和他的政權推翻。這種理論毫無事實上的根據，僅僅是由於願望而產生的一種臆想。實際上的情形剛剛與此相反，我們爲拒絕加以援助并不允給以任何同情的諒解，結果祇有使德國瀕於絕望而愈加依附希特勒，把他當做德國利益的唯一保障者。

情形雖然如此，我還是竭力想要知道在慕尼黑會議後那可以決定命運的六個月之內，當希特勒站在十字路口的時候，他心中究竟是如何打算？

第九章 第三幕：布拉格的佔領

雖然希特勒永不會循「正途」而行，甚至也許連想也不會想過，但是那年二月中旬當我回到柏林時，我并不會想到他對於用什麼方式去冒險行伴，或者將在何時發動已經有什麼決定。我回任數日後，在一次汽車展覽會中遇見他，他顯出誠意地樂於見我的樣子。那時戈林正預備動身往聖里摩，這事我已在前面提到過。就是里賓特洛甫，也確知我長期的離任實在是因爲患病，并不是「外交病」，且與十一月間虐待猶太人事件發生後美國召回駐德大使一事無關，對我也顯然非常友善，於是這些岡仔後的最初印象提高了我的希望，但是不久我就恍然大悟了。

第一次使我覺得有燃眉之急的預兆是在希特勒招待外交團的年宴席上，舉行之期爲三月一日，較往常稍遲，餐後，希特勒照例立在會客室裏，依次輪流和各國使節每人談話五分或十分鐘。在這次宴會中他已完全沒有在汽車展覽會中所表示的那種十分和氣的態度。在汽車展覽會中他不止和我握手一次，而是有三次之多。這次他和我講話時，總是小心地避免直視我的面孔，却把目光注視着我的右肩，所說的祇是些空泛的題目，同時却着重他說到英國不應干涉德國在中歐的行動。這話我以前雖已聽得爛熟，這次并

無新奇可驚之處，但是他的態度却常給我一種恍惚不安的情緒。照事後的結果來看，我確信他當時已在權衡關於處理布拉格的各種專變的輕重，并在準備三月十五日動手的計劃。他正在默想着對於張伯倫先生的背信。我回想起了前年三月三日我遇着他時的情況，那時他也正相仿地在對維也納準備動手。

戰爭的醞釀事實上已經被他的部下所攪動。維也納的無線電廣播正忙於勸動斯洛伐克人反對捷克人，這兩個同血統的斯拉夫民族間的鬭牆之爭已被激起，使希特勒又得着一個可以乘隙而入的機會。而巧妙地坐收漁翁之利。在一星期內，雙方的爭執已如此劇烈，以致到了三月十日，捷克總統將斯洛伐克內閣總理蒂蘇神父免職，派捷克軍隊和憲兵佔領勃拉琴斯拉伐強行在那裏另組政府，任命得布拉格信任的薛多爲領袖。希特勒的對手又一次夫着，（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都是一樣的）自行投入了他的掌心。對於希特勒的機會主義，這是一個太好的時機，不容放過，於是他矜持地不管結局如何，又一次展開了適用的計劃，立刻進行閃電一般的行動。

捷克永遠有突然受到一次武裝閃擊的可能性，因爲德國的地位和權力，足夠在捷克煽動瀛亂。但是我必須承認，差不多直到最後一刻，我還是難於相信希特勒竟會做得那樣過火。他之所以如此過火，是由於純然的背信和對於領土的佔有慾呢？還是由於完全

缺乏道德觀念并且毫無能力去考慮除了他自己的情況以外的任何情況或任何別人的情況呢？那原因大概是以上四者兼而有之，因為當時的問題是極其明顯的。慕尼黑協定愈是漬未乾，而且希特勒曾經說過要獲得英國的諒解，他說的次數如此之多，語氣如此動聽，又是說得單純而清白的，如果他真是說這句話，便決不能那樣毫無人性地將從前向英國首相所作的保證。全部毀棄。

不幸得很，捷克人對於斯洛伐克人的處置是如此難以置信的淺見而專橫，斯洛伐克人中的離間份子，對於捷克政府也是同樣盲目地不忠。他們中間所發生的爭執當然使雙方同等地招惹德國的干涉。在布拉格被德軍佔領前的一星期中，我竭力勸導在柏林的捷克公使，叫他竭盡全力，勸諫捷克政府，乘事尚可為之時，從速解決和斯洛伐克人間的爭端，並將軍隊自勃拉赫斯拉伐撤回。當時馬斯特尼已和以後的波蘭大使一樣，暫時和威廉憐憐的德外交當局失去一切連絡，對於德國的好意，全然蒙在鼓裏。我向馬斯特尼警告說：捷克政府正是中了希特勒的鬼計，它那種愚行的結果便是招致危難。當時或者是馬斯特尼對於我的話，置若罔聞，或者是他自己無法說服布拉格政府。捷克政府堅決因執，到三月十一日星期六那天便有公告說希特勒父已向德政府請求保護，來對付他的斯拉夫同種。

原先德國的報紙，對於捷克斯洛伐克內部組織上的糾紛本很少提及，但在那一天却抱着激烈的態度，替斯洛伐克人撐腰，并且凶多吉少地提起捷克政府干涉德國的團體和個人的話。這是納粹主義的慣技，預備着更進一步的作惡。可是，德國的報紙似乎仍在等待着較高當局明確的指導。我厭惡那種在國外的口頭上或文字上的言論，像上年五月間所發生的那樣，那種言論或者會激動希特勒，促進他的行動，使得情勢對於捷克被現在更爲不利。緘口不言固然已證明無補實際，但是口頭上的抗議也是同樣徒勞無期的。

正像剛剛一年前的奧地利的情形一樣，事態進展得驚人地迅速。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德國報紙滿載捷克人的兇惡，和日耳曼人逃難的佞談。一個獨裁者較一個民主政府在逐漸速行的能力上要方便得多。希特勒在他的舉手可及的範圍之內，有一個懷蓄已久約計劃。他在那星期天打定了主意，決定不再讓西歐列強或他的同盟國義大利在這件事上再作任何不愉快的干預，反使局勢格外複雜難理。

星期一早晨，我到外交部去請求外交次長注意，不要做任何違犯慕尼黑協定或擾亂史丹索和赫德森赴德訪問的事。我看出魏薩寇完全不明示態度。他所能向我保證的就是無論有何舉動，當採取「適當」的步驟，他幾次三番地說了這句話。結果在那件事變中可

認為適當的舉動，僅有任命牛賴特男爵爲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兩邦的護國官這一點。牛賴特是以穩健而有些對捷克同情見稱的，這次的任命是蓄意要掩蓋歐洲人的耳目，而且牛賴特這次所任的職位是個容易惹怨的差使，里賓特洛甫推荐了他從前的上司去就這樣的二個職位，無疑地會叫牛賴特暗中伸舌。後來一個著名的蘇台德莽漢流氓名叫佛蘭克的被派作他手下的副員，也仍不見得能使他的工作比較輕鬆些。納粹主義的所謂「適當」行爲如是而已。但是我不能怪魏薩寇。希特勒在前一天上午已經作了決定，於是事情就此定局。魏薩寇所能告訴我的話，不能再少，但也不能再多。

前年，希特勒是最後決心在三月十一日向奧地利進兵，今年，他決定在三月十二日佔領捷克。維也納已集中大批軍隊，預備受希特勒的檢閱，慶祝德奧合併的週年紀念，同時在德意志都也集中着一部分軍隊，據說目的是爲義大利對法的要求作準備。棋盤上的陣勢是有利於希特勒的，他決心等待最適合於他的計劃的時機一到，便再度實行突擊。

那天早晨，當我見過魏薩寇，離開威廉街的時候，心中帶着最憂鬱的預感。我想拿外交次長關於「適當」步驟的保證來安慰自己。魏薩寇是一個正直的人。我已竭力給他一種深刻的印象，讓他知道假使德國政府在任何方面有違犯慕尼黑協定的舉動，或有擾亂史丹萊赴德訪問性質的任何舉動，將在英國無可避免的發生種種反應。史丹萊赴德之行

，就定在那個週末，並且所有的諸東都已發出，但是魏氏并未再向我保證。當我用最強硬的辭句反對施用軍隊之後，魏薩寇對我宣稱：德國軍隊的行爲，始終是「適當」的。這并不是一種意欲減輕我的憂懼的言辭。同時我覺得英國政府的正式抗議到達時，將爲時過晚，無論如何會僅和上次維也納被佔領時英政府的抗議一樣，成爲毫無效力。

在這個時期，除出以立刻而直接的戰爭威脅來恐嚇希特勒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阻止他。捷克政府處境孤立，祇能靠自己的行動來挽救自己，我和魏薩寇談話後，又去見捷克公使，他自己既已和德國外交部隔絕關係，我便再度向他敦促，請他向捷克外交部長契爾柯夫斯基建議立即來柏林一行。契爾柯夫斯基極願與德合作，這是人所共知的。據我看來，單是這種直接的接洽便足以挽救危局。這樣做法也許會成爲一種恥辱，但是或者可以防止最惡劣的結果。這種勸告雖然有點刺耳，但是縱使能早點聽從，事實上情勢也許不會像現在一樣。後來不但契爾柯夫斯基，連捷克總統哈柴自己也一同到了柏林，可是已經太晚了。翌日（三月十四日）我聽見哈柴首途向希特勒乞援的公告，不禁大爲驚愕。哈柴和契爾柯夫斯基的身分不同，他是一國的元首。在我看來，他這種行動未免自貶身價而且太過分了。哈柴已經通知希特勒所願，投入了他的軍心。希特勒對他是不會仁慈寬宥的，從那時起，我已經覺得萬事俱休。三月十四日晚上海

，我曾經思慮是否要通宵達旦坐着，等候哈柴和希特勒會晤結果的最早的消息。但是我已無能爲力了，還是毅然就寢罷。次日我一見報紙，就曉得我所最深慮的一層，業已證實。我到柏林來的使命已遭最後的破壞。希特勒已決意硬幹了。

截至三月十二日爲止，德國的計劃是送一個哀的美教育給捷克政府，同時顯示武力，作爲後盾。我有理由可以相信這個最後通牒的本文，確是在星期六用電報轉給布拉格的德使館，但在德使館尚未送出之前，又被取消了。那最後通牒的條件，當然是苛刻的，不過或者至少還可使捷克留一點獨立的影子。但是德政府統制下的報紙和希特勒手下的煽動者——這些是納粹主義機構的主要機件——已經在動作了。六個月前張伯倫先生到貝希德斯加登鎮去過之後，他們所做過的工作，現在正在照樣地做着，不足六個月之後，關於波蘭問題，他們也要照樣去做。捷克人如何兇惡的故事正在增長着。日耳曼人據說是被捷克人虐待屠殺着；成千成萬的難民說是從勃郎的日耳曼人區逃出來，湧往波蘭邊境。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說下去會令人生厭。希特勒就以這些故事當作藉口，改變私衷，取消最後通牒，而代之以全部的軍事佔領，使捷克成爲保護國。他真是一層層說得或造出似乎合理的辯解而爲他的惡行作藉口的天才！

我們很難相信這種詭計不是希特勒自己計劃中的一個固有的部分，不過我在數月之

後，會聽到一段故事，似乎可以表示它的確不是的。爲了表示公正，我現在將它寫出來。三月十五日，希特勒到了布拉格以後，他所表示願意最先做的舉中，有一件便是去視察醫院。他周圍的人——大概是兵士，所以不如希姆萊的黑衫隊員那樣消息靈通——問他目的何在，希特勒的回答是：「去探視那些被捷克人虐待而受傷的日耳曼人。」但是事實上，一個受傷的日耳曼人也沒淋。他手下的人却又難以辯阻他，不敢說這種視察是無謂的。後來他們也許引他相信各處都有受傷的日耳曼人，藏有布拉格本地沒有，假使這故事是真的——這故事的來源是在捷克方面，且又是可靠的——它似乎可以表示國社黨中有幾份子甚至比希特勒本人還躁急，甚或他們的元首倒有幾分做了急進派的傀儡。然而這是機會上和時間上的問題，而不是原則上的問題。波希米保護國是一個蓄意已久的計劃，即使希特勒的黨徒不在三月中逼他動手，也終究是他的最後目的物。

最近且希特勒作了最後的決定，必盡力使他的行動，在德國人看起來，不管怎樣總是在假充合法的空氣之下進行，德國人有一種傳統的守法的心理。三月十二日，斯洛伐克天主教牧師蒂蘇神父奉召到柏林來，他被勸說將他那小邦的命運交在希特勒手中。他受命宣布斯洛伐克在德國護保之下獨立，而自任爲該邦第一任總統。三月十四日，哈斯博士接顧萊利柏林，但他確是出於自願而來。希望本國能倖免被侵的恐怖，并想因他的屈

辱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寬大的待遇。

不論希特勒具有何種美德，慷慨一項必然總是不在內的。我有好幾次親自觀察過他的觀面，具上全無這種美德。那幾次如果他能慷慨，或者倒會對他有利的。哈柴博士是個年邁孱弱的人，他的女兒陪他同行，以便照顧，德國以款待一國元首之禮相迎——也許像對待一個受刑前的罪犯——他抵站時，里賓特洛甫送了他的女兒一束鮮花；到阿爾德旅館時，希特勒送了她一匣巧克力糖。這便是希特勒最大限度的慷慨之舉。

捷克外交總長契爾柯夫斯基會同他的總統前來，當他和里賓特洛甫會晤之後，希特勒決定於夜間一時在元首府延見哈柴。希氏想得週到，請了一位醫生在場，以備談話進行時，哈柴萬一病倒。而且，如果所傳不虛，那位醫生倒實在被請教過一兩次。在哈柴博士到達元首府以前，德國軍隊早已開入捷克，佔領了馬利希和奧斯特羅羅圖一帶。這是以防止波蘭將佔領該地為藉口，這種藉口也許并非毫無理由，因該處擁有波希米亞最富的錳礦藏，因此波蘭都要爭取。

這也就是那可憐的哈柴博士被引到希特勒面前去時的情景。他們兩人直談至早晨四時，延遲的大都原因是由於柏林與布拉格間若干次電話來往的阻隔。哈柴表示他所憂慮的是有幾兩萬的捷克軍隊也許會向侵入的德軍開火。希特勒說假使那樣，布拉格會立刻

遭受德國空軍的轟炸。戈林上將已於三月十二日自聖里摩被召返國，當時也在場幫閒威脅，哈樂被勸請將這種警告親自在電話中告訴在布拉格的他的閣員們。經過許多周折和延遲，他纔照辦。反正這禍是在條約上簽個字的問題，結果他簽字了，於是「爲了和平打算」將捷克民族移交給德國。

這事的經過完全是一幕滑稽劇，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哈樂總統儘可以採取較爲嚴正的態度。他至少可以拒絕簽字，可以免得使希特勒得着滿意的藉口，向德國人說佔領波希米亞是合理的而又爲捷克人所願望的，他不必簽字也仍可照樣命令捷克政府對於侵略者不加抵抗。我們必須因他年邁孱弱之故而原諒他。次晨他動身回布拉格，但是希特勒由於在車務上作了巧妙的佈置，已經先他而到。三月十五日晨，希特勒在黑拉德貝宮上層時窗口向捷克民衆宣布將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兩省改爲德國保護地。這次危機的前後經過祇有五天。希特勒又施展了一次閃電式的策略，使全世界又感到一次大大的震駭。

在突擊策略上這是一種顯赫的豐功偉績，但從其他任何方面說來，這件事確成了政治上一個無可挽救的大錯。比較起來，戈德斯堡的事情，倒還是一個較小而較不重要的錯誤。由於布拉格的佔領，希特勒已毫無可疑地使他自己犯了道義上的大錯，而且不容置辯地毀滅了凡爾賽條約對於德國的壓力。布拉格被佔領後，納粹主義不再是一種良政。

上和種族上的主義，而成爲純粹是黨和有意義的了。希特勒無情的摧毀了一個獨來自主的民族所辛勤獲得不久的自由，明知故犯的違背了他不滿六個月前所簽訂的慕尼黑協定對於張伯倫先生所提出的保證，那保證就是說在蘇台德區併入德國以後，將尊重捷克民族的獨立和完整。自此以後，希特勒的話將永遠不能再被人信任，就是最主張和平的人也不能忽視希特勒的威脅。這件事簡直就是一九一四年德軍侵入比利時事件的重相重演。我們即使說一九三九年戰事的發生也是由於德國故意撕碎條約，這話也不能算是過分誇大，我在末次的報告中曾提到一事件：在那年三月以前，德國元首所乘的飛機是掛的德國國旗；到了三月十五日，那艦長竟放肆地改變了骷髏和雙骨的海盜旗；懸他的真面目向歐洲的和平自由作放縱的恫嚇。

如果國社主義祇是運用在國內的一種制度，或者即使運用到國外，而是以像德國國境附近併組成堅固的單位的大批日耳曼人爲限，那麼德國人的行爲，究竟不是違背道義，還不失爲一個可以爭辯的問題。就內政的範圍而言，德國政府祇與德國人民有關，不論是英國民族或者整個的不列顛帝國，決不情願在民族自決的原則有適用的可能，并有適用的正當理由的時候，爲了不許適用這種原則而主張參戰。不料德國的民族主義竟擴展到德國的國境之外，而且民族自決的原則在被應用之後，竟遭變棄，去改用一種

所謂「生存地域」(Lebensraum) 意即德國不顧他人而自由週旋的無限地域) 的理論。因此納粹黨的哲學和它的支配慾，纔越出了不妨礙和平的範圍，布拉格的淪陷使法國重新生氣勃勃，使英國和整個帝國堅固團結，並且產生了一種對付德國的反侵略陣線，目前的一場鬥爭，乃是爲爭取最大限度的自由與正義的理想實現，去對抗肆無忌憚的極端政治和擴張世界的野心。布拉格的淪陷，便爲這場鬥爭奠下了一重基礎。

布拉格這次事變不僅是政治上的最大的錯誤，也是一種策略上的同等的錯誤。這種表面上的成功，尤其是因爲未流滴血，打動了大多數甚至於穩健德國人的心扉，使希特勒因此暫時增加了他的聲望。但是仍有許多德國人毫不猶豫地批評，說那種事變是不值得其時的，據他們的意見，應該先行解決其他更急迫的問題，如米美爾，但澤，和波蘭走漏等問題，較爲得計也較易着手。捷克大可以留在後面，可施行嚴厲而殘酷的經濟壓力，使它不得不在相當時期以內變成德國的屬土。

我仍覺得奇怪，爲什麼希特勒會不走這條路。因此我祇能推想他大概是喜歡顯出煽習權會主義要比判斷的知覺強得多，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爭執正是一個不容失去的良機，同時也是報復張伯倫和達拉第在慕尼黑會議時愛管閒事，干涉德國在東歐行動自由的良機。還有一層，持態度憤怒，他這樣可以容易得着令他民衆滿意的軍事上和經濟

上的藉口，來滿足個人的野心和洩憤，因為就是慕尼黑會議也不會減輕他對於捷克人在一九三八年五月間所持態度的憤怒，記得是俾斯麥這樣說過：「得波希米亞者便是中歐的主人。」這兩省在戰略上重要，只要一看地圖就可以明白的。一旦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併入德國，將使德國參謀本部的工作大大化為簡單。

蘇台德區的割讓使捷克抵抗德國侵略的整個計劃大受阻礙。捷克受內憂外患之累，現在對德國的侵略即使想作幾星期的抵抗也不可能。在另一方面，蘇聯和西班牙強國在的危險仍然存在着，況且照希特勒對他的將領們所說，英國正在加速地準備一個先發制人的戰爭。（里賓特洛甫曾不斷地宣傳說英國全然無用，永不會爲了任何人或任何事而作戰，但是這個事實對於希特勒所持相反的議論，並不發生影響，希特勒要說的時候仍可照樣那麼說。）在這種環境之下，希特勒的那班軍顧問們當然必然的最贊同他提議採取的路線。但是希特勒却漂亮地裝着是聽從他們的主張。他的那些經濟顧問也是聽從同樣的論調。原料是德國極端需要的，英國有封鎖德國的可能性，尤其是當美國因猶太人被殘害而對德仇視的時候，德國必須併吞捷克，刻不容緩以便應付這種可能的封鎖。陸上的包圍，海上的封鎖，通貨膨脹，和原料缺乏都是常常驚嚇着德國人的妖魔。希特勒常常可以利用其中之一，使他的人民屈從阿諛他的政策。

然而，希特勒豈會毫不覺察他的行動，將在國外發生一種不可避免的結果嗎？他有著種種特性，使他從一個毫無地位的人，高昇爲一個大民族的領袖，如果他的誇大狂不是在三月十五日以前就已經超過了其餘一切的特性，那末他無論任何似是而非的理論使他自己和他的黨徒去確信他的行動正當，我仍相信他那天也決不會像那樣膽大妄爲的。但是這種情形并未使他對於布拉格被佔領以後全世界所立時發生的極大反響，不裝出一些驚訝的樣子，當戈林曉得了史丹萊和赫羅森的訪問不能實現時，他裝出極端憤怒的樣子說，這次訪問不應該爲了這點小事而作罷！

德國人是一個奇異的民族。他們對於一個問題，除了他們自己的事以外，似乎全然不能理會到任何別的方面，并且完全不懂得文明的禮貌及謙和的意義，許多捷克人自己覺得他們的國家在西利西亞和奧地利之間，正在德國虎口之中，如果要它和德國採取敵對的態度，仍是一種不足取得辦法。捷克在經濟生存上的平安須靠着和德國建立友好的關係。在柏林威廉街外交部中確實存着一份使捷德關係建立在互相滿意的立場上的協定本文。爲德國自身的利益計，在它的邊境上，同時在其經濟勢力範圍之內，存在着一個知足而勤奮的捷克國家，要比擁有七八百萬懷恨在心而蓄意報復的奴僕有價值得多。舊奧地利帝國是由不同的民族所組成，有駕馭他們的傳統的技巧，可是總覺得捷克人是。

難對付而且最難加以同化的民族。這個民族氣質剛強，其力量常存在於潛伏的反抗力之中。據捷克駐英大使馬沙里克曾說過：「捷克人無論如何將使德國感覺胃痛。」

德國在今日能用暴力壓服捷克人，但在現代民族主義的洪流中，它不能永遠壓服他們，不管現在的戰爭其目前的結局如何，「上帝有知，報應不爽。」三月十五日布拉格的佔領是一個最大的政治上的錯誤。在那時以前，全世界熱忱地渴望以和平為自身的歸宿，深知下次戰爭的慘酷，注視着希特勒一次一次的成功，對於他不變地應用着的可恨的手段和技倆，曾經表示寬恕或是為其所欺騙。但是布拉格是一個界限。歐洲無論何處已無絲毫安全可言，所有的祇存一種完全不信任希特勒的空氣，不信任他的誠意，也不信任他會遵守將來或將立下的任何保證。我在第二天拍給哈里法克斯勳爵的一封信中曾說：「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歸併德國，是一個大錯誤，將來無時不需要賠償。這件事雖然也許使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獲得了一次便宜的勝利，但是如果有人會不相信它最後要被證明為一個必須付與重大代價的錯誤，那真是太可悲了。」英國政府對於一個已經表示不能遵守未滿六個月前所許的協定的政府，應當採取什麼態度，無疑地將加以考慮。英國政府採取了當時所可用的唯一步驟，就是將我無限期地召回倫敦。我到柏林去的使命已經失敗了。從那時起，我覺得要想到真正的和平希望那除非是奇蹟，縱然氣

數已盡，但是我仍抱着那種渺茫的希望，度過了五個半月，困疲焦灼的歲月。

第九章 第三幕：布拉格的佔領

一九七

第十章 第四幕：波蘭 第一場：英波協定

表面上，我被召回到倫敦的原因是回國報告，但在我離開柏林的時候，總覺得我不會再到那裏了。很可能的也許更爲了政策上的關係，我會被撤回。我貢獻一個方法，試向希特勒政府尋求一個暫時的協定。可是在三月十五日那天，那個策略被希特勒的侵略行爲所破壞。照理應該任命另一位大使代替我的位置，可是因爲局勢變動得的很快；而英國政府大概不願於競賽半途，再調換馬匹，所以沒有更動。

我在倫敦，過着一個憂慮焦急的時期，重要的事件，也在那時發生。全世界，尤其英國的民意爲了布拉格的被佔，和慕尼黑協定整個精神的破壞，而大大的被震動。慕尼黑會議後，英國人民團結一致。從一九二〇年來會未有的，擁護着一個單獨政策。在這種情形下，希特勒覺得假使他很快地把米美爾和但澤問題同時解決，那他以前侵略捷克人又失信張伯倫所生世界對他的憎惡，也不致增加多少。於是命令里賓特洛甫威嚇立陶宛人和波蘭人接受德國條件，來解決這兩個問題。對於立陶宛人他是成功的，以很合理的條約把米美爾割讓給德國。但是波蘭人生性堅決，在斯洛伐契亞方面已受過希特勒的欺騙，同時這土地他們認爲是在他們的利益範圍之內，於是不信任之外，又加上了憤恨

。所以當里賓特洛甫把希特勒欲加諸波蘭政府的條件，提交波蘭駐柏林大使的時候，李柏斯基已奉命中止進行已數月的但澤和波蘭走廊問題的談判，並提議以自由平等討論為基礎，重開談判。情境似因電報地變化四週充滿着謠言的氣氛，德國陸軍已作半戰時準備，而且過去的一段時間中，曾在波蘭邊境上囤積糧食和軍需品。

希特勒因為波蘭的答復而大怒，在一時看來，好像可隨時掀起戰端。德國的脅威，使波蘭政府大為驚懼，不得不動員她自己一部份的軍隊。在三月三十一日那天，張伯倫獲得下議院和英國民衆輿論的一致贊助，宣布如果波蘭遭受任何足以危害其獨立的侵略，英國決進行與該國互助的義務。這是一個重要的決定，自布拉格被佔據了之後，在歐洲的國家沒有一個能夠覺得安全，而不感受到納粹種族的威脅和野蠻法律的影響。在十二個月之中，德國已併吞了奧地利，蘇台德區，和捷克。口頭的抗議，形同廢話，有些地方真應持堅決的立場，應該拿武力對付武力，否則希特勒忱於成功的狂熱中，在未來的十二個月內，會繼續去處置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納粹黨徒已在高唱重建戰前的奧匈帝國，並且要由柏林管理全部中歐。以前希特勒造成大日耳曼時利用的民族主義和自決的原則，現在已經是完全不合時了。在布拉格，它們已被無情地廢棄，取而代之的乃是獨霸世界。假使要保持世界和平，應該確切明瞭，在何種限度下，德國仍可不與

英國發生戰爭。在一九一四年，英國政府沒有把這點充分底表示明白，因而遭人家的非難。這種謬實雖有其理由，而張伯倫主持的政府決不使這種危機再重生。這次假使一切跑路的人，都可以知道關於波蘭事件而舉起來的危險信號。然而英國政府並不到此就止，波蘭的協定是一種互助協定，但是因為看來德國的野心永無止境，所以數星期後羅馬尼亞和希臘也同樣獲得這片面的保證。

不列顛把她的立場表示得不致被人誤會的坦白。然而結果只使人覺得德國人的歡心是何等的困難。在一九一四年，只因我們事前沒有表明我們的意欲如何，我們被人家責備說，戰禍是由我們惹起的。一九三九年，我們同樣地受人的責備，說這次戰端是我們煽動的，我們煽動了德國，因為我們把我們的立場顯示得太清楚。德國總是為着她自己立場辯護，對於一個問題，只顧到自己的一方面，而不顧及其他方面。其實祇要德國的活動不超出日耳曼人原佔多數的區域，那末不列顛民族，雖深痛疾惡希特勒主義施行的各種策略，並不想極端地干涉。一種預防性的戰爭。若祇是阻撓以國家為基礎的大日耳曼民族的團結，為其唯一目的，這無論英國民族和不列顛帝國都不會許可的。沒有一個英國政治家會不審慎考慮這件事情。不列顛民族雖酷愛和平，但對於德國繼續不斷地吞滅獨立國家也不能一味容忍。三月十五日，世界已受了震驚，但是不應再給她震驚。

戰爭將爲德國下次侵略的必然結果。假使希特勒需要和平，他知道怎樣可以保持它，假使她需要戰爭，他也同樣的明白怎樣可以造成它。選擇之權既在他手，而最後戰爭的全都責任，當然也是他的。

從外表觀察，自始就是很明顯的，不論英波協定，以及戰爭的最後結果是什麼，假使波蘭受到德國的強有力空軍和高度機械化陸軍的攻擊，不列顛和法國都不能立刻給以任何有效而又直接的援助。體力的勇氣，對於這些技術和物質上的優勢，是無法抵抗的。至多祇有幾個月的問題，波蘭就會被壓服——就是說，從西方對齊格弗里防線上所施任何封鎖或壓迫以助她的獨力奮鬥，即便奏效，她已早被壓倒了，如果她有直接援助的話，那末唯有俄國從東方來救濟。

再者，和捷克的情形一樣，——關於這點我們不能過分重視，——這也是一個從政治地理的觀察。照波蘭的國境而論，她處在這兩強之間，所以不管過去和未來，波蘭的命運，總將由德國和俄國來決定。在一九三九年四月開始，德國對於波蘭，是一個威脅，所以蘇聯的善意和物質援助是波蘭的目前安全所依賴的。

因爲這種原因，必須把蘇聯包括在和平陣線中，來反抗德國更進一步的侵略，所以英法兩國政府便開始與蘇聯談判。這些談判會延遲了寶貴的四個月，到結果將近八月底

的時候，蘇聯突然不變原有面目。我們在莫斯科的諷刺，反時常給戈培爾一個很好的宣傳機會，說西方列強又在包圍德國了。英國被認爲主張包圍的設計首腦，又被稱爲日耳曼的第一號公敵。我在柏林的任期內，英國總是這樣地被看待着。除了常希特勒設計使犯捷克人和波蘭人的時候，使他暫時提高波蘭人的驕傲地位以外，每個機會都被利用着來批評或輕視英國，着望她的外患內憂，並斷言她國運的衰微和國威的凋落。很明顯的，與蘇聯談判是一種包圍的形式，不過並不含有進攻的意思，而僅是一種抵禦侵略的方法。但是這却被利用作爲惡意的宣傳，來刺激萎靡的日耳曼精神，提早準備希特勒明確整算的戰爭，結果却非常的成功。在那四個月之間，便用這種宣傳來適應他的目的。在此間，他不斷的動員，動員更多的人。被包圍的呼喊，總能激起一個如德國這樣一個有十一個接壤隣國，而因此容易被征服的國家。這呼喊壓倒了因兒子被召入伍，及漸受嚴密糧食統制的家庭中所發出的怨聲。當德國人在一天早晨醒來，知道原是仇敵的蘇聯，過了一夜，變成了德國的朋友和同盟國，無疑地那時這呼聲失去了這樣的效果。然而那是將來的事情，到那時，急進派和戈培爾自會及時行事的。

宣傳被包圍的絕技中，更有無恥的一部分，希特勒始終在莫斯科力謀將會經蘇聯和痛恨過的西歐強國向德國所作的防禦性包圍，轉變成爲蘇德聯合向波蘭所作的攻擊性包

團。這些反談判以及參加的人物等的許多消息，不經的傳到柏林，當然那種力量會破壞和平陣線的。所以法國和我們自己的軍事使團於八月中的離任道到莫斯科之後，我已知他們是不會成功。我也不會料到俄國如此無信義，根據仔細的判斷，如同後來事實證明一樣我必須再說，我不相信我們自己的談判會更順利些，尤其是當李維諾夫在那些談判的初期，就被無故免職了。

在我離開任所五個星期之後，結果仍奉政府之命，回到柏林，到那裏的日期是四月二十五日。爲了我們在東歐擔負了新而重大的義務，又因爲要加強我們履行這些義務的嚴重性，決定提出軍事訓練法案，這是近代英國史中第一次在和平時期，提出一種征兵法案。我這次回到柏林的直接動機，是因爲要把這件事實，通知德國政府，（這並不是希特勒的勝利），又要在本國下議院把這事實宣佈之前，將情勢解釋一下。但在我離開英國之前，有人說除非我接到這通告的確實條款，不應去通知德國。那些確實條款，却須先由政府通報給下議院中的反對黨。本來在原則上，定於下星期二，即四月二十七日宣佈，但是結果直至那星期二晚上，我纔奉到命令，說祇將於星期三下午在下議院中發表，那時英國政府的意念，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而我爲了種種理由，決定把這通告不交給里賓特洛甫本人，而交給外交部次長。於是在星期三早晨，我自己打個電話告訴他

說，我有件照會，想在當日上午送給德國政府。魏薩寇知道了我訪問的目的之後，說他能在正午接見我，關於英國政府的意念的正式通知書，終於交給了他。

假使報紙不會有謠言，說我被里賓特洛甫粗暴地拒絕，這裏也不值得將它原本翻述。或許有一位前任英國關員知道的更清楚，甚至在一張新聞紙上，登載了一幅凄慘的漫畫，描寫英國大使手裏拿着一頂帽子，站在里賓特洛甫的門階上等候着。假使是事實，我決想不到對於英國有什麼大利益，或與她的尊嚴相稱，傳揚這一件事除了里賓特洛甫自己以外，別人不會滿意的。但就事實而論，這是絕對不確的。徵兵法案是一件純粹的英國的事務，所以，首相給德國政府這件事的預先通知，並不是一件必須要親自送給外交部長的照會。更有，我完全明瞭在布拉格事件後，我的從柏林被召回本國，使納粹政府深感不快，他們極想表示出他們對於這件事的憤怒，假使我讓里賓特洛甫來見我，他自然會設詞延擱的。這個明顯的報復，我早已打算要避開的。

兩天後，就是四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在議會中演說；他向波蘭的建議的基礎是：但澤歸還德國，向波蘭作但澤港經濟上的保證，經過波蘭走廓爾一個治外法權的德國走廊，最後還有一個賄賂物，就是波蘭參加對斯洛伐克契亞的保證。同時希特勒宣稱，因為波蘭拒絕了這個寬大的提議——如他所稱的——所以不再重提了。於是他通告廢止那不以

武力解決所有爭端的十年德波協定。這個協定是他於一九三四年和畢蘇賓基元帥所簽訂的，還有五年有效期間。他同時片面地通告，廢止一九三五年的英德海軍條約。又同時利用這個機會，諷刺羅斯福總統所提的休戰十年的建議。這名單上有三十個國家，共同保證抵制侵略。恰巧一星期後，關於波蘭的事件，貝克上校有一答復，大意說：波蘭充分準備解決這些問題，但是祇要一種條件作基礎，這種條件就是要以平等精神討論，而又能保障波蘭的重要利益。

結果完全停頓，弄得一九三九年五月初的德波關係，和那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德捷關係很相像。後來接連的事情也同樣的相像，但是也有極大不同的地方。開始顯明顯的，波蘭人決不像捷克人，願被屈服於武力。英國對於捷克人曾未有任何條約上的義務，如從三月三十一日起，對波蘭人所有的。張伯倫先生也不能再去慕尼黑。住在鄰近德國土地的日耳曼人，並不聚集在一起。這是真的，如果那問題單是提及經過走廊的一個通道，或是居有四十萬日耳曼人的但澤。那德國事件中，也就有許多對的地方。但縱使如此，那事件也給他於慕尼黑會議後的行動，完全毀壞了。在布拉格事件後，波蘭，據世界的其他各國一樣的，明瞭所有希特勒的語言僅是策略上的手段。但澤是否和蘇台德區一樣，僅作爲吃櫻桃的第一口；全部走廊，波森及西利西亞爲第二口；最後以波蘭的獨立

自由作爲第三口呢？如要緩和波蘭人的應有疑懼，那除了像從未履行過的慕尼黑所提口頭保證之外，還需要別的才行。波蘭人是勇敢的，或許太喜歡談論他們的勇敢。但是，費煦在他所作動人的歐洲史中，稱他們爲「歐州的急性人」。焦急的原因真多，結果還是缺少他們的勇氣。

在五月裏的起初幾天，就是再過四個不平靜的月份，就要到最後的戰爭前的結束的一幕，我對於一般的情勢，可作如下的估計。如果沒有不可知的意外事件，或新變化的情勢混合一起，希特勒的策賂總是一樣的，他會等待着，並且同時會準備應付一切急變，這完全和他在去夏幹的一樣。如果他可不戰而得但澤，那會使他暫時滿足；如果他不戰而得，最後他會出於一戰，但是祇要在於他看來是有利的時候。主動權總是他的，即使他暫時對但澤和走廊不動手，這決不是說他已經放棄了他的主張和野心，而不過是所等候的有利機會尚未出現。最後我相信沒有一種解決是一個永久的解決，如果不滿足他在四月二十八日向波蘭所提的建議或最後通牒，因爲正像那時我向英國政府所報告的，波蘭問題也並不是希特勒所造出來的。他如果是一個奧國人，會比任何普魯士人更可能傾向波蘭，波蘭走廊和但澤確是一個德國國家方面要鳴不平的事情，所以這問題必須獲得公平的解決，如果德波間將來會有永遠真實和平的話。實際上，英國政府對於這

點完全了解。後來首相或哈里法克斯助爵的每次演說，和後來與希特勒或任何納粹黨領袖的每次談話，都着重在我們的願望要得一個公平的解決，這和我們有以武力抵抗武力的決心，會有同樣的聲明。

第十一章 第三次休息

像一九三八年間夏季的幾個月消耗在無結果的談判一樣，一九三九年間的夏季，又同樣的重演一次。當時莫斯科已變成舞台的中心。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曾懇懇勸請俄國政府確實地對波蘭負詩和我們兩國一樣的義務。但是結果空費周折。每次把和俄國合作的一樣障礙解除以後，史太林會不斷有規律的提出另一種，其忍耐力也和我們解決每點困難的忍耐力有相同的程度。同時我們繼續不斷在華沙幹旋，想避勉希特勒很技巧地爲達到他自己的目的而生出的不幸事件。

就我在柏林這方面的本分，我是極力忍耐着，再提出各種鄭重的警告給各方面。我的主要目的，實在差不多是唯一的，是要使德國人相信他們如再有任何進一步的侵略舉動，就是表示對英開戰。舉例來說：我曾在五月底和戈林談話，當時我曾將經過向本國政府報告，亦即英國政府在戰爭爆發以後不久所發表的藍皮書中所載的文件之一。我那次向戈林元帥很清楚地說明，關於但澤和波蘭走廊問題，我們願與德波兩國之間，能有一種友善的措置，在這方面沒有人會比我們更需要，可是同時我們已經決心將來要用武力對搖武力。當時里賓特洛甫雖然正在用他自己的特種宣傳方法，大大的鼓吹英國

決不會爲伊澤而開戰，但是那位上將本人那次似乎不會懷疑我所說的確是我們的固定的決議。他似乎頗相信，或者裝作相信英國已經打算無論如何要對德實行一場預防性的戰爭。大概他已經從希特勒方面得到一種暗示，因爲希特勒用他那種自欺和造謠的非常能力，仍在辯證他相信的戰爭會來臨。因此戈林同樣苦苦地對我詳細解說，爲什麼任何強國或者幾個強國聯合起來不能在歐洲勝過德國。他鎮靜地詳述：法國沒有支持長期戰爭的能力；波蘭沒有軍事上的準備，也沒有真實的團結；蘇俄不情願以任何有效的協助給與波蘭；戰爭對於英國會有損害；和德國有着世界無敵的威力。

無論在當時或在那年夏季的全季中，如果向德國爭辯，最後我也放棄這個嘗試，波蘭人對於「生存地域」和「經濟存在」有同等的權利，實在毫無用處。所以我的談話集中有侵略行動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每一個德國人有一種同一不變的答復，就是英國已將一張空頭支票，給與波蘭人，並且將他的武器授給他們。這件事又合了講到「狼與羊」那段寓言的情形，正和前一年的關於捷克人的事情一樣。無論波蘭人做什麼事，說什麼話，都是錯的，而且都是完全由於英國的鼓勵。這件事，在任何理智或邏輯上，就是魏薩寇來也講不通的。德國人祇能想到他們自己「生存地域」的許多事情，他們又肯定地說，祇要美國繼續做波蘭人的後盾，波蘭人便亦不會對於任何變更現狀的方案表示

同意。所有希特勒擬定的計畫，莫不以這種臆斷爲根據。

我同戈林的談話，無論是這樣興奮，必然不能談到一項特殊問題上去，我恐怕那也是我的談話的塞運。但是據我看來，不論希特勒的心中有什麼打算，可是當時戈林不會開戰的願望，也沒有一種直覺的成見可看出戰神的降臨。戈林曾打算在他的一加林別墅」的新餐室中，掛上幾張有着色圖畫的繡帷，那次他將那些東西得意揚揚地給我。我後來在一件正式公文中曾將那些圖案，稱作「一絲不掛的婦人」圖，但是我恨厭爾乘寫本畫的機會說明我用那個名詞，並沒有一些失敬或誘惑的態度。倘使當時我預料到該的公文會被公布，那末我一定改稱「裸體像」，以代替我實在用過的那個粗魯的名詞。那些圖畫，實在是很藝術的。我所以提到牠們祇是指着關於忍耐的辯論而言，否則完全不必說起。原來那一天早晨我對戈林所講的一切談話，完全以「忍耐」爲要點。因此當戈林讀出「仁慈」「貞潔」等等的名字時，我就乘機對他說我不會看見那些畫中女人有「忍耐」。戈林從來不會不解別人說話的要點，所以他聽了我的諷刺，大聲狂笑。在藍皮書發表以後，我才知道了那些圖畫的來源。有一位海德小姐是海斯德先生的駐英的法定代理人。她從聖杜奈堡寫去信告訴我：我所指的那些繡帷本來是十六世紀中英的法蘭達民族的遺物，通稱爲「四季」圖，現在屬於海斯德先生，將由戈林買去，那些繡帷確是存在聖杜

奈堡中，定價是英幣五千磅。她繼續說：戈林的代表本來決定在八月十六日到堡中來完成交易，但是離那個日期不遠，她接得通知說：他已不克在原定期期動身。海德小姐在她寫給我的信中結尾說：「事情既有變化，我當然知道那件交易將作罷了。」這句話雖是直觀的，並非是無識之談。

在以後的四個月間，我對於希特勒的最大印像，就是覺得他是一個西洋象棋選手，正在研究棋局，等待着他對手的一些失着，便立刻利用機會，以謀有利於己方。只要俄國的最後態度尚未有決斷，他自己便一直不肯動手，他的軍隊中，已經有一大部分人，不論是否信仰共產主義，始終頑強對俄同盟的價值無上，他們決不肯讓他冒險引起一場世界大戰，因為俄國或許會活躍地加入波蘭那一方面。德國在軍事上的缺點，是他要在兩條前線上同時作戰。就這一點而言，他認為波蘭無足輕重，但是俄國有源源不絕的軍事準備，有在數量上佔優勢的空軍，都是可慮的。而且俄國在前一年間實行激烈肅軍，並不影響她的實力。在這時候希特勒固然或許會繼續等候機會，但是我們可以認為他在四月二十八日向波蘭提出的要求，縱使全部被接受，也不會使他從此安分守己的。他手下的急進份子，和其他許多德國人甚至都不贊成他那次略具雛形的解決方案，所以任何人不必多加推想就可以確信希特勒本人並不會將那些要求當作最後的解決方案。在德着

起來，祇是癢一個小卒向前移了一步。他總是移動無關緊要的小卒，等候時機，他祇要贏了全局，那麼他會否欺騙，會否將馬頭棋當作主教冠形棋走，或者將衛城棋當作馬頭棋走，這對於他有什麼關係呢？他總是希望沒有人在旁觀棋，或者，如果有人任旁觀破，他總要尋出理由作辯護，會堅決地說：最先破壞規矩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對手。

所謂「Wahnsystem」或「自騙的能力」，就是希特勒的伎倆中的正常部分。這種能力幫助他既能發怒，同時又能使他的人民相信無論他想的任何事情，絕對他們有利益的。當他在受最後裁判的時候，必定帶着顯然完全自己覺悟的態度來辯駁，說假使當初波蘭人接受了他的合理而寬大的條件，他一定會使歐洲脫離戰爭的危窘。據我的意見，那句話是虛偽的。他心中完全明白除了那些條件以外，他實在還想要更多的東西，他還要波森和羅利西亞兩省，並且還要波蘭的自由。對於這些東西波蘭人決不肯不戰而犧牲的。他曉得爲成就他全部野心，戰爭終於不能避免，他的大量軍器都是預備作那最嚴的消耗。還有如我在上文已經提及的，就是他自認爲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的化身，他將他們二人的畫像和半身像，掛在柏林，慕尼黑和貝爾斯加登等處的辦公室中。他們二人都是侍奉戰神的，所以他沒有向那位天神犧牲，他的地位威名就不會完固。終久他的犧牲要大過於他們二人的。沒有人能疏忽他的低能錯綜的心理。他覺得無論他本人或全國國民

都決不能成功那願望。除非德國在另一次世界大戰中高奏凱歌，洗清一九一八年敗北的恥辱，接着德國便要統治全球。

因為希特勒的軍隊非等到八月底，不能完全作好最後準備，以應付所有真正發生的事變，所以他本人多少還耐心地等待着。雖然各種準備完全秘密進行，而這些內情非常明顯。當他宣稱坦能堡戰勝二十五週年紀念會定於八月二十七日在該處舉行，屆時將有德軍艦一艘開往但澤作訪問。這也不一定我有什麼先見之明，那次我放棄了我一向極端嫌惡的習慣，就是一般人對緊急變化，預言何時何日發生的習慣。我也在七月初寫信告訴哈里法克斯伯爵，預言最後關頭的一剎間，會爆發在八月份的最後一星期中。

我們到了戲劇的最後一本。這一本的幕幕是在那個緊要的三月三十一日升起。那一天正是張伯倫先生在下議院中宣布英波協定的日子。當時兩方面正在搶奪陣地。我們在莫斯科和安卡拉力求建立一條和平陣線，抵抗侵略。同時德國人也在莫斯科，波羅的海諸國，和巴爾幹半島等處活動，要打破那條陣線。雙方都有得失勝敗的可能。

但是當時有一段風雨暫息的時間，除非有不測的意外事件突然發生，會再延續幾個月。我在五月初曾將這件事實向本國政府報告。那時德國的軍事方面固然有很大的活動，可是沒有一種行動，不能就情理判斷而看作一個正常的問題，即使是在非軍時期。更

多不斷的後備兵曾經逐漸被召入軍隊服役（我的德籍男僕中有一名在五月間召去，另有一名七月間也接着召去，）不過軍事行動還不曾加速度進行。希特勒和在一九三八年間一樣，再等候時機，並準備應付萬一發生的一切意外事件，可是他尚不曾作任何決定，而且非等到他所希望的環境轉變到有利於他的時候，不肯下一個決斷。直到八月份下半月為止，他的軍部固然可以有了最充分的準備，一切糧食的收穫可以儲集在這一起，但是我們倘使能在那個時候以前，建立一條堅固的和平陣線，同時在陣線背後，勸說波蘭人和德國人判談，那末制先權仍是我們的。假使我們失去這次夏季幾個月內的機會，我們定可預料希特勒自己將奪回或抓住制先權，只要倚靠他的軍隊的力量。所以他九月間在紐倫堡召集的國社黨大會中，一定要能夠對黨員宣布一些事態的發展的真相才行。就另一方面而言，如果國社黨大會如期舉行，並盡力籌備典禮所需之事物；那末一九三九年間，大概不至於有戰爭發生，因為波蘭在每年十月間，常為一種多雨季節，高度機械化的德國部隊，在那種時季，似乎沒有速戰速決的可能，這些却是德國軍事將領所認為成功之要素。事實上，除非在停頓期間，有發生一種嚴重的意外事件之危險，或者希特勒和我們自己都被逼到無退步餘地，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十分相信在那段風雨暫息的期間之內，可以暫時安全無事。所以據我看來整個的問題是怎樣使紐倫堡國社黨大會如

期舉行，而不要遇着不幸的事流產。

夏季於是開始了。五月初里賓特洛甫和齊亞諾伯爵在義大利北部相會，商定將羅馬柏林軸心改爲確定的軍事同盟，終於在五月二十二日在柏林很皇耀地簽字。這種軍事同盟的正式宣布，就她本身而言，義大利方面是爲一種疑慮促成的。這種疑慮恐怕英國和蘇聯土耳其兩國的談判，或許會生出不利於她的結果。這件事經正式公布以後，事態不會有特殊的新發展。軸心的力量，早就始終被認爲足夠堅強，不必再有一件經過雙方簽字，蓋印和交換的軍事同盟條約，來加重他的力量。無疑地全部條約中最有趣味的部份是它的第一條。根據那一條，德國方面的任何打算，或許會是挑動一次國際間的衝突，那麼德國必須預先將她的意思完全通知義大利。這是義大利方面的一種暗示，表示羅馬不能單單被柏林的勢力所箝制。來忍受另一次事前不會宣佈的大打擊，如同那次在布拉格發生的事件一樣，那麼德意志和義大利兩國的邦交，或許不能顧全了。由此看來，那件條約似乎向世界其餘各國提出了一種薄弱的保證，擔保將來不會再有同樣閃電的打擊。但是最重要的效果還是義大利方面，假使希特勒將來採取任何行動，而在事前不曾通知墨索里尼並獲得他的同意，義大利根據條約，就有限定戰爭區域的機會。

五月間，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兩國，覺得俄國的暗中存心大可懷疑，這並非過慮。

同時又煩慮我們在莫斯科談判的程度，因此也在五月間聯合一起，和德國訂了互不侵略條約，來保障他們的地位。當時看起來，這件事似乎是里賓特洛甫進一步的外交上的勝利，但祇是一種醉生夢死暫時的成功，因為將來在史太林以德國同盟者的地位參戰時，這種成績無論對於德國或者對於波羅的海諸國都沒有益處可言。

五月份很快地過完了。我們建立和平陣線這件工作，並沒有比從前進一步的成就。李維諾夫已經被免職，英法兩國的駐莫斯科大使和莫洛托夫重新開始談判。我在五月最末一日，曾迫切地向波蘭大使表示願望在外交部內重開談話，但是他的答復是在德國表示她有談判的善意和準備以前，他無能為力。至於德國已經有了決定，認為貝克上校在五月五日所發表的一篇演說，已經關上了談判之門，非妥等他自已將它重行打開，沒有磋商的餘地。

六月份接着到了。這是最後的一個月，以後我的心理上連比較上的安寧也沒有了。就柏林的情形而言，第一件大事是兩斯拉夫的攝政王陪伴着他的妻子奧爾加王妃（前俄公爵夫人的妹子）到柏林作訪問。這是第一次國君訪問柏林，所以希特勒親自款待，並迷惑他的嘉賓，結果亦不算白費心機。同時德國政府檢閱軍隊，大約費了四小時纔告完畢，也不算徒勞無功，那次表演使保羅親王感到了德國軍事上的威力。幾百架飛機成隊

飛行着，低得幾乎可掠到屋頂；無數的坦克車，槍炮，和其他機械化武器，絡繹不絕，形成一幕顯赫的情景。可是參觀的羣衆却顯出一點不公平的待遇，他們看見有軍樂隊及騎着馬領導的牙灰色制服的兩三隊騎兵的時候，表示特別興高采烈，大聲鼓掌。那是一九一四以前輝武攝威時代穿着美麗軍裝的光榮的騎兵，剩下那兩三隊人。這次表演始終是軍調的，使人看了那些毀壞現代文化的傻子，心中充滿了憂愁和恐怖的感覺。

爲了保羅王和奧爾加王妃和英國皇族有親戚關係，所以我希望他們能光臨英國大使館午餐或晚餐一次。但是德國的招待程序，佔了全部的時間，以致我不能實踐。德國歌劇團曾在一個節日特地舉行一次盛大的表演，招待他們，外交團官員祇在那一次被邀請參觀。除那次表演以外，若是不會領着戈林的盛情，我簡直沒有看見那兩位貴賓的機會。我始終覺得就是這次唯一的寵召，也是一部份應當歸功於我在一九三七年九月間，墨索里尼到柏林遊歷時的一次表示。當時的外交部長是牛賴特男爵。我聽說德國當局不預備邀請外交團官員參加有招待墨氏光榮而舉行的任何宴會。所以我對牛賴特說：在這種環境之下，我一定不能留在柏林，做一個德意軸心僱用的捧場者。後來我真的離開柏林。從我那次以後凡是有國賓訪問柏林的時候，各國使節首腦照例都被邀請參觀歌劇團的表演。這是每次款待國賓的程序中，必有的一項節目。那兩位親王和王妃在逗留柏林

的最後兩晚，消解在戈林的加林別墅中。我承戈林的盛情，邀到那處，和他們談了一個下午。因為他曉得了那兩位貴賓從我出使柏爾格萊德（南斯拉夫國都）時起，就是我的老朋友，纔生出一種機敏的心思，邀我前去。

國皇和皇后在六月間到加拿大和美國遊歷。造成一種驚人的成功。那種使人興奮的結果更使人對於安格魯撒克遜民族的理想主義的堅固性和永久性，表示信仰，英國的聯邦就是例證；同時又更使人深信納粹黨的理想要武力統治世界，不過曇花一現而已。我們受了這等感想的鼓勵，決定在六月九日再度慶祝國皇誕辰。那一天，我在大使館內舉行一次招待會，英僑大約有三四百人參加。那次便是大使館內無論規模大小的款待會的最後第二次了。第二天，六月十日，湊巧是我自己的生日，所以曾邀請了許多賓客餐宴。三年以前，我曾完全忘記了那個日期，到過期之後，方纔想起，所以那一年決定預先籌備這宴會。那就可以使以後永不再忘記了。

我在外交圈中的朋友，和我特別親近的是義比兩國大使和他們的夫人。若是沒有阿托里哥和達維農兩對夫婦在柏林，我總不完席而散。那天，阿托里哥夫人不幸因為已返羅馬，不能光臨。但是她的丈夫惠然肯來，他在席上舉杯祝我康健，其實這也不必，可是虛意可感，應誌之。南萊聯邦公使夫婦和美國代辦寇爾克君當然也一同在座。在座的

德國人中，有魏薩寇男爵和他的夫人，我對於他們兩人，向來很是尊敬；此外還有勞倫士君和史丁格拉契男爵，都帶着他們的美貌的太太到來。孟特是我幾次遠征行獵的伙伴，那天他也帶着太太同來。在柏林研究歌唱的羅德亦是來賓之一。其餘賓客大半是大使館職員。我回憶那次晚宴是很歡樂愉快的；可是也就是我在柏林舉行的最後一次正式宴會。

六月二十五日我乘汽車到漢堡，參觀當地的賽馬會，並訪問從柏爾格萊德到那處的兩位老朋友——亞波德夫婦。當在柏爾格萊德任公使的時候，他曾任美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秘書，後來昇任美國駐漢堡領事。那次賽馬會中，湊巧有一匹波蘭種的馬，許多人認為有跑第一的希望，可是結果落在後面，使素有愛國心的德國人大為稱快。當時的空氣已經緊張，我記得我曾為同時在場的波蘭大使，頗表不快。不過大家都很友善而有禮貌，大家見面時好像都是誠心地互表欣喜。如果現在任何人回想當時的一切情景，祇能感到這次戰爭是悲慘而愚笨的。在德國民衆的心目中，並沒有存着一點對英的敵意。自從戰爭開始以後，戈培爾的癡狂的宣傳或許已經如願而憤地激起了德國人的憎惡心；德國的青年正在受着教導，養成一種憎惡英國人的心理，他們在過去的數年間，就受到了這種薰陶；納粹黨的急進份子心中，充滿着一種有深意的信念，力求將世界變成一個德國

德國。由德國人來統治。因此他們始終懷恨那種壓迫他們目中無人的殘暴，而使它不能實現的主要障礙物。對英國人的憤恨，使英國人替里賓特洛甫起了一個綽號，稱他為「受掘揄婦人的暴怒」，這可以使他滿懷憤怒，更惹起了他的怨恨。英國人又指着說希特勒有着一「受掘揄婦人的暴怒」，這真可以挑動了希特勒本人的一股忿恨的怒氣，但是德國人民對於英國人民沒有出於自然的憎惡之心，兩國人民居然互相格鬥，真是世界上最可悲傷的事。張伯倫先生在戈德斯堡和在慕尼黑時，曾有人出乎天性地向他喝采，表示歡迎，這裏才顯出德國人民的真正感情的特性。

就我個人而言，直到最後一週鐘，我無論在什麼地方，不會有受人歡迎外的別種感覺。那月底，我曾參加兩次盛大的宴會；一次是芬克請客，他先繼司希特勒之任，當經濟部長，後來又兼任德國中央銀行總裁，另一次是楊衫軍首領路茲請客。芬克是一個最討人喜的人，當他所有可能約齊的朋友和他聚在一起飲酒，或進啤酒的時候，那他就感覺無上的快活了。路茲曾在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中，任過軍官，我對於他和他的太太，都很喜歡。很可注意的，納粹黨中的各界份子，除了里賓特洛甫希姆萊和他們手下的一批黨羽的那一類人，不曾參加那兩次宴會，其餘都應邀赴宴。據我看來，那兩次宴會不很像莊嚴性的款待會，實在可以說是使大家有了兩次和喜歡聽聽講講的人，交換一些意見的機會。

那兩次宴會，我盡我最大的能力，在許多次談話中，想求得和希特勒最密切接近的幾位幫助，目的在設法勸誘希特勒表示一些態度，以便打開一扇方便之門，即使門縫祇有一寸或大約一寸之闊，也可以使張伯倫先生方面回覆一些表示。但是據那幾位勸我講，我們和蘇聯繼續的談判，便是對希特勒和好初步進行的一種不能調服的阻礙物。唉！這祇是空談而已；因為決定政策的不是鐵茲或芬克一類的人，就是勃勞若茨和拉歇斯等的那一類人，也不能決定政策。希特勒自己所要做的最後一件事是對英國開始作嚴厲的商討。當我和別人正在整天談論的時候，大家只能得些不舒服的情感，而希特勒却正在秘密地計畫他的行動。在另一方面，莫斯科的談判即使祇有達到一種圓滿結果的一線希望，也被過分的宣傳所毀滅了。本來應當在柏林和華沙兩處進行談判的雙方，當時毫不發一言。

六月份幾乎在不知不覺之中如此過完，我們又過着七月份的日子了。七月間的第一件事情是義大利和德國訂了一個協定將阿的治河上游流域中的提羅爾居民，強行割歸德國統治。那些居民住在那個可愛的故鄉中，已有很久的歷史，這次移歸德國管轄，當然要受到壓迫和災難，可是訂立這次協定的宗旨，本來是一種方法打算將義大利兩國間發達商業的一切可能的起因，完全消除。在德國方面這是給與同盟一個軸心的命脈國家的一種

賄賂，而不能沮喪他們的意志。但另有一種情勢，愈來愈明顯，就是假使和俄國的談判不能早日結束並且假使柏林和華沙間不能重行磋商，那末九月以前波蘭危急存亡的關頭是無可避免了。關於波蘭的少數日耳曼人受虐待的消息，仍載在德國官方報紙的不重要的幾頁中，唯一的原因是蘇聯的態度尙未確定，而希特勒自己的軍事準備尙未完成。戈培爾已經在兩星期以前，在但澤發表了一篇有煽動性的演說，講到日耳曼人受虐待的題目；這種日耳曼人被殘害的故事正在國外加緊宣傳。事後我曾偶而想到那次戈培爾的演說使羅馬方面大感憂慮，或許就是齊亞諾伯爵在八月間到薩爾斯堡訪問里賽特洛甫的緣由之一，這我以後將再行提及。逃入德國的難民人數漸漸增多，情緒已經開始被激動了。

在這種空氣之中，隨處不幸的意外事件在等待着，而且事實上也的確發生了。少數官吏的熱烈情形，往往越出了中央當局所指示的範圍。當雙方一起研究一個題目發表意見的時候，反對方面就有一種堅決的反駁，指出對方面的過失。這種不幸的事態大都是半斤八兩的爭執。德國人爲波蘭境內的一百多萬日耳曼人作權利要求，而波蘭方面說德國境內亦有同樣數目的波蘭人。雙方大概都有點過甚其詞，但是這一點無關重要，因爲雙方都有少數民族存在對方，這是毫無疑問的。在若干區域之內，例如西利西亞礦區，那裏用波蘭名字的人，有一大半是日耳曼人，反之，德國名字的人，有一大半是波蘭

人，他們已經混雜得難解難分。但是比較起來，我心中無疑地認為在波蘭的日耳曼人的不滿，在事實上更為嚴重。在德國的波蘭人大半是屬於勞工階級的，所以他們不易遭受德國的虐待，因為德國需要所有能招集的工人；至於在波蘭的日耳曼人大半或是地主，或是屬於中等階級的自由職業界，他們對於波蘭與其說有功勞，不如說遭嫉妬，還有最重要的一層：德國政府並非把那一批人當作日耳曼文化的先驅者使用，而是將他們當作德國實行干涉和統治的前哨。

七月初，我曾回倫敦幾天，料理私事，那時我警告本國政府，說戰雲正在聚集攪來。但是俄國仍舊是一塊使人顛躓的石頭。勞工和自由兩黨，還有保守黨的一部份人，都大聲高唱，犧牲任何代價和蘇聯訂立協定。他們公開地堅持這種主張，這徒然惹起史太林和莫洛托夫抬高他們所索的代價，我們總是好像在可以和蘇聯成立一個協定的前一夜，但是到了第二天，又有一些新的困難發生，必須設法度過。到了七月，在我看起來，英蘇談判已停頓得連一點外表上的樣子也沒有了。我至今仍相信從談判開始時起，莫斯科政府就沒有和我們成立一個協定的意思。莫斯科已經成爲一個東方的獨裁政治的寶座；蘇維埃政權的理想上的基礎，現在完全沒有了，而祇是一條詐計和一個迷想而已。史太林的唯一目標是要使德國爲西方的列強所擾亂，讓它們任何一方忍受痛苦代他效勞，

而他自己却得其實惠。

希特勒自己究竟從什麼時候起，開始和史大林談判，目前尚是一件煞費揣摩的問題。但是在希特勒四月二十八日所發表的一篇演說中，從前照例對蘇聯所講的有敵意的言語，已經沒有了；五月三日，國際聯盟蘇聯代表李維諾夫被免去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過了幾星期，一位蘇聯駐德新大使到任，受着德國非常殷勤地招待。以上這幾件事與往日大不相同，所以都是不尋常的巧合，自英波協定成立之後，蘇聯已經可以安心，全不以德國向她的侵略為慮，她可以不再顧慮她自己的安全，現在能夠專為她的本身利益設想了，由此看來，為什麼她不這樣做呢？

當初英國如果情願犧牲波羅的海的三個小中立國作一種交易，英蘇談判的結局或許要不問了。希特勒是不大思慮的，或者也許要輪到他受史大林的欺騙了。還有一點很重要，波蘭烏克蘭的居民中，正教的蘇聯人多於天主教的波蘭人，所以蘇聯以為與其讓他們成為德國取道波蘭向前擴展的誘餌，不如將他們劃歸蘇聯管轄。波羅的海諸國要劃分成四個小國，始終是一種可能的結局，假使莫斯科政府能夠恢復她在波羅的海諸國的勢力，並且在烏克蘭建立一道障礙物，阻礙德國向東方的壓迫，那麼德國便可再蒙想開西方法。俄國政策的最高目標如此，而且一定是始終如此，這些和其他同樣的考慮必定

一直不停地在蘇聯統治者的腦海中思索着。同時史太林個人也羨慕希特勒，或者羨慕墨他的成績，所以情願抄襲他跟着舉他的機會主義。

事實上，一切都不利於我們。同時建立和平陣線的談判，在倫敦與莫斯科之間進着，遙遙無結束之期。史太林也是正在研究棋局。就另一方面面言，但澤的緊急形勢，不但見鬆弛，而且事態反而愈來愈形緊張，但澤自由市的重新整頓軍隊正在急速進行中，德國人申辯說那種舉動完全是防禦性質，因為預料波蘭有進攻的可能，不過關於這方面的所謂安全措施，也同樣可利用作進攻的目的，這自然不免使波蘭人感覺驚惶。除此以外，還有別的理由，因為波蘭恐懼德政府會存心在那裏向波蘭作一次突然的打擊。那時各種軍火正在公棚地大量運到城中去，因此波蘭人不得不在此邊境上加派大批哨兵，以增強海關稽查員的力量。爲了報復起見，他們同時又採取了一些經濟上的措施，藉此使這自由市的貿易受到打擊。

一次可怕的爆發的要素都已俱備，祇缺少一個火花，便可以將和平打到天空中去了。我因爲完全明白這種局勢，在七月底就決定力求和希特勒有私人面談的機會。當時他在拜恩特城參加瓦格臬紀念會。我雖然是音樂的門外漢，但是我喜歡瓦格臬那個人。我在青年時代曾在德勒斯登城學習德文，那裏就是德國最好的歌劇團的產地。有一位戴爾

惠特先生（就是現在的柏納斯財爺，）和我同住在一個公寓裏。我由於心領神會，準備了「鈴曲」全都樂譜，一直未曾忘記。我在柏林時，曾兩次聽樂隊演奏全部「鈴曲」，所以我便將這件事當作託辭，在七月二十九日，動身到拜墨特去。結果就我此行的實在目的而言，完全徒勞奔波。我到那處去的途中，車子出了毛病，而且當我到那處時，曉得希特勒已經離開，去視察齊格弗里防線，並且正由里賓特洛甫陪伴着，一個不詳的結合。希特勒在我逗留拜墨特城的最後一日下午，回到那處，但是我祇在歌劇院中遠遠地望見他，我此行唯一的滿足，就是我聽到一次伐爾基萊名曲的名貴演奏，看見了幾位我個人的朋友，並且認識了齊格菲瓦格莫的英國籍太太。

雖然如此，如果希特勒真想和我談話，他必能做到的，因為他一定已得到了通知，曉得我在那裏了。但是他的遊藝節目中，沒有英和國大使會談一項，我相信當時他還不會決定選擇什麼當作他的下一步行動的適當藉口。他仍在注視着棋局，細細思索等對方走一着錯誤的棋子，或者盤算怎樣引誘對方作一失着。他的軍隊還要等一個月纔能夠準備好去攻擊人家，並且英法兩國的軍事集團正在預備動身到莫斯科去。至於希特勒自己與蘇聯的談判當時已達到什麼程度，當然我沒有說明的可能。但是他心中或許仍有點端端不安，恐怕史太林或許會欺騙他，就像他後來欺騙我們一樣。無論如何，德國的

軍隊那時還沒有完全動員，所以他仍延擱着時候，等候使他便於作最後決定的情況發生。

德國的技術完全和一九三八年間所用的一樣，在戰略上，主要的據點附近，德軍已在祕密地動員。所有萬一會發生的各種事件都經考慮過，爲應付每一種事件而定的計畫，已經都弄好了。如果希特勒所期待的有利的環境，不能實現，他總可以召集九月間的國社黨大會，來辯白他的存心，是無惡意的。那種環境如果實現，那末不論什麼時候需要，他便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製造一粒火星，把歐洲燃燒起來。他祇要向但澤議會說一句話，宣布自由市重行附屬德國，便可造成一個危急的局面。那年春季，他在無論何時就可以做這件事，在事實上他所以沒有如此做的緣故，或是因爲還猶豫不決，或者因爲他沒有準備好。

當時德國有三派人。第一派和希特勒一派人很疏遠，但可以代表民衆，主張一定要維持和平，並且仍舊希望希特勒的巫術，能夠使他不戰而達到目的。第二派的人，有着同樣的勢力，主張無論代價如何重大，非戰不可。他們信任德國的陸軍和空軍的威力，並且相信德國不會從西面遭到攻擊而受損傷。那一派人和希特勒最接近，時常催促他勇往直前，不必顧到結果，並且發表他們的見解，認爲英國在無論何種場合之下，必不會

戰，也不能戰。此外再有第三派的人，似乎確實相信英國的軍事準備，正在從容地進行中，其目的在應付一場預防性的戰爭。因此他們認爲一九三九年的戰爭，對於德國，比一九四〇年或一九四〇年以後的戰爭，較爲有利。我屢次聽見和希特勒最接近的一班人說，希特勒自己公然承認贊同這一派人的意見，這些自己有了基本意向的人，常有一種習慣將同樣的意向歸諸別人，希特勒不善理解而是一個經驗主義者，這誘使他告訴他的軍隊將領說，英國正在準備一場預防性的戰爭。那時他已經執意立刻開戰，要使他的軍隊將領成爲專心致志地附和他立刻戰爭的人，那種言語是最有效力的。後來事實證明，他那時或者大概始終有這種意思。

整個夏季中的德國宣傳，表現出後兩派人的相反見解。官方的報紙呼喊，德國被人包圍，這是爲着獲得所有德國人的支持。除此而外，不問他們的存心如何渴望和平，可是他們繼續不斷地向國外傳播，一方面說英國決不會爲但澤而開戰；另一方面說英國正在準備抓着她有利的第一個機會，便對德國開戰，其目的，在將德國未變成可怕之勢力，而成爲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勁敵以前，將她擊碎。兩種報告都巧妙地設計着，以達到希特勒的目的。前一種報告希望立刻得到效果，這樣的宣傳可暗中削弱波蘭人的信心，同時可動搖美國和諸較小的強國的信念，這是指英國有抵抗任何進一步侵略的決心的信

心和信念。第二種報告不但要克服軍事將領對於戰爭危險的躊躇猶豫之心，並且要預備在戰爭發生的時候，使德國人民深信希特勒不負戎首之責，而是一個嫉妒的英國逼他如此的，這宣傳現在正被運用着。這種手段最可以代表希特勒手段的圓滑，假使一件事表面上爲着達到一個目的，牠常能再有另一個目的，而且每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情，都有等着的，而且已準備好的結果。

戰雲正在迅速地推廣開去，那時法國也已經動員了，在達拉第領導下，全國團結在一起。英國亦在努力準備，她在七月中旬，宣佈艦隊的額外演習，將若干額外軍艦編入現役艦隊，並且召集了一批海軍後備人員。我們的根本意思是要使希特勒深信我們準備應戰。但是在表面上，里賓特洛甫似乎不會相信，他一直到底，仍繼續堅持英國決不會開戰。我說「表面上」是故意的，因爲我至今仍不相信里賓特洛甫會如此難治的愚笨，竟認真相信英國會不履行她的義務。他當時確實始終那樣的說，無論向希特勒或者向別人都一樣的。但是如果說他相信他自己所說的話，那我就不相信。

在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已經變得非常自尊自大，他竟將他的外交部長，稱做俾斯麥第二。他常向人說這句話；對於這句話，祇有里賓特洛甫本人最相信，爲着要使全世界相信這件事，必需要有一場戰爭。祇要能確實引起戰爭，任何手段是合理的。如果他對

希特勒說英國恐懼戰爭，而能藉此勸誘希特勒趨向極端，那是最好，可是或許希特勒不必勸誘就行。俾斯麥曾偽造伊姆斯的一封信報，煽動了一八七〇年的戰爭；里賓特洛甫要和俾斯麥競美的方法是向他的元首和同胞，對英國的意向，作一個偽造的估計。他在預定軍事行動開始之前不久，即拒絕給德國所擬解決但澤和波蘭走廊問題的提案，他的機謀和俾斯麥的手腕不是如出一轍嗎？他不是惟恐認真討論那些提案以後，戰爭或許會避免了嗎？我不能斷然這樣地說，因為所有的觀察祇是根據事實而已。但是我的猜想或許是對的，否則祇有一種可能，就是他除出他自己的意見之外，對於別人的意見，完全置之不理。戈林有一次對我說：「你討厭里賓特洛甫的地方，就在他的剛愎的態度罷。」我告訴那位上將，說剛愎和愚蠢有時是難分的。

至於希特勒本人，祇將英國海軍力量，認為是他磨坊中的積穀，當着有利於他的。他那時已經因為已往的成功，和他自身偉大而又不會失敗的信心，過份興奮，不管英國做了一些什麼事。我們的軍事準備祇加強他預防戰爭的理論。在另一方面，我們與日本在天津發生糾紛，和英國本土發生的炸彈暴行，無疑地使那些人向希特勒所說的英國不能參戰一篇話，更講得入情入理了。

如果你已經休戰了很久，而在休戰期間終止之時，沒有什麼表示，那末你將有再遭

戰爭之危險。狄斯萊里在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戰爭時，曾針對這事說過一些話。那話正可適用於七月底的情勢。自從三月份起，歐洲曾有一種半戰爭狀態，實際上等於一種休戰；但到七月間，我們已經迅速地趨向戰爭。八月四日，英國國會宣告開幕，七月份又過完了。

第十一章 第四幕 第二場：戰爭

在表面上，過去一月間的局勢很少變化，風雨表上顯示着「無變化」。不過氣壓有下降的預兆。在一方面柏林和華沙仍沒有開始商議，那駐柏林華沙的波蘭和德國大使都呆坐在大使館裏。而互相攻訐對方虐待少數民族的事件一天天的增加，同時但澤市更充滿了騷擾和激動，在另一方面倫敦巴黎和莫斯科間連續談判的結果，看來還是和以前一樣的遙遠沒有着落。英法軍事使節團那時的確在整裝赴莫斯科。當他們八月十一日離抵莫斯科的時候，很自然的，我們可以斷定，雖然史太林會爲蘇聯的利益作苦苦的爭執，可是最後的決心，還是和西歐強國合作，來阻止德國的侵略行爲。此外，還有一種擾亂世界的發展，就是莫斯科方面已毫無羞恥地露出馬腳來，要求能在巴爾幹半島諸國有自由行動的權力。

蘇聯的真正目的因此變得明顯了，有着德國秘密地夾在中間弄得這項交易大不利於英法。英法不能把獨立小國的尊嚴和自由來作交易，而德國是能夠的。我們希望蘇聯到底史太林是否一開始就和希特勒串通，故意延長他和我們的談判，到德國準備要動手的時候呢？還是德國和我們都是受他愚弄着呢？我自己傾向後者的觀察，不過這僅是一

種猜測，可算是我的偏見。從開始我就認為和蘇聯的談判是必須嘗試的，可是毫無實效。的可能性。我從未相信蘇聯會對波蘭作有效而肯利人的援助。我最大的希望只要蘇聯能夠參加和平陣綫，不管他是怎樣的不熱心，那也能使希特勒覺得勇敢的優美部份還是謹慎，而趨向於和平談判的，但我常相信莫斯科方面主要目的在使德國和西班牙陷入爭鬥中，結果大家毀滅，而自己却收漁翁之利。這一點，直到八月止，德國人自希特勒以下都有相同的認識，並且他們還在批評我們在蘇聯的談判哩。八月二十三日在貝特德新加登我遇見希特勒的時候，我向他提起這一點。在那天，里賓特洛甫正在莫斯科，參加簽訂蘇德協定的事情。希特勒對我詳細地誇稱這新協定的價值和利益，他說這是不變的並且永久的。我提醒他以前對蘇維埃的態度；並表示我的意見，就是他也許會發覺蘇聯的友誼比他的敵視更要危險，又以完全私人資格及根據純粹道德的立場對他說；如果要和蘇聯訂一個協定，我倒寧願是德國而不是我們；在蘇聯，現在共產主義僅是極端國家主義的外套，他們的最後動向，我以為很可懷疑的。希特勒聽了一時露出紛亂失驚的態度。接着他機敏的反辯，說這都是我們的錯誤，是我們驅使他投入蘇聯的懷抱的。但是這不過是一個想原諒自己的回答罷了。

柏林華沙間的沉默，和我們在莫斯科談話的缺乏進展，一切都不僅顯示風雨表會突

然迅速下降而已。除了但澤情形更趨惡劣，德軍軍隊已很快接近於完成動員前的準備了。現在至多再有三四天，就可完全走入戰時狀態了。八月二十七日的坦能堡慶祝會的籌備正在有秩序的進行着，人員和物品都繼續東移，經由可尼堡運到東普魯士。希特勒不久便能自己選擇適當時間來造成那危機，我也比以前更可斷定，八月的最後一週就是最後的一刻。貝克上校在那時諮詢英法政府，在九月間的紐倫堡大會，擬以何種訓令給與英法大使，波蘭駐德大使已處極難兩可不明的地位，他說將叫他贊同英法大使所採取的行動。當外交部在徵求我的意見時，我的回答是到底一九三九年的紐倫堡大會，是否能夠如期舉行，還不一定，假如我們能平安到達九月，那我當然毫無猶豫地最低限度也要參加那個慶祝的。但是我們能否平安地達到九月呢？這就是我那時唯一的考慮。

如大家所知道的，希特勒要親自出席坦能堡週年紀念，並發表演說，我又怕他利用那個機會來發動危機，所以我竭力想在這次演說裏找出一些他的圖謀，我找不出什麼，而且實際上，我大概觀察錯誤了；希特勒的行動是不會依照一次演說而定的。坦能堡的週年紀念，不過是對波蘭軍事準備的掩飾；恰好像三月裏維也納週年紀念的軍事被閱，是他進擊布拉格前的掩飾一樣。他的方法，在原則上，是永遠不變的。在一種假是而非的託辭背後，希特勒不過多一次地準備各種事變，而在等待適當時機發動進攻罷了。

他等待着每件事的來臨。在等待的時候，他就在那處策畫，這是最適合於他的性格和他的奧國人特質的手段，尤其因為應付任何事變的計劃準備在德國陸軍部和航空部，只要希特勒最後決定發動，立刻會迅速地實行的。一切只等希特勒按電鈕罷了。

戰雲真的很快地聚攏來，暴風雨的第一個雷聲在八月四日可以聽到。英國議會延期那天，在但澤東普魯士的邊界上四個地方的波蘭海關稽查員接到通知，說他們以後不准再進行他們的職務。正在驚恐着波蘭在「自由市」的權利逐漸被剝削，波蘭公使立刻接到調令，把一件公文交給但澤議會，警告他們倘使稽查員的工作受到干涉，波蘭政府將以強硬態度對付。但澤議會因此否認發過關於阻止檢查的任何正式通令，但是德國政府乘此機會說這是波蘭的真的美教書，就以一個嚴厲的口頭照會送給華沙，這是由外交部次長在八月九日交給駐柏林波蘭公使的。那照會警告波蘭政府，倘再以任何書寫的或書信或含有報復恐嚇性的照會交給自由市，將立刻引起波蘭關係的嚴重化，這種責任是要波蘭政府擔負的。第二天就來了一個反駁，波蘭政府以同樣口頭照會答覆，否認德國有合法權利。來干涉波蘭與自由市間的事情，而反轉來警告德國政府：「任何未來的干涉，凡損害波蘭在但澤的權利的，都將認為是一種侵略的行爲」。

無疑的，這最後一句話正是希特勒所需要的一種藉口，使他未來的行動，在他自己

和他的人民眼光中看來變爲合法。在他這是一次賣弄他生事的手段來達到他的目的。八月四日，波蘭給但澤議會的照會引起八月九日德國給波蘭政府的有挑戰性的口頭照會。八月十日波蘭的答覆，特別是上面有括弧的那句話，給希特勒一個必不可免的思想戰的動機。直到口頭照會的那一星期，德國第一號公敵仍舊是英國和她所採取的包圍政策。從那天起波蘭的殘暴故事和德國的尊嚴的鼓吹開始在德國報紙上佔據重要的地位了。

一九三八年捷克虐待日耳曼少數民族的故事，差不多一字不改的重新用來描寫波蘭人了。爲着使兩國人民間有激憤緊張的情形，這種故事一定要有些事實根據。在一般人民和少數官員方面，也無疑的有一種過度的熱烈——所以虐待，沒收財產，圍剿和照樣的故事都一百倍的誇張。希特勒自己對於這種故事到底相信到多少程度，旁人也祇能猜測一下罷了。德國人是很容易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任何事情的。當然他會照他相信的而起一種行動，就是有人義務地給他一種懷疑的勸告，也只能煽動他的憤恨之火，而達到他的急進派所要的程度罷了。

里賓特洛甫，戈培爾，希特勒及其同黨的惡勢力是無庸再誇張了。這種勢力總是不幸的，並不是因爲牠有提議的功能，（因爲政策是希特勒一人就可以決定的）也並不是因爲牠有稱讚與鼓勵，而是因爲倘使希特勒表示猶豫不決，這黨的急進派會立刻進行捏造

情報騙使 he 到那種 he 有時也似乎不敢冒險的路上去。做這事情最簡單的方法，是利用一種被機關的報紙作工具。這樣在去年九月慕尼黑協定之前所經過的事情，在三月佔領布拉格之前又重演了一遍，在今年八月進攻波蘭之前又重演了一遍，戈培爾博士的宣傳機關是這些急進派的現成工具，他們恐怕希特勒在追求他自己的最後計劃中行動得太慢，所以到八月十七日報紙上的反波運動已經到最高度了。

不過在那天以前，在不同方面，有兩次嘗試以求挽回這個危局。第一，在德波激烈交挑照會中間，但澤市國聯特派委員勃克哈脫氏覺得事情危急，所以飛到貝爾維爾加登鎮作最後努力，想把自由市放在比較滿意一些的地位上。他於八月十一會見希特勒。希特勒是不妥協的，但是當時態度含糊。他那時還沒有知道八月十四波蘭答覆的內容，那答覆是在那天纔送到柏林外交部的，否則他的態度一定還強硬了。他還猶豫不決，因為常他接見勃克哈脫時他正在等候薩爾斯堡附近舉行的一個會議的消息，那會議是他的外交部長和他的盟友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長所舉行的。

如我很早就提起過的，六月底戈培爾在但澤發表的政治演說的恐嚇語氣早已使義大利政府有所不安。墨索里尼先生在一九三八年中的慕尼黑談判，對於保持和平的貢獻很大，他想在一九三九年從事做一個同樣的工作。他就是我上面說在八月間嘗試挽回危局

的第二個人；而他還想在九月到來的時候作一次最後的嘗試。他一定感覺到歐洲正在移向戰爭，除非立刻進行阻止，那議題也可能被牽入漩渦。他因此派遣他外交部長齊亞諾到里賓特洛甫新買的近薩爾斯堡的巨廈裏去會見他。

齊亞諾於八月十一日會見里賓特洛甫，同日勃克哈脫也在約有三十哩外的許貝德新加登訪謁希特勒。似乎很可能的，齊亞諾在那裏提議召開一種國際會議，始在九月中所做的一樣。十天以前希特勒或許難以拒絕接受這樣一個提議，而加以慎重考慮。但是要重提一次，希臘希臘主題的命運和希特勒的責任便可分別得極為明顯。在但澤與德的柏林華沙間的照會，就在齊亞諾訪問的那天晚上互相酸澀地交換的。齊亞諾在八月十一日和里賓特洛甫會面之後，八月十二日再和希特勒親自會面。那時希特勒已經讀過八月十日的波蘭口頭照會，於是能夠表演一幕戲，做出一種被觸怒的當事人控訴的樣子來。他也有理由拒絕接受任何國際會議的提議。齊亞諾的從中調停的嘗試因此失敗了，他回環義大利，而義國駐柏林大使也急速地被召回到羅馬。墨索里尼不能夠阻止希特勒要演波蘭的計劃，但是他至少不至於使義大利自動地站在德國方面加入戰爭。

希特勒的謹慎維持的耐性，實際上現已經沒有了。我在八月十八日打一個電報給哈里法克斯勳爵：說我已經得到一個確定的結論，假如要維持和平，那末現在的局勢不能

夠再讓它繼續下去，而唯一消除方法，一定要有一種迅速的罷停的行動。關於這事情我又把以前說過的建議重新提出來——就是英國首相須要寫一封私人信給希特勒，從倫敦差一個使者送到柏林來。兩天之後，我又發了一個同樣性質的電報，而且說我相信希特勒現在已經最後決定採取某種立刻的行動，或許會阻止電報的發出。我指出在坦能堡週年紀念名目的掩護下，在東普魯士德國已有布置來求增加她的兵力，同時表明我憂慮這個慶祝或將成爲希特勒所預先籌劃的行動的起點。我相信這是希特勒的本來預備的計劃。幾天之後，我真的得到切實報告，說早已預定但很小心隱藏着的德蘭軍事集中已在進行了，而希特勒已發出命令，要在八月二十四日調動完成。有一個消息特別指出八月二十五日爲德國進攻波蘭決定的日期。我相信這些命令確乎是希特勒簽字的。

無疑的，事實上，那時候非但德國的軍事準備已足夠使希特勒發動戰爭。而且他現在能夠確實認爲蘇聯會容忍他對波蘭卑劣的計劃。究竟希特勒確定在那一天動手，這些顯然是我們最有興味的幾點之一，當然將來歷史會告訴我們的。除此還有他付給蘇聯精神上及物質上的代價，到底有多少。無論如何對於世界其他各國，最後炸彈在八月二十一日黃昏爆發的。蘇聯不侵犯協定的簽訂已經結束了他們的談判，里賓特洛甫將於八月二十三日飛往莫斯科簽字了。這個祕密，德國方面知道的人不過寥寥幾個，被保守得

很謹慎。

這在柏林的第一個印象是一種極大的安慰，一部份是因為可怕的蘇聯的空中威脅取消了，但是更特別因為人民的心裏由於戈培爾的宣傳，已相信英國和蘇聯的談判實在是一種以預防戰爭為目的的包圍，蘇德不侵犯協定的結果就是和平得到保證，因為英國沒有蘇聯的幫助，據說是不會為一個但澤或波蘭而作戰的。德國人民這是以一次相信他們的領袖不用戰爭而達到目的的才能。然而這種的滿意是暫時的，當他們發覺英國對於波蘭的諾言並不決定於蘇聯的援助，他們感到了很大的欺騙。那些為納粹主義而對共產主義鬥爭過的人們對於這個完全變更，更覺莫明其妙。純種族的納粹原理是在三月裏拋棄的，到八月裏他的第二個基本原則——就是反共產主義——也同樣地被拋棄到廢物堆去了。對於大多數德人，蘇聯是他們傳統的老敵人，蘇聯對西歐民主國家的不忠實，也不能使他們對蘇聯的信任增強起來。不過當時是一種外交上猝然的打擊，那蘇德協定是非常成功而且使人驚奇的。這種外交上的勝利或許對於雙方都是得不償失的。

當里賓特洛甫預備飛往莫斯科的時候，我在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九時前一刻，接獲命令，立刻把一封首相的私人信交給希特勒。那時外交部次長正在飛機場送里賓特洛甫赴莫斯科，但是我設法和赫基爾洽，他是總司令部裏外交部與希特勒之間的連絡官員。他

同情我們而且願意幫助我們，那天黃昏，我和魏薩寇本人碰見了。在那天晚上，通了幾次電話之後，決定次日我到貝許德斯加登鎮去會希特勒。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九點半，我和魏薩寇赫惠兩人乘了外交部所預備的一架飛機，離開柏林。在短短二小時行程的路上，我又一次地感覺到希臘的悲劇的特點，一星期以前我的使命或許有點希望，但是現在整個情形都因蘇德協定而改變了。

我抵達薩爾斯堡大概已是中午，下午一時在貝許德斯加登鎮和希特勒作第一次會談，魏薩寇和赫惠也在旁邊，為參照起見，我把首相的信和希特勒的答覆，附在書末作為附錄(一)和(二)。

首相信中的三個要點是：(一)堅持英政府實踐對波蘭責任的決心，(二)尚能造成和平空氣，則準備討論我們兩國能爭執的問題，(三)在休戰的期間，英政府願望德波兩國立時直接開始談判關於互相處置少數民族的問題。希特勒的答覆和我所預料的一樣，不受調解。他說英國幫助波蘭的決心不能變更他在八月九日送交波政府的口頭照會中所表明的政策，他預備接受即使一個長期戰爭，而不願犧牲德國的利益和尊嚴，並且倘使英國堅持着他自己的計劃，那末他要立刻發出命令動員全部德國力量。

在我第一次會見他的那天，希特勒是在一種極端激怒的情形之下。他對於波蘭及英

國對波蘭態度負責任的言辭是很激烈，抱怨而且誇張的。舉個例子，他說從波蘭逃來的德國難民有十萬人——這個數目至少比實在的多五倍。我可不能說出到底是別人使他相信，還是他自己使他相信這數目的，當他把他的答覆交給我的第二次面會中，他已經恢復了他的鎮靜，但是仍舊很固執。每一件事都是英國的錯誤。英國去年鼓勵捷克，現在又給波蘭一張空頭支票。他告訴我他已經不再相信張伯倫先生了。他說願意在他五十歲時有戰爭，比五十五歲或者六十歲有戰爭還好。他自己常常想而且相信和英國的友誼的可能性。他說他現在覺得反對這個意見的人是對的，除了英國對德國政策完全改變之外，沒有事情可以使他相信英國需要改善邦交的誠意。我最後對他說，我只能從他的談話中，知道我來德國的使命已經失敗，對此表示不勝遺憾。

當天黃昏時候，我從貝許德斯加登鎮飛返柏林。在事實上，我認爲首相的信，或是我對希特勒的談話不論說得怎樣爽直坦白，都很少希望能使他停止行動，我覺得在他目光中，蘇德協定造成了一個有利於他的時刻的局勢，而且我相信他心中已有決定。他雖然說他也有藝術的興趣，而且有滿足這種興趣的慾望，不過我得到一個印象：上次大戰中的下級軍官，更希望能在下次大戰中證明他當一個勝利的總司令，那他的成就該是多麼偉大。祇要滿足他做德國領袖能有大作爲的慾望，那末世界各國或者德國自身將受到

怎樣痛苦，他是不顧的。他屢次對我說，倘使他在一九一四年做德國總理，那末德國決不至於在一九一八年失敗的，

可是到貝爾德新加登鎮的訪問，無論如何把危機延長了一個星期。里賓特洛甫帶着簽過字的蘇德協定飛返德國，於是希特勒在八月二十四日晚上回到柏林。我上面說過我有理由相信——雖然不能夠證實——德軍進入波蘭的命令，實在是八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間晚上發出的。要不然就不易尋出二十六，二十七實行各種命令和調動的解脫了。在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柏林與倫敦巴黎之間的電話交通突然斷絕了幾個鐘頭。二十六日埃能堡的慶祝會和二十七日紐倫堡的國社黨大會都取消了。所有駐柏林大使館中的海陸空軍武官，沒有陸軍部預先的允許，都不許離開柏林。所有德國航空站從八月二十六日起都封閉了，整個德國除了幾條普通航線之外，變成一個禁止一切飛行的區域。所有德國航空的業務都已停止。還有自二十七日起，食糧及其他貨品都開始實行統制了。我們很難解說，為什麼這個使民衆不樂的制度在開戰之前就實行，除非我們假定這戰爭實際上已在八月二十六日爆發了。

照我所猜想，實在希特勒在接到首相的信以後，或許曾有一度最後的猶豫，想取消他發給軍隊的命令。可是其他準備仍照樣進行無阻。但這並不是戰爭的恐怖或者德人的

死亡使他延遲的。他對於他重建的偉大陸空軍有無限的信心，他當然不反對拿破波爾來作一次試驗。他告訴我兩月之內可以結束東部戰事，他再說那時倘使英國真的不識相來反對他的計劃，那末他可以調動一百六十師兵來對付西線。他的猶豫還是因為想作一次最後努力使英國脫離波爾罷了。正如所想像的，我在二十五日十二點三刻鐘左右接到了一個通知，說希特勒願意於一點半鐘在元首府裏接見我。在那次談話中，他給我一個口頭照會。

簡單的說，希特勒的建議包括兩個問題：（一）解決德波爭端的急切需要，（二）爲英親善或同盟問題的最後提議。我和希特勒的那次會談，里賓特洛甫和希特勒也在場，談話繼續到一小時以上。希特勒說話平靜而似乎有誠意。他說他的建議是爲良心所驅使，用最後努力以求和英國友善的關係，他提議要我親自帶了他的建議書乘到倫敦去。我告訴他，我雖然極準備考慮這件事情，不過覺得這是我的責任，我應該明白地告訴他，英國決不能夠失信於對波蘭的諾言，同時不論我們多麼切望和德國有一種更好的諒解，可是我們永不能到達這地步，除非有了和波蘭和平解決的基本條件。

不論希特勒這個最後姿態背後的動機如何，我總不能置之不理，所以我得到了哈里法克期的允許，於次日（八月二十六日）清晨乘了一架特爲我預備的德國飛機到倫敦。英

政府把希特勒的書信仔細鄭重考慮了兩天，在二十八日下午，我帶了英政府覆文飛返柏林。在那覆文裏，英政府重申對波蘭的義務，說明波蘭政府準備進行談判，覓取一個爭端的合理解決，只須安全保證波蘭的重要利益和最後談判結果實行時的國際擔保爲基礎。英政府因此提議第二步就應該根據這個原則，開始波德兩政府的直接談判；同時採取立即實行的步驟。除了處理少數民族事件的緊張形勢，更有英政府願意用所有她的力量幫助德波達到一個兩方面都滿意的解決方法。他們希望那樣一來，能夠得到一個英德兩國所願意的更進一步和更完全的互相諒解。末了，提起軍備的限制之後，英政府指出說波蘭問題的公平解決或許可以展開世界和平之路，倘不能解決那末我們兩國開進一步諒解的希望要破滅了，而且也許會使全世界陷入戰爭。

還有比這個更精確或更爽直的答案嗎？希特勒要避免戰爭的禍患是容易的，如果他真的願意這樣做的話。以上已可使他有很明顯的抉擇；一方面是和波蘭談判，那我們保證他們達到一個雙方滿意的解決；另一方面是戰爭，要是德國攻擊波蘭，那我們是站在波蘭方面作戰的。這是最後的機會，但是有了蘇聯的容許，除了波蘭被第四次分割以外，沒有什麼可以滿足希特勒的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仍不明白爲什麼他把他的使路從八月二十六日延遲到九月一日。他於八月二十五日交給我們的建議書的真正背後的動

構到底是什麼？他從英政府接到最和善的可能有的答覆，可是他的計劃絲毫沒有更改。那末他爲什麼要提出這些建議呢？是不是他想到戰爭，本館上會有一個最後的猶豫嗎？或者是不是想欺騙他德國人民，使他們相信他已經努力作最後的避免戰爭的工作了嗎？

不過在繼續敘述在八月二十八日黃昏我返柏林之後所經過的事情以前，必須要把在我離德返倫敦的時期中所發生的事情，大略地記載一下。在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點鐘，希特勒接見法國大使，交給他一封轉致達拉第的信。大意是告訴法國，說德國和法國並無爭執，叫他不要再幫助波蘭。這是最後一次的嘗試，想分化法國和英波。結果接到法國政府一封嚴正的覆文，是在兩天以後公佈的。這時候教皇和美國總統都向德波政府及其他國家呼籲和平。他們雖然從波荷政府得到善意的答覆，可是德國却沒有給他一些考慮。八月二十五日晚上，英波協定已在倫敦簽字。雖然談判已經進行了幾個月，這協定的簽訂却激怒了希特勒，起初他以爲這竟是英政府對他的建議書的答覆。他的立刻報復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早晨宣佈任命福斯脫爲但澤市市長。同時德軍對波蘭的軍隊集中，已到最後階段。

在等待我遞送英政府答覆到柏林來的兩天內平靜無事。我於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離開倫敦，那晚十點半鐘希特勒在元首府接見我，我把英國覆文連同德文譯本交給他。

希特勒是又一次的很和善而有理性。他並沒有對我帶給他的答覆表示不滿意。不過他說他須要鄭重研究一下，明天給我當面答覆。我們的會談延長到一小時以上，我動身返大使館的時候，差不多快午夜了。我想這是我與希特勒的會談的唯一的一次，是我說話比他說得多。大概就因為這個原因，開戰後所印行的德國白皮書裏沒有這一次談話的記載，我用種種言論，想使他見到真理，走向和平這邊來。我指出這選擇權是在他的手裏。和平談判就是英國的友誼，這是他常常告訴我是他所希望的，在另外一方面侵略波蘭的行爲，就是戰爭。我甚至於摘出一本我碰巧知道他也讀過的書中的一段話，就是關於昔日英德並肩抵抗拿破崙，和德國那時所抱的對尊嚴和諾言的觀念的故事來打動他的情感。當勃魯契急速地進兵滑鐵盧援救惠靈頓的時候，他用下面幾句話鼓勵他的疲乏的軍隊，他說：「前進！我的孩子們！前進！我已經答允我的兄弟惠靈頓了，你們不能夠要我失約」。後來這個老元帥在英國和在德國一樣，大家叫他「前進將軍。我把這個故事提醒希特勒。他也許已暫時的受了感動，但是這也無所裨益。

我碰着就提一提那一天晚上，和次日晚上我再見希特勒而接到他復文的時候，所有的情況都是在增進或者想使我感受到局勢的嚴重。從大使館到元首府不過三四百碼，但是因爲柏林正在進行一星期的燈火管制演習，那威廉街是完全黑暗的，一羣相當多的，

可是沒有動靜的羣衆聚集在我的汽車進入的元首府門口對面的廣場上。他們雖然沉默着，但並不給我仇視的感覺。直到悲愁的最後一刻，柏林民衆仍舊保持原有的態度。一隊儀仗兵在場上，一直排列到正門的右面，在鼓聲中撲我進去。梅思內和布羅克納，希特勒的親信和衛士在門口迎接我。梅氏對我說，他非常高興看見我鈕扣上插上了一朵花。我在柏林除了慕尼黑協定之前那星期中三天緊張的日子之外，老是戴着一朵深紅色的石竹花。當我那星期裏在坦坡羅甫途威爾遜路倫敦的時候，有幾個德國新聞記者問我爲什麼忘記插鈕花。我告訴他們我並沒有忘記，但是我以爲在這種嚴重關頭，是不大適宜的。這個故事傳佈開去。現在我認爲梅思納的話是有意義的。是不是希特勒早已預料英政府的答案是什麼？但是這大概不過是梅思納自己的希望或預料罷了。我次日仍舊插着石竹花，但是那次，當我有面後離去的時候，我對梅思納說，恐怕以後不再在德國插花了。雖然那第一天晚上我從英政府帶來的覆文使希特勒如此容易避免戰爭，所以我仍舊能夠向好處希望。雖則那次他沒有允許，可是他的態度是平靜而且和氣的。

次日我正在進行之際，接到一個消息，表示希特勒方面有準備和波蘭直接談判的傾向和預示的徵象。所以八月二十九日晚上七點一刻我再被召入元首府去的時候，我沒有什麼準備。或者我應該準備的，因爲德國午報已經登載六個德僑在波蘭國內被謀殺的消

息，這個故事大概是急進派恐怕希特勒軟化而捏造的，還有波蘭總動員的新聞，正是最適宜於使他決定的東西。當他把他所應許給我的覆文交給我的時候，不論怎樣，我立刻覺得在希特勒方面有一種比較前夜更強硬的態度。

那覆文裏，宣佈的要求是修正凡爾賽條約，把但澤和走廊歸還德國，並且保障在波蘭日耳曼少數民族的生命安全。對英國建議的德波直接談判和履行所有協定的國際保證的覆文說：第一，德政府雖然懷疑這建議有成功的希望，仍接受和波蘭的直接談判，可全不是爲着要得到英國的友誼而如此的。第二，關於領土的任何變動，德國在不會取得蘇聯的同意之前，無論如何不能參加或進行。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看着我細心地讀那篇覆文。雖然我看到那句不祥的牽涉到莫斯科的話我也不作任何評語，直到我看末了。一句話說：「德國政府信賴着明天，星期三，八月三十日波蘭全權代表的光臨柏林。」我就指給希特勒看，這句德文話讀出來有些像英文的宣佈最後通牒。('hatte den Kia ng eines Ultimatus, 的聲音很像 'had declared an ultimatum,') 他對於這層竭力鄭重否認，里賓特洛甫也幫他說，這是以前戈德斯堡的「筆錄」和「備忘錄」故事的重現。據希特勒的意思這話不過着重情勢的迫切，因爲兩個已動員的互相對峙的軍隊有發生事變的危險，同時又因爲德國人民正在波蘭被屠殺。接着，希特勒就說我不關心到底有

多少德國人在波蘭被屠殺。這個對於英政府和我自己的人道主義的無根據的非難，引起我激烈的反駁，所以後來會談就變成一種爭鬧的性質。不過末了希特勒用很簡短，但我以為很忠實的言辭——這是因為他那時情感的流露——來表明他真正在不斷地努力想得到英國的友誼，以及他對英帝國的尊敬和他對一般英國人民的愛好。

希特勒常提到說他願意得到和英國的親善關係，並不是矯飾，我想他和多數德人一樣，讚嘆英國民族却妬羨他們的成就，並恨他們反對德國過分的渴望。說他竭力討好英國也並不過誇，一則因為英國是代表貴族政體和諾迪克種族中的最成功的國家，二則因為英國是對於他的日耳曼統治歐洲的遠大計畫的唯一危險障礙物。這一點已經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表示得很明顯，所以雖然他常認為從英國方面受到不斷的拒絕，他還是堅持他的努力到最後一刻。本性是一個奇怪的創造物，而希特勒的性質是深謀遠慮，和因仇恨而生的粗暴而擅專衝動的混合物。前者驅使他尋求英國的友誼，結果後者驅使他陷入戰爭。而且他相信他的仇恨是完全有理由的。他沒有發覺為什麼他的軍警專制行為，和英國的個人與民族的自由的理想是互相衝突的；或者為什麼不允許他在中歐東歐有自由行動，以壓服較小的國家和他認為較低劣的民族，使他們服從德國的管轄和文化。在他的遠大計劃中，他相信他能夠用和英國同盟及保證英帝國的條件，來買得英國的允諾

·這種預先的允諾，對他野心的成功，是必不可少，所以他不斷地想得到它。他的大錯誤是他完全不能明瞭固有的英國對於道德，人道，和自由的觀念。

那天晚上，我離開元首府，充滿了憂愁的預覺。希特勒雖然屢次說希望得到英國的友誼，但是已經堅持說他不願意因為這個緣故，犧牲他所謂德國重大的利益。當我提出反對限制波蘭全權大使抵達的時間，他已明顯地表示這是因為他的總參謀部急需一個決定。他說：我的兵士正在問我「戰」還是「不戰」他的陸軍和他的空軍，自八月二十五日起已準備動手了。他們在告訴他一個星期已經失去了，他們不能再失去第二個星期，否則波蘭的雨季會幫助他們的敵人。當我在回到我的車子的路上，經過等候室，那裏擠滿了陸軍官員，凱脫爾和勃勞希茨也在內。在那裏遇見他們也不能減少我的恐懼——我已經問過希特勒他所說的德國重大的利益到底是什麼。他對我提到他的覆文，那覆文說德政府將立刻擬出幾個他們自己能夠接受的建議，來解決波蘭問題，而將在波蘭和蘇代表到達之前，把這些建議送給英政府。

因此一切須取決於兩件事情：一件就是這些建議的性質，另一件是波蘭政府答應立刻派一位和議或全權代表到柏林來。第一件事我無能為力，但是總盡力完成第二件事，那天晚上我就請波蘭大使在我起草給倫敦的電報的時候來看我，告訴他，德國的答覆和

我與希特勒的會談，而且還使他知道必須立刻進行。我素來知道波蘭的力量，祇能在一個短時期抵抗一下德國的高度機械化軍隊和優越的空軍。我把這個意見告訴波蘭大使，我請求他爲波蘭自己的利益，催促他的政府立刻派遣一位代表到柏林談判。但是我也講明白這些是什麼意思，於是同時我打電報給哈里法克斯，說希特勒已決心要達到他的目的，如果武力示威不成功，就要武力解決了。我又說：「這結果一定是戰爭，否則希特勒會不戰而得到勝利，結果也是鼓勵他明年後年再來重演一次。」

英政府立刻答覆八月二十九日的德國照會，八月三十日清晨上午四時，我已經把一個臨時覆文遞交德外交部，那覆文說英國要慎重考慮德國照會，但是事實上英政府不可能在二十四小時內請一位波蘭代表到柏林來，所以德政府應該不要堅持這點才行。

後來就在那天又接到三封公文遞交德政府。第一封是首相私人給希特勒的，通知他英國政府最近對華沙建議避免邊界上起衝突，請求德國也採取同樣預防（在那天下午我就把這信附在給外交部長的私人信內送去。）第二封是同樣地通知德政府，我們已經通告波蘭約束行動，請德國方面也取同樣約束。第三封指出德國要求波蘭全權代表必須到柏林來接受德國的建議，是不合理的，並提議德國政府應該依照平常手續，邀請波蘭大使，把德國建議書交他轉給華沙，同時準備談判事宜。這個最末的照會也提議德政府說

已經允許把詳細的建議書送交英政府，英政府倘認為建議書有合理根據，那末他們願意在華沙盡力助成談判。英政府的友善企圖，事實上已非常明顯，如果希特勒真誠的需要或願意有和平解決的話，所必要達到和平的處置，看來已完全準備好了。

我預定在下午十一點半，去看德外交部長，並給他那些照會。在預定時間前一週，我接到英政府對八月二十九日德照會的覆文的密電。我不得已請求把會見里賓特洛甫的時間，延遲半小時，來把這覆文譯出來。在那覆文的結尾一段中，英政府完全承認有迅速談判的必要，更請求在談判期內，兩方面都沒有侵略的軍事行動。他們還進一步來承相情能夠從波政府獲得這個允諾，如果德政府願意給同樣的保證。他們又提議在但澤訂立臨時協議，以免發生事變，使德波關係更加困難。

我在正午夜的時候去見里賓特洛甫，在這小時以前，德政府公然預料波蘭代表一定會到達柏林。我說：「公然」，因為希特勒波蘭全權代表在他沒有預先知道談判的建議的基本原則之前，就到柏林來，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希特勒或者他的外交部長，決不能達到這目的。陸軍軍官們告訴他們的領袖，說僅僅二十四小時的就擱就有危險，叫惡劣氣候妨礙德軍進佔波蘭的速度。但是縱使這樣，照現在所發生的事情看來，我們不得不來一個結論，就是由他的欺騙行為看來，所謂建議書也不過是一種灌入世界眼目的灰沙罷了。

，就是德政府本身也沒有慎重地當做一回事。

如事實所表現的，希特勒在決定戰爭或和平的時候，大概脾氣是不很好的。這可以從里賓特洛甫處反映出來，他那晚上對我的態度開始就是一種深的仇恨，當我把每一件照會給他知道的時候，那仇恨更加增進了。他激動地繼續跳着腳，把手臂交叉着抱在胸前，問我還有什麼話說。我繼續回答說還有，倘使我的態度和他一樣不客氣，我只能老實說我是有充分理由的。當我告訴他我一定把他的言語和批評報告英政府的時候，他的態度略為平靜一點，並說這些話是他私人的批評，一切都由希特勒來決定。至於談到邀請波蘭大使來看他，他憤激地說，這件事是絕對不必考慮，也沒有商量餘地。

在我把各件照會通知他以後，他拿出一篇長的文件來，用德文讀給我聽，或者寧可說他是儘可能的喃喃地念過一遍，並且聲音表示出極端輕視和煩惱。在十六條之中，我祇能收集到六七條的大意，我相信若是不用心讀一遍原文，就不能担保明瞭這幾條相當準確的意義。當他讀完之後，我接着請求他讓我自己讀一遍。里賓特洛甫常常把粗暴當做力量，他堅決地拒絕我，帶着一種輕視的姿態，把文件丟到桌子上。並且他說既然波蘭代表沒有在午夜以前趕到柏林，這些建議已經過期了，照這樣看來，我以為八月二十九日德國照會上的那句話，就是前一天晚上我請他和希特勒所注意的那句話，不管他們

必然的否認，總之是宣佈哀的美敦書罷了。里賓特洛甫却回答說哀的美敦書不過是我自己幻想造出來的無稽之談。

我不希望再加重這一次會談不歡的程度。談到那時候，局勢已非常緊張，由里賓特洛甫的急躁也可以看出來的。我以為他任意地拋棄和平解決的最後機會，在面臨那種危難的時候，也不容易保持鎮靜，我仍舊相信，像那時一樣地相信，里賓特洛甫那天晚上的易怒和惡劣態度，一部份是因為他猜疑我有意延到午夜才去看他的，——就是等到那哀的美敦書限定波蘭全權代表到達柏林的時刻，雖然他和希特勒都對我擔保說那不是哀的美敦書。可是八月二十九日的德國廣播會說過他們的建議倘使可能的話，也許可以在波蘭代表抵達之前送到英國政府。那天為什麼里賓特洛甫在假作讀給我聽前一直要等到午夜以後？而且他為什麼還不肯交給我呢？就是希特勒也不見得真的會希望波蘭政府派遣一個代表來討論他們全然不知的建議的。是不是里賓特洛甫和他的主人不願意把建議交給波蘭政府，因為怕他們真的同意談判嗎？這是我們能從這一段事實所得到的唯一的結論，因為倘使波政府聽得這些德國建議的正式內容，那末次日給李柏斯基的訓令是要完全不問的了。那些建議，從表面上看來，也並不是不合理，而且可以作為談判的基礎的。那就是為何我們祇能斷定里賓特洛甫不願意討論它們，而他那天晚上的態度不獨是

無禮而且也是失信。他竭力想用歪曲事實來隱藏他的失信。

在次日晚上，魏薩寇所交給我的包括這些提議原文的照會裏，說里賓特洛甫已經乘收取上一次的英國照會的機會，把作為談判基礎的德國建議，確切通知英國大使了。德國白皮書說明戰爭原因的一段亦重述這種與事實完全不符的話。實則所有該備忘錄中的各點，都沒有討論過。誰要想明瞭里賓特洛甫所稱的「確切通知」，可以讀過建議書的英文翻譯本，讓他們自己想像這篇建議書，如果用德文讀起來而且讀得這樣快，簡直用任何一種言語來讀都不會聽懂的。難道里賓特洛甫這樣看重我的記憶力，以為我聽了他的喃喃字句之後，能夠把這一篇長而複雜的文章的全部準確意義，報告給英政府或者波蘭政府？但是里賓特洛甫竟稱為「確切通知」關於這樣一件戰爭或和平依賴着的重要文件，是不僅須要讀，而且須要十分謹慎地研究的。

那天夜裏我回到英大使館，確信和平的最後希望已經消滅了。可是我還在那夜二點鐘去看波蘭大使，並將我和里賓特洛甫的會談給他一個客觀的緩和報告，告訴他但澤的割讓和走廊的公民投票是德國建議中的兩個要點，照我看來也並不完全過分不合理；又勸告他請求政府立刻提議史密格里立茲元帥和戈林會晤。我覺得要說，如果他們和里賓特洛甫舉行任何談判，我不相信會成功的。雖然李柏斯基進行把這個提議交給他的政

府，但是那時候大概已經太遲了。真的，對於希特勒，除了訴諸武力祇有一個變通辦法，就是波蘭代表謙恭地到他那裏，像許士尼格博士或者哈柴維統一樣，爲希特勒更大的榮譽，在有虛線的一行上簽字。就是這事情也得立刻辦到纔行，因爲他的軍隊正在焦急地問他「戰」還是「不戰」。

次日清早，我從和戈林接近的另一來源，得到了更確切德蘭建議的詳細內幕，即不是原本的話。我立刻把這些內容託英大使館參贊交給波蘭大使，他費了一早課把這些條件電話通知華沙。這是李柏斯基通話的最後一次機會，因爲一到晚上，德政府打所有他和波政府的電話及其他交通割斷了。英政府亦在華沙方面竭力設法。大約中午時候，我又把英政府的一個照會交給德政府，告訴他們波政府正在進行由柏林波大使和德國接洽，並請求他們同意在但澤由布克哈特作爲中間人，訂立一個臨時協定。我沒有接到這個照會的任何答覆。這樣又耽擱了約十二小時。據說波蘭政府已經命令波大使和里賓特洛甫商談，而希特勒却等着李柏斯基到底帶來什麼照會。在事實上，那問題是他有沒有波蘭政府所派全權代表的職權，來和德政府進行和解決這談判，所以那問題還不在他知不知道德國所提的確切條件。除此沒有別的能使希特勒準備再把行動遲緩下去了。德將軍隊已經準備好，而且波蘭應該受一次教訓，她須要屈服或者得到懲罰。

那天戈林有很多活動。我想他自己是贊成和平解決的，但是對這種事情，只有希特勒的決定纔有效力，不論戈林感覺怎樣，他不過是他的主人的一個忠心服從的僕人罷了。更有我已經說過，一年前他是堅決主張和平的，現在他也許不便第二次再主張和平。他請我那天下午去看他，我就在下午五時和福伯士到他那裏。當我聽說里賓特洛甫拒絕給我看的建議的內容，將於那天晚上用無線電廣播，所以我第一句就向他指出這件事或許會毀滅和平的最後希望，請求他竭力阻止這個宣佈。戈林的回答說他不能夠干預，他政府覺得需要把他們的建議廣播給全世界，以證明他們的「誠意」。

他的談話佔了兩個鐘頭的大部份，說起波蘭人民的不義，希特勒和他自己需要英國的友誼，還說到這種友誼對於全世界的利益，尤其是對於英國的利益。這是一個毫無結果的會談，我不能感到他所說的話，他本人會覺得是完全真實的，這些話我從前也常常聽見過，主要是想用來感動他的聽者而已。他在那時候竟用許多時間來和我談話，我就預知情勢不吉。幾天之前，他接任為德國國防會議（即戰事會議）主席，倘使不是所有的一切以及精小節目都已經準備好的話，那他一定不能在這麼緊張的時候和我談話的。

附帶說，這個國防會議的組織看出希特勒的心思敏銳。他選擇最受尊敬的納粹領袖，像弗立克，拉默斯，和可靠的芬克還有最平民望的戈林上將以引起德國人民的信仰。

。過分急進份子及不孚民望的人是不選在內的。這些人祇有一些比較不出風頭的工作，如對付中立國，組織內幕，及殘酷地壓制國內的不滿等，我對於我和戈林最後會議的一般印象，是覺得這是戈林最後努力想把波蘭脫離英國，雖然明知他不會成功。不過戈林在聽了電話回來，似乎很誠懇地告訴我們說李柏斯基正在去看里賓特洛甫。他似乎得了安慰，而且希望祇要能夠接洽談判，戰爭畢竟可以避免的。可是波大使和德外長的會面是徒然的。李柏斯基說：他不過是大使資格，並沒有討論或者談判的全權。他把一封簡短的照會交給外交部長，說波政府正在善意地考慮英政府所提關於直接談判的建議，而里賓特洛甫也不自這件事正式的答覆立刻可以送到德政府。他不會請教德國的建議，而里賓特洛甫也不自動給他。他們的會談僅不過幾分鐘。會談之後，當波大使再想打一個電話給波蘭政府的時候，他發覺已經不可能了。希特勒已確實決定他的時候來發動戰爭。他並不想和波蘭直接談判。現在就是最後的一刻了。

那天清早我打電話給德外交部祕書，提醒他德政府已經允許過把他們的建議書送交英政府，而如今沒有這個建議書的正式文件，我是多麼絕望，我請求他再去對里賓特洛甫提一下，把建議書交給我，一直到黃昏時候，我都沒有從魏薩寇那裏聽到什麼東西。在我和戈林會晤回來的時候，接到一個通知要我晚上九時一刻去看他，法國大境和美國

大使也接到同樣的通知，要他們分別在九時半和九時三刻去看他。我準時去看魏薩寇，從他那裏接到建議書的本文，還有我早已關照過的說明書，因為這兩種文件都已經在九時廣播過，我就責問現在把照會交給我是什麼意思。魏薩寇說他不過依照訓令行事，他不能再對我說什麼話。我只能從這個答覆裏推想到希特勒已經有了最後決定。所以我那晚上打一個電報到倫敦，說我再向德國提議什麼是完全沒有用的，因為現在事實已超越了提議，而我們唯一的途徑，就是表示我們以武力抵抗武力的決心。實際上在李柏斯與里賓特洛甫會談之後，立刻就發出進攻波蘭的命令。九月一日早晨，德軍不宣而戰就衝過邊界，同時德空軍進行轟炸波蘭機場及交通線。

照着希特勒的一貫本領，那時德國當局做出種種事情，來向德國人民證明波蘭是侵略者，而不是被侵略者。上午六點鐘英大使接接到一個乖戾的通知，告訴我但澤海峽已封鎖，不准航行和飛越了，這是因為可能有軍事行動以抵抗波蘭海軍和空軍的攻擊。戈林也給我一個通知，說波蘭已經毀壞維可羅拉河在德邱地方的橋樑發動戰爭了。同時希特勒發一個命令給德國軍隊，宣傳波政府拒絕他所提議的和平解決而新添武力，說波蘭境內的德國僑民受到流離的虐待，說波蘭人民是不再尊重德國國家的邊界了。每一種德國報紙都重複着謠言，說是波蘭人發動戰爭的，最後上午十點半希特勒在

召集的德國國會中，同樣也通知那些聚集的代表，說他是「被逼得用武力來防守德國的」。這是一個真實而有深謀遠慮的戲文，並且空前絕後不會有更有預籌和這樣小心計劃的侵略行爲。

接着就在那天晚上，我又奉到哈里法克斯的訓令，叫我通知德政府說：德國的行動已造成一種局勢，使英法必須進行援助波蘭，又說除非英政府接到德政府已停止一切侵略行動而準備着撤過波蘭領土的軍隊的滿意保證，英政府就要毫不猶豫地履行他對波蘭的責任了。同時又叫我要求一個立刻的答覆。我又受到命令，倘使德國詢問，可以對他們解釋，這個照會存有一種警告性質，並不能認爲哀的美敦書的。

我把那個寫好的照會於那晚九點半送給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收到時沒有說別的話，只責備着波蘭，是他們先動員。是他們先以正式軍隊侵略德國。他不問這個照會的正確性質，不過說他應該交給希特勒。我對他說這是必須的，並且我隨時準備等他給我答覆。接着法大使也受到同樣的訓令，送去同樣的照會，也接到一個同樣的答覆。

依照哈里法克斯的訓令，我在那天下午很早的時候，正式請求美國大使，在戰爭時期，照顧英國的利益。所有密電和祕密文件都燒了。全體大使館職員都捨棄通常的無用之物，集中在隔壁阿得龍旅館或大使館內。這些和其他安排都是以最高效力和最少混亂

進行的，這完全要歸諸英大使館卓越的職員的組織力和才幹。主要責任是由秘書長賀爾曼所擔任的。

九月二日是一個沉悶的日子。據報告波蘭人民已不顧德國的空軍和機械化部隊的極大優勢，在勇敢地抵抗聲勢喧赫的德國軍隊了。整天我們都沒有接到德政府對英法警告的答覆。

在那當兒，義國正在作最後的努力，挽回這個危局。那天中午時候，義大利大使阿托里哥到外交部去，順便過來看我，他說他須要立刻知道一件事。我昨晚交給里賓特洛甫的過牒是否一封哀的美敦書？我告訴他我受到訓令去通知德外長，如果他問我，我要告訴他這是一個警告，並不是一封哀的美敦書——可是他沒有問我。我告訴阿托里哥，我知道義政府正在提議雙方停止敵對行為，和立即召集一個有關係國家的會議。我說：對這件事我不得不表示意見，就是除非同時德國軍隊完全退出波蘭領土，這樣的提議是不會達到的。我催促他請求這件事。義大使反說，我不能夠代我的政府發表意見。我承認這是事實，但是我說，我不相信我們，更不會是波蘭人，能贊同更低的要求。

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在希特勒祇有兩種辦法：是武力解決或者是以武力示威而達到他的目的。「倘使想用武力達到你的目的，那必須堅強；倘使你要以談判達到你的

目的，那你必須更堅強」。這是那年希特勒對一個拜訪他的外國政治家所說的話。這話很清楚的表明了希特勒的技術。這正是他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所表演的，他那時也並沒有比一九三九年八月更加虛張聲勢，那時有兩面受敵的恐懼，蘇聯的敵視，至少不友好的態度，會阻止他和他的軍事顧問決定進攻波蘭的，一九三八年，在東線並無使他猶豫的原因，而他那時已預料匈牙利和波蘭一定有贊成他分割捷克的萬惡計劃的。要不是慕尼黑協定，他一定毫無疑惑地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已進攻捷克，就像他一定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進攻波蘭一樣，那末戰爭對於我們也許十一個月以前早已臨到了。在兩件情形下所用的方法是相同的；德軍在數個月的期間，逐漸動員，而且秘密集中於指定地點，不論什麼時候在數小時內更可開始進攻。

如果希特勒能夠以武力示威來達到他的目的，他也許會因又一次不流血的勝利，而對增加的威望感到暫時的滿足。但是等到世人驚魂甫定，又要舊戲重演，即使他的人民也不會開始厭倦這些層出不窮的危機。許多德國人民已經開始在渴望一個較和平的生活，除了青年，槍砲代奶油的口說變得不時髦了，而希特勒也許考慮過倘使這種行動停止的話，納粹革命不知會變成什麼樣，更有德國的財政經濟地位，倘使沒有內鄰或外鄰的擴充，是很難繼續下去的。在兩種交替的問題，爲着他個人逐漸增加的野心，和他的親

近的黨羽的野心，最動人的就是戰爭。所以他選擇戰爭。

倘使在他們覺得流血戰爭不會比不流血的勝利更有希望，那末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不會像他們所做的那樣了。以前對付貝尼斯，現在同樣的來對付貝克。希特勒常常想教訓他一頓，因為他認為波蘭拒絕他在三月裏對他們所提的寬宥的要求，是低卑的忘恩負義。從那時以後，他的動作以造成有利於他的計劃的情況為目的，或者誘使英法離棄他們的波蘭盟友，讓他在中東歐能自由行動。他受着里賓特洛甫的鼓勵不停地向這個目的做去。希特勒的一個最大缺點就是他除了兩次正式訪問義國之外，從來沒有旅行外國，所以對於英國心理的認識，他是信賴前駐英大使里賓特洛甫的，他能說英法兩國語言，在加拿大也住過幾年，所以他就被希特勒認為是熟悉全世界的人。可是里賓特洛甫對於英國的意見常常是錯誤的。

就是最純粹的獨裁者也受到他左右的影響的。可是希特勒的決定他的計算，和他的機會主義是他的自己的。像有一次戈林對我說的：「當進行一個決定的時候，我們不過像腳踏的石頭一樣。只有領袖一人決定的一。還是他的軍事顧問的意見有考慮的地步。我猜想是他們告訴希特勒的，說再有延誤的話，波蘭季節性的惡劣氣候必定會顛翻他們閃擊戰的計劃。他的軍隊甚至於在理恐他最後嘔吐，想總得英國中立所費去八月二十五

日到九月一日的那一個星期。

可是即使這樣，他的兵士的忠告可能僅是一種對於希特勒自己的計劃進行中的掩飾罷了，八月三十一日他的不能忍耐和突然的行動一定是預先籌畫的。整個夏季他已等待着他有利的事情，並準備抓住來到約機會。蘇德協定似乎是給了他所尋求的便利，如果他不想再敷衍英國，他是立刻要動手的，所以當波政府延遲了四十八小時，才派遣全權代表到柏林去請求條件，並且祇派一個沒有全權的大使。於是希特勒不顧波蘭準備直接談判，最後決定立刻進攻。

在九月二日下午，我把那天首相在下議院所講的演說送交外交部秘書，通知德國政府，在那篇演說中，張伯倫說英政府在波蘭被侵略時，不能同意義政府召集會議的建議，如果德軍自波蘭領土撤退，撤退得和德軍未用武力越界前一樣，那他們才願意。這是最後一刻的避免戰禍的最後一個機會，但是德政府保持沈默。

在九月三日清晨四時，我奉政府命令，設法與德外長在上午九點鐘會晤。那時要和外交部接洽很困難，但是我最後接到通知說，希密特由外長授權接收任何我將給他的照會。我在九點鐘正，把英政府的最後通牒交給希密特；指出我請求他們答覆九月一日的警告書之後，已經超過了二十四小時，而對波蘭的攻擊愈形激烈；現在除非英政府在英

國夏季鐘點上午十一時之前接到德國的停止進攻和撤退波蘭德軍的滿意保證，從該時起英德兩國即入戰爭狀態。希密特接收這個通牒，立刻去送交他的部長，德國答覆到十一點鐘沒有送到。英政府通知倫敦德國代表，自那時起英德兩國開始戰爭狀態。十一點十分，英國駐德各領事都接到柏林英大使館對此事的通知。

剛敲過十一點，我接到里賓特洛甫的最後一個通知，邀我立刻去看他。我在十一點半到他那裏，他那時立刻給我讀一件長文，開頭說德國人民拒絕接受英政府所發哀的美敦書性質的要求，說德國將以同樣武器同樣方式答覆英國的任何攻擊行動。該文其餘都分純粹是宣傳，預備給國內及中立國看的，想對德國人民及全世界證明所有發生的事件都應該由英國受譴責。我對這篇完全不符事實的話的唯一的批評是：「讓歷史去判斷，到底誰該譴責。」里賓特洛甫的回答說，歷史已經證明事實，沒有人比希特勒所做的更努力於和平及改善英德關係的了。他最後祝我安好，對這句話，我祇回答說：我很抱歉我所有和平的努力都已失敗，可是我對德國人民並無怨恨。從那時以後，除陪我們乘專車到鹿特丹去的一批人員之外，我沒有遇見過其他任何德領官員。我給德政府的最後正式通牒是奉英政府命令送去的一個照會，問德國政府是否遵行一九二五年所訂原草的日內瓦會議的條款，禁止使用戰時窒息彈，毒氣彈，及其他氣體與細菌的戰爭方法，後來

德政府由倫敦瑞士大使給我們所請求的保證，祇要英政府也同樣遵守原草本的條款。

法大使也以同樣的哀的美敦書在正午送交德政府，以下午五時為期限。十一點以後的幾小時柏林英大使館的電話線還在應用，但是到差不多下午四點，所有電話線都被割斷。所有在阿得龍旅館和大使館的人員完全與外界隔絕了，不過爲着準備我們的撤退，我的職員還在十一點鐘去看過陪送人員。我們受到很禮貌和關心的招待，而且得到通知，明天早上有一輛專車供我們支配，我們以後與外界的唯一往來是經過美大使館轉。他們的協助是極可貴的。全靠美國代辦寇克和他的職員們，沒有遭遇很大的困難。他們盡力幫助，使我們最後的二十四小時能平安度過各種困難；而我們在那個危急時期留下快樂的回憶，也就是我們對從美大使館所受到的偉大同情和自願協助的感激而已。

第十三章 下旗歸國

這本戲已經到了她的不可避免的最高潮，而九月三日那星期日早晨十一時的宣戰，就結束了她最後的一幕。在和里賓特洛甫中午會談了回去以後，我不會再離開過大使館，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寇克親自駕駛他的汽車才把我運到車站去，這也是他最後一次爲我服務。直到這最後的二十四小時以前，我仍然自由地在柏林街上通行無阻，不論是步行或是坐着插英國旗的汽車；我很高興乘此機會來聲明一件事實，就是在所遭到的這幾個星期，直到最後我們誘出德國的邊境爲止，我和大使館的職員始終沒有受到不禮貌的款待，即使一些敵意也不會感覺到。這和一九一四年八月間第十次大戰前夕，全不相同的。那時一批咆哮的民衆形勢洶洶地在大使館前，打破了她的窗子，並猛烈辱罵她裏面居住的人員和大英帝國。

我的感覺以爲全部德國民衆——那另一個德國——對於被強迫給他們的戰爭的觀念，有一種極度的恐怖。可是我只能判斷柏林一處，不盡知道全德國的奇跡，和開往波蘭的線去的兵車中的兵士，他們有怎樣的反應。而演習燈火管制，額麵包券，及已極普遍的嚴格統制的方法，絕對不是使民衆觀的一個戰爭的開端。我能夠說柏林普遍的一般空氣

是非常幽鬱和沮喪。每個國家應當有她的政府。可是德國人民對他們的當局如此順從，願草地屈服，那他們對於這次的戰爭一定要和他們的當局共同負擔這責任的。爾後他們是并無可憐的，我感到他們全體都在那裏受苦，不過是爲了九三八年九月裏失敗的納粹納粹注戰派到一九三九年八月裏抬頭了。也是爲了一個人有埃薩特烈大帝更強的個英雄主義而準備犧牲他們全體的快樂。

因爲我要親自知道德國人民在進攻波蘭後的情緒。我在那最後的星期六下午順着柏林最大的椒樹街散步，路上行人稀少，每個人面上都露着沒有表情，那時候巧佛要用一種催眠劑「鴉片精」，便走進一家店中去買。藥劑師憂愁地對我說，沒有醫生的處方是不能買藥的。我告訴他，我是英大使。他又說：他跟我道歉，因爲那限制是不能違犯的。所以我又說：「我想你沒有懂得我的意思：我是英國大使啊！如果你能用你的藥來毒死我！你會從你們的戈培爾博士那裏得到一枚大勳章呢！」他聽了這個小小的戲言，他那憂愁的面孔露出一些笑容，而立刻如數給我所購的鴉片精。這件事實真令人發傷，而爾後和達爾克同離大使館的時候，又感到一次同樣的悲傷。在離大使館門口約一百碼的地方，總有一個警察站在威廉街和椒樹街交叉處的崗位上。那裏的警察，不是屬於德姆萊赫密警察隊，大概是市警運的老兵士；在平常我經過那裏的時候，總向他表示敬意。可是最

後在那天早晨，當他看到我駛近的時候，他小心地將他的頭轉到另一個方向，裝着有意另一條路上的交通，他自然不能向我敬禮，可是同時他又不情願不理我。他對於至柏林和他都知道爲和平斡旋到底的人，是沒有惡意的。

當我們團體離開大使館，全部剩留的使館人員——十三位男人，七位女人和兩條狗——都集中起來。在星期E早晨，有一小堆羣衆，聚集在門外，看着我們的行李搬上軍用車。這是一堆絕對沉默的羣衆，如果他們心中有憎惡和仇恨，可是他們並沒有一點表示。無疑的那裏面一定有着便衣的祕密警察，若是他們能罵幾下「包圍者」和「戰爭禍首」，也就可以取歡他們的主人了，可是羣衆不發一聲。在柏林性的年長的一些人並不會被戈培爾的宣傳所誘惑，他們完全知道英大使館已盡了牠最大的力量來維持和平。

更有，從威廉街到有專車等候我們的却羅頓堡車站——路找不出「個鬼影」。整個的情勢表現出一種冷淡和不歡，或者可以說是迷惑昏亂。在三個月以前維繼馬遜麥克法給之籽而當大使館武官的達萊上校曾對我說：「這是一場奇異的戰爭」。他的話是真的，從德國人民的態度看起來，沒有人會猜到我們已經向他們宣戰，也沒有人能覺得他們想和我們打仗；這印象在我們經過的德國各處都是一樣。在一九一四年間，英法兩國使館人員所乘的列車，沿途必須將遮蔽物一直關着。這一次祇在我們的車輛到了大些的車站

例如在漢諾威稍停一盞的時候，纔將遮蔽機關了一兩次，可惡列車上的管理員還向我們解釋說：他祇是怕一批開着的傍觀者出於好奇的來找麻煩，我們纔將窗戶關上。德國街邊上的一批較爲年長的人都恐備着戰爭的慘狀。而那些大中有一位曾對我說：「他們那批人太發硬了。我們能怎麼辦？我們是太渺小了。我們沒有一點辦法。」德國的青年或許含着一股狂蕪的心思，但是年長的人，一定沒有。

古倫德率領的法國大使館人員，在星期一上午九時離開柏林。我們早動身大約兩個半小時。他們和我們同走一條路線。取道荷蘭，一直到我們鉅離荷蘭國境不過幾英里的時候爲止，一路平靜無事。可是在星期一晚間抵達來恩鎮的小車站時我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們停在那裏，等候命令再前進。顯然德國駐法大使館人員在離開巴黎的途中遇着一些困難，所以我們前面的法大使館人員所乘車輛已經不許開出德國國境，要等德國大使館人員離開巴黎所乘的列車也安抵中立國地界才行。我相信那次麻煩的起因是由於德國人的猜疑和酷愛互惠主義的心思，我們也同樣地被扣留，直等到從倫敦動身的德國駐英大使館全體人員所乘的輪船到了荷蘭領海時，方能前進。我們就停止在來恩鎮。值星期一晚間等到星期二下午一時半左右。我們的列車幸虧有一節發車掛着，所以我們不會感到不適或者受到無禮的待遇。我們的列車開到支線軌道上等着，沒有受人家詢問厭麻

煩。我帶了幾副撲克牌，所以我們能消磨這些時候。但這次事件有一個很不幸的結果，德國政府就將它當作藉口，扣留了幾位英國領事館官員在德國爲質，要等到全世界各國領事士上的德國領事館所有官員，完全安然地回到本國以後，纔可釋放。直等到聖誕節時那幾位英國官員纔終於被放行。至於我們此行，祇感到厭倦。我們在來馬尼拉時德國報紙，變得英國飛機曾空襲威爾漢漢博文海口，第一批傳單在德國散下，其中有幾離我們所乘車輛所在的支道並不十分遠。

最後我們在星期一下午左右，越過德國國界，下午七時抵達鹿特丹。英國駐海牙公使白蘭德爵士在那處很優渥地款待我們。那沃福伯士和我同在使館中過夜，其餘艦員安歇在離我們有幾英里之遠的斯開萬尼，這是荷蘭最著名的海濱旅館之一。

剩下來要我們做的，是尋一艘中立國的船隻，將我們載回美國去。這件事並不難辦起來那樣容易，但是畢竟讓我們乘坐荷輪「巴達維亞第五號」在星期四早晨黎明的時候從鹿特丹開往倫敦。我儘在前一夜就登輪；人數減少了，因為賀爾曼和另一位職員留在荷蘭，以加強海牙使館的陣容。當我們在第二天早晨走上甲板的時，我們看到三艘英國驅逐艦在我們的船隻左右和前面一層前進的愉快景象，他們是英國特派護送我們回國的，在我們船隻剛離開荷蘭領海的時候就遇到我們了。看了這隻艘靜悄悄艦上帶說談

的英國戰艦，我們這團體中的每一個人都和我一樣地受了感動，那一個美麗而日光普照的秋天，這幾艘軍艦一直保持著那樣的隊形，不過有時會有一艘突然加足馬力向前開去，隱沒在水天一色的蔚藍之中，或許是偵察別的船艦，或許是她的潛水艇偵察器聽着了「一些可疑的聲音」。不幸到我們大家都在艙內用餐的時候發生了僅有一次的真實驚駭。那時我們乘坐的「巴達維亞五號」輪突然因為水中有三枚深水炸彈接連爆發，全都受了震動。那是領前的一艘驅逐艦所投下的，離我們的船有三英里多遠。我們有希望地想像過了一會就可以聽見短短的一陣小砲聲。但是究竟發生了怎麼一回事，我們不會知道。當那艘驅逐艦回到原處，我們立刻發無線電報詢問「什麼運道」。收到的覆電祇是「來電已收到」一句話。據海軍部的訓令，一切事情，不許宣布。可是我告訴我的屬員在我們到達的時候，如果海關當局問我們有什麼要納稅的物件，那末唯一的答復，就是「一隻德國潛水艇」。

當我們望見格雷扶山德的時候。我們的護送艦便立刻離開我們，開回根據地去，大概是茶坦姆。我們的航程也告完畢。我們輪船靠了格雷扶山德碼頭之後，史柏來德的代理人首先上船，將我們帶來的兩條狗領到檢疫所去。我們在下午七時左右登岸。事實上我們等不着脚夫，因此福柏士脫去了外衣，領著其餘人員，親自將我們的行李搬上船。

上搬到火車上去。九月七日星期四，下午八時剛離邊，我們到了維多利亞車站。從柏林到倫敦，一共費了我們三日又八小時，我到柏林去的使命已經結束，而失敗也同時宣告完畢。

收場白

「凡屬自由之邦，無不欣欣，勢力強盛，不易被人侵凌，

但是祇有敢替別國出力的國家，纔蒙受無上的福祉。」

當我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裏離開阿根庭共和國的時候，我抱着滿腔雄辯和異辭的禱望，去維護世界的和平，雖則位低能鮮，亦必唯力是視的，我深信這件事祇有英德合作，纔可保證，所以我曾爲了這種目的，盡心盡力，奮鬥了兩年。可是天意不順，結果我遭了失敗，我在柏林所表演的一齣悲劇，至終在九月三日因戰事爆發而閉幕，但是我當時由失望而生的悲痛，現在不願再去想它。有一些人的責任遠較我的責任爲大，我祇是循着他們的指示而行事，他們也和我同樣地向同一目標努力，假使拿我和他們定然感覺到的悲痛比起來，真是值不得一提了。

來日戰爭結束戰幕重啓時的場面，究竟如何，現在沒有人敢說，就是戰爭本身的結局，究竟如何，也沒有人敢預測。戰爭包含形形色色的驚人事態，但是我所能想像的結局，不外是至終將擁護較高尚的人道主義的，假使不是如此的話，那末沒有一個世界能夠永永長存。這次戰爭在我們這方面，並不是爲了自私自利或國家的野心，真如約克

那約大主教所說：我們這次參戰，已經成爲一個代人出力的民族，無論犧牲如何重大，現在必須堅忍到底，直至我們的十字軍凱歌高奏時爲止。

我曾在末次的報告中寫着：這場戰爭將決定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應否把世界上消滅。雖然林肯曾在美國南北戰爭時，在葛茲堡的演詞中，這樣地重申這條大憲章中的永久原則，向來沒有任何人，比他說得更好，而且將來也不會再有人比他說得更好，但是他的這句話實在已成爲安格魯薩克遜族或英國的歷史的經緯。在那一部人類歷史中曾有幾頁是黑暗的。我們如果能時時虛心地記住那幾頁黑暗的歷史，那自然很好。但是我們因爲根本服膺人類的崇高理想，已經續清了我們的前途。英國聯邦確實是於一種偉大的理想的，由於現在的憲法，我們已經由狹窄的國家理想進入到全世界的國際理想。正如雷遊士於幾年前在布隆方丹演說時所說：「英國聯邦與我們這個時代所將實現的理想中的國際最爲接近。……假使……帝國及美利堅合衆國一旦分裂了，那末世界將成一片漆黑，世界將停止進化。」

這也就是我的信念。我們現在從事作戰，并非爲了伊澤或波蘭走廊，或德國與獨立的捷克或波蘭兩民主國間的界線。東歐國土的變動也并非不是我們正真關切的事件。我們是十字軍，爲了基督的理想而對異教教義作戰。要迫使他人對於國際間的協定發生誠意

和信任，要證明侵略是得不償失的，也是不應當有價值的，並且要證明戰爭或戰爭的威脅不可以當作一種遂行政策的主要而最後的工具。這些并不是空洞的口號，更不是僅僅幾句成語。今日的德國，在希特勒和他的狂妄納粹黨徒統治之下，國內所唯一崇拜的是物質上的力量，它對於它所偶然覬覦的任何土地，認為有用兵力或暴力強佔之權，至於那片土地上居民的意志如何，則完全不問，這是簡單而明白的事實。假使希特勒在慕尼黑會議以後，就能懸崖勒馬，還是可能和別國合作的，而且全世界也許結果會替他的天才喝采，同時對於他從前爲達到其目的而採用的手段，也許認為有幾處可以寬恕。他現在也許仍是一個有天才的人，可是他對於捷克的獨立已經默性地加以破壞，並且對於波蘭，曾經毫無理由地加以襲擊，因此使他自己在全人類的眼中，被爲威脅人道的最危險的份子，簡直是一個罪人。

他之所以能征服兩個獨立的民族，不過是因爲那兩個民族的力量，偶然比德國弱小一點，在這種錯誤的善行沒有獲得補償之前，我們是不停戰的。我們必須爲了弱小者而強硬到底，而且我們必須強硬給弱者做一個榜樣。世界前途，悉繫於此。

一切都要緊的是我們在和平恢復之後，到了安享太平的時候，對於道義上的原則和立場，必須和我們在戰爭開始時一樣約忠實堅持，始終不渝。我們必須證明我們的勝

利。是當之無愧，而且必須我們造成一次公正的和平。我們結束戰爭的方式，寧願對雙方屈辱之間，不再存留一點猜忌之感，並且要使德國所受到的痛苦，僅僅限於其個體們和漸探的制度，因為由於她們的野心和軍事侵略性，才使得德國遭受第二次的敗北，此後的問題將為德國是否將採取我們自己現在所流血爭取的文化標準。德國也許是願其悔改的，但是如果我們在戰爭結束之時，不能逼其從前滾登對於卡斯基利所蒙的訓練——就是：「認清我們的大目標，就是全世界的真正和平與安寧，並且還要各方籌劃，做達到這個目標的準備。」那末，德國一定仍會本性難改，一意孤行的。

在所有擺在我們面前的工作中，這也許不是一件很輕而易舉的事。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於勞斯拜。

附錄

附錄一

薩克首致英首相函

張伯倫先生閣下：

九月二十六日大函已由威爾遜勳爵帶下，余於晤談之際，已將余之最後態度再度向其伸述，惟對於來函中若干細節，茲再作書面答覆如下：

據布拉格政府聲辯，九月二十三日余備忘錄中之建議，較之該政府對英法政府之談話，超過甚，且謂捷克斯拉夫苟接受此項備忘錄，則其民族之生存必致完全失其保障，此一陳述，係根據下述理由，即捷克斯拉夫在能另闢途徑，免取軍事保護以前，必須放棄其原有國防之大部，因而該國之政治的經濟的獨立必致自行毀滅，不特此也，余所建議之交換人口，在實行時必演為驚惶逃遁之現象云。

余必須明白聲明，上項辯論余實難於理解，甚至不信其係出於誠意，捷克政府全部想視當前之事實，即依照余之建議，根本解決蘇台德日耳曼民族問題之真正協議，并非依據德國之片面請求（註）或德國之武力措置而定，實係一方面依據不受外力左右之自由

投票，他方面依據日後締結之條約協定而決定者。依據余之建議，不特舉行公民投票區域之劃定，即如公民投票之執行以及根據其結果而定奪之劃界，均須避免德國之任何片面決定。至其他一切細節應即保留以待德捷共同委員會之協商。

由以上關於余之建議之解釋及捷克同意割讓蘇台德區之事實觀之，余要求德國立即派遣軍隊佔領該區，實乃萬全之策，俾能獲致迅速而順利之根本解決。此項萬全之策實屬必要，使德政府捨此，而與捷克斯拉夫舉行普通之談判以謀問題之解決，則日昨余在演說中所述蘇台德日耳曼區域內不堪容忍之現狀，勢必繼續存在，而延續至何日尙未可逆料。捷克政府似係有意借端延宕談判之進行而欲延緩問題之最後解決。余實不能置會於捷克政府對德國所提供之各種保證，觀於斷往之事實，諒必爲閣下所亮察也，同時英國政府亦必不致施用任何外交壓力以應付此項危機也。

捷克斯拉夫將因割讓蘇台德區而失去其堡壘之一部，自爲無可避免之結果，倘吾人坐待捷克在其現所保留之區域內完成新的堡壘而後實行根本解決，則勢將迂延歲月無疑。此爲捷克人所反對之唯一目標。尤有甚者，或謂捷克將因此喪失其國家之生存與夫政治經濟之獨立，其孰能信之？德國之佔領僅及於假定的範圍，至疆界之最後劃定仍須俟與余早經奏述之步驟而進行，此於余之備忘錄中，曾明述之，捷克政府對於德國之軍事

捷克是否讓於此範圍以內，殊無加以懷疑之權利。但如捷克政府真未能釋然於懷，則臺灣政府必能保證余之迅速履行建議，必將隨德國政府簽字而保證之。余雖能再慮此舉，余日昨所作之演說，當時余曾明白聲明，對於攻擊捷克領土之見解余亦認爲可減。余將在余所簽定之條件之下，余并準備給予捷克之剩餘部份以正式之保證。因此之故，捷克之獨立決無絲毫問題。至謂捷克經濟將受損害亦屬謬論。反之，捷克在割讓蘇台德區域以後，將形成一較前更健全更統一之經濟機構，此固彰明昭著之事實也。

續布拉格政府對於最後餉區內捷克人民之處境猶不免戚然憂慮，則余儘能認爲可異而已。自德國立場言之，因捷克之措置而施於蘇台德日耳曼人之命運，決不欲致再施於此等捷克人民，自無疑義。

在此種環境之下，余不得不認爲布拉格政府因曲解余之建議之意義與目的，而企圖藉德軍佔領爲口實，以動員他國尤其英法二國之軍隊，希望得其種種援助，而掀起滔天之戰禍，閣下目擊此種事實，是否將繼續努力——對此努力余當藉此機會再向閣下致其殷殷之謝忱，——以破壞此種策略而使布拉格政府憬悟於此最後一刻，惟閣下審度抉擇之。

阿道爾夫，希特勒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於柏林

(註)此處「請求」二字疑爲「決定」之誤。

附錄二

英首相致德元首函

總理閣下：

關於英國政府所採取之某項措施，已由今晚報紙及廣播電台予以揭佈，閣下當已悉及之矣。

英國政府採取此項步驟實屬必要，因德國傳已採取軍事行動，且自德蘇協定宣佈以後，柏林若干方面曾表示英國相繼波蘭而出面干涉之事已不足介懷。竊人此種觀念之謬誤，莫此爲甚。須知無論德蘇協定之性質若何，英國政府所歷次公開宣稱履行其對波蘭義務之決心，斷不能有所改變也。

或謂一九一四年時，設英國政府能明示其立場，則戰禍或可避免。不謂此種論斷有無力量，英國政府業已抱定決心，決不容此大再有同樣可悲之誤解。

一旦禍患臨頭，英國政府決心且已準備發揮其全部軍事力量，毫不遲疑。戰事萬一爆發，其結局如何，殊難逆料。戰事一經發動，縱使參戰之任何一方獲得勝利，倘以爲不戢可告結束，則贖罪最危險之妄想也。

吾人之立場既已如此鮮明，余願再向閣下警告，貴我兩國萬一發生戰爭，必將造成空前之巨禍。余敢斷言，貴國人與我國人民均不願掀起戰端，雙方苟能排除猜忌，恢復互信，必能於較今日更佳之空氣中進行協議。余不信德波兩國間所發生之問題非用武力不能解決。

吾人業已準備且隨時準備設法造成有利之局勢，俾能進行此項談判，同時更能討論有關未來國際關係之更廣泛的問題，包括與貴我兩國一切有關之事件在內。

雖然，在目前之緊張局勢下，和平談判顯然難於進行，此種緊張局勢持續愈久，則理性之伸張將愈難。

但如雙方及各方能使輿論之攻擊及一切煽動挑撥之言行先期休戰，則此等困難縱不能完全消除，亦將大為減少。

此種休戰苟能實行，則在此時期內所有雙方關於少數民族待遇問題之爭端即可進行調查處理，吾人不難希望造成適宜之局勢，俾使德波直接談判各項問題。（如雙方認為有益，可請中立國協助調停。）

然余仍有不能已於言者，若非雙方預行諒解，任何解決方案一經決定均難實際執行之保證，則此項談判，成功之希望至為渺茫。必要時英國政府對於此種保證之有效執行

顧慮最大之勢中。

當此危機深重之際，余深信藉此而外，即無法避免使整個歐洲陷於戰爭之厄禍。茲鑑於各國當政者之行動將招致嚴重之後果於全人類，余確信閣下對於余所述各點必能深思熟慮，權衡輕重也。

納維爾，張伯倫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於唐寧街十號

附錄三

德元首羅英首相函（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送達英國駐德大使）

首相閣下：

竊由貴國大使轉下大函，辱承以英國政府名義指示閣下所認為絕對重要之若干問題。茲謹奉答如次：

一、德國從未對英國有意尋釁，亦從未干涉英國之事。反之，歷年以來，德國力謀獲得英國之友好，不幸徒勞無功。因此德國自願在廣大之歐洲領域約限制其自身之利益，此由國家政策立場觀之，實為難於容忍者。

二、然德國正與任何國家相同，享有其種族殊種之不容輕易放棄。假此等利害紛

不請出維爾廉度斯決定其國主要納稅條件所發生之必要無窮，其目的在保護其國重要之
海峽及英領土安全含有重大意義。任何時代之德國政府均不容許加以假說。又據英國知
，且耳曼蘇之稅務市及海關關稅亦被兩走屬國應持關於此種權利，即應與多數其國
歷史家及學者多亦莫不認此種事實。蓋在數年前曾論及此種不盡責之納稅條件凡
處於歐洲海峽勢力範圍以內之一切領土，尤其在十八個月以前所歸還德國之區域。其文
化之發展亦非得諸英人，而實發源出於德人之所賜，蓋已千餘年於茲矣。

且以吾人，德國已準備以正當合法的態度經由談判方式以解決但澤及「走那」兩區人然英國
所時時關於德國對波蘭之傳說，對任何等國侵略計劃之虛斷，以及此後所發表之新
保證宣言，均使波蘭依據此種態度以進行談判之意向，無疑為有矣。

四、英國所發給予波蘭之無條件的保證，即在無論何種情況之下，不關潮地衝突之
原因如何，英國將援助該國之保證。在該國亦僅能認爲一種鼓勵，此後由於此種條件
，將使波蘭國境內二百五十萬日耳曼居民所遭受之可怕有迫行為之兇嫌，更形加重。其
後所發生於波蘭之種種暴行，對於被害者殊為可怖，此在泱泱大國如德意志者實難容
而繼續袖手旁觀。波蘭對於但澤自由市所負法律上之義務均未履行，且曾提出種種放
棄式之要求，并特別一種經濟制度等。

五、是故最近德國政府遂設法使波蘭政府確知德國不復消極坐視事態之發展，不能容忍該國再向但澤提出哀的美敦書試之文告。不能容忍一切迫害日耳曼少數民族等之續發，且同樣不能容忍該國欲置但澤自由市於死地之經濟手段，換言之，即以十種機關對波蘭乘危脅釋人民之生命線，且亦不能容忍對於德國進一步挑撥行為之發生。此點姑勿置論，波蘭走廊及但澤問題必須迅謀解決。

六、閣下以英國政府名義向余警告，謂德國苟出面干涉上述種種，英國將表他援而波蘭，閣下此語，余已知悉，茲將確告閣下，德國政府對於保障上述第五節中所稱各項德國利益之決心，斷不能有何變更。閣下認為萬一戰爭爆發必將演成長期戰爭，並與德見相合。德國如遭英國攻擊，將見德國早有準備且早具決心。余已屢次向德國人民及全世界人士宣稱，漸與德國與其犧牲其國家利益（國家榮譽毋論矣），毋寧歷盡種種艱苦患難，此種決心，絲毫不容廢弛。

七、德國政府業已接獲情報，謂英國政府已準備實施勸員計劃，根據此兩所獲情報，此項計劃顯然係單獨針對德國而發者。此點對於法國亦屬適用，德國惟對英採取防禦步驟外，概從未有採取軍事行動之意向，且亦從未有，將來更不致有。攻擊英國或法國之舉動。對此首相閣下在大會中所作之勸告聲明，不特不認為蘇對德關係之改善之

種有計劃的感獲得爲一聯基高級之特考告圖下。其一事項專宜言候諸實事。其地爲
令德國軍隊立即實行動員。

八、根據和平基點以解決歐洲事件之問題。其地實向願諸者在德國。其地自及國家
和約簽字。禍苗以奉堅決反對和平基點。修改和約之各國。非至有顯各列強。改其地。其地
後。其地關係決難有真誠改善之可能。余曾畢生尋求英德之親善。然英國所採取之外交
姿態（至少至目前爲止）已使余確信此種意圖爲徒勞無功。他日苟能在此方面有所改善。
則誠爲余所萬分慶幸者也。

附錄 四

阿道爾夫·希特勒

德元首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接見澳德森爵士時所致口頭通知原件之附件。

下列爲希特勒八月二十五日接見澳德森爵士時所致口頭通知原件之譯文：

「德元首於談話間宣稱，英國大使於上次會談終結時曾表示英德兩國尚有互相瞭解
之希望，以是元首曾一再考慮，擬對英採取一種斷然之步驟，有如最近對蘇聯所爲而論
於最近締結協定者然。昨日英國下院之會議以及張伯倫先生與哈里法克斯爵士所發表之
演說，亦使德元首有感於中而願再與英國大使會談。或請德國全權代表與世界各國會談。

笑之假設，不列顛帝國擁有土地四千萬方公里，蘇俄擁有一千九百萬方公里，美國擁有九百五十萬方公里，而德國所有土地且不及六十萬方公里。究竟誰欲征服世界，實為明顯之事也。

「德元首對英大使作如下之通知：

「一、波蘭之實際搖盪行為已至不可容忍之程度，孰負其責似已無庸過問，倘波蘭政府推卸責任，適足以表示其已不復能控制其所屬之軍人。前夕又發生邊境衝突二十一起，在德防已盡最大之能事以維持紀律，一切事件均由波蘭方面挑撥而起，且德國民用飛機竟遭射擊。倘波蘭表示不負責任，實可證明該國政府已不復能約束其人民之行為矣。

「二、德國在一切情況之下，決心消滅其東部邊境之此類不安情狀。尤有進者，德國此項決意，不特為維持世界與秩序計，抑亦為歐洲之和平前途計也。

「三、但澤及波蘭危難問題必獲解決。英首相所發表之演說絲毫未論波蘭之危難程度，其可能的後果，充其量不過為英德二國庫一增轟烈之虛門而已。此項事實將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間之大戰尤為慘烈。與上次大戰相較，德國今後無須再在兩條戰線上作戰，德蘇協定係無條件而締結，且可表示德國外務政策上之重要變革。德蘇

兩國將永不復互相攻擊。此外，德國與蘇聯締約以後，將在經濟上獲得安全保障，是以支持長期之戰爭。

「德元首始終期望英德二國能成立諒解。英德間之戰爭多少必於德國有利，但於英國則毫無利益可言。」

「德元首宣稱德波問題必須解決，且亦將解決。然在此一問題解決以後，彼決將準備再度對英國提出一範圍廣泛之要求。彼為勇於決斷之人，在本案中彼亦能出以斷然之行動。彼信賴不列顛帝國，個人誓願保證其繼續生存，且願將德國之權力任其處置。倘（一）其殖民地要求能見諸實施，此項要求範圍有限，且能經由和平途徑磋商解決，彼對本案擬儘量延長其時限。」

「（二）彼對義大利所負義務，不加改變；易言之，彼並不要求英國放棄其對法義務，同樣彼亦不能放棄其對義義務。」

「（三）彼願特別強調關於德國不復與蘇聯發生衝突之決心，德元首準備與英國締結協定，此項協定如前所述非特將保證不列顛帝國在一切情況下之生存，且足以保證德國必要時將隨時隨地給予英國以援助。屆時元首且將準備接受一種切合於新政治環境，且在經濟上可以容忍之合理的軍備限制。最後，元首重新保證：彼對於蘇聯願不兼邊與

對於西部疆界之變更亦從未考慮及之。德國耗費鉅資所築成之西方防禦，將成德境之境之最後疆界。

「英國政府倘能考慮此種見地，則不特為德國之幸，亦為英國之福也。英政府倘拒絕此種意見，則戰爭即將隨之。無論如何，英國決不能更形堅強，上次大戰足以證之。」
「德元首重復表示，彼為一富有決斷之人，其本人實有堅持此項決心之義務，且此乃彼最後之進言也。在德波問題解決以後，彼即將立刻以一種建議提出於英國政府之前。」

附錄五

英國政府對德元首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及二十五日來函之覆文（目錄為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英國政府接奉由其駐柏林大使遞呈之德元首大函，已如所請各點加以注意。

一、德元首表示願以友好態度為英德關係之基礎，英國政府完全贊同此種意願，確信兩國間苟能成立垂久的全盤諒解，則兩國人民必蒙無盡之福祉。

二、德元首來函中區分問題為兩類：即征波爭端問題，及對於英德最終關係具有影響之問題。關於後者，德元首已表示準備在某一條件之下，向英國政府提出某種建議。

俾獲一般之諒解。英政府業經注意及之，此種建議雖僅略涉梗概，猶待續籌確定，但英政府準備於略加補充後即以此為討論之主題，倘德波糾紛能和平調解，則英政府準備立即作進一步之談判，俾以誠意達致妥協。

三、德元首所提出之條件，為德波齟齬必須先行解決。關於此點，英國政府完全同意。然一切均須由解決之性質與完成之方法而決定，此點之重要當為德國元首所熟知，但其來文隻字不提，如此英國政府不得不指陳，為求進一步的成功，必須明瞭此二點。英政府須注意英政府對波爾負有義務而必須遵守之，且此亦為英國榮譽之所在，英國政府不能因他國許給英國以任何利益，而對於足以危害其被保證國家之獨立之和解方式，表示默認。

四、英國政府認為德波爭端最合理之解決方法，應在包括保障波蘭主要利益之原則上互相同意而尋求之，倘憶德元首去年四月二十八日之演說，曾承認此項利益對波爾實屬重要。

然英國政府認為欲使德波達到協定之談判成功，事前必須獲有一種諒解：而任何解決方案必由其他列強加以保證；關於此點，英首相八月二十二日致德元首函中業已述及，英政府對於此種保證之履行，準備應事實之需要，而作最切實之貢獻。

英國政府以爲今後之第二步驟，應即由德波兩國政府以上述原則爲基礎，開始直接談判。波蘭之切身利益應予保障，解決方案應有國際的保證。

英國政府已由波蘭政府取得切實之保證，準備依此基準，開始談判，英國政府希望德政府亦能同意循此途徑進行談判。

英國政府甚望此項談判能導成協定，則進一步英德兩國間成立更廣泛更完整的諒解之談判門徑，亦將因而開啓矣。

五、德元首以爲德波關係最大危機之一，係由關於少數民族待遇之情報而起，此點英政府完全同意。同時由於邊境衝突事件以及關於虐待之報告及煽動的宣傳所造成之緊張狀態，實爲對於和平之不斷威脅。是以當前之急務，爲此類事變必須嚴加制止，凡未經證實之情報不應任其傳佈，以免激怒雙方，俾能有覓取解決途徑之充分時間，英國政府深信有關各國政府對於此事，必亦已加以充分之考慮矣。

六、英國政府已一再明白表示其對德波爭端所抱之態度，英政府確信德元首對於英政府爲忠實履行其對波義務起見，不惜出其全力以助成德波雙方自行和解一點，當已無復疑義。

英政府之所以重視此項和解的成功，不僅由於其所能直接產生結果，同時實亦由於

德元首所曾確切陳述之更廣泛的問題。

七、至關於由和平方式解決目前爭端，較之武力解決遠爲有利一點，在本照會中自毋庸再加贅述。武力解決所將產生之後果，在八月二十二日英首相致德元首之函中，已有明白之陳述，英政府確信德元首必能明悉英方之體認此類後果之嚴重性。

另一方面，英政府對於德元首在來函中所提及之軍備減縮問題，甚感興趣，並確信此項糾紛苟能和平解決，則必能在舉世支持之下，覓取有效辦法，俾備戰的狀態，得以安然納入和平貿易活動的正軌。

八、德波間各項問題苟能獲公平之解決，或可開闢世界和平之門，否則將使英德間增進諒解之希望爲之摧毀，而導兩國於戰爭，或竟使全世界捲入戰爭之漩渦。其結果倘竟如斯，則將爲歷史上空前無匹之浩劫。

附錄六

德元首對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英政府照會之覆牒（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傍晚由希特勒親交漢德森爵士）

貴國駐柏林大使已將各項意見，遞呈貴國政府，余所以感覺不得不提出此項意見者，蓋爲。

(一)重言申明德政府對於英法諒解合作與增進友誼，有其誠之願望。
(二)使人確信此種諒解決不能以犧牲德國生存攸關之權益之代價換取之，至以人疑正義及德國威譽爲基礎之要求，自更不容放棄。

由貴國政府之覆文及貴國大使之口頭解釋，藉悉英政府亦願改善英德關係並按德方建議之意義加以發揚光大，德政府獲悉之餘，至爲欣幸。

關於此點，英政府亦已同樣確信消弭德波間不堪容忍之緊張狀態，實爲達成上項願望之先決條件。

自去秋以迄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之最後一次，當時德波友好關係尙存，德國政府，提供爲雙方皆能接受之解決爭端方案，波蘭政府卒於去年三月予以拒絕，此事貴國政府亦已知之。同時該國政府以此種拒絕爲藉口及機會而採取軍事準備，此項準備正在繼續強化中。至上月中旬，波蘭事實上已入於動員狀態，而波蘭當軸之峻使，但澤自由市內屢出不窮之侵略行動隨之而起。同時該國政府復向該自由市提出最後通牒式之恫嚇要求。此後又實行封鎖邊境，最先尙出以關稅之手段，嗣後方變成會有軍事意味，進而妨害交通運輸，悍然以促成此一日耳曼城市之政治衰微與經濟崩潰爲其目標。

加之，橫蠻之虐待舉動及迫害行爲正不斷施於波蘭國內之大辟，日耳曼民族，甚且

變本加厲，殺害多數德國僑民，或以酷毒之條件強迫其遷移。此種事體決非一大強國所能加以忍受者。德國對此袖手旁觀者已歷有年所，今乃不得不採取必要步驟以保障其合法之權益。德國政府至此已不能不以最嚴正之態度確告貴國政府，事態已至最嚴重階段，不容吾人再加漠視矣。

德國政府之要求，恆與其修改凡爾賽和約中關於但澤之規定相一致：即收還但澤及走廊地帶並確保波蘭境內日耳曼少數民族之生存權是也。

德政府對於英政府在原則上亦已確信當前之局勢非迅謀解決一點，表示滿意。德政府更認為英政府亦必須確信當前之問題為一立待解決之問題，能除此種現狀蓋已刻不容緩，已無一日或一週之時間，容吾人之遲疑。蓋在波蘭之混亂狀態下，事態之續發而至德國所不能容忍之程度，乃屬極可能之專，此點必須隨時注意及之。英政府今雖或仍信此類嚴重衝突可由直接談判以謀解決，但不幸德政府已不復能持此同樣見解。蓋吾人嘗努力尋求此種和平談判，但不特未獲波蘭政府之贊助，且遭遇其堅決之拒絕，突然採取軍事之措置，而加以打擊。

英政府對於下述兩點特別重視：（一）急如燃眉之當前危機當迅速由直接談判設法消除之。（二）波蘭之生存權，應由國際保證方式在政治經濟的範圍內予以適當之保障。

對於此點，德政府謹作如下之聲明：

德國政府雖懷疑其成功之可能，但仍擬接受英國之建議而進行直接談判。所以然者，完全係受英國來文所給予印象之感動，即英國政府亦願依照面授英國大使之綱領而成立友好協定也。

德國政府茲願向英國政府及人民提供誠摯的保證，德國竭誠願與英國成立恆久之友好關係。

然德政府有不能已於言者，即波蘭疆域倘重行分配，苟無蘇聯加入，則德方將不復能負擔給予保證或參加保證之義務。

其他，德國政府於提出此等建議時，絕無妨礙波蘭切身利益或獨立生存之意。因此，在此種情勢之下，德國政府同意接受英政府之斡旋，由波蘭派遣全權大使蒞臨柏林。切盼該使命能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三）抵達。

德國政府將立即草擬可為波蘭所接受之解決方案，如可能時當於波蘭使節到達之前，徵詢英國政府之意見。

附錄七

德國致波蘭政府之覺書及說明（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晚九時十五分由德外交送）

交英駐德大使，該證書并未正式送交波方。

英國政府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之照會內曾通知德政府謂英政府準備出面斡旋，使德波兩國直接談判解決爭端，足徵英政府鑒於衝突事件之連續發生，及歐洲大局之日益緊迫，亦覺有迅速採取此項措置之必要。故德政府於八月二十九日之覆文中亦聲明德政府對於波蘭政府是否有成立諒解之誠意雖抱懷疑，但爲和平前途計，仍願接受英國之調停或建議。德國政府對於當前之局勢經縝密考慮以後，特在覆文內指稱苟欲避免歷史之浩劫，則必須採取及時之行動。因此德政府準備截至八月三十日晚間，歡迎波蘭政府特派代表之蒞臨，此一代表須賦有商討並決定談判之全權。

此外，德政府復指稱，德國可於波蘭使命抵達柏林以前將關於成立諒解提議之基點加以決定，送交英國政府。

德政府提出此項建議後，並未接獲關於波蘭派遣全權大使之宣告，反之，其所接獲之第一答復厥爲波蘭實行動員之消息，直至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午夜十二時，德政府始接獲英國廣泛籠統之保證，準備促成談判之開始舉行。

今德政府期待中之波蘭使節迄未蒞臨，德政府雖可不必再將其可能的談判基礎通知英政府，但因英政府曾提出德波直接談判之呼籲，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願乘英國致

送其最後覆文之際，將德國建議之全文向英國大使作正確之報告，此項建議原擬在波蘭全權代表到達時作為談判之基礎者也。

在此種緊張情勢之下，德政府認為有要求波蘭立即派遣特使之權利。

蓋波蘭大使既無協商之全權，復無談判之資格，由其近頃所進行折衝之結果，可以見之。德元首與德政府均持波蘭全權代表之駕臨，業已虛擲兩日之光陰矣。

德政府遂覺其對英政府所提出之建議至為公正而切實，但在目前情況之下，德政府不得不認為此項建議事實上已廢遭拒絕矣。德政府認為此時將德外長里賓特洛甫遞交英大使之談判基礎公諸於世，實為適當之時機。

德波兩國間現存之局勢，已至千鈞一髮，任何突發事件，均足使雙方嚴陣以待之軍隊立即發生火併。故無論何種和平解決方案，必須能保證現有之事端不復續發，且不僅東歐一隅為然，即其他地方亦應設法使其不致陷入此種緊張狀態，此類事端發生之原因實在於（一）凡爾賽和約所決定之國境界線之不合理，（二）割讓區域內少數民族所受待遇之不公平。

故於擬具此項建議之時，德政府即抱有覓取持久之解決方案之觀念，期能解除由不合理的國界線所造成之緊張局面，此保障雙方之主要交通線，並設法解決少數民族問題

，倘此而不能辦到，則至少可藉可靠之權益保障，以確保此等少數民族能有可以容忍之未來。

德政府以爲進行和平解決時，必須將一九一八年以來之經濟的及物質的損害予以暴露而完全補彌之，至兩當事國對於此項義務皆應具有拘束力，自無待言。

根據等此考慮，爰作實際之建議如次：

(一)但澤自由市具有純粹之日耳曼性質，應徇從該地人民之一致意志，將該自由市歸還德國。

(二)自波羅的海經馬里安魏爾特，格勞登茲，科爾姆，布朗堡之線，再由此向西延伸至甸蘭克之所謂「走廊地帶」，究應屬德抑屬波蘭，應任該地人民自行決定。

(三)爲達到此一目的究應在該地帶舉行公民投票。而下列之人有投票之資格：即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以還居住該地或於是日誕生於該處之日耳曼人以及在同日（即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居住於該地或誕生於該地之波蘭人卡秀勃人等。凡自該區被逐之日耳曼人應即返還該地，以便行使投票權利，藉以進行，客觀的公民投票並保證其必要。之規模的準備，上述之地帶應仿照薩爾區域之前例，由義蘇法英四強迅即組織國際委員會，共同監督管理之。此一委員會得行使該區內一切主權。爲達成此項目的起見，所有波

蘭軍隊，波蘭警察及波蘭行政當局，應於最短期間——期限另定——撤離該區。

(四)波蘭之海港率尼亞因其地域上屬於波蘭之居留地，為波蘭之領土，可劃出在上述區域以外。至此波蘭海港之確切邊界，應由德波兩國共同決定，必要時可由國際調停委員會勘定之。

(五)實行公允的公民投票，事務至為廣泛，應獲有充分時間以便從容準備，故此項公民投票應於十二個月以後始能舉行。

(六)在此期間，為保證德國與東普魯士間及波蘭與海口間之交通暢達計，應建築公路及鐵路，以利交通運輸，所有捐稅之征收應以建設交通工具及運輸設備，所必要者為限。

(七)此地帶將來應屬於何方之問題，純由過半數之投票取決之。

(八)不問將來公民投票結果如何。為保證德國與其但澤，東普魯士一省之交通及波蘭與海口之聯繫起見，為公民投票區域劃歸波蘭，則德國應得一保有治外法權之交通地帶，約自蒲托至但澤或實旭之一線，在此地帶內敷設雙軌複綫之鐵道。惟此公路及鐵道之建築務求不妨礙波蘭之交通綫，即應築於上述交通綫之上方或下方。此地帶之幅員以一公里為限，且作為德國之領土。若公民投票結果有利於德國，則波蘭亦可如德國同樣

建築公路鐵路及治外交通線，以便與其海港琴尼亞交通無阻。

(九)倘「走廊」歸還德國，德方預先聲明有權要求與波蘭交換人口，其範圍視「走廊」之性質而決定之。

(十)波蘭方面對於但澤所希望之任何特權，以及德國在波屬琴尼亞所應享之同等特權，應以領土主權為基準而商討決定之。

(十一)為消除雙方在該區域內感受被威脅之危懼起見，應使但澤及琴尼亞保有純粹商業城市之性質，即應毫無軍事機關與任何軍事設備。

(十二)公民投票之結果，不論海拉半島係屬於波蘭抑屬於德國，均應作為非武裝之地區。

(十三)過去德政府對於波蘭待遇少數民族之情狀既屢表不平，而波蘭政府亦曾對德有所爭辯，今德波雙方應共同聲明將此類爭議交由國際調查團處決之，該團之任務即為調查關於經濟及物質損害之申訴及其他任何威脅行動，德波雙方應負責補償任何一方少數民族自一九一八年以來所遭受之經濟或其他損失，並發還前此強制沒收之財產。其實在經濟生活方面受有侵害者，亦應予以全部之賠償。

(十四)為避免使留居波蘭之德人以及留居德國之波人有被各國歧視而置於法律，保

護以外，以及被迫從事違反其民族性之服役之可能的危機起見，德波兩國同意，以最廣泛而周到之協定，保障雙方少數民族之權益，藉以保證此等少數民族之民族性質以保存，自由發展，並實際運用，尤須允許彼等得組織團體以實現此項目的。雙方並同意對於少數民族決不強迫其參加兵役。

(十五)倘能在上項建議之基礎上成立協定，則德波兩國應同時聲明準備頒佈命令，迅速實行復員。

(十六)加速實現上述協定所必需之進一步的步驟，應得德波雙方之同意。

研究敵情的

井東憲著。牛光夫譯

日本的黑幕

版再訂增

本書內分七大章，都十七萬言，對於日本軍閥、財閥、政黨、議員、官僚、貴族、新聞界、宗教界之營私舞弊，荒淫無恥，互相結托，互相衝突之事實，作最無情之暴露，且因作者係日本著名文學家，其文筆之幽默滑稽，更使讀者不忍釋手，本書在重慶初版，不及一月即已售罄，今由本社再版，月內出書。

兩大參考

暴露敵國

日本工業資源論

安田莊司著。牛光夫譯

年來我國論述日工業資源之文章，幾乎無日無之，而有系統之著作，尙未見到，現值抗建時期，經濟建設，頗爲重要，所請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本書出版，足可彌補我學術界之缺陷。其優點甚多，最著者有四：

1. 資料豐富——內有將近二百之統計表格。
2. 立論公正——此書雖爲日人所作，但對日本帝國主義之弱點絲毫未加隱瞞。
3. 解說通俗——凡具初中程度皆可通曉。
4. 譯文信達——譯文雖係直譯，但絕無艱澀難解之處。

著名大兩的著

三 版 出 局 書 志 衆 三

總 理 遺 教

三民主義……………一元五角
民族主義……………五角

民生主義……………六角
總理遺囑淺說……………四角

建國大綱淺釋……………二角五
軍人精神教育……………二角八

建國大綱……………編印中
建國方略……………編印中

總 裁 言 論

三民主義之體系……………八分
及其實行程序……………五分
政治的道理……………七分
行政的道理……………七分

告川省同胞書……………六分
推進地方自治……………一角
治基本要務……………一角
國際大勢與中日戰爭……………一角

參 考 書 籍

新縣制論文集……………一元五角
到憲政之路……………四角
三年來抗戰史要……………四角五
黨員守則……………一角二分
領袖的認識……………編印中

五權憲法(王寵惠先生論著)……………編印中
領袖的認識……………編印中

黃季陸先生抗戰的認識……………三角
陸先識與發展……………八角
生講什麼叫做勇……………編印中
演詞識總理……………編印中

黨 員 必 讀 · 黨 義 書 籍

編 輯 部 : 成 都 紅 照 三 十 六 號 附 三 號

營 業 部 : 成 都 四 維 街 二 十 九 號

本 書 局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英德外交內幕

* 有 所 權 版 *
* 印 翻 准 不 *

經	發	發	校	譯	原
售	行	行	閱	者	著
處	所	人	者	者	者
各	中	黃	黃	楊	漢
大	國	大	中	中	德
書	文	白	夢	堅	森
店	化	柱	元		
	服				
	務				
	社				
	社				
	分				
	社				
	社				

實價：三元

(外埠加郵運費一成)

本書領到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審字 第 六 十 七 號 審 查 證

